

France 

[法] 洛朗·若弗兰 著 万家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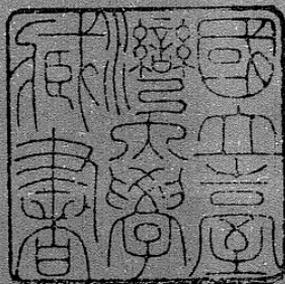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338657

1968年5月

法国的“文化大革命”



长江文艺出版社

2338657

Je dédie ce livre à mon oncle Antoine Lan
(谨以此书的中文版献给我敬爱的舅舅兰国安先生)

目 录

译者序 \ 1

作者谢辞 \ 4

前言 \ 1

第一编 学生危机 (5月1—13日)

第一章 巴黎大学的星火 (5月3日)

警察在圣殿 \ 3

第一次骚动 \ 10

政府犹豫不决 \ 12

第二章 学生暴乱的双重原因

出生率激增的 Saga \ 18

歌曲引起争议 \ 20

越南和流行音乐 \ 24

法国版本 \ 27

大学危机 \ 30

去女生房间的男生们 \ 31

选择入大学的方案 \ 32

佩雷菲特的计划 \ 34

3月22日运动 \ 36

学生政治的衰落 \ 39

小派别 \ 41

战斗中心 \ 43

第三章 农泰尔发生骚乱 (1968年1—5月)

达尼和游泳池 \ 47

工人的警报 \ 49

巴黎大学被占领 \ 51

他们谋杀鲁迪! \ 53

朱坎——犹太 \ 55

“西方”组织 \ 57

一切正常 \ 58

星火燎原 \ 61

第四章 法官们的周末 (5月4—5日)

学生参谋部 \ 63

睡觉…… \ 65

定罪 \ 66

第五章 骚乱 (5月6日)

出庭 \ 71

圣热尔曼—德普雷大街的战斗 \ 75

舆论支持学生 \ 77

第六章 长征 (5月7日)

实用主义 \ 80

走向星星广场 \ 83

第七章 退缩 (5月8日)

协调 \ 87
误入歧途的运动 \ 89
热斯马尔的苦恼 \ 90

第八章 战斗的前夜 (5月9日)

民心 \ 93
阿拉贡 \ 94
互助会上的激昂 \ 95

第九章 巷战之夜 (5月10日)

失败的谈判 \ 99
占领拉丁区 \ 101
街垒 \ 105
巴黎大学的插科打诨 \ 107
突击 \ 113

第十章 工会登上舞台 (5月11日—12日)

警察的暴力 \ 120
轮班 \ 122
蓬皮杜回来 \ 124
必须让步? \ 130

第十一章 10年,够了! (5月13日)

反戴高乐派的洪流 \ 132
解放的巴黎大学 \ 136

第二编 社会危机 (5月14—24日)

第十二章 1968年的法国社会

- 人口激增 \ 139
- 工业 \ 140
- 商业 \ 141
- 农业 \ 142
- 《稳定计划》 \ 143
- 统治阶层 \ 144
- 中产阶级 \ 145
- 工人阶级 \ 147
- 其他工薪者 \ 148

第十三章 蓬皮杜掌舵 (5月14日)

- 罢工先锋布格奈和克莱翁 \ 153
- 议会上的事端 \ 156

第十四章 学生公社 (5月15日)

- 词语革命 \ 162
- 雷诺启动 \ 165

第十五章 法国停滞 (5月15—16日)

- 法国总工会接上 \ 167
- 科恩 - 本迪在电视里 \ 169
- 海啸 \ 171
-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动摇 \ 171
- 走得太远 \ 173
- 戴高乐发怒 \ 176
- 戴高乐派内的叛变 \ 179
- 议会上的攻击 \ 183

第十六章 罢工中的法国（5月17—20日）

够受 \ 187

外省的五月 \ 188

中学生的革命 \ 189

卢瓦 - 谢尔省的红旗 \ 191

格里莫的苦恼 \ 194

萨特到巴黎大学，科恩 - 本迪自知之明 \ 196

居留权被剥夺 \ 198

第十七章 负重的战略家们（5月21—23日）

希拉克 \ 201

征询意见 \ 205

剥夺居留权 \ 206

占领市政府？ \ 209

走向格勒内尔 \ 210

政府分析危机 \ 214

第十八章 最严酷的夜（5月24日）

灾难性的高谈阔论 \ 218

冲突 \ 219

火烧证券交易所 \ 220

动乱的顶点 \ 222

第三编 政治危机（5月25—30日）

第十九章 格勒内尔（5月25—26日）

戴高乐败北 \ 225

格勒内尔的角色们 \ 227
各业最低保证工资：“傻事！” \ 229
蓬皮杜和莫斯科 \ 230
竭尽全力 \ 231
让步 \ 232

第二十章 从比扬古到沙莱蒂（5月27日）

塞吉的错误让步所带来的 \ 235
晕头转向 \ 237
法共的不安 \ 239
孟戴斯在跑道上 \ 241
一切都是可能的！ \ 244

第二十一章 密特朗摊牌（5月28日）

“我是候选人” \ 248
“求助于军队？” \ 253
戴高乐派的示威计划 \ 254
恐慌与分裂 \ 256

第二十二章 戴高乐失踪（5月29日）

“我拥抱您” \ 261
继任？ \ 262
孟戴斯掌权？ \ 265
失踪 \ 270
巴登 \ 273
马絮的“训斥” \ 275
下定决心 \ 277
将军的两个5月29日 \ 279
假象的黑幕 \ 280

阴 谋 \ 283

第二十三章 起死回生 (5月30日)

解散议会 \ 287

“我是不会引退的” \ 289

戴高乐派的洪流 \ 292

第二十四章 报 复 (6月)

学生运动的退潮 \ 296

三个死者 \ 298

恢复运转 \ 300

海啸·蓬皮杜将是胜利者 \ 301

尾 声

外国阴谋? \ 305

保守派的评论 \ 306

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 308

莫兰、勒福尔、卡斯托里亚迪和图雷纳的评论 \ 310

民主的假设 \ 311

附录

资料提要 \ 322

大事年月表 \ 345

略语表 \ 354

译名对照表 \ 359

译 者 序

10年前在巴黎弗拉克书店发现刚出版的《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翻开就被吸引住了。从那一刻起，就想把它译出来，献给中国读者，尤其献给那些渴望深入了解世界的中国青年一代。但由于昂贵的国外版权费和国内出版问题，一直使我望而却步。直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终于鼓足勇气向法国驻华使馆寻求帮助。承蒙法驻华文化专员罗歇·戴鹤白先生（M. Roger DARROBERS）的热情介绍，才顺利地与该原著出版社法国瑟伊出版社联系上。该社国外版权主任罗瑟莉娜·巴伊女士（Mm. Rose-lyne Bailly）竟十分利索地破例将该书的中文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简体字版权）批准签署给译者，使我久久难以相信。

尽管此书出版颇费周折，但在本院吴崇恕（院长）、金家兴（前教务处长）、熊平凡（科技处长）、高华（教务处长）和同事黄颂、颜善文、黄红发、严亚明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问世。顺向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友好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译者同样感谢法国的另两位女性：我忠实的朋友阿格妮丝·梅里克太太（Mm. Agnès Méric）一如既往地鼓励我支持我完成这项工作；在我院实习的中文学士戴丽娜·德勒波特小姐（Mlle. Léna Deleporte）帮我校对了法文难点。最后还要感谢妻子宫恩慈女士，逐页反复朗诵，往往因一字而反复推敲、斟酌并誉正译文，直到清晰流畅易懂。

作者在写作该书时，法国已有上百种关于五月风暴的文著出

版了，但作者并未把写作建立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而是重新采访与运动有关的一切人，上至部长、巴黎警察局长和各组织领袖，下至普通干部、学生、工人，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实录风格，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剔除了许多关于运动的讹传和错误的记叙。若弗兰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史态度和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社会史相结合的科学方法颇值得我国一些惯于综合、热衷抄来抄去的史学工作者们学习，此其一。其二该书的写法也颇新颖：全书按运动的进程分“学生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3编24章124节，均冠有生动鲜明的小标题，循日甚至循小时地记叙，全书正如法国的古老箴言“历史就是一部小说，尤其在法兰西”，且并未削弱其学术性、专业性，这对于习惯于时间单位模糊且过于理性枯燥的中国历史著作来说，的确值得借鉴。书后附有全面而准确的资料提要，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指南。当然，该书并非完美无缺，作者毕竟是资产阶级学者，即使属于左派，其观点和用语并非是不带任何感情的“纯客观”，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对马克思的“青年并不是一个阶级”的理解及托克维尔的唯心的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尤其对当时作者对越南共产党的观点明显是错误的。其历史方法论明显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相信读者自会分辨。

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该书的书名——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何以称这场“风暴”为“文化大革命”呢？因为这场“风暴”改变了法国，自1968年5月后，法国人的思维、感觉、谈吐、服饰，或者是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家庭生活、度假、休闲都与以前不同了。从那以后，法国“人人关心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权力归谁所有，而是社会的实际改变”。“另外一种生活的要求比另外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要好得多”。所以说“五月风暴”“在是政治以前已经是文化的”。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名曰“文化”，实则完全是政治的，把法国的

“五月风暴”称作“文化大革命”是十分贴切的。同时，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确实多少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译者并非法文科班出身，纯属自学，虽然在巴黎呆了好几年，法文还是个蹩脚货。对法国史也是只知皮毛，可谓才疏学浅，又处于无人合作的环境，独立译完此书实属自不量力，尽管钻研精神和认真态度可能弥补一些，且尽可能采取直译，以期体现原著的思想和风格，但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行家里手不吝赐教。

万家星

1999—2001 年于孝感学院

作者谢辞

作者首先应感谢一位杰出的能干的女大学生塞弗丽娜·勒格丽·德拉萨莱，非常有效地协助研究大部分的档案和谈话。

其次应该感谢所有的事件参与者善意地接待作者，与作者交谈，特别是阿兰·佩雷菲特，贝尔纳·特里科，米歇尔·若贝尔，穆里斯·格里莫，让-马赛尔·让纳内，路易·若克斯，伊夫·盖纳，以及阿兰·热斯马尔，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和雅克·索瓦热奥。

特别要感谢塞尔日·朱利，让-马赛尔·布格罗和让-路易·佩尼努自愿地提供他们的建议、反思及修改意见（当然，作者对本书负完全的责任）。

我的朋友让-吕克·普捷已经是一位活跃的出版者，给予作者以宝贵的热情，让-克洛德·吉耶博以他忠实的友谊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

前 言

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这场失败的革命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然而法国人总体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罕见的春天^①，才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再同于以往。从这个五月起，无论是他们的思维、感觉、谈吐、服装，或是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夫妻生活，度假休闲都与以前不同了。在1968年5月里，政权之所以没有被推翻，是因为最古老的家长制社会和乡村式社会的束缚在起作用，正是这种社会束缚使在这场难以想象的造反运动推动下跳跃了一大步的青年一代感到窒息。如今这种社会束缚已经被国家的迅速工业化所削弱。

诚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时期结束以来，所有的西欧国家都领略了文化的重大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准则被扰乱了20年。惟有法国把相当于20年的节目集中在五月这一个月里上演，如同一部史诗的序幕，惟有法国把无数个细微的变化集中在五月这一个运动里，这当然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注意。正如戴高乐将军在五月中所说的“法兰西一如既往，敞开了道路”，这不仅仅是戴高乐的爱国主义，而是共和国本来就到了一个纷繁的戏剧年代，法国人一如既往地历史风尚的改变赋予了史诗般的色彩。总之，在这个那么热爱革命的国度里，一次试图改变一切的革命只是多了一次失败而已。

^① 法国春天为3—5月。——译者

当人们对近 20 年里所有最重要的事件进行审视时，1968 年 5 月风暴无疑是第一个对象。舆论如此深刻地评论它，从而又掀起一场左右未来的认识革命，这是对这场迷人运动的最好纪念。舆论认为，一个充满发展的繁荣社会，一个具有稳定的享有盛名的差不多民主的制度，何以忽然欢迎骚乱，听任令人眼花缭乱的造反，经济中断整整一个月，疯狂地内战起来？实际上，这一代人比以往所有时代的人都生活得好。在大学第一次总动员的开端，求职的问题只是引起了小小的不安，接着就是向一切权威挑战，难以抑制的口头疯狂和无休止的街头事端。好在工人阶级被工会牢牢地框住，且缺乏某个“人民阵线^①”的支持，更缺乏准备和命令，其活动只是在提高购买力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范围内合法地进展，即使投入规范之外的活动，仍未超出重温 1936 年大罢工^②的范畴。法国是西欧中央权力最集中的国家，控制着电视，具有强有力的制度和按照自己的尺度建立起来的行政机构，即使在阿尔及利亚危机^③上升到极点时也幸存了下来。这多亏奇迹般顽强的政府总理和在动荡中姗姗来迟的老首长^④的天才领导。然而，这一切却在一个月里变了样！总之，五月逃过了一切范畴，驳斥了一切先例，在一切定义之外。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无法给这个运动命名，只有用一个平庸的中性名词“LES É

① 1936 年初，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等 69 个党派结成“人民战线”。工会号召举行总罢工，“人民战线”内的许多组织都参加了。罢工要求仅限于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范围。——译者

② 同上。

③ 1958—1962 年，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掀起独立运动，法国国内也因此发生危机。——译者

④ 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的召唤，蛰居多年的戴高乐于 1958 年 6 月 1 日正式出任总理，1959 年 1 月 8 日，正式就任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译者

vénements (事件)”来称呼它，直到我们选择了“Mai 68 (1968年5月)”这个没有内容的年月名称。确实很难找到一个较准确的词来称呼它。

人们经常议论这个运动，然而对于它的真实面貌，实际上是鲜为人知的。这首先是人口统计学的结果。现今半数的法国人在1968年处于12岁以下，或者没有出生。只有今天在30岁以上的人，才可能对这个过去的事件保持着记忆。人们可能并未注意到这一点。至于因1986年12月在大街上轰动而出名的新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出生在1968年左右。1968年5月对这些新的不满现状者来说，只是发生在他们父母辈头上的一段久远的往事而已。

其次是新书目的效应。尽管已有数不胜数的作品献给这场暴乱，然而至今仍未见到完全排开感情的，全面而客观地详尽描述它全程的东西问世。

1968年5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弄清1968年5月，必须同时对好些作品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比较补充、认真校正的研究。最新的叙述已经有10年了，最透彻的叙述也是在1968年的3年之后。但在那个时候，参与者们都还没说话，一切情节都没公开，所有的阴影都没驱散。比如说，必须等15年以上的的时间，才能确切地弄清1968年5月29日戴高乐将军究竟干了什么。或许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或许10年以后，巴黎警察局局长、议员们和部长们道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事，能正确评价政府和警察局的行为。真正值得分析、解剖、解释、争论并使这一切理智化的东西，恰恰是这些长期保守秘密的东西。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认识这个运动的时候往往存在误区。

一些人仅仅认为它是国家生活中一幕荒诞的心理剧^①，滑稽的题外语或令人不快的插科打诨。另一部分人，通常是青年人，认为它是由极左组织的头目们带入的一场充满疯狂的暴乱，一场飞舞着铺路石，对抗到白热化程度的街头战。还有一部分人，只是对这场危机的忽起忽落保持着有点神秘的凝固印象而模糊地回忆它、歪曲它。

同样有些人，在五月之后乔装打扮，有意识地撰写回忆文章，歪曲事实。这首先是政治的原因，他们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名言和革命象征的启迪下，法国将走向革命派和守旧派对抗的边缘，人们将有充分的理由从五月事件中看到这种深刻的动荡已经开始，下次将在一种形势下或另一种形势下获得成功。而且在政府里，在领导阶层里，如同在极左组织和部分官方左派的狂热世界里一样，认为下一个年代将被空想和革命所控制。正如活动分子们在群众中所煽动的：1968年5月只是一次大革命的“全面演习”，同样的历史话剧将继续演出，旧世界将发抖。

为了消除研究的障碍，人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湮析和错误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们同样担忧这场运动会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么，五月的另一特征将变得更加突出，即它在暴动时，可能被当时的争论所掩盖；它在五月之后，又被相当普遍的却是荒谬的北欧传说所掩盖。它的真实面貌就更难被人所认清了，即它并不是一场想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改变现存政权的暴动，而是一场想使社会民主化的广泛的民主暴动，而且具有日常的平和气息。

经过多年的争论，近两三年终于有了上述再发现，这将启发

^① 心理剧：根据精神病人生活中的问题编写的，由本人参加演出，使精神得到发泄而起治疗作用的戏剧。——译者

对1968年5月历史的重温。历史将从新的假设开始，结合五月的双重性重新研究，即除了对民主的憧憬，还有受救世主诱惑的重要因素。

历史如此容纳20年来积累的顿悟，也高度重视能给今天提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有益东西，尤其是再现暴动者和他们的战斗经历，他们的真实活动、困惑、犹豫、内心冲突及至缺点和冲动。因为在这个历史剧里有一些经过历史考验的神奇角色，即便他们是从微不足道中涌现出来的。正是这个五月，给他们提供了历史的舞台和精彩的话剧并使他们活跃非凡。

这就是我们将阅读的该书的意义，它以古老的方式和写作工具再现历史，启蒙更年轻的一代人。它十分重视事件的月、日、时，循日安排章节线索，配有鲜明的小标题。读者可以从中发现，该书是建立在现有文献资料和事实的基础上的，没有虚妄，并力求完整详尽和苛求两倍或三倍的容量，后附事件年月表和完整的资料提要，这将为寻找研究基准点，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五月已被泛滥了，因此作者重视事件的口述形式。第一章写了5月3日这一天，一个意外的事件如同晴空霹雳开启了危机，使读者一头扎进学生政治和行动之中。第二章是叙述这次学生危机的双重原因，同时解释学生的赌注的性质和重要角色的个性及一些小派别的由来。

通过对五月现实的严峻而曲折的情节概括，事件随着便自然系列起来，即经历了学生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直到最终的结局。第二阶段的开篇，关于法国社会近代史基础知识的概述是为了使读者理解大罢工和随后达到顶点的历史原因。对法国人认为的那可能改变政权的那令人晕眩的两天，叙述得尤为详细。

最后，读者可以在本书的末尾，找到在这段五彩缤纷的历史之后所涌现出来的主要作品的评价。总之，五月是一场民主的爆发，而不是一场革命。这个简单的感想首先来自开头的假设，其次来自事件平息之后才想起的一个极妙的已被五月进一步证实了的古老箴言：历史就是一部小说，尤其在法兰西。

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一章 巴黎大学的星火（5月3日）

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男青年把一块铺路石向一辆旧式雪铁龙警车掷去，旋转的上半身，展开的手臂，一个完美的曲线，近乎缓慢地，车窗玻璃碎片顿时横飞，一个黑影应声倒下。

这是1968年5月的第一块铺路石^①，打破了警察队长克里斯蒂昂·布律内的头颅，时间是5月3日17时半，地点是圣米歇尔大街，路易中学的前面^②。

这块铺路石象征着后来的一切。在没有计划，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投掷者瞄得太准了。这一幕的见证人之一罗朗·卡斯特洛，早已是学生行动主义的老手了，连他也说从未见过这等事^③。达

① 巴黎的老城区街道多用小方石铺成，巴黎的革命者有撬铺路石的传统，没有这个行动，巴黎的革命不算完成。——译者

② 这个镜头被《法兰西晚报》的一位摄影师当即摄下，并在该报上有详细的文字叙述，题目是《五月的日子》，《历史知识》专号，巴黎·阿歇特版，1968年。

③ 见埃尔韦·阿蒙和帕特里克·罗特曼合著的《青年一代》，第一卷《梦的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尼埃尔·科恩 - 本迪^①后来说，这个投掷者是他的“3月22日运动”（22 mars）的成员^②。

不仅如此，在那里有数千名围观者，大多数与警察对抗着，紧接着与警察斗争了3个多小时，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那一天，差不多所有大学骚动的领袖都被逮捕了，学生运动呈现衰退，只能重复无足轻重的小打小闹以表示反对不感兴趣的秩序，一些没有头头的小组织按溜出游行的惯例来到拉丁区^③。未去拉丁区的人留下来自由活动，其中的小头目们表面上很平静，脑子里却保持着步兵的警惕^④。这一小群人自由自在地在巴黎大学周围的空场上聚集。在1968年5月3日这一天，他们就打破了常规，事件形成。

这就是5月第一个星期的关键——所有的公众生活的骑士们纷纷落马，经受第一次锻炼。按照时代的修辞，这就是“群众运动”发动的奥秘：在一个星期里，5次游行，革命的少数派变成了暴动的多数派，而且在这种嬗变中，他们还在寻找革命的点金石。法国的这个由国内战争开始的、经受了双重非殖民化战争^⑤洗礼而幸存下来的、又成功地取代前一种共和政体^⑥，在经历了

①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Daniel cohn - Bendit）：德国留法学生，无政府主义者，五月风暴中最有名的学生领袖，书中将频繁提到并陆续介绍。“3月22日运动”是他在农泰尔文学院创立的学生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很大。——译者

② 与作者的谈话。

③ 巴黎的大学区。——译者

④ 引自雅克·贝纳克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文《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封版，1978年。

⑤ 1954年法国结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1962后结束北非殖民战争。——译者

⑥ 指戴高乐将军建立第五共和国代替了第四共和国。——译者

20次谋杀和一次军事政变^①考验的之后，终于赢得了民意政体，却要向只会以反对一切现实来显示历史风尚、只懂得煽动风暴而不会真正成功的、只知道大喊大叫的青少年组织屈服！这就是五月疯狂的第一周，学生们难以置信的胜利的一周，关键而又荒诞的一周。

警察在圣殿

然而，大学生们在5月3日的一个集会却失败了。这天中午，大约有200人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集会。这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为了揭露刚刚发生在农泰尔文学院的“法西斯恐怖和警察的暴行”而召开的。所谓“暴行”，表现为对8个骚动大学生的传呼，使科恩-本迪等出现在大学纪律委员会的前面；所谓“恐怖”，则由争论西欧小型运动中出现的警察的结实的盔形帽所引起。但终究是大学纪律委员会所采取的方式太不寻常而引起了事件。尤其是使舆论也为之震惊的明确事实再次突然出现：即前天，也就是三个月中的第二次，格拉潘院长宣布农泰尔文学院暂时停课。

“3月22日运动”有被驱逐出它的地盘的危险，它的头目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声誉开始受到伤害，这将使他惟有的号召力变得有些暗淡起来^②。革命学生联合会(FER)的一个托派分子开始呼吁与工人阶级建立神圣联盟的必要性。接着，法共《人

^① 由于戴高乐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反对此举的“秘密军组织”(OAS)于1960—1961年建立地下组织，先在阿尔及利亚，接着在巴黎制造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件，戴高乐险些在一次行刺事件中丧命。1961年4月22日，4名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叛乱，反对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的主张，被戴高乐迅速平定。——译者

^② 有几位作者已详细叙述了尤其是贝纳克，阿蒙和罗特曼也出席了这次集会，还拍摄了一些精彩镜头。

道报》主编乔治·马歇开始撰写有关社论。农泰尔事件已引起新闻报刊的高度注意，法国共产党（PCF）不得不有所表态。这位马歇是法共前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的老搭档，也是一位曾参与法共中央权力竞争的老同志，现在是一个坚强而有力的宣传机构的当家人，由他负责表态的工作。然而法共历来像当心瘟疫一样提防左倾骚动。马歇看不惯党内的这一倾向，进而否认法共的马克思主义专利，这使他在大学生中打开了影响的缺口，这无异于在为宿敌托派提神，或者是在仿效中国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修正主义”。马歇认为有充分理由对法共猛击一掌，因而他在僵硬腔调的嘲弄面前和笨拙迟钝的作风氛围里^①，仍然不放弃争辩。为了使自己的发言有力，他模仿法共代表大会的夸张：

“在工人和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向前的时候，左派小团体一如既往地关系到各个方面。”

“这是真的！”听众们喊道。

“尽管他们有错误，然而这些将近百来人的学生小团体却在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本迪的率领下，在他们称为的‘3月22日运动’中统一起来了。”

一阵怀疑的哄笑。“德国”这个限定词使听众们那么粗野地，好像是在模仿似的大叫起来：“犹太！犹太！”

马歇继续讲：“……革命的观点和创举可能只是在为某种嘲笑作准备。其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不能不注意，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子弟一方面藐视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另一方面迅速地暗淡他们自己的‘革命火焰’，以便将来继承他们父辈的事业和管理那里的劳动者。”

这下没有抗议。

马歇仅仅在大学生出身问题上剖析法共：惟有工人出身的大

^① 1968年5月3日《人道报》。

学生形成的有产社会环境才可能为政治活动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他们往往处在十字路口，而极左的大学生们通常出身低微，往往是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很难形成那种社会环境。然而，乔治·马歇的论据是笨拙的，也带有侮辱性。因为许多学生负责人是老共产党员的孩子或本人就是共产党员，通常二者都是，是政治冲突攫住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趋势，并不是出身之类的次要因素在起主要作用。经过五月风暴洗礼的青年一代，为激情所驱使，已经发现了一个敏感的事实：即从第一天起，骚乱的主要行动之一就被定格了——五月运动将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也是反对共产党的；这种表面的对称将不只一次：人们今天都知道，法国资本主义将失去的少，法国共产主义将失去的多。

插曲过去了，巴黎大学天井院的集会重新平静地进行。科恩-本迪讲话，然后是大家不熟悉的一个面容清秀、声音细弱的人讲话。他叫雅克·索瓦热奥，原是统一社会党（PUS）的活动分子，后来的确是无意识地重返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偶然地代替了辞职的主席，成为一个没落学生组织的代理职务者。在整整一个月里，他将是学生暴动的最合法的代表。这个聪明的但缺乏经验的男人，在暴风雨中将主要依靠统一社会党的前辈来保持航向。下午1点了，他的讲演仍没一点起色，集会的失败是明显的。由于集会已成为警察威胁的目标，不满现状者们在这里连积极同情极左派的传统圈子也没有动员起来。尽管集会人数不多，也尽管存在新生的“法西斯主义”和“警察镇压”的威胁，在场的学生还是毫不在乎地准备接受考验。午时，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参加者。

在这个时候，戴高乐将军的心情还是愉快的。他在爱丽舍宫进午餐，竟首先放起了他平时有点讨厌的爵士音乐《费尔南代尔》。然后，侍从特别送上一份刚出版的像敲响胜利钟声似的公报。这是美国和越南将在巴黎举行会谈的公报，为持续了10年

的越南战争寻找妥协。这是戴高乐历来的外交主张之一，他在有损西欧鹰派的情况下，在交战国中开启了和谈的大门，战争将结束，戴高乐的外交又一次取得辉煌战功。将军陶醉于斯，对巴黎大学的集会当然一无所知。他曾了解农泰尔文学院动荡的情况，并发出坚强有力的训令。5月1日，当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搬运工人送来他们传统的铃兰花束时，将军欠身对他的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说道：“必须结束这个农泰尔事件。”^① 这些捣乱分子还没在美越会谈即将开始的时候来巴黎捣乱呢！至于其它，我们正在进行必要的改革。戴高乐很早就敦促他的数任部长们实施选择学生进大学的政策，以便他这个高大虚弱的身体最后有力量拉住国家所需要的二流精华人才，因为已经从大学里选择了一些国家准高级负责人。然而，部长们总是支支吾吾，说什么民主化、大学的开放、灵活的方针、结构的适应等等。这一切，在将军眼里都是徒劳的饶舌，因为他看到的结果是这些非选择的预料之中的产品正在制造动荡。那么，至少要维持秩序，使小政治不至于妨碍大政治。

将近下午2时，约300名大学生重返巴黎大学天井院——大学左派惯常的政治集会广场。还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科恩-本迪趁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的一个活动分子指责乔治·马歇的文章的机会悄悄离开。这个热忱而顺从的活动分子同意他的领袖科恩-本迪的意见，对法共舆论企图使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学生运动脱离社会的导向迎头棒喝。一个小时就这样毫无生气地过去。这时需要刺激，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们于是登上舞台唱起无产阶级的战斗歌曲，想使与会者的兴趣保持下去。场面被维持到15时。突然，一个气喘吁

^①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吁的传讯人带来一个令人激愤的消息：上百个“新法西斯分子^①”在天文台组成了一个恐怖集团，排着密集的队伍正向巴黎大学开来。喔唷！随着这个根据不足的传言，集会者们立即行动起来。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UJcml）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好像重新找到了战斗的意义。他们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掏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并收拢一些走廊里工程用的石头。一阵狂热地喧闹和小型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大部分大学生正在上课，或正在很近的梯形教室里泰然地进行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学衔考试。凑巧“法西斯分子”就要来临，集会者将碰上比自己强的对手。

这些战略准备给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带来了强烈的反应，他害怕农泰尔的传染，同情农泰尔大船上软弱无力的船长——格拉潘院长的命运。他开始关闭控制不住的梯形教室和疏散里面的学生，此举反而起到了扩充小团体的作用。巴黎大学的那个小天井院变成了有堡垒保护的小兵营。因为警察们在不显眼的地方监视着集会的发展情况，但并未引起太大的抗议。校长然后召请警察的最高领导——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然而，这位局长因为没有很好地判断形势，没有取消他下午的一个小小的约会，而使后续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巴黎警察局局长正在巴黎上空的直升飞机上向一个专业记者介绍他的部门人员刚使用的巴黎新交通图^②。晴空万里，他看到了只有稀疏人群的巴黎大学，好像在嘲笑他的高度。巴黎大学在实施惯常的应急措施，警察局对历来在这种情况下关闭大学的两个入口，把大学分离成两个营地的应急措施感到满意，这回仍然如此。同时，由于有警察阻拦，“新法西斯分子”是不可能越过

① 指“西方”极右学生组织。——译者

② 与作者的谈话。

卢森堡公园的界限的,但巴黎大学的活动分子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5月3日中午前后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集会的极左派大学生们,正发热地等待着敌人——“新法西斯分子”的来临。目睹这一幕,总是忧虑的罗什校长想尽快地把他们从这块讨厌的驻地上遣走。由于年轻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派来的人员传达的部的命令是那么坚强有力^①,罗什才未勉强为之。罗什请来部长办公室的主任,两人认为警察全面干预的计划是适当的,因为巴黎大学不是农泰尔文学院,它要摆脱这一切。他们不得不违背大学传统的独立性,在上司的支持下,罗什召请巴黎警察局局长。问题是局长不在,他在巴黎的天上。警察局办公室主任犹豫不决^②。警察局应该进入巴黎大学这个马蜂窝吗?维持治安的老兵让·保利尼是警察局长的右臂,他熟悉他的上司的哲学——警察局应该尽可能少地在大学里惹事。况且,封闭的未知的外籍大学生住宿区处在大学动荡的边缘,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大学生群体中的不满现状者马上就会变成牢固的团结,直到不感兴趣时为止。

鉴于校方的请求,保利尼同时要求校方有一个书面申请,这得到了迪里和扎曼斯基两个院长的赞同,罗什在书面申请上签了简短的话:“请求警察局驱逐捣乱分子,以稳定巴黎大学内部秩序。”^③

14时50分,深蓝色的警服墙堵住了学校街路口,只有少数

① 阿兰·佩雷菲特已向作者证实了这一切。

② 穆里斯·格里莫在他的《五月使你愉快》中已详尽讲述自己在五月这一个月中的情况。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③ 见勒内·巴克曼和吕西安·里乌合著的《1968年5月》,《那一天》丛书,巴黎·拉丰版,1968年。

活动分子从居亚街逃离^①；大部分留在了那里，武器只有脚下的铺路石；头头们也在里面，喊着不冷静的口号。大学生们进退维谷，要么战斗、要么逃跑，或者毫无希望地孤注一掷，这都是无用的或者是危险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负责人阿兰·克里文^②，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雅克·索瓦热奥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斯特凡纳·贝格受委托上前与领导行动的警官谈判。他们协商了一个僻静处作为学生离开的出口。1968年5月运动就这样以一个口头协议开始，虽然是短暂的。例行公事的警察们开始检查这些“捣乱分子”的由校长签署的身份证。警察的人数很多，能够在广场上做好这项工作。大约有500名大学生被装上等在外面的大客车里。评论家皮埃尔·维昂松-蓬特^③后来说这是全面动手的错误，只要让肇事者离开，防止扩散就足够了，一切就会进入秩序。格里莫如果在场，可能也会如此决定。这次发生在拉丁区中心的大逮捕，更激起了团结一致的运动。“运动的爆发只是或迟或早的事，当时只等一个充分的借口，不在这一天出现，就会在另一天出现。”20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如是说^④。

① 尤其是贝纳克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朋友们都在这里逃走了，贝纳克的前书中已有叙述，这些人是皮埃尔·纪尧姆的老鼯出版社的成员，该社随后走不同的道路，做了罗贝尔·弗里松“修正主义”观点的传播者。

②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③ 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的革命史》，第二卷《失去父亲的时代》，巴黎·法亚尔版，1971年。

④ 与作者的谈话。

第一次骚动

由于缺乏“色拉筐^①”，警察对巴黎不满现状者之精华的装车活动需要持续三个多小时。这时，一些从后面逃离的大学生从拉丁区找来一些增援。这些增援有在圣米歇尔大街东游西逛的一些大学生，有集会迟到的一些活动分子，也有在大逮捕一幕发生之前半途而废的一些人。由于这一幕大逮捕持续了数小时，使如此的政治行动吸引了众多群众的注意力。于是一个小奇迹发生了，围观的群众中发出了喊声：“释放我们的同学！”“巴黎大学是大学生的！”“停止镇压！”群众马上齐声高呼。让-马赛尔·布格罗和布里斯·拉隆德都是一个小型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大学行动党(MAU)的负责人^②，向在他们面前忍着痛苦的阿兰·克里文^③问道：

“是谁惹来这些警察？”

“大概是新法西斯分子们……”

这个骚动的老手，知道现实是残酷的，靠经年累月的战斗精神往往是达不到成功的彼岸的。学生自发的团结行动往往伴随着职业骚动家的指导。如果是这样的话，像这样侵犯大学的独立，并如此拖拉臭长地装车，10分钟内就能激起事端。第一辆警车驶向喊声之中。“共和国保安队^④(CRS-SS)！”人们叫着，警察中也有如此叫喊的。第二辆和第三辆警车更震撼人群。警察开始掷催泪弹，清理巴黎大学周围。这时，警察队长克里斯蒂昂·布

① 指囚车。——译者

② 与作者的谈话。

③ 阿兰·克里文(Alain Krivine)，巴黎大学的年青讲师，西欧托派倾向组织，所谓“第四国际”——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的负责人，在5月中很活跃。——译者

④ 隶属法国内政部的流动治安组织，多半是雇佣来的。——译者

律内的额头突然被从20米外掷过来的一块铺路石打破了。这个消息即刻在警察中夸张地传开，一些警察甚至认为他们的这位同事死了。

雇佣的保安队伍没有任何应付游行示威的经验，加上近年很少出现骚乱。这些警察和保安队员们不知道如何确定暴力的程度而粗暴地袭击人群，他们在巴黎大学周围的分散行动开始变得盲目起来，催泪弹到处弥漫。他们面对着所有的人——大学生、过路人、商人、游客、酒吧间的顾客和河边的居民。警察把他们往下面的塞纳河边驱赶。雨点般的警棍，使人眼睛发蓝。

意外的冲突就这样发生了。在发生一般事端的情况下，一两名武装的警察就足够驱散人群。但这一次，学生们抗拒并且还手，他们同样想打开一个缺口，一边掷石头一边逃离。人们纠缠着警察，警察吸引着石块，警察陷于混乱。有人从卢森堡公园移来3辆出租汽车，并用石块垒成30厘米高的路障。1968年的专门闹事者们就这样在即兴中安排。抗议活动变成了骚乱。恼羞成怒的警察们更加盲目起来：亨利·达西埃去卢森堡仁兄弟电影院，在王子先生街被警察当着他朋友的面按倒在地，他只是与两个骚乱者隔得较近而已。在医学院街的一个角落，IBM软件销售员克洛德·弗雷什站在他的404号门前，好奇地问跑过来的警察发生了什么事，就接受了两警棍，而警察接着又追赶示威者去了。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一个卡车司机因熄火从车上下来，抡起手柄准备启动发动机，却吓得警察直往后退^①。在米歇尔大道周围的小巷里，尼科尔·勒盖内克^②和其他几个亲华派分子趁机掀翻停车场上的一些轿车。在圣米歇尔-圣热尔曼大街的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一个老会员亨利·瓦克坎看到一个组织的青年们

①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② 与作者的谈话。

正在像摇李子树一样摇着一辆警察局的大客车，他不禁喊道：“你们疯了！”青年们回骂：“住口，老混蛋，是你管的事！”^① 瓦克坎曾参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一切示威，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不远处，在圣热尔曼—圣雅克大街的交汇处，聚集着“罗密欧俱乐部”的孩子们，这个俱乐部专供郊区的青少年聚会，他们却用无产阶级的全部活力带头捣乱。在那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一个活动分子矗立在一辆汽车顶上大声喊：“同学们，这是发疯，你们撤退吧！不要跟随破坏分子！”但没有结果。

到21时，骚乱已被控制；大约23时，最后一批示威者才消逝。由于行人的帮助，大约两千名学生在街上坚持了三个多小时。警察们也完全超出了负荷限度。这个星期天，在10号轻罪法庭上，法官德米里埃讲述着他的不安：“星期五，我看到一些极端疯狂的孩子竖起路障，融化路上的沥青，挖出铺路石，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在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警察力量在示威者面前退却。确实有一些煽动者，大约40名。但我认为示威者大体上是自发的行动，为一种破坏的兴奋所驱使。”^②

政府犹豫不决

在警察局长格里莫的影响下，政府的反击将是审慎的。晚8时，校长罗什宣布关闭巴黎大学直到恢复平静。当内政部长富歇征询格里莫的意见时^③，格里莫正准备处理关在警察分局里的被逮捕的活动分子们。这位警察局长建议不要起诉并打算释放他们，因为骚乱发生在他不在的时候。格里莫提议放弃司法程序，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78年。

②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③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大学继续上课。富歇感到纳闷，对放任不管不安，他认为应由司法机关和学校当局严厉惩罚他们。实际上，从骚动的第一个晚上起，政府就在宽容和严厉之间徘徊。在现场，格里莫就在满怀信心地为让步和平息辩解。

此刻的爱丽舍宫，完全在考虑它的全球计划，深信此类十分次要的内政事务凭一点刚性就能解决。戴高乐将军要求恢复学校的权威，尤其是国家的权威。如果有闹事者，我们就处罚他们；如果有煽动者，我们就逮捕他们。大学生群体是希望学习的。抓一两个做榜样，多数党对捣乱分子将非此不可。

在戴高乐的严厉和巴黎警察局长的灵活这两种观点之间，政府将没有选择。这已经不是真正的管理了。当圣米歇尔大道的骚乱爆发时，总理正在德黑兰参观陈列在莱利银行地下室中伊朗王室的金银珠宝饰物。乔治·蓬皮杜是在骚动的前一天起程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的。按照法国规定，总理出访，应由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代理总理职务。出于分寸，司法部长仍然留在他的旺多姆部长官邸，只是谨慎地监察着马蒂尼翁总理府，加之总理办公室的主任是个有能力的总爱挖苦人的米歇尔·若贝尔，若克斯只能如此。若克斯是戴高乐主义的要人。当危机将发展时，他认为无疑需要让步，但他不是位置上的人。他是个总喜欢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人。他出生在1901年，选择了外交官的职业。1967年，作为一名外交代表，他与路易·德布罗耶和罗贝尔·比隆一起圆满地签定了埃维昂协议^①。他的戴高乐主义倾向始于1940年流亡伦敦的时候。同时他也是战前皮埃尔·戈特左派内阁的一分子，他从不否认自己的温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① 1967年3月18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达成著名的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同时规定，法国有在阿尔及利亚开采石油，使用军事基地的特权。

左派人士的发端。1967年他在一个艰难的选区里被选为众议员，又在投票范围狭隘的多数派内部赢得部长的职位，不可思议地如愿以偿，这真是他的一个小战绩。他，鹰钩鼻，充血的脸，也是酒和诗爱好者，人们曾看见他站在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上组织文艺晚会^①。他是政府的元老，但他的三个儿子却应召重返左派舞台，甚至是极左派。他的儿子德里是个学人文科学的大学生，将参加一切游行示威。“他与三四个同学分享一套西服，轮流地穿”，做父亲的笑着说。这样一个父亲怎么会为反对学生服务呢？20年后，路易·若克斯和蔼可亲地道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还是未能从上面吸引住这些孩子们。”^②至少，在他代理总理的头10天危机里，确实没出现一个加利费^③。

他之下的两名部长，也是工作认真的人。阿兰·佩雷菲特是戴高乐主义的一颗新星，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NS）兼国立行政学院（ENA）的双料毕业生，一个身居要职雄心勃勃的文人，正在细心地进行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教育改革，他为戴高乐所器重，但为学生们所讨厌，因为他一点也没准备从正面进行教育改革。克里斯蒂昂·富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最早的抵抗运动成员和最早的戴高乐主义者之一，1940年6月17日就到达了伦敦，而戴高乐还是19日到达的，他万分忠实于戴高乐，他颇具军人风度，眉毛炭黑，声音洪亮，体质上可与博沃广场媲美；精神上却差多了，他有文学天赋、爱发牢骚，还有爱任意指挥行政长官的毛病。其实他刚离开教育部，交托他后面的改革，并高度评价教育界。他为获得乔治·蓬皮杜交托的内政部的领导权而自豪，这下可没准备一个字的牢骚。他将是“第五共和国最美丽

① 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② 与作者的谈话。

③ 加利费（Galliffet），疯狂镇压巴黎公社的一名将军、侯爵。——译者

的成果之一”。其实，这三个男人都宁愿宽厚、人道，都在约束部下粗暴对待青年人的行为，因为这些青年人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将在风暴的开端期间掌舵。当然，他们还是保守的，有时是陈旧过时的，对专制的权力往往感到是负有责任的，甚至有时披着庄严的外衣专横地检查电视。国家权力本来就像菩提的触手一般向四面八方伸展，无处不存在。至于司法机关的监督，或是国会的调整，只能慢慢地来。但他们总萦绕着保护青年人的念头，不惜一切地避免流血。富歇后来曾对菲力普·亚历山大^①说过：“我惟一的忧虑是如何避免流血逐步升级。我常回忆1936年2月6日^②，那时我也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我仿佛再次见到了血淋淋的死者 and 伤者及震动巴黎的惊人事件。当然，在我们想制止骚乱的时候，能够在技术上做好。只是这样会使我们的正火旺的骚乱引起整个欧洲的关注。”^③

巴黎第一警察——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一直遗憾自己没能走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门^④，他爱好能够毫无束缚地倾诉哀情的诗和小说，它们是那样高雅而细腻，然而他却变成了有权威的高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首脑，在省长中也是突出的，这要求有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刚毅的性格。现在将要用暴力抑制来稳定秩序，职业的偶然性给他安排了当警察局长这个没有一点先天心理准备的高位。在这种矛盾的工作中，这位1/4的文学家决定

① 法国作家，著有关于五月风暴的书《爱丽舍宫在危急中》。——译者

② 1936年2月6日，肖当内阁因财政丑闻倒台后几天，各联盟组织在波旁宫国民议会周围集体示威，声讨与“盗贼”勾结的议员。后来开了枪，有几十人死亡，大批人受伤。——译者

③ 菲力普·亚历山大和乌拉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④ 与作者的谈话。

用有效的缓和来促进恢复秩序，他鼓足勇气，遵循他的路线——不流血地抑制骚乱，而又坚持原则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路线。

学生们悲观地蒙着眼睛，像诅咒恶魔一样诅咒现实制度，现在又过于严峻地负载现实，无克制地筑起街垒，这就是悲剧的大悖论：秩序的支柱本来更喜欢橡皮棍离笔杆子远些，榴弹离言论远些，然而现在却这样了。如果没有戴高乐将军的强硬和他的怒骂，学生的骚乱毫无疑问会很快平息。他们不是不知道示威者对他们的公论：强硬将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强硬的命令至少应与执行中的缓和相结合，尤其在关键性的骚乱开端。倒是没有经验的临时组成的处在裂缝边缘的学生参谋部，将以惊人的手段向前猛冲，要弄政界人物如同玩走马灯。看来，他们的背后存在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

第二章 学生暴乱的双重原因

自发的行动，是5月3日的真谛，对“3月22日运动”和大学危机都可以如此肯定地解释。群众则只是弄不清其中的名堂而滞留街边。他们太不了解这一代人的组成，圣米歇尔大道上闹事者们闹事是有原因的。这是西欧国家历史中很奇特的一代，这次是这一类型的人首次登场。在讲述动乱中的学生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有关一些歌星的家系史。我们可以从有关姓氏和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中去寻找：比思莱家族，罗林·斯通斯家族，埃尔维丝，鲍勃·迪伦，让娜·贝兹，一个民族的合唱团，还有卡尔纳比·斯特雷特^①和“向同伴敬礼^②”等等。他们是五月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伦农^③在五月中将扮演比列宁还要重要的角色^④。

马克思主义手册里说：青年不是一个社会阶级^⑤。然而，在1968年5月，这个特别群体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巴黎和外省形成大学生和中学生团体，不仅仅是在游行示威中，而是在运

① 均为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英国和西欧流行的家族摇摆音乐团体。——译者

② 原是一首著名的摇摆乐歌曲，后成为一摇摆乐团的名称。——译者

③ 约翰·伦农(John Lennon):美国著名的摇摆舞歌唱家和喜剧丑角。——译者

④ 青年文化现象的重要性随后经常被赋予了极左影响的关于1968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的无数解释所掩盖。虽然那个时代有叙述这个内容的大量文献出现，但被阶级斗争的理论家们同样打入了冷宫。而埃德加·莫兰仅仅为了举个例子，自60年代初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用了“小阿飞”这个词，却一直风行并流传至今。

⑤ 阿尔蒂塞仅仅为了引用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便竭尽与之相似的概念大肆攻击“青年”整体。他认为，人们不能用任何方式来混合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工人或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此处应指教条应用的马克思主义。——译者）往往有碍理解现实现象。

动中有团体出现的所有地方，大学里、中学里、咖啡馆里、街道上、广场上，一直到家庭中间。在工厂里，青年工人总是站在前列，热情洋溢，斗志昂扬，富有战斗效能。也许，青年不是一个阶级，但在1968年春天，青年是无可争议的先锋队，在学生运动需要迅速一致的社会响应时首先涌现出来，然后才是一般的社会接替。既然青年在这个把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年代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就应该是时代的。必须以缜密的理性分析，使它的作用明朗起来，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整个一代青年^①。这就是回顾历史。

出生率激增的 Saga^②

1942年，无疑是国际冲突空前激烈的年代。法国的人口统计学是明确的。在这个黑暗的年代里，出生曲线骤然上升，毫无疑问是有1940年的战俘从1942年开始遣返回国与家庭团聚的原因。这是一个长的生育期的开端。或许是被同盟国的胜利所鼓舞以及被大规模恢复建设的乐观所驱使，也许是出于对经受了最严峻的历史考验的制度及未来的信任，西欧民主国家的居民一下子敢于进行远远超过战前的生育。在1945年至1965年之间，生育

① 已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口头禅。自社会学者和统计学者在他们的分析里有了青年一代的重要位置以来，青年一代的分析就有了它庄严的学科。实际上，从1958年，阿尔弗雷德·萨维在《青年的攀升》一书中就开辟了分析青年一代的道路，巴黎·卡尔曼-莱维版，1958年。他说：“当然，青年将以冲破反对接纳他们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老顽固们的老思想而告终，也将以进入职业和要求他们的权力而完毕。但那将是一个好闹事的和政治混乱的年代。”另参见德里·凯斯莱尔的著作《生活的周期和青年一代》，巴黎·埃科诺末卡版，1985年。

② Saga(萨加)：在冰岛语中是故事或传说的意思，原在民间口头流传，到十二三世纪，被整理成文字，用散文叙述，中间插入古代诗歌。大致分历史记载和传记、神话和英雄传说、骑士爱情故事三类。欧洲人常用该词指令人瞩目的事实。——译者

的百分率大大超过了居民的生育界线。20年孕育了奇特的一代，也就是对80年代以及后来的30年负责任的一代。

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战后的西欧一下子接受了出生率激增这个令人瞩目的事实。在西欧的三块大陆^①上，共有数百万激增的孩子。他们不了解发生在他们土地上的战争，更不了解发生在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战争，他们一般在迅速发展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将体验“富足社会”的一切成果——文化的、有益健康的或邪恶的。关于他们的简单统计数字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们必须吃饭、穿衣、居住和受教育，因而直接地派生出消费品、不动产的飞速增长以及一个相当数目的学校设施的匆忙建设。一切就像突然向西欧所有的壁炉里全面投放无限的能源一样，只有生产生产再生产。这些在匮乏中出生的激增的一代，在社会刚开始充裕时就到了结婚或生育的年龄，到社会繁荣时都成人了。

尽管他们的父母努力地工作，但还是配给不平等的购买力，而且商品经常涨价。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亲生父母所经历的。这些50年代的成年人——他们的父辈，不久就形成数不胜数的服从整个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的孩子们却不需要这些，他们与自人道主义产生以来的所有时代的人截然相反，不知不觉地就从孩提时代到了成年，15岁到25岁之间的青少年人数越来越多。父母出钱，他们读书。到了既独立又依赖父母的中间阶段的年龄，用功学习只是偶尔为之，剩下的时间里无所事事。他们已经到了能够读写、梦想、恋爱和娱乐的年龄。就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新的意识在西欧产生。

在50年代，这种独特类型的青少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到他们20岁时，就任凭所有的人高兴地夸他们是在一生中更美好

① 指法兰西大陆、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译者

的年龄。

西欧是商品世界，战后埋头苦干的青年人都有宽裕的零花钱，加之有清偿能力的市场已经形成，青少年一代马上有了他们的独特音乐、服装、电影和报纸，也有了他们的队伍特征和用语，总之，有了他们的世界。

在这一代既受约束又开放的青年眼里，旧世界的规则过时了，社会、科学、自然、工业托拉斯等，一切都要改变。宗教也被超前的伦理宣传削弱了。轻松、性欲、音乐和人造麻醉与已转向社会成果研究的传统学术一样具有魅力。

歌曲引起争议

爵士音乐打开了个人自由的道路；摇摆舞——粗野和力量的衍生物，改变着一切事物的透视角度。开始，对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少社会批评。埃尔维丝，巴迪·霍利，查克·贝里或是吉恩·文森特^①的崇拜者们只是向往在成年时能有他们那种生活方式——跳舞、调情、狂欢、过节。然而，在精密工业和宗教伦理的社会里，这些欲望是具有破坏性的。摇摆舞由于它的腔调肆无忌惮，服装奇特，手势下流而引起公愤。电影院也拉走和征服了部分青少年。詹姆士·迪安^②或是马龙·白兰度^③在大部分青少年眼里，简直像是半个上帝。

美国摇摆舞是在英国创立流派的，三四年后就成为搅动英国的“流行革命”，同时传遍全世界。那些“无产”青年被一个电

①② 均为五六十年代美国和西欧的摇摆舞明星和喜剧丑角。——译者

③ 马龙·白兰度 (Marlan Brando)，美国电影演员，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译者

池组和一些电吉他推到疯狂的巅峰^④。比思莱和罗林·斯通斯被推到庞大的西欧青少年军团前面而征服了全世界。法国“小阿飞”运动的诞生就是起源于对英国青少年的模仿。约翰尼，西尔维，埃迪，迪克·里弗斯，里夏尔·安东尼，希拉，克洛德·弗朗索瓦和弗朗索瓦兹·阿迪^⑤在改革影剧业试图影响青少年的意识。工业界为这次文化转换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半导体收音机和电唱机的价格极大地降低了。同样简单的节奏，同样幼稚的老调，同样疯狂的动作，竟使全世界的青少年相通。

他们的父母只相信工作和家庭，原因就不必说了，是他们使这一代人激增并发育成长的，也被孩子们如此肤浅搞得晕头转向。青少年一代的冲突就从这种“代沟”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这已是报刊和电影编剧们的口头禅了。人们试图抑制青年一代，使他们少异化一点儿。然而，在那些年里，即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青年们就与表达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的歌曲无形地连在一起，越来越明显地反对他们的父母亲。

大部分出身于工人阶级或纯小资产阶级的歌唱家们开始愈来愈对那些音乐产品持批评态度^⑥，而约翰·伦农，米克·贾格尔，鲍勃·迪伦，让娜·贝兹先等有超级天赋的思维型喜剧丑角名家却不想走正道。也有些工人出身（他们中的某些人）的名家，却嗜好煽动，与美国黑人音乐家经常往来，过度地嗜酒麻醉，不断地探索音乐和服装的怪奇，逐年越来越远离一般的规范。比思莱家

④ 见比思莱的两部引人入胜的传记，与菲力普·诺曼的《呐喊！比思莱在他们的一代里》，伦敦·沃纳·布克斯版，1982年；与雷·科尔曼的《约翰·温斯顿·伦农》，伦敦·西奇威克和杰克逊版，1984年。

⑤ 均为五六十年代西欧著名的影剧业人士。——译者

⑥ 见贝特朗·勒莫尼埃：《60年代的流行革命》，巴黎·拉·达布尔·龙德版，1986年。

族探索音乐的怪异与宗教静修，罗林·斯通斯家族复活没有装饰音的摇摆舞的原始活力，鲍勃·迪伦以卓越的天才埋头研究美国的“新教徒梦幻”的传统，培育拒绝越南战争的美国大学生和青年一代的复仇歌曲，这一切都具有敏感的节奏和口头的煽动力。在这些权威色彩的影响下，数十万青年彻夜学习杰克舞和吸大麻，长期旅行，满足性欲，做白日梦^①。70年代，一种新的伦理形成，容忍古怪、开放、金钱、嘲笑、和平主义、天生的幽默、拒绝权力等等。绝大部分人不赞成这些，远离并谨慎地看待这些，或者保持克制，总是尊重道德老人。然而，他们总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青年人第一次集体擅取他们长者的评判权力。但或多或少地，民主国家的青少年也有将在伦理的分裂中重新找到道路的。

当时，在“激增的一代人”看来，下一代人的历史就是在上一代人的历史边缘展开的，也是上一代人未经历的或被忽略的成年世界故事的续篇，或完全是上一代人逝去年代的真正故事情节的显现。歌曲《比思莱玛丽娅》的涌现；比思莱家族和罗林·斯通斯家族的支持者掀起的一场可与世界性冲突相媲美的轻浮辩论；1962年，鲍勃·迪伦和约翰尼·哈里迪第一次在音乐会上运用单调的旋律和腐蚀性迭句；“向同伴敬礼”无线电传声的成功；加利福尼亚摇摆舞伴随着印度、北美大麻的时兴和平克·弗洛伊德的幻觉色彩的第一次混成而诞生；歌曲“满足”的世界性轰动；消费者失望的组歌出现；超短裙和卡尔纳比·斯特雷特的登场；罗林·斯通斯或是奥蒂斯·雷丁的吉他弹奏者布赖恩·琼斯的毁灭；1967年希伯莱教大祭师的“陶醉音乐”等等，成为10年来数不胜数的美学事件而存留下来。还有“尖刻的法律家和凄凉

^① 见蒂莫蒂·维特的一部极好的书，即一部毫不掩饰的传记：《罗克·斯塔尔》，巴黎·埃尔舍版，1984年。

的爱情俱乐部乐队”的问世。最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是画册《比思莱时代》，其编辑即使成年累月地在利物浦各地疲乏不堪地演唱也未放松对画册的精心修饰，它将改革世界的“流行音乐”。这些才是“激增的一代”的真正的历史事件，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比1965年的法国总统竞选，比英国劳动者的胜利，或比1964年的林登·B·约翰逊的美国总统竞选还要光辉得多。

面对这些令人困惑的奇特现象，成年人的反应是笨拙的，一些人持怀疑、嘲笑的态度，一些人忧虑传统的道德和政治的稳定。在当时，这是一支反对这一代人的象征性游击队，他们在完成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挖掘工作。有人曾阻止埃尔维丝·普雷莉音乐会的转播，接着要求“京族人^①”只拍摄她的上半身，以避免她那挑逗色情的大腿公开表演。人们抨击大中学校里的超短裙和长头发。罗林·斯通斯家族打算在美国的电视里亮相，把它的流行歌曲的说明文字“让我们一起耗尽夜晚吧”，改得缓和了一点：“让我们一块耗一会儿吧”。在法国的大中学校里，还保持着以前的纪律，在街道上，成行的学生队伍还带着被“管理”的气氛，只是小警察队伍^②仍然使整个一代人失望，直起鸡皮疙瘩。假若大学城里骚动的聚点围绕着男孩拜访女孩的问题，并成为重登部长会议桌上的国民事务讨论的主题，假若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为性教育问题与青年体育部部长第一次公开露面争吵的话，人们一点也不会感到震惊。这些小事情将是赢得青少年的大事，青年总想在改变世界之前改变他们的生活。

青少年的对抗是严峻的，戴高乐的法国充分体现着这一点，

① 指在美国从事摄影工作的华裔。——译者

② 使人容易想起二战期间维希伪政权搞的“法兰西伙伴”（Compagnons de France），参加者为15—20岁的男孩，着蓝制服，其宗旨为“熏陶个性，培养忠于贝当的感情”。——译者

直到漫画夸张的程度。苏米兹^①面对日本的发展百分比，曾试图用外省天主教资产阶级的文化规范调整社会，但没有结果。森严的等级，落后的性道德，超越的美学标准，依靠权威普及基础知识的惯例，这一切使人窒息，因此，法国爆发了比其他国家更猛烈的暴乱。

越南和流行音乐

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将替代许多现代政治启蒙，尽管它是个没有明确的领袖和代言人，没有许多的活动分子，也没有事先准备的爆发。在这个60年代的第一场争斗中，“激增的一代”的团体就这样进入政治，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小团体将按年龄不断地扩大运动同情者的队伍。在关于“流行音乐”以及审美和服装争议的腐殖土上，政治的花草将长成，并将开出耀眼的花朵。美国的所谓启蒙则早于法国，在战后就敞开了道路。在美国青年眼里，在舞星埃尔维丝·普雷莉之下，才是政治明星约翰·肯尼迪，根据公众舆论，他的青年时代具有神赐的力量，他的号召力富有公民责任感和正义，他的哥哥的斗争首先是反对种族隔离，然后是反对“黑豹党^②”对青年一代的迷惑。在他们弟兄为了日常的生活自由和美国社会的协调而提出的诉讼面前，摇摆舞的崇拜者们显得没有任何理性。美国青年很欢迎他们的这个最杰出的代表。肯尼迪的死亡，对千百万“激增的一代”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的政治休克，也改变了许多事情。一个公正而强有力的总统就如此了结了，不可能是无可指责的。他的继承者林登·约翰逊，虽然掀起了社会改革，但陷入错综复杂的越南战争的泥坑

① 法国研究天主教的学者。——译者

② 1966年休·牛顿在奥克兰成立的为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党派，在黑人武装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是进步的。——译者

(熟悉其内情的是肯尼迪^①，由于他成了殉难的年轻总统，人们往往忘记了他)。美国社会的繁荣富足是从这位不再掩饰和不再进行空洞说教的总统开始的，他的死亡变成令人怀疑的事。但是，美国社会的繁荣富足单凭总统的神通还是不够的，除了向别人攫取，他们的父辈们怎么可能聚敛那么多的财富？富强而民主的社会拒绝殖民国家的独立要求，武力戴上了漂亮原则的光环，事情就变得使人难以接受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后，越南战争就从那同样的伪善里显露出再爆发的迹象。在人们都用倾向批评的眼光看待越南革命以前，越南人的战斗就是正当的。出于北越的巧妙宣传，给人们的印象是：南方游击队并未得到如人们所过分强调的，可作战争典范的北方正规部队的支持，南越战争是善良在抗击邪恶，是生活俭朴而又热爱正义的大卫在抗击肥胖的无人性的戈里亚特^②。西欧有良心的舆论对共产党战士的野蛮和北越既定制度的“集中营性质”保持缄默，也不认为北越防卫部队的过度使用同样是战争的“帮凶”^③，同时更热衷于报道美国的勒索、狂轰滥炸、凝固汽油弹的使用和南方独裁者的真正卑鄙。首先是青年们的舆论，他们推断美国的干涉原则是无道义的，越南共产党的本体论有理。当越南北方的制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即十几年之后，同样的舆论就泄气了。在那段时间里，只有在美国部队攻击南方游击队的时候，才是黑暗反对光明的战争。

① 实际上正是肯尼迪任总统时向南越派出的特种部队。这里对他过于溢美了。——译者

② 大卫和戈里亚特 (David, Goliath)，(公元前 11 世纪) 歌利亚《圣经》中记载的：戈里亚特是被大卫杀死的非力士巨人。——译者

③ 对北越正义的自卫战的谴责显然是错误的，可能是历史的原因在影响作者的眼界，因法国人被越南共产党赶走了。——译者

当美国在武元甲和胡志明的大量贫困兵团面前陷于泥潭的时候，美国尚无顾忌地向青年人求援以赢得这场战争。然而，“革命的别动队”突起，大批地拒绝征兵。数千美国青年拒绝入伍，宁愿穿越加拿大也不愿拿起枪为国服务。一部分青年还去了越南战场。在南越泥泞的稻田中和拥挤的城市里积累忍受创伤的经验，他们在那里只能透过多诺万^①和保尔·麦卡特尼^②的悦耳的旋律才能看到生活。动荡经常猖獗地降临到美国校园，反战的抗议活动就像美国青年的日常面包一样。知识分子、作家和电影艺术家们给拒绝赴越南运动不断提供文化的背景。苏联和古巴的猛烈抨击以及所有反对“美国冒险主义”的盟国找到了一个扩大反对美国的极好机会。在三四年内，肯尼迪的公民权利的、征服太空的、宽宏大度的、理想主义的美国和马丁·路德金^③（与约翰·肯尼迪的哥哥罗贝尔·肯尼迪一样在1968年被刺）的美国，变成了与法西斯独裁者相似不远的约翰逊的美国，分裂的和束缚消费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和投掷凝固汽油弹的美国，排斥黑人的种族主义的和三K党^④的美国。在美国，安杰拉·戴维斯^⑤，胡志

① 还有其他好多歌曲，如多诺万的《和平主义歌曲》和《全球团结》，约翰·伦农的《带来和平希望的一支歌》等。

②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著名歌星。——译者

③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60年代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1968年4月4日被暗杀。——译者

④ 美国的一个反动恐怖组织，提倡种族歧视，迫害黑人及一切进步人士，并从事其他破坏活动，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三K（K. K. K）是Ku - Klux Klan的缩写。——译者

⑤ 美国六七十年代著名的女歌星、演员。——译者

明，谢·格瓦拉^①的招贴画曾装饰着上十万青少年的房间，他们这种列宁方式虽然叫人神经失常，但是他们可以从这些形象里看见现代革命的浪漫主义英雄们。他们以享乐主义和和平主义来补充西欧被马列主义迅速同化的高尚而坚定的战斗阶层，这无异于宣布：有罪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人是当今世界的精华。

法国版本

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使五月运动的推动者们在造就他们的入伍者方面变成了可能。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然而，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略占上风的塞纳河两岸的环境里，却从来看不到共产党人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影响太平洋海岸。

一些二战的游击队员且放置一边不谈，“进步”的知识界也或近或远地重新成为这个“工人阶级政党”路线的伙伴。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政党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它可以在注定是金钱的世界里广泛地体现苦难的人类。法共可以凭借共产主义的整体形象团结人民，尽管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所批判，尽管苏联的镇压真相被苏瓦林·克拉弗琴科和大卫·鲁塞^②及其他一些人所泄露，尽管这些将肯定地全部地长留在有灼见的正统舆论家的心中^③，但这毕竟只是偶然的差错所造成的。无论在斯大林主义的经典著

① 谢·格瓦拉（Che Guevara），古巴革命领袖之一。生于阿根廷，古巴革命胜利后被宣布为古巴公民，并任工业部长等职。1966年在玻利维亚进行革命斗争，1967年10月8日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旋被政府军杀害。著有《游击战》一书。

② 均为前苏联著名作家。——译者

③ 菲力普·罗布里厄在他的《我们的共产主义时代》里对这种文化和情感霸权做了全面的叙述。巴黎·拉封版，1977年。

作里，还是在阿尔蒂塞^①的所谓创新表象下的神学里，或是在“新左派”的理论家们所创立的异端稿本里，马克思主义总是控制着灵魂。换句话说，人们议论法共的论调，同样是为了斗争，法共僵硬的论调束缚着法国斯大林主义的合作者们，同样束缚着它的反对者们。党背负着巨大的选举重压，狭隘地控制着工会的主要事务，虚伪地装点无数的民主门面；它配备有强大的舆论机构，控制着左派的头目和支持者们，在大学里也立住了脚。然而，法共只打算忠实地辅佐苏联，并不打算在欧洲这块地方搞什么革命，只满足于管理他们既得的权力阵地，同时尽可能地同样辅佐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乐于在法苏两大块之间搞平衡。法共完全同意它的莫斯科主人的意见，比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们更斯大林主义，它彻底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这个苏共总书记的改革，赫鲁晓夫的下台，使他们狂喜了一阵，然而法共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仍然扮演着徒劳的角色以及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的圆滑看门人的角色，当莫斯科玩稳定牌的时候，它还是要忠实于莫斯科的。

法共内部斗争也是秘密的。极端的斗争仍然在“致力于现代化者”和“守旧者”之间展开。一些有所偏离的前沿战士，往往会迅速地遭到党内保守者的周期性清洗，人们总能惊愕地看到这些战士转身用沉默的方式反抗保守的当权者。“守旧者”们曾用同样的方式反对上一代的法共革新者。法共预定的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自穆里斯·多列士死后继任，他完全同意谨慎地进行改革，但他总是在内部派别和多少有一点的强大压力的苏共老大哥之间迂回曲折。在目前的情况下，法共还是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力求在选举有进展，并努力联合左翼。1962年，罗歇与工人国

^① 阿尔蒂塞（Louis Althusser），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共产党员，亲华的理论家。——译者

际法国支部 (SFIO) 的总书记居伊·摩勒^①达成退出第二轮选举的协议。1965 年, 法共则支持左翼惟一的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密特朗在德费尔^②或是孟戴斯^③的一个不那么大西洋主义^④的报告里已经比较好地突出起来, 自这次艰难的报告之后, 密特朗紧接着就在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里和激进社会党的脆弱联盟里竭力维护“非共产党左翼联盟”。

1967 年, 左翼选举联盟取得骄人的结果, 因为戴高乐派险些失去议会多数,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主体部分, 激进党, 共和国国民议会 (CIR), 各小党派都忠实地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 是他们使密特朗与强大的共产党代表在波旁宫^⑤的长椅上坐在一起。法共早在戴高乐的机构里安营扎寨了, 并在市镇和商业繁荣的帝国里稳坐, 满怀信心地向往未来。就是有一件事总使法共微微发痒: 与青年的关系, 尤其与大学生青年的关系。

根据法国共产党的反社会思想, “激增的一代”与他们父辈之间的冲突原因同样可归结为对社会的感受。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派别并不明显, 最活跃的惟有共产党的青年。由于祖传意识, 法共党员的后代一般参加共产主义学生联盟 (UEC), 共产党的接班人一般如此合成。但开始存在问题, 他们的后代开始感

① 居伊·摩勒 (Guy Mollet), 即法国社会党总书记。曾任第四共和国总理 (1956 年 2 月 1 日—1957 年 5 月 21 日)。——译者

② 德费尔 (Defferre), 法国社会党人, 马赛市市长。1965 年以中左派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 后退出竞选。——译者

③ 孟戴斯 (Pierre Mendes - France), 法国激进党领袖, 曾任第四共和国总理 (1954 年 6 月 27 日—1955 年 2 月 5 日)。——译者

④ 大西洋主义,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其宗旨是“亲美”, 主张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其相对。——译者

⑤ 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译者

到法共特别地遵循惯例和讨厌奢华的年轻女人。他们只有懒洋洋地遵守纪律和遵循无生气的惯例，完全失去想象力，绝对尊敬苏联，绝对蔑视内部民主，拒绝罗马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所鼓动的从古巴到北京的革命道路的讨论，僵硬地理解党的传统路线，绝对不参与现代生活，同时强加好斗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这一切使法共迅速地脱离朝气蓬勃的青年并促使他们向别的思想极端危险地漂移。说到底，法共似乎在以它的方式加入专制而又陈旧过时的法国旧社会。如果还要补充的话，就是在许多活动分子看来，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态度也是畏首畏尾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儿子仍然拒绝与养路工人的女儿联姻，他们都将离开法共这艘停在海上生了锈的大船。他们读鲍里斯·维安^①的小说，吸玉米纸的高卢牌香烟，或听比利·阿莱的歌曲。一些分离的共产党员的后代还读托洛斯基、阿尔蒂塞和马居斯^②的某些书，他们眼红意大利共产党，迷信毛泽东中国，恳求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内部的民主，过分地煽动改革，或去阿谢特酒吧间跳舞。可以说在法共帝国的边缘上，在杂乱的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心脏里，许多五月运动的未来领袖们在造就他们的活动分子^③。

大学危机

第二个因素是大学。1938年，法国仅有5万名大学生，1960年超过了25万，1968年到了50万。这已达到民主化的数字要求，然而都缺乏适应现代世界的民主化方式，专制的教育机构似乎已无力背负这沉重的十字架了。威严的学校里始终保留着知识

① 法国著名作家。——译者

② 马居斯 (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译者

③ 阿蒙和罗特曼《青年一代》第一卷《梦的年代》是叙述该问题的关键作品。这是共产主义联盟的两个老成员，在30年代就贡献出了他们的智慧。

的权威性传授，让学生孤独地面对冷漠的叫不出名的规章。这些规章还能适应 1960 年以前公开招收的以国民中最有教养的阶层的子弟为主体的学生，传播的知识还能弥补教学法的不足。自从中产阶级和缺乏家族继承的孩子们成群地进入大学以来，就必须围绕最贴近大学生的问题组织更严密的教学，密切教师与教学的关系。总之，必须加强教师主体，某些顽固坚持官僚哲学的教师当然除外。

学生人数骤然膨胀，为了缓解完全可以预料的人口高潮，这个群体过早地分布在匆忙盖起的新楼房里。这种“人格解体”使大学生们产生了无言的失望，而且必须持久下去。斯特拉斯堡^①的境遇主义^②小团体就是受了居伊·德博尔的引人注目的悖论的影响，他曾发表预兆性的抨击时政的文章，尽管当时几乎未被注意，它的标题非常正确：《来自大学生内心的痛苦》，它将生动地宣布五月不满现状者的反权威倾向。

去女生房间的男生们

整洁实用的大学城，粗糙难看，毫无特色，只有冷漠的氖气灯管和浅灰色水泥的装饰。大学城一般住的是家庭收入最微薄的大学生。因为地理的原因，他们与父母分开，因此，不在乎地不恰当地扩散感情，在大学城封闭的世界里越来越泛滥。根据严肃时代狭隘的性伦理（当时还没有避孕药），教育部制订了一个严禁晚上外出和禁止少男少女夜间互访的严格规章，抑制性倾向。在大学生眼里，男女互访完全是正当的。如今这些陈旧的使人恼火的纪律与时代相抵触，束缚个人自由，将是激起这场有力而持

① 法国的另一个大学区。——译者

② 境遇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在法国学生中间的以反对现存社会结构为目的的运动。——译者

久对抗的重要因素，这在五月运动的系统里是不可忽视的。1965、1966和1967年，一些事故充满大学城，教育部不得不做出让步。1965年，克里斯蒂昂·富歇批准女生可以访问男生的法规。那年秋季，警察介入安东尼大学城，因为传言那里的学生房间里有流产的事发生，事情一直到骚乱之后的几个星期才平息。

1968年初，巴黎地区的学生反对陈旧规定的浪潮再次掀起^①。在已凝固的大学生的要求与坚持清教主义的大部分舆论之间，政府长时间地在寻找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新任国民教育部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这方面贡献着他新任期的活力。1月26日，他向与会的大学校长宣布他的管理计划。大学同意成年学生完全自由，未成年的应补充以父母的权威（成年公民为21岁）。对未成年的学生，富歇的规定是不可更改的，只能是女孩去男孩家，而不是相反。这个方案以大学生的成年和未成年的分类为前提，并附加看门人的认定及保障看门人援用该法规的规定。经过讨论修改，直到2月7日，阿兰·佩雷菲特把他的计划提交部长会议讨论。这种程序在今天看来是不必要的，但这是第五共和国政府第一次直接抓性道德这个敏感问题，确实充满了改革。

惯于嘟哝的戴高乐将军在部长会议上含糊地嘟哝了几句，好像是“溴化物”，还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只能在梯形教室里见面。”乔治·蓬皮杜相反，他用了一个含意深刻的箴言支持他的部长：“必须与时代生活在一起。”阿兰·佩雷菲特的计划得以通过。

选择入大学的方案

这些难以应付的麻烦事同时也是大学生面前的严峻问题，例

^① 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如选择入大学的问题。雅克·纳博纳^①既是军队选择的产品，又是具有现代性和富有条理的人物，他对享有盛名的现代主义的大学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向戴高乐将军呈递了一个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其中阐明了一个简单的原则：学校和大学体系应该在一个高水平的框架里适应国家的需要，在规范大学生人群的基础上选择他们进入学院，并在最有利于国家的一系列手续里选择领导人。这应以大学的计划性和大学生选择入学为前提。将军的面前有两种不同方式的例子，即美国的和苏联的^②，都符合它们的目的性，纳博纳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跑出了这个简单的规则，好像是在以即兴的指点来进行工业化社会的改革似的。

蓬皮杜敦促他的部长们满足学生们的意愿，但他们一点也没抓紧做。实际上，在教师和大学生中间通常地流露着对那个苛刻的补救方案的反感，他们对战前朗之万·瓦隆的进步的教育大纲和拯救教育的愿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管理大学的一代人相信瓦隆的社会开放政策和面向全球的教育使命。而这个排除部分业士^③进入大学的选择方案却与民主化原则背道而驰。在专制之外的偶尔宽容下，某些戴高乐的部长，如克里斯蒂昂·富歇对取消专制的计划性规定，对自由选择进大学的原则抱有同情心。

对左派而言，对选择入大学方案的拒绝也是对学校和上层选择结果的批评。相当数量的老师和大学生认为，波尔迪厄^④和帕

① 雅克·纳博纳 (Jacques Norbonne)，当时为戴高乐的技术顾问。让-雷蒙·图尔努在《将军的五月》这本书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雅克·纳博纳的计划。

② 美国基本上是高中毕业生自由选择入大学，苏联是国家有条件选择高中生入大学。——译者

③ 合格的高中毕业生称业士。——充译者

④ 法国当代哲学家。——译者

斯龙^①的作品给他们提供理论基础，大学也是一部再造社会阶级的机器，因为它是在运用教育模式调整对人有参考价值的文化评价和高层的语言规则，它自然有利于少数社会精华的后代，而不利于大众阶层的后代，这将更加残酷地淘汰贫困阶层的后代，社会将自然而然地弃置他们，而不管他们的工作及实际能力如何。统计学以它枯燥的数字证实了这些社会学的推论：大学使居民教养阶层（大部分与富有阶层交叉）后代的“代表名额大量超出”，与它相对的职员、工人、农民的后代的“代表名额不足”更加明显化。

1962年，克里斯蒂昂·富歇入主国民教育部。一个海军上校，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与雅克·纳博纳的激烈的选择方针不一致，他谨慎地支持乔治·蓬皮杜，凭他的个人经验在教育方面实现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同样是自由主义的。他说：“我不想把法国青年关在兵营里。”为了制定学校和大学的方针，纳博纳预先考虑选择入大学的限制，表示他助长家庭出身论。出身低微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富歇，相信靠文凭晋升的共和国的效能。纳博纳大概不高兴有人考虑别的贫困生，因为他们都知道贫困的中学生比其他中学生更少成功，现在将看到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决定关闭他们进入大学的通道。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起草、咨询，国民教育部终于实施一个经共和国总统签署的充分缓和的计划。纳博纳是那么的气馁，于1964年那么赌气地辞了职。1967年4月，议会选举之后，克里斯蒂昂·富歇被调到内政部。

佩雷菲特的计划

一位精明的知识分子和政坛新星接下富歇手中的这些复杂档

① 法国当代哲学家。——译者

案，成为这位软心肠老兵的继任者。这就是阿兰·佩雷菲特，在1967年议会选举以后被任命为国民教育部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交托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由国民教育部的秘书长皮埃尔·洛朗准备的关于第三阶段^①学生的方针。在这个计划的措辞里，一个最高指示将决定学生的方向。优秀的学生将在长长的等级里等待，其他的将被驱向短促的培训。新部长维持选择的原则，但采用温和的方式。四个相继的条件将严格地审查学生的情况，他认为学生们可能不会太抱怨曾有过的随心所欲的裁判。

在几个月里，阿兰·佩雷菲特着重地准备了这个将改革大学结构的计划^②。法国的原则是希望中学毕业会考成为文凭的一个接合点，同时成为中学学习的必然结果和进入大学的“护照”。佩雷菲特不希望以双重特征为结果，这与将军和纳博纳的愿望相反，也与他的前任富歇的自由原则相反。他打算实施的计划是：中学毕业会考将不通向任何等级，国家保证为所有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在高等教育里找到一个位置。重要的是大学或学校能给予他们最实用的训练，如同未来的“技术教育学院”。有趣的是，这种折衷方案成了1986年阿兰·达瓦凯设计教育改革计划的基础，阿兰·达瓦凯是后来希拉克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后来将成为另一个大学生抗议运动的爆炸剂，那个运动也很猛烈。

阿兰·佩雷菲特于1968年初邀请教授研究和修改他的计划，然后于4月24日提交部长会议讨论，即拉丁区示威爆发的前一个星期。他坚持政府应有一个声明，这将引起随后的5月14日的议会争论……

① 法国大学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阶段。——译者

② 阿兰·佩雷菲特今天还在为制定1968年5月的这个计划的真实动机之一激动地辩护，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国民教育部同时在进行另一项改革，即针对教育法，关于更多地突出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组织教师讨论教学，推行视听教学等等。他们都清楚当权者不宜在大学危机之前盲目地强加什么，因此他们对这些计划分析、讨论、掂量了好长时间而未敢实施。在他们看来这是医治社会病的改革。然而这种操心已经太晚了。大学法律系和文学系膨胀，大学为毕业生出路而忧虑是秘而不宣的。僵硬的学院束手无策，这一切在几年内越来越蔓延，离缓和的局面本来就遥遥无期，加上这些改革对随后将接受选择威胁的大中学生来说更是举足轻重。阿兰·佩雷菲特预计他的改革到1968年秋入学期间才能着手实施。但他已经没有了时间，烽火已经燃起，他的计划被一些难以察觉的煽风点火者一把火烧了。

3月22日运动

几根铁杠下，玻璃橱窗碎片横飞。上百个大喊大叫者从富丽堂皇的歌剧院步行到斯克里布街和奥贝尔街的交汇处高喊“民族解放阵线必胜！民族解放阵线必胜！”他们在惊恐的职员面前，焚烧一面美国国旗，然后迅速逃进歌剧院地铁里，而警察还没来得及动一动。大概美国快速部队都忙于越南战争去了，也没有力量追赶他们吧。不管怎样，这次来自巴黎分会的象征性抗议还是一个圆满的小成功^①。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这次的活动分子之一，农泰尔文学院的托派大学生格扎维埃·朗格拉德重返现场估计损失，然后迅速登上奥尔费弗尔地铁站的站台不见了。当夜，四个中学生——“越南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家里被捕；清晨，“全国越南委员

^① 贝纳克、阿蒙、罗特曼和其他人都详细地叙述过美国快速部队在越南的进攻情况。

会”的秘书尼古拉·布尔特也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了。这是1968年3月22日。

当农泰尔文学院发生新轰动的时候，达尼埃尔·科恩-本迪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①。朗格拉德在大学里很有名，他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纠察队的负责人，也是一个冷静的受青年尊重的青年人。小组织“疯人派^②”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抓住了一个极好的动员名词。于是，棕红色头发的头头后面，就跟随着这样一些活动分子，察看所有的梯形教室，动员反抗“警察的镇压”。下午5时，百来个大学生聚集在B2梯形教室里，议事日程是：反击。“疯人派”的一个先锋忽然想出一个很恰当的行动：象征性地占领学校的一座建筑。这样，权威将受到挑战。本来敏感的大学生们，加之告警的风声，这个提议在欢呼声中得以通过。计划马上付诸实施，控制校园，行政楼将成为突然攻击的要塞，情况是有利的：行政楼空着，门开着，只有两个负责传达联络的办事员在下面。捣乱分子们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咨询一个机智的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成员让-皮埃尔·迪特伊，他登上阶梯审视了一番。为了确定方案，随后他们去了会议厅——农泰尔文学院行使权力的地方，啤酒和三明治摆满了教授们通常辩论的椭圆形讲坛。大家提出方案，议论、推断、欢笑，直到深夜1点30分。他们决定在3月29日白天转变成全校性的关于工人斗争、东方国家和反帝斗争的研究和讨论。大家准备去好好地睡一觉。被捕的大学生于这天晚会开始时被警察局释放了。这太晚了，“疯人派”已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③。

① 与作者的谈话。

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忿激派（又译“疯人派”）。——译者

③ “3月22日运动”的发起者们都对该组织的创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遭受1953年夏的蒙卡达^①惨重失败的打击后，把他的组织命名为“7月26日运动”。古巴革命的图片使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托洛斯基分子们入迷，他们向“谢·格瓦拉”挑战。为了嘲弄这种浮华的崇拜^②，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无政府主义战友们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3月22日运动”。

这个出人意料的小团体将成为1968年5月的主要成分之一，就像容器里的一滴水、火药桶的引爆线。它的领袖就是好打趣、总是局促不安而又精明、激奋的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在极左派活动分子的生硬气派里，他的战术想象力、他的幽默、锐利和敏捷答辩的意识显得很突出。他是同类人中出类拔萃的犀利善辩的演说家，他的成功辩术在小团体中很难归类。他是边缘群体中的边缘典型，将成为学生运动这个经常卡住的机械中的一个机动部件。1968年他22岁，实际上，这个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诞生在德国，他的父母在1933年为躲避希特勒而定居法国莫托邦，他13岁才返回德国。父母死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法国高等学校学习。他享受助学金，拮据的生活使他奔走在农泰尔学院和他的巴黎房间之间以及法德之间，因而受到德国大学生运动的影响，他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被无政府思想所吸引。他的哥哥卡布里尔在法国南特教授文学，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弟弟小达尼的学生组织里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个红棕色头发的青年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在这里作令人瞩目的法德相互居留，还算有点成功，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如何做。他生动活泼，

① 蒙卡达(Moncada),位于古巴圣地亚哥的亲美巴蒂斯塔政权的兵营。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发动了反巴蒂斯塔的武装起义,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卡斯特罗被捕,被判刑15年,1955年因大赦获释。——译者

② 与作者的谈话。

热情洋溢，没放弃过一门功课，没停止过提问题、提意见、辩论。“他从未放弃过我的学士学位课的时间，在1968年，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10分钟。”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叙述道^①。这个语言煽动的高手，“3月22日运动”的领袖，引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改革——围绕直接行动团结起来，尤其在学生运动处于分裂和衰退的时候。

学生政治的衰落

两三年来，学生政治默默无闻。它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扮演过重要角色。好几个五月的先锋就是出自“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系统或出自“为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而动员起来的为极右派所反对的学生系统的战斗阶层。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团结了10多万学生，它的住地通常也是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根据地^②。阿尔及利亚人获得自由后，它们的辩论转向其他领域，学生的工联主义成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思考的大课题，这是左派工会的世袭领地，批判党的路线有利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活动。法共的这个学生分部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火锅，沸腾着一切主义的异端和变种。派别的权威是一致确认的结果，这当然有损于党的领导。他们怀疑科苏特广场“44号”^③中枢的命令，嘲笑老斯大林主义者的死板作风，他们借助一些最异端作家的学术性论据反驳笨拙的后多列士^④辩术。

① 见让·贝尔托利诺：《捣乱鬼们》，巴黎·斯托克版，1969年。

② 阿蒙和罗特曼已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书，也可参见贝尔托利诺的前书和尼科尔·德莫普-阿布德的《外籍大学区的开放》，巴黎·国家科研中心——安特罗波版，1974年，以及阿兰·蒙卡布隆的《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历史》。

③ 法共中央所在地。——译者

④ 指多列士的继承人，当时的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等人。——译者

“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是一切对左派政治感兴趣的人的汇集之地，特别在群起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情况下，可能更甚如此。”让-马赛尔·布格罗^①今天回忆说，他后来便是五月中一个小团体的推动发展人之一。

三个主要派别也摆脱了法国共产主义边缘的激烈斗争：享有盛名的贝尔纳·库什内或让·沙利的“意大利人”受意大利共产党改革的影响，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主张与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左派工会”的推动发展人让-路易·佩尼努和马克·克拉蒂茨的主张相差不远。托洛斯基分子阿兰·克里文和亨利·韦贝尔在崇拜列宁上相通，在法共过于谨慎的方针和在被法共所控制的改良主义者面前，他们难以压抑怒气，强烈要求恢复斯大林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有效的内部民主。

教条主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青年学生们在路易·阿尔蒂塞的影响下，成了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阿尔蒂塞在他们中间不同于罗贝尔·林哈特^②的严肃面孔和教授式冷冰冰的纯理论语言，而是用他的细心照顾感动他们亲近中国。阿尔蒂塞^③向拉·加罗迪^④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偏向”，被法共所接受，他为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严肃地辩护，即跨越“认识论的鸿沟”，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与整个人道主义决裂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法共党员兼哲学家

① 五月中活跃的团体之一“大学行动党”的头头之一。——译者

② 罗贝尔·林哈特（Robert Linhart），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亲华派组织，“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译者

③ 见马克思的《资本论》（巴黎·马斯佩罗版，1965年）以及路易·阿尔蒂塞的其他一些作品。

④ 拉·加罗迪（La Garaudy），法共的新闻检查官。——译者

影响了法国这个最高学府的一代学生中的一些人，他们赞同他以对党的过去理论的回顾和筛选来建立新的革命科学的思路^①。

在上述三种潮流中，一些游击队员参入争论、添砖加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重要的有皮埃尔·戈尔德曼，寻找战略前途如同寻找他的梦，还有让-路易·佩尼努^②，以他超天赋分析家的严峻如痴如迷。

自1965年以来，法共就决心整顿秩序，以使无政府主义处于从属的地位。罗朗·勒鲁瓦^③以居伊·埃尔米耶^④为助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耐心地在学生组织内部重组顺从的多数，以排除戏剧性的辞职，或以直接的审查方式使分裂分子们从共产党内部重新回到它外面的出发地，他们认为人在家中能当家做主，到外面就不行了。内部的手们，变成了不能再称其为左派主张的外部派别的先头兵，从今以后成了战斗的敌人。这样做反而使派别活动越来越活跃。党实际上脱离了教育界。

小 派 别

于是，小派别的小 Saga 便开始了。克里文和他的朋友们创建了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一个训练革命骚动的组织，配备了新闻机构和有效的纠察队，那里成了理论讨论的场所和训练一代活动分子的学校。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引起了其他托派小团体如痴如醉的注意。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CLER）是个小党派式的学生组织，10年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由位于于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1964年编辑出版。

② 让-路易·佩尼努（Jean-Louis Péninou），法国全国学生的国际联络人。

——译者

③ ④ 均为法共干部。 ——译者

来一直进展不顺利，默默无闻，在1968年4月，改头换面成革命学生联合会（FER），它的战斗精神是最好斗最宗派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OCI）是由工人力量总工会（FO）的一个会员皮埃尔·朗贝尔创建和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理论家和精神之父是皮埃尔·弗朗克。在“弗朗克派”和“朗贝尔派”之间，理论辩论同样抽象而又尖锐，根据他们的惯例，都已预先确定了继承人。

一些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大多数马上就要离开教育界，但没有失去联系。5月3日他们未到场，自5月4日起，他们将补上，带来运动所需要的经验以及他们的独立思考。统一社会党学生（ESU），因为一个5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年青老队员显得特别活跃，他叫米歇尔·罗卡尔，掌握了这个组织，竟然能在这种怪异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艰难地扮演着一个传统左派的角色。

亲华派在难以理解的宗派主义里迅速建立起来，钢铁般的语言，工运中心主义，狂妄自大的要求。组织命名为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UJCM），很快被活动分子们的小中心起了一个外号——“青年列宁联盟”（l' UJ）。亲华派因遭赫鲁晓夫派“修正主义”的尖锐攻击而出名，他们着迷地想一下插入工人阶级之中。他们以中国为榜样，认为苏共总书记的改革是可耻的，甚至习惯于面对“赫鲁晓夫派的诽谤”，马列主义发展的保卫者们同时在斯大林主义的发展^①中寻找他们的位置。

热忱驱使亲华派比其他的个人战斗走得更远，某些人甚至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练习和训练活动。“青年列宁联盟”掌握了一支守纪律的纠察队，令人吃惊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铁杠的使用技术。所有的小党派在亲华的领域里相聚。雅克·儒尔盖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更加正统，如果可能的

① 当时西方认为毛泽东也是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译者

话，还会更加宗派，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里重新找到排除法共^①的官方斯大林主义的继续，它有从人民中国的大使馆里得到官方恩惠的优势^②，但这并不能弥补它所缺乏的影响。

战斗中心

小派别的膨胀支持了拉丁区的零星骚乱，尤其使一个战斗中心更精悍更有力更具体化起来。所有小派别的领袖们都有共通的历史，他们体验一切，在相互诋毁中重视自己。尽管如此，当激烈的争论摆在他们面前时，最起码的团结需要还是可以使他们重归于好的。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拉丁区小世界里展开，那时，院校分离后的大学生活动中心还没产生。在圣米歇尔广场和皇家港之间，以及在酒市场和医学院之间的一个政治沙龙里，活跃着他们的流行旋律、规则惯例、选举情况以及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这样步行进行一切活动，因为这里离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处所巴黎大学很近，离朱西厄·迪尚波和学校街的一些酒吧间以及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处所——位于保尔-潘勒韦广场的法国大学生互助会会部不远，“青年列宁”们的约会地比奇咖啡厅，可以翻书为乐事的弗朗索瓦·马斯佩罗书店也在附近。时间在阅读、聚会、秘密会议、编辑报纸和传单、学术活动和不尽的理论争论中度过。他们不工作，广泛地学习，总是在寻找论据，寻找历史范例以及光辉的先贤们败在对手之下的由来，思索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国内斗争的原因。这个“战斗中心”超越了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和其他众多小派别的争吵习惯，沉浸在理性的状态中。人们将看到这个“战斗中心”将部分地领导暴乱（同样为了人们能行动起来）。达尼埃尔·林登贝格注意到这个中心，很正确地在1988

① 当时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法共不感兴趣。——译者

② 此属西方一些人的猜测。——译者

年3月的《心灵报》专号上评论它。萨特，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行动“赎罪”的说教者，突出于这个成长的年代之上。尼赞，浪漫派，革命者，以历史及对当代问题的表态和行动向这些狂热的学生们展示英雄形象。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更自由的共产主义研究吸引着活动分子们。他们贪婪地读罗莎·卢森堡^①，卡尔·科尔施^②，格拉姆齐^③和青年卢卡奇^④，也回忆二战时期法国的抵抗运动。马斯佩罗是个官方出版发行人，也可以说是官方同样活跃在其中。还有克里斯蒂昂·布尔儒瓦，一个蕴藏着争议的折衷人物。大家依然沉浸于鼓动世界共产主义的复杂争论中，从哈瓦

① 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她盲目从考茨基的权威，以“怀疑一切”为座右铭，在革命问题上留下了许多理论上的贡献。列宁曾对她的民族问题、资本蓄积论、党组织论、农民问题做过评判。她在德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同时在理论上不间断地指导祖国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1919年1月15日，她与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国际部长诺斯凯部下士兵杀害。终其一生，不愧为革命的斗士和伟大的女革命家。——译者

② 卡尔·科尔施 (Karl Korsch, 1886—1961)，现代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参加过1918年德国革命，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因撰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既批评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又不点名地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遭到两方面的批判，1926年被开除出党。以后专事著述。曾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的思想。——译者

③ 格拉姆齐 (Gramsci, 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21年领导创立意共，为中央委员，曾出席共产国际第四第五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3年为意共最高领导人。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匪徒逮捕，在狱中折磨而死。著有《新秩序》、《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哲学》、《狱中札记》等。——译者

④ 卢卡奇 (Lukacs, 1935—)，1935年1月29日出生于工人家庭，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从1964年起任巴兰尼亚的共青团委第一书记。在60年代初才20多岁，西方称之为“青年卢卡奇”。——译者

拉到北京，寻找着新的革命道路，思考着对最刻板的马列主义进行安德烈·戈尔兹^①式的现代主义改革。总之，他们意识活跃并执着地思考生活。但在1968年，这个中心倒比三四年前缺少了活力，它不再进行学生群众的工作，过高地估计自己，只剩下令人生畏的活鱼仓式的政治框架以及梯形教室里的几个领袖、大会发言人和示威的组织者。现在在这个中心面前摆着一个需要研究的难题，也就是对他们部分掌握的学生骚动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异议，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大学骚动和一些罢工为什么会反对这样或那样的改革计划。

两个决斗场隐藏着周期性的对抗。首先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守着伟大过去的某些威信，在既定框框里矫揉造作地辩论，这并不能挽救自己的迅速衰落。不管怎么说，这在巴黎只能算是一个战斗机构在下苦胆碱式的赌注。在五月的前夜，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为统一社会党的学生们所操纵，只能争取相对的多数和等待对手分裂的好处，主要是托派分子的和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分裂。雅克·索瓦热奥操纵着少数工会，这个来自迪戎的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用了10年时间组织工会运动，但说穿了还是带点国家性质的手段。索瓦热奥刚加入了统一社会党，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活动是他顽强和巧妙斗争的第二时机。两个组织网络在一个行动领域里竞争：“全国越南委员会”（CVN）特别想从共产主义青年（及其他组织）里找回活动分子，并接受一些左派权威人士的领导，如让-保尔·萨特和教授罗朗·施瓦茨；“基层越南委员会”（CVB）主要来自“群众组织”和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基层”，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由此获得现场活动的特权，他们模仿越南共产党的宣传方式，从而采用更好斗更狭隘的宣传术语。

^① 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1923—），法国当代思想家，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代主义的改革。——译者

第三章 农泰尔发生骚乱（1968年1—5月）

大学和青年危机需要拥有它的典范。在学校里的典范是农泰尔文学院。农泰尔文学院，一座新型的具现代思想的大学，位于巴黎的郊区。在贫民窟和阴暗的小屋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围绕着一个游泳池呈椭圆形地分布着戴高乐主义的城市设计家汇集的一片了无生气的建筑杰作。建筑是灰色的，呈几何图形的，在水泥立方体之间是稀疏的草坪。建筑工程的泥浆从没停止过包围大学的环境。大学开有文学、法律、经济、人文等超敏感的学科，主要接受混合性居民的学生，同样的学生证汇聚着他们。富人区后代的小车占满了小型合作社的停车场，苏格兰式的超短裙，紧身的设得蓝毛织品和发亮的高跟长筒靴充斥梯形教室。在他们中间，出身比较低微的不满现状的学生一般带着很不协调的怪态，这与课堂过于严肃，校园政治的曲折很有关系。绝大部分活动分子出自学生公寓——城中之小城。巴黎8个集中的低租金住房（HLM）区在这里就有两个，大门口都有一个心平气和的守门人看管。离这些冷漠的墙壁100米远的地方还有一片瓦楞铁皮房搁在那里。到处挂满了衣物，等待着恒久充满着公厕气味的风来干燥，穿着褶叠裙的纳伊族和非洲的年青姑娘们踩着泥浆小心地行走。公寓里的大学生们随时都在不同程度地接受着一门社会学课。

大学生们在校园里过着一种自治的生活，形成一个隔离的社会，睡得晚，夜生活活跃，共享散乱的读物、音乐晚会和没完没了的闲谈。这一切又被重新活跃的小派别生活所刺激。农泰尔的“疯人派”就是在这种使人疲惫的环境里得以充分发展的。他们好煽动、好斗、好耍笑又无法受到检查，如此造就着五月的为数并不多的先驱。在领导运动爆发的年表里，农泰尔虽处于次要的地位，然

而在报纸的末版里，农泰尔的活动曾长久是被挑选的对象。

首先重登舞台的是电影摄影机，总在伺机待动，摄影师让-马克·戈达尔早就嗅到了农泰尔。中国人塑造形象——少许有点严肃——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却震动了每一个活动分子的心：安娜·维娅藏斯基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①的小女儿，在摄像机前面滔滔不绝，无所畏惧，不愧一个前驱战士。

达尼和游泳池

富歇实施的改革，修改了教育的分布，但搁置了相对棘手的问题。农泰尔自上年12月就开始罢课，运动持续不断，看来必须实行格拉潘院长的关于复课的折衷主张。格拉潘是抵抗运动队员和左派人士。他与学生的对话是宽容的也是不安的，格拉潘向长时间抗议学校壅塞的“疯人派”让步。签字的时候，农泰尔市的共产党人市长巴尔贝带来了他对罢课者的支持，但遭到大学生们的辱骂。

农泰尔的动乱与政府的意见相差甚远。政府认为自阿尔及利亚所掀起的风暴之后，国家已选定了掌权者，走上繁荣昌盛的平稳道路，在祥和的气氛里，一点也看不出动乱或造反的迹象，法国社会富裕，它的领导人正在做着伟大的梦。在1968年新年致辞里，戴高乐将军还能做一个没有人想反对的声明：“人们再也不会看到我们像麻痹人那样对待危机，以至于重温往昔的灾难。”

1月8日，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决定去视察农泰尔文学院的游泳池工程，50米长的罕见的池子可以代表政绩。工作有实效而勤勉的部长是戴高乐的新信徒，在他被任命时，戴高乐召见他并嘱咐道：“好好看住青年人，研究他们，我不能影

^①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gois Mauriac, 1885—1970），法国当代享有盛誉的作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译者

响你，但你会看到，有些事情或问题……”于是，米索夫像猎人一样上阵，召集了一支专家队伍，在一堆研究和预测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青年白皮书》。他们能预测革命吗？在书的结尾部分对青年人明显地给予了嘲笑：“法国青年总想早结婚……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这关系到所有的重大问题，他们不能首先请求过早地进入政治生活……他们不相信会有下一次战争，他们应该特别相信建立在工业效率、内部秩序、居民团结基础上的前途。”

在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看来，《白皮书》是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当时，大学城正处于由访问女孩子的要求问题而引起的周期性骚动之中，这时青少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显示出性伦理转变的必然性。奉命的白皮书，经米索夫塞进了有问题的话，于是，当部长结束了他的视察，拒绝格拉潘院长谨慎指给他的一个小门出去，而走向等着他的大学生们的面前时，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靠近他，有火地质询：

“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600页的荒谬之言中，根本没讲一句青年的性问题。”

部长：“如果您有这个范畴的一些问题，您最好还是再三地扎进这游泳池里。”

科恩-本迪：“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①。”

不幸的口角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提高了科恩-本迪的威望。官方的权威被这位显职部长的如此过失所损伤。谣言首先从握有认同权的“疯人派”领袖们那里迅速传出来。说通过咨询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弗朗索瓦·萨尔达先生，科恩-本迪寄

^①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可能没记清当时说的话，他可能说的是反语“希特勒万岁”。某些作品说是另一个学生最后对米索夫的反驳。

了一封很谦恭的信给部长，请求把口角之事一笔勾销。因为这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没有法国国籍，害怕随时被驱逐回德国，他宁愿公开悔罪。另一个谣言据说是从共产党里传出来的，说什么弗朗索瓦·米索夫^①的女儿弗朗索瓦兹的小情人20岁以后将成为希拉克派的众议员，并且以弗朗索瓦·德帕拉菲厄的名字。真是无稽之谈，两个年轻人年龄不同，又互不认识。这个时候，游泳池旁的英雄大概仍然在继续他的活动。

1月24日，“疯人派”在大厅里示威，因为格拉潘的让步、努力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果实。示威者的主要标语是如此评判的：“格拉潘，纳粹！”左派老师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高唱：“啊！够了！够了！莫兰^②，勒菲弗^③，我们讨厌你们！啊！够了！够了！还有那个图雷纳^④，我们要你们的命！”这一次，格拉潘院长终于终结了他的自由主义。警察蜂拥闯入大厅抓闹事者，毫不在乎的大学生们立即手挽着手，团结一致。这就是开始运转起来的五月的机器，只不过缩小了而已。

在右派老师的压力下，院长决定用学院传达人员组成一支辅助治安队伍以应付“时难”。经部长同意，格拉潘决定安排考试打发五月。

工人的警报

学生在1月末的骚动里不是孤立的。在几乎完全平静的社会环境里，几次工人冲突使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月26日在富惹尔专区，一支浩大的制鞋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示威队伍后面

①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已经弗朗索瓦·米索夫对证。

②③ 农泰尔文学院突出的右派教师。——译者

④ 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农泰尔文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作家，科恩-本迪的任课教师。五月后著有《空想共产主义》一书，倒是同情运动的作品。——译者

有十具棺材代表着上年关闭的十家企业。这两个产业部门的雇用工人占此地就业人口的67%，三分之一的居民在20岁以下，尚未算在就业人口之内。1967年，这里仅创造了206个职位，935个工人失业。富惹尔的居民清楚他们还要为工业戴高乐主义的所谓经济调整效应付出严峻的代价。11时，工人们在专区政府前面开辟了一个“失业广场”，然后，一名代表被专区区长舒梅尔接见。这时，一个青年团体翻过专区政府的铁栅栏并打破玻璃窗，他们还扯下国旗踩在脚下。警察追捕着他们。下午继续动乱，宪兵们开始承受雨点般的石头。催泪瓦斯的气味弥漫富惹尔。

在岗市萨维扬工厂，一场罢工已坚持了三天。现代工厂都雇有一支来自农民的熟练工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法国民主工人工会(CFDT)的会员。在经过几次冲突取得了交通补助和食堂津贴之后，大多数工会表决终止全面罢工。市政府凭借宪兵别动队排除了罢工纠察队的阻碍，但5000名工人中仍然只有500人回到工厂。1月26日，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教育联合会(FEN)的支持下，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决定在岗市举行一次集会。前一天，岗市的第一支示威队伍被共和国保安队武力驱散，但学生和工人还是肩并肩地重新出现在岗市的街头，他们生气勃勃，东突西撞，很快与宪兵爆发了殴斗，螺栓、铺路石、莫洛托夫式的土制催泪混合物^①纷纷投向宪兵队，宪兵们用橡皮棍回击，战斗持续了数小时。宪兵别动队占领了工厂，此后，劳动者仅仅在29日重新占领了一天。1968年初的这两次有特征的工人与宪兵的冲突，生动地表现了工人暴力的程度。

① 西方群众示威中，一些群众往往自制一种催泪瓦斯，起先是女士们用于防暴徒的，后来用于对付警察。群众称之为莫洛托夫混合物。——译者

巴黎大学被占领

1月中旬，活动精英们还沉浸在国际主义里，这已经是传统了。世界处处都掀起了强劲的学生运动。在越南战争的推动下，所有西欧大学校园都发生了持久的骚动。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青年就起来造反，反对他们长辈的梦想。贝克莱^①一头扎进反文化里。杰斐逊·艾尔普兰^②的摇摆舞，俏男靓女和幻觉象征得以普及，加利福利亚^③在所有向往自由的青少年眼里变成了谜。

法国学生的领袖们经常会见他们的外国同类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进行国际关系活动的专职人员让-路易·佩尼努和让-马赛尔·布格罗进行了一个专门的国际性接触，旨在西欧工会会员、学生和左派分子之间建立一些协调性的组织。这次是德国社会党学生联盟（UDSA）在柏林组织的全国革命者大会晤，有两万青年参加，其中有300名法国青年。他们举行了一个长达80小时的集会，然后徜徉在柏林大街的胡志明、谢·格瓦拉、列宁和卡尔·李卜克内西^④等革命领导人的画像下。欧内斯特·曼德尔，比利时的托派领袖；鲁迪·杜奇克，德国革命青年的领袖；阿兰·克里文，掌握着法国共产主义青年的发言权。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那儿是一个反常现象，似乎是法国人被德国人的奇想所诱惑。德国人对法国的组织及其僵硬的主义感到吃惊^⑤。他们

① 贝克莱（Berkeley），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译者

② 美国六七十年代中家族式的摇摆舞团体。——译者

③ 主要指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立大学及柏克莱分校——美国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发源地。——译者

④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罗莎·卢森堡同时代的德国女革命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与卢森堡一起遇害。——译者

⑤ 作者与让-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都从这次会晤里获得了补充力量。

2月21日，巴黎的不满现状者组织了一个“越南日”。电影、讨论、报告忙坏了大学生们。自年初以来，“越南委员会”有所壮大，“全国越南委员会”和“基层越南委员会”两个竞争的组织继续它们阴暗的争斗。亲华派利用越南共产党的名义传播一些教条得可笑甚至惊人的小册子。青年列宁联盟在小册子里原样地模仿北越共产党的修辞，欲使读者反感以挫败敌对组织的修正主义。不满现状者们不同意“给越南和平”的标语，决定缓和，它们更喜欢“民族解放阵线必胜！”的战斗标语。亲华派们之所以争来后一标语，因为他们认为，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面对这些不断的分裂，惟一的办法就是像“3月22日运动”那样超越分裂。农泰尔行政楼的占领更加绷紧了“3月22日运动”与院长之间的关系，何况占领时还发表了“142人声明”，响得如同宣战声明。科恩-本迪已安排在29日（星期五）围绕革命主题进行全校性辩论。院长反对，决定推迟10天复课。学生们仍然聚集在关闭的教学大楼脚下。有人担心西欧运动的活动分子们因此走下坡路。亲华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栅栏，在所有的入口安排警戒哨，把校园变成了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但“西线无战事”。晚上，主要由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中的“社会党左派”的老成员让-路易·佩尼努，马克·克拉韦茨以及全国学生文学联合会（FGEL - Sorbonne）的秘书布里塞·拉隆德组成的一个活跃的小团体“大学行动党”（MAU）在巴黎大学组织了一个集会。当农泰尔人到达时，警察各就各位包围了这所古老的大学。当局禁止集会。科恩-本迪拿着一个扬声器果断而蛮横地号召：“我们占领农泰尔行政楼已经有几天了。既然我们来到这里，那就同样干吧！”于是，学生们占领了笛卡儿梯形教室。警察动也没动一下，因为穆里斯·格里莫已向部长陈述了他的主张，他宁愿远远地离开，宽容这种混乱，让学校当局自己去应付。

这样，行动之后接着行动，学生运动逐渐团结在农泰尔人周围，这是五月机器的一次小型试车。权力瘫痪，与“法西斯分子”小有冲突，咄咄逼人地反对法国共产党，直接地请愿伴随着革命的修辞，如此的混合将是具有爆炸性的。从中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暴力的程度。2月份，在“基层越南委员会”示威时，亲华派的纠察队把警察狠揍了一顿。已经有了第一次。在越来越紧张的形势下，这又是个先例。

他们谋杀鲁迪！

农泰尔恢复上课，校园面目一新，标语张贴都揭掉了，墙壁重新上了漆。但离“3月22日运动”泄气还差得远。总是自由主义的院长格拉潘还是拨了一个有500座位的梯形教室以供学生政治集会。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认为这是对他的威信的损害，必须至少有1000个座位。于是，“3月22日运动”拒绝指定的梯形教室而占领了另一间大的。

学院当局没有办法只有切断电源。这个红棕色头发的青年在黑暗里站起来大声喊叫：“如果不在两分钟内亮灯，我们就去会议大厅集会。”灯又亮了。从4月4日起复活节放假，才有了一个缓冲的余地。然而，4月11日16时30分在柏林又发生了一件事：青年约瑟夫·巴克曼在大街上边走边踢球，几次把球打飞到经过居尔菲斯唐达姆街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的头上。这个人就是鲁迪·杜奇克，德国持不同政见者阵线的头头。新闻马上在欧洲所有活动分子里传播：“他们想谋害鲁迪！”“他们”是指守旧派的阴谋，有权势的阴谋。敌人被指明了，一个心理上的罪魁祸首，甚至是有影响：“施普林格组织，是法国一个很普及很反动的报纸《比尔德》的监控网络。当晚，示威者包围了施普林格组织在柏林的处所，多亏警察艰苦地斗争才制止示威者进入，但示威者仍然闯入了停车场焚烧了10多辆轿车。

第二天，一行人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上高喊：“施普林格，杀人犯！”在奥戴翁剧院前面，德国社会党学生联盟的一个代表发表演讲，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接着鼓动学生们行动起来。示威者们四散回去请示他们的头头们。就在当天晚上，一大客车警察遭到难堪的追击。

翌日，在巴黎大学的一个梯形教室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特别的全体会议。大学生联合会因农泰尔骚动分离出来，像大学生活动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贝壳马上空了，尤其在小团体世界中的对立派别的战场上。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们不是用一切办法热烈地支持科恩-本迪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举，而是未经调查地做决定，不负责任地对待农泰尔骚动。直到1968年4月，那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在本来就脱离社会的大学生中仍然是个脱离者，全国学联副主席索瓦热奥不认识也不信任他，认为他太无政府主义太不可预料。必须等到5月3日，学生们的集体被捕才可能使他们清醒一点。五月的帷幕拉开了，五月的历史实际上是学生政治的老前辈们与农泰尔的捣乱分子之间的力量关系颠倒的历史。

软弱无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被统一社会党学生所操纵，它的主席米歇尔·佩罗德想放手便辞了职，统一社会党学生的活动分子，25岁的索瓦热奥替代了他，没有时间进行规范的选举。22时30分，“西方特遣队^①”闯入会议厅，战斗虽然短促但很激烈。革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迎头痛击。进攻者逃走后，人们才注意到有好几个人受了伤。

托派分子趁机指责统一社会党学生并暂时赞成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方针。他们到午夜才散会，没有结果。索瓦热奥留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而不是主席。统一社会党学生与共产主义学生

^① 指极右学生组织。

联盟商妥建立联盟，共同防御托派的野心。在大风暴的前15天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没有组织也没有头头，陷入衰落的境地。

朱坎——犹大

第二天，轮到皮埃尔·朱坎尝试不满现状者的愤怒了。当他到农泰尔出席一个会议时，共产党的大学生们邀请了他，一条狭长的欢迎标语展开在梯形教室里：“工人阶级和学生唾弃修正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亲华派决定给予他的有力一击。亲华派为防止因研究法共和法国总工会（CGT）的“有益”因素所困惑，决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他们认为的法共内部最为“修正主义”的分子，皮埃尔·朱坎名列其中。当时，马列主义者估计他会变成“法共的勒克尼埃^①”。当他一登上讲坛，在梯形教室高处聚集的青年列宁联盟的活动分子们便刷地举起耀眼的毛泽东的“小红书”，喊叫声盖住了这位发言人的声音。随着“朱坎——犹大^②”的喊叫，罗贝尔·林哈特急忙拉他走。这位代表已没有其他的出口可逃，只有从有人指示的一个暗门里溜了出去。他消失了，被亲华派的忠诚带走了。这又是一个先例。因为这是人们第一次转向用暴力反对法共。

朗朗·施瓦茨，一位受尊重的教授，左派形象，接替“小兔子朱坎”，从此以后，亲华派就给朱坎起了这个绰号。这次想阻碍施瓦茨发言的是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们。施瓦茨是学生们的“挑选者”，他想以这个名义取消工人运动。科恩-本迪表示反对。施瓦茨立即懊悔自己又从朱坎的观点出发，接着他准备

① 法国1965年总统选举中的右派候选人，得票不到16%。——译者

② 犹大(Judas)，耶稣的门徒，后来出卖耶稣，后来成了叛徒的代名词。

在最有希望取胜的方面进行辩论，即从说话有力方面。托派分子们对亲华派保持尊重，不准备为施瓦茨辩护，但也不想看到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中的朗贝尔^①派光彩太大：“让施瓦茨去说吧，如果也是个坏蛋，大家都会反对他的。”施瓦茨尽量选择恰当的词语，以避免受奚落：“这决不是要使你们颠覆戴高乐的农泰尔处于无力的状态^②。”

4月26日又是科恩-本迪够紧张的一天。这次，所有“3月22日运动”的青年都参加了静坐，这个红棕色头发的大学生注意广泛地参与，带着满意的神情观察着大学生政治的一切成分，除了共产党员，都到了场。青年列宁联盟的活动分子们也来了，带着朗朗·卡斯特洛的声音，这个前“意大利人”的老成员，一个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因为前几次未到场，他作了自我批评。“红色达尼^③”赢得了召集者的饰带。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们决定把5月2日和3日定为两个“反帝日”。

第二天，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被捕。因为几天来，一个宣传小册子在农泰尔流传，上面再次加有“3月22日运动”的印记，绿色的封面上印着《5494号乙公报》（5494号增刊）。人们能从里面读到运动全体会议的公报。封底特别用了玫瑰色，以提醒注意，正面用形象表现《国际歌》的歌词，反面是硫化的字：“莫洛托夫式自制催泪瓦斯混合物的制作方法”。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开玩笑的话，然而却触到了警察局的尊严和大学当局要害。谈到科恩-本迪被捕需要补充说明一个右派学生的事，他叫

① 朗贝尔 (Lambert)，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一个会员，创立托派组织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后改为革命学生联合会，亦称“朗贝尔派”。——译者

② 农泰尔事已经所有发起者或多或少地叙述，参见让·贝尔托里诺：《捣乱鬼们》，巴黎·斯托克版，1969年。

③ 指科恩-本迪，因其头发为红棕色，都如此称呼他。——译者

伊夫·凯旺达埃尔，在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 (FNEF) 总部前的一次争斗中受了伤，这个右倾学生联合会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 (UNEF) 的对立面。伊夫向科恩 - 本迪谈了事情的真相。当时是4月27日8时，红色达尼在他居所的大门口被警察喊住了，这个右派学生亲眼所见。

警察开始越过农泰尔文学院的围墙拘捕捣乱分子，这将引起政府阴谋策划的疯狂。格里莫不想做殉难者^①。他为迅速释放“3月22日运动”的领袖辩护，他认为在避免动乱的希望里，不能忽略农泰尔的出现，他强调骚乱是在农泰尔内部发生的，为什么不让学校当局去面对它的闹事者呢？事情一直提交到蓬皮杜那里，他选择了宽容。大约晚8时，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被释放。诱发动荡的导火线暂时拔掉了。

“西方”组织

不幸的遭遇使“红色达尼”成了知名人物。在法国高等法院宫的大门口，摄影师们等待着他，隔几米远就有两名警察面对面站着，长长地。他回到农泰尔，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说：“我同这个星期融会在一起了。”随后的欢迎会上，笑声中，他继续说：“我对你们说知心话，由于看来我是带头者、领袖，那么，我放弃个人崇拜。”

第二天，4月28日（星期天），圣热尔曼 - 德普雷广场上，中午的阳光下一片静谧，游人和闲逛的人安详地坐在弗洛尔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上，吸着春天的空气。突然，一辆“4L”粗鲁地停在雷内街44号门前^②。原来在那里，有一个好斗的巴黎极右派

^① 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② 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罗歇·奥兰特尔以“受共产党侵略的南越遭难者战士”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展览。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领袖认为“法西斯分子”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一个行动由让-马克·萨尔蒙精心准备起来，他是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纠察队的队长。“4L”里装满了橡皮棍和铁杠。一群紧贴着一座建筑物的墙壁静静地等待着的青年人，在一部分人从车子里抽出武器的时候突然冲向那个展览的门口。奥兰特尔是驻印度支那和秘密军组织^①（OAS）的老兵，与一个20岁左右的光头青年一起在里面。冲进去的人与里面的人像魔鬼一样地打了起来。展览厅里面的人在进攻者的人数优势和突然袭击下被赶了出来。展览厅被破坏，里面的极右分子都被痛打了一顿。不一会，青年列宁联盟便停止了这次杰出的行动。这个“西方”^②团体由阿兰·马德兰，阿兰·罗贝尔和热拉尔·盖隆领导。此后“西方”发表了一个全面战斗的声明以示抗议：“从此以后，警察将只能收拾躺在拉丁大街上受伤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猎区是开放的，将只有我们来消灭他们。”这誓言不是放空炮，“西方”像它所说的那样做了，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尽管它的实力十分薄弱。从那时起，所有左派学生都清楚敌人的反击将随时爆发并将是激烈的。极右派的燧石开始与极左派的燧石摩擦，星火燎原已经临近。

一切正常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乔治·蓬皮杜在他起程访问巴基斯坦之前的48小时，还在“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Ud—Ve）的办公

^① 从事恐怖活动的“秘密军队组织”。诞生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反对让阿尔及利亚独立。——译者

^② Occident“西方”，喜欢暴力的学生右翼组织，诞生于1964年到1965年，由一些好战的赞成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人领导。——译者

室里概述当前的事务，他这个老联盟成员为了新共和联盟（UNR）而鼓动。总理总是高兴的。他说：

“刚刚否决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充满了反对的声音。政府是稳固的，是建立在多数的基础上的。只有新闻对左派感兴趣。

“关于大家所争论的第四个星期的给薪假问题，政府将避免社会的竞相许诺。

“学校和大学方向的改革计划将引起一场丰富多采的有益的大辩论。”

乔治·蓬皮杜不是孤立地在为第五共和国的稳定及政治、社会的安宁奠定基础，所有的部长都在他们各自的部门研究有关这个性质的事情。在4月份请愿照例进行时，让-马赛尔·让纳内接见了工会的领袖们。接近尾声时，这位劳工部长平静地询问，大家也都平静地回答，几个工会干部悄悄地对他说：“秋季前大概没事。”一个有点腹痛病的工会干部却想动手术，决定进医院躺到7月份，就是为了在最动荡的时候停止活动^①。

5月1日的游行是由总工会组织的，好几年来，“5·1”的集会方式已由游行的方式所代替，第一次进行得如此平静，除了在菲耶·迪卡尔韦尔地铁站前发生了总工会会员和学生之间的一点争吵。科恩-本迪和青年列宁联盟的领袖罗贝尔·林哈特痛快地把他们骂了一顿，总工会会员们也同样回敬了他们。“红色达尼”大概是惟一相信在未来的一周里动荡将高涨的人。早在几个月前，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在一些学生领袖怀疑的眼神下，他发言赞扬农泰尔的斗争并预言春天的斗争将更加激烈。5月以前，在拉丁区差不多每两三天就有游行，为越南为鲁迪·杜奇克或者反对“法西斯分子”。5月初，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些小团体在战斗的浪潮之中处于沸腾状态。然而半职业性的学生

^① 这两个细节都是让-马赛尔·让纳内与作者的谈话所叙述的。

政治活动家们都认为大的活动只能定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即政府选择入大学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的时候^①。

3月中旬，皮埃尔·维昂松-蓬特^②因一篇文章声名鹊起。这篇文章以《当法国厌倦时》为题发表在3月15日的《世界报》头版。他预言风暴将来临，这至少使他保持了大记者大手笔的声誉：20年后，当我们再谈起这篇半传奇式的文章，可能觉得他的预言有许多细微的差错，但他对那种环境的评论却是绝妙的：“真厌倦，这已成为今天公众生活的特征。”第一次大的国际动荡及所导致的外部冲突，迄今已有30多年了。动荡将影响到每一个国家，“青年人感到厌倦”，他们困扰，仿佛感到“被诱骗”。对男孩子拜访女孩子的权力要求问题，维昂松-蓬特认为学生为之斗争的原因出自“狭隘的人权观念”。“戴高乐也感到厌倦”，但他要领导下去，尤其当他感到处于风暴中的国家尊严更需要保持完美时。维昂松-蓬特的某些话同样具有预见性：“法国人通常是为改变而热衷改变，”但“左派政权会比右派政权更使人高兴吗？”“人们没有热情，一点也不想建设法兰西。”当公众社会还处于积极状态之中时，皮埃尔·维昂松-蓬特却如此悲观。“小小的法国几乎缩小到只剩一个六边形的本土，这不是真正的不幸，也不是真正的昌盛，与世界和平共处，也没有大的办法左右世界事件，对我们来说，热情和想象力是比福利和扩张更必要的东西。”出于某种限制，在文章结尾他说：“一个国家也会在厌倦中死去。”总之，维昂松-蓬特感到了某种不安，但他并不急于进行他的下一个爆炸性的评论，而是转而向国家领导人无力的躯干里吹一点改变法国的生气。他是最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的情况的人之一（如果把科恩-本迪除外），他认为国家如果萎靡不振，

①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和让-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② 《世界报》记者。——译者

就应该向权势集团提个醒，与其要使公众社会信任，不如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对公众社会进行激流式的回报。但这样明显是难以预料的。

星火燎原

动乱的星火在农泰尔闪耀了相当长一段时间。5月2日，星火燎原起来。两个“反帝日”的第一天的活动由于“3月22日运动”的最近一次全体会议而中断。在这48小时里，辩论、放映、秘密集会必然地充满了农泰尔的革命。“红色达尼”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安排的方便要求有一个大厅。会议厅本来已给他们了，但他们嫌小了。学校当局任凭他们再三请求。他们终于强占了行政楼。下午，历史教授勒内·雷蒙在他上课的梯形教室的门上看到一行字：“雷蒙教授的课不在此进行。”这话刺激了他，他仍然和来上课的学生们进去了，当他看到自己的讲台上有一排长椅，不得不让步了。他感到愤怒。

从上午起就呈现出紧张的气氛，学院里风传极右派要来干涉，大家传阅着从巴黎带回的“西方”的传单：“我们将在5月3日（星期五）亮相，我们有能力与红色恐怖对抗并将采取非此不可的办法稳定秩序。”这就是动员令，农泰尔的学生群众都赶来增援，亲华派最卖力，游击专家们也跑来参与保卫学院。他们到处安置警戒哨，用大卡车运输装满螺栓螺钉和石头的箱子，还去附近的树林里砍树枝做弹弓，雄壮的武装到处展开了：“伞兵们，你们逃避了奠边府^①，你们不能再逃避农泰尔。”在这阵狂热中，大家又获悉“3月22日运动”的8名领袖科恩-本迪、迪

^① 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包围了奠边府，经过57天的战斗，解放了奠边府，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给法、美帝国主义致命一击。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协议签订，法国不得不同意停战撤军，承认越南的完全独立。——译者

特伊·卡斯特洛等被纪律委员会传呼，将在5月6日再次举行庭讯的消息。科恩-本迪再次召集所有的小团体研究如何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格拉潘院长已没有勇气再面对新的事件了，而向他的同事们咨询，惟一的办法是重新关闭学院。终于用公告宣布了这个决定。

不满现状者们决定第二天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里集会鼓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也决定号召进行一次抗议活动。“反帝日”并没改变大世界。明天，面对镇压的恐吓，学生群众可能会更激动。“西方”星期五的“通牒”，他们已经看到了，是具有爆炸性的。

第四章 法官们的周末（5月4—5日）

自5月3日（星期五）晚上起，初生的运动才具有一个非正式的多变的然而有效的领导机构。关着小团体头头们的歌剧院警察分局在午夜前一会儿释放了他们，他们不久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亲华派和阿尔蒂塞派的堡垒，与阿兰·热斯马尔汇合形成运动的一个领导机构。

学生参谋部

统一社会党学生（ESU）的全国性领导在1968年是29岁的讲师热斯马尔^①。一年来，他同时主宰着全国高等教育工会（SNF—Sup）的命运，使它摆脱了法共的传统影响。著名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是全国教育联合会（FEN）的成员，它是大学请愿活动的传统合作者、协调者，也是教育部的对话者，经常进行有生气的讨论，影响到所有的左派。一些年来，该会一直在请求实现大学的现代化气派，然而徒劳的。有经验的政治家比学生领袖们老练得多，也比他们更接近其他工会的负责人。热斯马尔对最近的事件立即有反应，他的态度对有争议的头头们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他能给予他们一个全国性的前途，也能给予孤立的组织所缺乏的常规的代表性。

一得到巴黎大学事件的报告，阿兰·热斯马尔就冲向拉丁区，他是在战斗发生以后到达的。21时，在他与能找到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领导成员商议以后，便下达了全面罢课的命令^②。这

① 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smar），统一社会党学生的主席兼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主席，五月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译者

② 作者与阿兰·热斯马尔的谈话。

个命令影响很大，因此在前些年里，每当警察与示威者有冲突时，学生领袖总是缠着所有的工会请求用公告形式表示一般性的支持，或只是象征性地加入示威队伍。这一次，多亏了热斯马尔，迅速地表现出超越。

近凌晨2时，会议在高等师范学校令人敬畏的地方举行，所有的组织都到了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3月22日运动”，克里文代表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韦贝尔代表的统一社会党学生，布格罗和佩尼努代表的大学行动党，林哈特代表的青年列宁联盟。这是令人生畏的一伙，都是有经验的活动分子，都具有五年或十年的政治斗争实践。机会终于来临了，他们都知道一定要抓住。

会议召集者，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粗鲁的发言人罗贝尔·林哈特第一个发言：他认为拉丁区的骚乱仅仅是徒劳的，必须改变观点，必须走出大学到工厂里去。其他的代表一致大叫大嚷地反对起来，这刺伤了亲华派，他们在林哈特讲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时愤然离开了挂有黑窗帘的会议厅。直到5月10日，亲华派还在进行分析讨论：这个运动将是革命战士的陷阱，必须离开拉丁区，寻求与人民的结合。在整个学生运动进程最狂热的第一周里，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固执地留在运动的外面。

从这以后，其他组织的领袖们每天晚上都来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驻地——王子先生街集会，他们成了运动气候的富有经验的气象家，迅速地测量动荡程度和注意用暴力取胜的火候^①。毫无疑问，这里近乎日常地为风暴作准备。他们决定最近进行两个示威活动：一个在星期一上午，为支持科恩-本迪、迪特伊等被纪律委员会追究的学生；另一个示威是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星期一18时30分。然后他们分散过夜。从第二天起，大学行动党

^①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的谈话。

就开始在圣米歇尔大道动员。

睡 觉……

像许多政治危机一样，首先是个长长的时间系列，五月是夜以继日的一个月。在运动开初渐强的时候，所有的角色们精神饱满。骚乱十天以后，他们开始疲惫、意见平庸。缺少睡眠的一伙人能在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吗？经过高度紧张和只有短暂休息的两三周后，主角们的清醒意识、冷静分析和旺盛精力都大大衰退了。战略性的错误、疯狂、惊慌、泄气、逃跑、辞职、精疲力竭等等，在这次运动中从未间断过。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方面就可以写一部五月运动史。乔治·蓬皮杜是耐劳的，他精神饱满、信心十足，从未衰退过，他借助阿斯匹林的特殊消费夜以继日地琢磨各个组织和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与他相比，夏尔·戴高乐就没有保持这个间距，年龄的重负已沉重地压向这位力量的巨人。贝尔纳·特里科^①认为他的爱丽舍宫办公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总统的健康熬夜^②，在戴高乐失踪之前，这决不是托词，他曾向总理说明戴高乐需要到科隆贝好好地睡一夜以应付时局。

同样，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危机临近顶点时，在身体上也需要休息一下。后退一步是为了猛冲。他准备去培植这个运动的德国恢复精力，这将使法国政府乘机剥夺他在法的居留权。警察力量的薄弱和法国司法警察总局参谋部的软弱是穆里斯·格里莫的主要忧虑之一，他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调集武装部队以补充宪兵及无用的共和国保安队的时候了。

波拿巴^③曾说过，最难有勇气的时刻是凌晨3时。而1968年

① 1967年至1969年4月任国务秘书，总统府秘书长。——译者

② 作者与贝尔纳·特里科的谈话。

③ 指拿破仑·波拿巴。——译者

5月的主角们却好多次熬夜到这个时间并充足地获取力量，他们很可能将是具有最大预备力量的优胜者。

定 罪

5月4日（星期六）拂晓，克里斯蒂昂·富歇查阅新闻。从舆论上看，争论是激烈的，影响是极大的。能去骚乱中心现场的记者们都触及到暴力扩展方面的或其他的问题。内政部长焦躁不安，他大概感到最重要的战斗之一就要从今天白天开始。右派类报纸一无例外地拒绝评论，只有帕皮荣在《费加罗报》^①上提问：“大学生，这些年轻人吗？更恰当地说，他们应该属于轻罪法庭的范畴。”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好评语。法共《人道报》在对学生的定罪里与政府竞争：“我们今天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会致左派小团体、无政府主义者、托派分子及其他方面的冒险活动，客观地讲，是政府反对学生的政策和手段所致。”前不久，富歇还不知道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领导人，一个“非共产党左派”，弱小的象征，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是如此称呼他，他也表示保留意见。都在批评政府“谨慎地宣传任用大学生方式的重要性”。政府就这样在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因为政府还弄不准向哪些舆论方面倾斜。人们看到的暴力也不是单方面的，特别是亲眼所见警察向自发行动的群众还击，而且发展后果难以预料。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弄不清楚是否因为政治手段引起的那种情况——政府是有意识的还是象征性的对学生使用暴力——学生是在玩弄还是在真正反对政府？逻辑上是希望借助暴力消除运动，相反地却会激发运动。当然，警察暴力的主旨并不是在现场抓人，但已渐露端倪。下午的《世界报》批评政府“缺

^① 《费加罗报》（Le Figaro），巴黎著名右翼报纸，帕皮荣（Papillon）为该报主笔之一。——译者

乏冷静^①”。在学生组织里，谴责已达到夸张的程度。最荒谬的谣言终于在星期五晚上传到示威者中间。传言被捕学生在警察局里受到虐待，还说被捕学生已被警察局杀害了并毁尸灭迹。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这些谣言产生在一定的气氛里，迅速笼罩着示威者。这种气氛首先流露于报端，一些教育团体从中敏感到，接着被热斯马尔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推向高潮，一份左派学生的请愿书被该会的左派教授罗朗·施瓦茨和阿尔弗雷德·卡斯特勒带走，消息马上传出来，所有善意的知名人士都企图调解，这在舆论中迅速地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克里斯蒂昂·富歇预料到这一切吗？7时，穆里斯·格里莫^②被这些最恶毒的谣言呼唤出来。这与前面发生的事件真相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他们能控制这个迅速蔓延的骚乱吗？能在巴黎避免暴力吗？格里莫回答新闻界：总之，不要批评警察局。在这以后应该属于法官们的责任，应由他们判决骚乱者的现行罪，加强秩序，或者如此假设，即将裁决。还有一次，格里莫希望宽大处理被捕的学生。稍后，他召见巴黎检察官帕若先生^③。对这位检察官来说，要使被捕学生的现行罪成立是很困难的。因为27名大学生是在没有抓住具体事实的情况下被捕的，我们仅仅能怪他们出现在现场，以及在他们的被逮捕的时候有运送到现场的一些所谓的武器，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武器的用途，我们也不能归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处置这些东西。格里莫同意这种说法。当然，坚决地判刑将使基层警察满意，因为在他们的行列里有许多人受伤。但格里莫不希望再镇压后面的示威者，他认为宽大处理能平息冲突，使团结的运动中断。这时，路易·若

① 见1968年5月5—6日（星期日——星期一）《世界报》贝特朗·吉罗·德拉安的文章，该报每周六下午在巴黎出版。

②③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克斯有事招呼他去一下。原来，那天上午，若克斯接待了弗朗索瓦·萨尔达的采访，这位出生在西班牙卡塔卢尼亚的律师是个多血质易冲动的戴高乐主义的左派，他与若克斯很熟，常在同一个政治俱乐部里碰面，这个俱乐部是调节戴高乐主义适应进步步伐的众多小团体之一。萨尔达也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之一，他的双重身份使他很自然地具有调停的声望。他建议代总理把星期一审查科恩-本迪和他的朋友们的纪律委员会庭议推迟到10月份。若克斯乐意听他的意见，但法国军帽的阴影笼罩着他，他熟悉爱丽舍宫的气氛，一切让步在将军的眼里都是退却。若克斯脱口说了几句好听的话，但没有一点着手实行的打算。因此，若克斯需要见格里莫。相反，当若克斯很坚决地把萨尔达的意见告诉格里莫时，这位巴黎警察局局长则暗地猜度戴高乐将军指示的意图^①。总统还是每天六时起床，接着看新闻，在自信里进一步肯定自己的估计：国家权力不能成了儿戏，让步，还有随后的被迫让步，公共秩序的原则是不可触犯的。

司法部长，同时是代总理的若克斯给检察官下达指示。在这种时候（如此真有转机吗？），政府的意见对审判官来说是判决的重要因素，他们将依此判决。第一批大学生于下午在10号轻罪法庭被判决，十分审慎，缓期执行。但这些被判缓期的学生们在第二天（星期天）还是会聚在法庭上不走，这是例外的事。这次处以4个学生两个月的拘留。检察官根据政府的策略在他们这一方如此进行。这4个囚犯做了榜样，也将是价值昂贵的4个囚犯。学生领袖们坐在法庭的平台上，法庭向他们分发了警察象征性进入巴黎大学所引起的冲突的补充证据的材料。他们举起“释放我们的同学”的标语，这将是动乱的催化剂，也是在给法庭观众席上不带政治色彩的学生群众的催化剂。这些在法庭调查中表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现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地来到克里斯蒂昂·富歇的办公室，比闹事者还要有力地大喊大叫起来，何况还有一个警察在法庭上平静地声明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受伤，因为“他们不该参加纠察队，他们活该”^①。

对于上级的指示，戴高乐主义在这个周末披着法制的外衣如此地执行了。这有他们的道理：捍卫共和国的法制就意味着捍卫公共秩序。但这样将与整个一代人隔断。下午，体育协会的卡尔卡松和科学委员会的利穆在法国网球锦标赛第13局的决赛里发生争执，格里莫前往静观结果，一边还在拟定他的战斗计划。两个示威活动如期举行，一个是上午陪着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出现在纪律委员会上的示威，另一个示威活动于16时30分从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出发。格里莫带着他的计划去见富歇。他准备限制警察最低限度地出现，即使监视着示威队伍也不要干预。富歇表示同意。内政部长本想在这个时候避免戏剧成分，然而在傍晚富歇却又提醒巴黎警察局长：按照法令坚定地、有力地留在那里。格里莫暗里料定这个完全改变可能是将军强制命令的结果。同样地，阿兰·佩雷菲特发布了一个公告，主要确认将举行考试和将惩罚闹事者们。同时，萨尔达回过头来找若克斯，请示关于学生的决定性指示，若克斯无法答复他，只说还要向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查清一个谈判代表的身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政府曾满意地看到学生组织尽管那么强大，但还是失败了。政府甚至取消了每年的津贴，使教育工会陷入财政拮据之中。为什么要使这个垂死的组织复活？萨尔达再一次乖乖地回绝学生组织和教育工会。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于是号召5月6日（星期一）举行示威。阿兰·热斯马尔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关于他的全面罢课罢工命令的批准书，全面罢课已在星期五下午

^① 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独立地开始了。傍晚，他在新闻媒体面前就此后的有关运动进程立出了三项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撤走拉丁区的警察力量。第一个目标是崇高的无可置疑的，为了其他一切活动分子，必须首先释放他们的一切被捕者；第二个目标是地理的——巴黎大学——知识的象征，必须从野蛮中恢复学生共同的人文主义气氛；第三个目标是针对一个单纯的明确的讨厌的敌人——警察局。一个完美的三段式。这个星期一将是热闹的。

第五章 骚 乱（5月6日）

马居斯^①在巴黎。头脑有点发热的活动分子们在这一天读到这位在美国避乱的德国理论家的文章，文章称这次掀起的巴黎革命吸引了西欧所有的社会边缘者，失去社会地位者和反叛的学生们。同时，在巴黎，5月6日上午，在审慎地召开着一个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像是有意为1968年5月6日（星期一）敞开的：卡尔·马克思科学思想的影响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马居斯在《世界报》上适时地回答了皮埃尔·维昂松-蓬特的几个问题^②，但没有立即到示威群众中去，他确实错了，在他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正是他的弟子们占领大街的时候。他第一次到他们中间，由一个记者团和一小群学生陪同着，在穆里斯·格里莫分派在巴黎大学周围的大约1500名警察的眼皮下，出现在圣雅克大街上。

出 庭

红棕色头发的人处于战斗状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显出嘲弄人的样子，穿着格子布衬衣^③，带着微笑和蓝色的明亮眼光，在一个随从队伍的陪同下去巴黎大学纪律委员会“自首”。这次在巴黎大学开庭是为了判决农泰尔文学院的8名动乱者的弥天大罪。这种裁判从来就是很有名的。开除学籍并附加他的外籍理由被驱逐出境的可能性使“红色达尼”充满了很庄重的忧郁，

① 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译者注

② 1968年5月11日《世界报》。

③ 见克里斯蒂昂·夏里埃：《疯人派的春天》，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根据当天下午在莫贝尔广场拍的一张照片，红色达尼穿着花格子衬衣出现。

其实他是有点担忧一下子牺牲他亲爱的革命前途。这就是有一支奇特的随从队伍陪同这个被告的原因，陪同者中有阿兰·图雷纳、保尔·里克尔和亨利·勒菲弗，一个社会学家和两个哲学家，都是出名的。他们将为“红色达尼”进行诉讼辩护。大学的法规已经一千次被这8名青年所嘲弄，他们只是将从另一个方面进行更政治化更激烈的辩论。

从巴黎大学的第一个事端起，达尼和他的朋友们就逐个拒绝到庭。像是事先安排好似的，他们这次整齐地坐在庭外的人行道上唱着《国际歌》，然后是他们个人版本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流行的卡马尼奥拉歌的旋律，配以“格拉潘烧酒”向农泰尔文学院院长“敬礼”的歌词。尽管庄严的法官立即制止并分组讨论被告们，煽动还是持续了4个小时，从科恩-本迪不逊地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起。在法庭出口，科恩-本迪很干脆地嘲弄：“大家这样消遣了4个钟头。”

真正的场面在外面。3000名学生前来支持农泰尔人，亲华派第一次散发传单。上午，郊区的工人也不甘落后，但没有成效。意识比较清醒的大学行动党号召立即建立行动委员会，这样便于在大学里进行运动组织工作。首先在13区，主要在属于“越南委员会”的一些中学范围里，行动委员会组织了起来并开始运作，其他地方还在形成之中。第13区行动委员会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穆里斯·奈曼，“帕比斯派”的托派分子，与他的兄弟一起后来又创建了自己的小团体，另一个是米歇尔·雷卡拉蒂^①，他们并入克里文^②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迅速地王子先生街

① 米歇尔·雷卡拉蒂不久成为克里文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阵线的纠警队的负责人，30岁时自杀，他是罗曼·古皮的绝妙影片《他30岁死去》中的英雄。

②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的集体行动方向结合起来。

活动组织的膨胀与电台和报纸的煽动大有关联，它们在星期五一整天适时地进行了令人感觉麻木的诱惑，它们不是希望人们了解什么，而是希望看到人们能做什么，也使离开大学的前辈战友们在记忆中重现往昔发生的战斗。庭外的示威群众被果敢的一动也不动的且大部分忠实于克里文的纠察队保护着，尤其是那些在星期天改变观点的向来不问政治的不参加任何组织的学生们，有了表明他们参与战斗的机会，或只是非常单纯地被当时笼罩着巴黎的时代气氛所吸引：不文明的言行，自觉地突然奋起，意外的对抗，解放者的权威，瞬时的造反，对抗成人世界，合理而又贫乏，负责任而又野心勃勃的悲惨世界。

科恩-本迪走进法庭 15 分钟以后，警察开始驱散外面的人群。虽然他们记得必须慎重行动，保持平静，但在这个白天还是爆发了第一阵催泪弹和石头雨。示威者撤退，一小时后又在拉斯帕伊大道重聚。格里莫任他们如此。这是五月的第一次长征。示威者在巴黎中央酒市场稍事休息，开了一个会以后，就沿着封闭沿河马路的障碍物的右侧前进，此次长征历时 3 小时，经过圣热尔曼大道又来到城区，当队伍到达圣雅克路十字路口时，突然分道向巴黎大学前进。指挥是完美的果敢的。这个继星期五的即兴之作出自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纠察队的战术策略，是它们操纵着这支队伍^①。克里文的托派分子们发现一个突破口，就是制造事件的力量，必须煽动思考在紧张局势下的行动以及运动尘埃落定之后的“算账”问题。确实，一点也不需要托派分子们用太多的手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这一天，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纠察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帕特里克·罗特曼在 1968 年 5 月期间是该纠察队参谋，他显然给予了许多影响。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却认为这是群众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掀起的战斗。

腕来挑起殴斗，群众已陷入激烈争斗的欲望之中，这是在纠察队的所有命令之外的事。扩散骚乱的快感在学生中间像是从来没有的感受。人们处于对抗之中。

格里莫总想避免与学生接触，但又需要防护巴黎大学。警察别动队突然从学校街蹿出，端着枪，灰尘弥漫。示威者与他们对峙了一会，撤退到莫贝尔广场会合。战斗开始了，首先是命运的“炮”战——催泪弹对抗石头。石头射手们迅捷地向前，冲向警察排成障碍的深蓝色长城，扰乱他们并在疯狂跑掉之前扔出手中的石头。一个示威突击手越过其他人，靠近发催泪弹的警察别动队仅几米远，于是一个目标突出在他随后的人群前面，橡皮棍举了起来，这个突击手又突然调头奔回队伍，一个错误发生了：一个正在专心筑棱堡的冒失警察^①面对奔回者和戴头盔蒙头巾的人群，慌忙从雨衣里抽出一根长长的警棍，转而又想扔催泪弹，这项危险的活动需要准确的步伐和锐利的眼光，大概这个警察初学掷催泪弹，人们很快发现催泪弹点火很慢，于是有人捡起这个武器扔还到深蓝色制服队伍中爆炸了。

紧接着，示威者开始撬铺路石垒成石块带层，为第一线做后盾。突然，一个市政工程用的小屋起火，警察们惊呆了。这一下使他们有了与示威者打交道的观念了，即使不是职业性的，在驱散示威者方面，操作得比以前更迅捷更冷静也更令人生畏起来。

格里莫不想马上有负罪感，他强令警察停止接近巴黎大学，肉搏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警察别动队只能在凌辱、嘲弄和石头、螺栓、瓶子雨面前持枪立正，只能仅仅借助有机玻璃盾牌的保护。由于这种严格的命令，一个警察在喊叫中倒下了，很快被同事们拖进了大客车。警察队伍充满了克制的情绪。因此，警察

^①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详细描述了这场骚乱。还可在同时的报纸中找到同类描写，尤其在《世界报》和《战斗报》上。

十分谨慎地定时轮值。

警察局长格里莫想掌握他的队伍的实际情况，决定从办公室徒步去莫贝尔广场，这已是很著名的事了。学生和记者围住他，抨击警察局。“示威者首先采取了暴力。”格里莫边说边想起在巷战中被石头击破额头的警察克里斯蒂昂·布律内。他微笑着，辩论平静地进行着。然后，他说了结束语之后就避开了问题：“在你们中间，将来可能有干警察这个行当的，那么，他们也将必须干好并保障巴黎大街的秩序。”

圣热尔曼 - 德普雷大街的战斗

16时，骚乱因骚乱者的不专心而中断了一会：示威者转移去与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动员起来的队伍会合，地点是当费尔 - 罗施罗广场，时间是18时30分。路途上，他们与到来的一支新队伍并排前进，大家放松地把头巾拉在脖子上，把头盔拎在手中。忽然，约1万名示威者围住了贝尔福地方省的那头狮子^①，激起大家的一阵好奇，不一会，他就消逝在人海中了。此间，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朗贝尔派”分子们借口格里莫的突然出现动员大家背上武装袋^②，但没有多少人响应。队伍在一片嘘声中仓促前进。五月的特征出现了：嘲笑僵硬的语言：“我们是一个小团体！”……语言的创造开始了。人群欢乐地沿着拉斯帕伊大道向前汹涌。人们唱着《国际歌》，还没唱到第二节，大家又错误地被另外的人所吸引：一些年轻的女人从她们的阳台上向下面扔红色的玫瑰花，并喊道：“资产阶级和我们在一起！”下面一些红旗

① 指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他出生于法国贝尔福地方省，人们通常称他为贝尔福的狮子。为了解警察执行任务的情况，他步行出门，与示威者相遇，此事成为著名的事件。——译者

② 装有石头、螺栓、螺钉等抛掷物的袋子。——译者

摇晃呼应，队伍中一阵狂喜。这是在勒内大街和圣热尔曼大道的瓦万十字路口。第一排戴头盔的队伍停止了前进，后面的队伍一排接一排地凝固起来，十分安静的。突然，人们发现约100米远的狄德罗街上有光泽——一排排深蓝色的障碍物，排列在灰色马路上的长筒靴和头盔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示威队在面面相觑，犹豫不决，焦躁不安。然而有头头们在，有擅长冲突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纠察队伍，必须向前进，突击手们手持抛掷物冲在队伍前面，示威群众互相观望了一会，然后戴好头盔，用头巾遮好鼻子，队伍重新启动。

被石块追击的有负荷的警察队伍，害怕另一侧的富尔大街被占领，只有后撤，示威队伍乘机蜂拥前进。这是警察别动队第一次主动后撤，官方为之震惊。

示威群众还在进行战备的杰作，他们拆掉道路指示牌，捶打石头。从第一条裂缝在碎石路面上产生起，人们就七手八脚地挖掘铺路石，然后分送到第一排的投掷手手中，向深蓝色制服群掷去。几辆轿车被掀翻在地，一些树的栅栏被拔掉。警察同样遭到一连串爆炸的催泪弹的反击。人们奔跑着，喊叫着，对着发光的目标投掷着，有的逃跑，有的躲起来，也有挺而向警察讨还的。傍晚来临了，昏暗笼罩着战场，饱和煤气的空气呛着人们的肺和眼睛，火光映红警察别动队的深蓝色雨衣，到处是玻璃碎片，一些过路者糊里糊涂地挨了警棍，到处听到喊叫、辱骂和爆炸的声音。

警察局开来了两辆消防车。一块石头正好砸碎第一辆的挡风玻璃，不得不在石头雨面前向后撤。是共和国保安队担负的这个任务，未料却遭到逼近埋伏在背后的石块的追击。一阵惊惶的捕获之后，共和国保安队慌乱地后撤，尽管有官方警棍的护卫。一个掷催泪弹的保安队员因避煤气盲目地奔跑，竟可笑地撞在一棵树上。突然，一辆小型卡车驶向保安队员组成的障碍层，从上面

飞出的一块石头加速飞翔，消防车的驾驶员在最后一刻喷出水柱，共和国保安队这下可成功地避免了这个飞行器的袭击，只差一点点^①。维持秩序的警察们仍在原地不动，他们不想组织正面的突击，那么多的示威者一旦被激怒而疯狂起来就更不好办了。警察想好了，过一会，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展开抓获动乱者的迂回行动。果然，人群在勒内街退了潮，慢慢溃散。21点多时，警察控制了场地，追捕还想闹事的小伙子们。这就是暴力行动，胡乱地打击，受伤者猛增，多亏这一次示威者还没想与警察正面冲突。对抗的嘈杂声一直持续到23时。第二天上午，尽管有路政局管理人员的清理，圣热尔曼-德普雷大街似在仍然忍受着旋风般来往者的践踏，到处是掘起的铺路石，破碎的玻璃，烧毁的残骸，经久不散的煤气味。据官方统计，有481人受伤，其中学生279人；81人被捕，40人已得到确认。

舆论支持学生

20时30分，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电视里回答青年记者伊夫·穆鲁西的提问。他说：我们是很有耐心的，问题是学生热衷动乱。事件是有组织动乱的结果，必须终止这种“暴力的逾越”。巴黎大学的第一次禁令是合法的甚至是敏捷的。从法律和技术的角度来讲，政府有一切理由对付他们。示威的权力并不包括用石头追击警察。对抗是由有组织的派别蓄意掀起的（主要指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以致群众也自发地跟随他们。对他们的大量控告比事实要小得多。警察当中也有许多受伤者，严酷的反击并不是由他们激起的，即使他们在场。

然而，从政治上讲，官方的控告词没有被通过。对学生群众来说，他们为星期五被监禁的代人受过的学生鸣不平，而且巴黎

^①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大学的关闭损害了自中世纪就延续下来的大学独立的传统，虽然检察官菲力普向巴黎学生承诺尽力使警察局和最高法庭避免冷冰冰的裁决，对于警察对逃离者同样冷酷无情地运用暴力表示愤慨，但是法庭还是取消了对冲突真实原因的一切查询，尤其当舆论朦胧地触及到是整个一代人开始被动员起来反对旧制度时，法庭辩论的范畴便有意识地转了向。学生青年自然地赢得了舆论同情，同样也取得了为数众多的教师队伍的不可思议的支持。在警察和动乱者的冲突中，后者自然地赢得人心，只要他们的动乱不使人恐惧，因为恐惧并不是来自他们这一边。一些人消遣地目睹对权力的蔑视，另一些人在橡皮棍的暴力面前大喊大叫，所有的人对活跃的少数派真实而出色的对抗表示缄默，除了政府雇佣发表的纯论战性的结论。殊不知，学生运动一抬手便赢得了舆论战的胜利。

新闻凝固着这种舆论的摇摆。《战斗报》发表以《拉丁区的大捕杀》为题的文章，夸张了普遍的感情：警察在狂热的示威者面前缺乏冷静，虽然动乱平息了。曾一贯战胜阿拉伯人和黑人闹事^①的共和国保安队承担对行人和影剧院集中人群处理的任务，报纸长篇报道他们的暴力行为，包括追击年轻的姑娘。发生在警察局里的难以胜数的暴行也开始被广泛地披露，尽管警察机关予以否认。一个被捕者叙述道：“我被带进警察局，首先进行简单的身份确认……当我从里面出来几分钟以后，就被一个警察十分巧妙地用十字镐柄捅破了鼻子。”^② 在博戎警察中心，递解着一批被捕的示威者，开始以严肃的名义摆布，接着就有些侵犯行为。尽管传闻有些夸张，凌辱和推搡是免不了的事，就像行人进

^① 五六十年代，移居巴黎的黑人、阿拉伯人常游行示威，反对种族歧视或变相的种族歧视。——译者

^②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入烟草店一样司空见惯。警察的怨恨，不纯的种族主义，往往使排犹主义者从这里得到发泄。穆里斯·格里莫有责任训斥他的下级并到布满石块的现场热心地要求他的人员保持克制^①。这严重地削弱了政府的威信，统治阶级开始感觉到了。戴高乐将军继续紧逼他的部长们保持坚定的立场。但议会代表团与爱丽舍宫的决心相反，坚持双向缓和的意见：“先生们，大学需要改革……当然，也不能容忍大街上的暴力。”^②这不再是秩序也不再是改革。决心好像是无足轻重的事；重要的是应该部分地承认示威者们的要求是合法的。不被人注意的是，议会代表团意见的言外之意包含对戴高乐将军从危机开始至5月29日的一切态度的保留。与此对称的是，法共也应该慎重地修正它对运动的态度。法共指示乔治·塞吉^③修正他以法国总工会的名义作的讲话，没有人知道他也是在法共的辩论中永远占中心地位的法共政治局的成员。法共总书记还是照例对党内极左的“煽动者”进行抨击。但法共自星期五以来已感到某些情况要发生，开始觉得没有必要马上清洗割伤自己。塞吉肯定他对“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尽管这份对学生运动的致意显得过分雕琢和有条件，但支持意向还是不容置疑的。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③ 隶属法共（相对独立）的法国总工会的主席。——译者

第六章 长 征（5月7日）

在工人和学生的示威运动中，学生运动占据了前幕。如何保持下去？如何将这种出人意料的强大动员效果转为政治上的胜利？运动的领袖们自第一次骚动的那天起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由热斯马尔提出的三项要求，即释放被捕者，撤走警察和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使他们在最近的目标上一下取得了一致。

实用主义

五月事件之后，人们对它的评论缺乏现实态度，对五月狂热的词语、革命的幻想和意识形态的转移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评论。小团体的头头们经常讨论这些评论。这当然敏感地涉及到对运动的观点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些评论的修饰语更符合五月以后的一些事件。70年代左派的昌盛虽然来自1968年，但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1968年，曾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萌芽，带有暴力本能并企图引起严重后果的战术家也层出不穷，在一个运动中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只有树木才不问政治。在五月第一个星期的活动里，少不了浮夸的华丽辞藻，也少不了一些人，他们玩弄团结、玩弄同业工会的最起码的义愤。多亏政治出路随后降临，三项要求暂时地统一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满脑子意识形态的科恩-本迪，克里文，热斯马尔，佩尼努及其他一些人都知道在必须摆出各自复杂的观点时，需要展开兼容感情的大旗。

暴力的使用仍然不会减少，以致人们在忆及五月时，好像只是一个大系列的骇人示威和不间断的暴乱形式而已，其实这是无意中的记忆选择。实际上，运动中只有三次暴力的爆发，两次在五月，一次在六月；在60天的危机里总共有10次狂暴的示威。由于激烈的缘故，人们夸大了它的次数，令人震惊的一系列巷战

也影响了人们回顾的视野。

这个星期二上午，王子先生大街的学生小参谋部里，特别缺乏战斗气氛。他们被频繁的示威搞得昏头昏脑，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巴黎 16 万大学生中的 1 万在示威，一个难以置信的少数派数字。他们同样担忧暴力的后果。惟一可能与当局谈判的是热斯马尔，虽然他只是一个薄弱组织的发言人，但还是很负责任的，也比其他团体的头头们合法一些。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提议当晚组织一个游行示威，但这一次却平静起来，人们把头盔和弹弓都扔进橱柜了，大家都嘲笑他。拉丁区附近，街道宽阔，补充队伍的入口也宽敞，当费尔-罗施罗门是个最理想的集会点，他们于是相约 18 时 30 分在这儿举行集会示威。

星期二下午，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从收音机里才获悉一个决议的消息，是以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播出的：“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将参加今晚这个可能少些暴力的示威活动。”热斯马尔认为这是个政治冒险：如果游行队伍稀稀拉拉，不管怎样，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将显出软弱无力而受到责难。运动领导在玩弄他这张牌。活该。然而至少有一个听众与他同时在高度注意这条新闻，这就是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他焦躁不安地考虑今晚的示威将预示着学生的不满会更激烈，而政府也不会妥协^①。冲突将重新开始，随着将是失去控制的事件或是持久的危机。这次他一点也不能担保示威者没有死亡，要么终止对抗。当然，他能够禁止示威，法律在这里授权予他，但他不愿这样，因为禁令作用不大，相反会使一部分人更坚决。从技术上讲，禁令也很难奏效。必须包围集会地点并阻止所有的人到那里，特别是地铁的来路。看来，暴力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示威者迅速改变地点，但这是他办

① 穆里斯·格里莫与作者的谈话。

不到的。那么，必须用卡车运送宪兵，这有阻碍交通的危险。那么，警察只能步行到场，但这样又不好迅速调动队伍，因为装备笨重，而且一些大腹便便的警察很容易被学生们超过。“我们什么也不能作，头头们，也是些篮球。”共和国保安队的一个军官在那个混乱的晚上如此揶揄他的上司^①。在这种情况下，示威群众按预先商议好的路线拥进会场，集会在一片混乱中照旧进行。警察成了人们的笑料。原来在那天下午，巴黎警察局长用电话与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总部联系过：

“我有许多困难需要你们知道。”电话接通后，格里莫对热斯马尔说道。

“但我们只有两条通话线路。”学生阵线头头的言语还是十分谦恭的。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马上派人来解决。”^②

不一会，一些电讯员就来到王子先生街安装直通电话线路。这条线路运行了6个月，虽然完全是象征性的。如果仔细地审视这场危机，就会发现暴乱参谋部与镇压参谋部的联系一直是保持着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特别是关于游行路线、时间、目标等技术性的对话。一些年来，警察局对示威活动就十分清楚，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们也习惯于与警察局商议游行路线和讨论当局的禁令，研究如何折衷如何绕行到某某地方等等。在五月里继续如此，只是频率有所增加而已。几乎总是如此，因为这关系到限制破坏、避免流血的大事。总之，双方还是遵守默契的，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都主动排除革命日程表上的“事件”，即使这些联系有些缺陷。无论如何，双方都还没有表现出走极端。因为这是国内“革命”，五月的战争还没有爆发，既然任何人都不想毁

^①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②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灭也不想死亡，何乐而不为？

走向星星广场

18时30分，当费尔广场，学生领袖打赌赢了，有10000多人，动员还在继续。对面，格里莫把他的4500名警察排得整整齐齐阻止人们前往集会场内并坚守巴黎大学周围。在这头贝尔福狮子的周围，站满了已经战斗了两天的老兵和有经验的战士，他们圆睁双眼，双腿叉开，克制着感情，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们不再感到孤独，因为不断有人来往，好奇的、逗笑的、激动的、提意见的都有，踩黑了当费尔的铺路石。那边，索瓦热奥在演讲着，似乎缺乏信心，人们只听得清几个句子和单调的词：巴黎大学……我们正在慢慢变成大学……“我们就是一种小派别……”

警察局长格里莫走出警察局，出现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与示威者见面。在皇家港，他一边向前走一边交涉：“不要试着去巴黎大学，你们会挨揍的，我特许你们去蒙帕拉斯。”^① 第一阵示威的人群顺从地缓缓流向塞纳河边，去拉丁区的活该倒霉了。塞纳河另一边即右岸的示威群众老远地向他做着抗议的手势，格里莫并不反感。右岸的示威队伍是学生长征的开始，他们从巴黎荣军院过来，队伍不断扩大，队伍的右边就是国民议会大厦，警察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们，但他们看也不看警察一眼，连嘲弄也是勉强的：“权力就在大街上。”

矗立在大街上的冷漠的波旁宫是议会权威的象征，人们没完没了地恶意评论示威群众的这种平静的蔑视，当然也有恰当的评价：五月的群众在合理的缺点里骚乱。制度的机器突然后撤，“突破口”半开着，然而并没发生别的乱子。1968年5月的青年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一代终归永远不可能真正比第五共和国驰名。当第四共和国脱离青年一代时便灭亡了。它的末日就是议会权力的丧失。10年以后，为什么要动用这种没有威信没有权威的刑事法庭来诋毁青年一代呢？

的确，权力就在大街上，要知道这是国家的权力，是戴高乐和他的政府的权力，被警察排成的一道深蓝色的人墙在大街上落实了。为了释放被捕者，都在大街上表演。看来，革命的浪漫主义不如合理的现场直感。戴高乐将军也曾用他那神赐的能力在电视里、在旅行中、在公共海滨浴场，在人民与政权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没有中间环节。这提高了他的威望，学生们完全理解他。而议会的反对派里同样总是活跃着戴高乐主义，这如同制度、党派、议会或联盟方案里长长的圆括号，使人们需要费好多时间去理解新的第五共和国的合法性。实际上，示威群众对这种合法性都暗含着敬意，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冷漠的巴黎荣军院也大概比革命者更戴高乐，这是个动人的悖论。

塞纳河岸边，沐浴在晚霞中的示威人群早已远离这种微妙的感觉。此刻他们只会感到坚强而有力，自负而顽强，五月里充满激情的幻想就产生于这一天。“我们就是导师”，活跃分子之一雅克·贝纳克^①后来回忆说。总之，12000名骚乱者在那天在忙碌的巴黎尽情沐浴着历史的微风。

警察拦住了亚历山大三世桥。游行队伍只有沿着凯道赛沿河马路向协和桥前进。1936年2月6日就是在协和桥发生的惨案^②。新来一队警察保护着国民议会大厦，他们开枪示警。这回可能是警察局的战术错误，协和桥敞开着，但这个错误并不重要，游行队伍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背向波旁宫，沿着塞纳河右岸

^①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② 见本书第15页注^②。

走向冒险，狂热继续迷住他们。队伍前进得十分惬意，打头的心不在焉，对刚掠过的险境浑然不觉，临近香榭丽舍大道，队伍的前头打起了红旗。“这是最美好的时刻”，让-马赛尔·布格罗^①后来叙述道，“我们走了整整一天，跑遍了全巴黎，啊，膨胀的队伍挤满了香榭丽舍大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②

博沃广场内政部里，克里斯蒂昂·富歇和他的办公室人员一起晚餐，只吃了一点点。随着愉快的气氛，大家议论着巴黎的“这些天”。这位博学自信的部长已经晋升为都市的战略家了，他向手下强调在巴黎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让暴乱者沿着塞纳河右岸走，真正的原因是总统府爱丽舍宫离河右岸只有两步，任何可靠的队伍也不能保卫好它。突然，电话铃响了。“他们正沿着右岸——妈的！”^③富歇狂怒地呼叫警察局长格里莫：“必须拦住所有的桥，你看着办吧，这是最起码的。”当然是的！但部长错了，游行人群这次忘记了掩映在树木簇叶中的爱丽舍宫。

22时，游行群众围着凯旋门席地而坐，一片红旗。只有歌声里还剩下一点对共和国的虔诚，几个托派分子当时还阻止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凯旋门下无名烈士墓上的火焰撒尿的准备^④。人们呼口号、歌唱，然后重新出发。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格里莫重新展开他的士兵。一排粗大的铁栅栏关闭了乔治五世草地，通向爱丽舍宫的道路被切断，以防万一。一个警察有力地向学生

① 让-马赛尔·布格罗 (Jean-Marcel Beaugureau)，大学行动党的负责人之一。

——译者

② 与作者的谈话。

③ 克里斯蒂昂·富歇办公室的成员保尔-玛丽·德娜戈尔丝对作者叙述的轶事。

④ 这件事被好几个作者引用过，也被一些作者否认过，在不同的版本里也缺乏这个“褻渎圣物”的情节。作者引用它是为了右派在反对学生的论战里重述是否有这件事。

头头们做着手势——必须转向河左岸。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们在警察面前手挽着手，但人流却不知不觉地改变方向朝有桥的地方流去。疲惫不堪的示威群众从收音机里获悉拉丁区的阿萨斯街发生事端的消息，人流便又流向拉丁区。已是午夜，巴黎大学在望，群情激奋起来。多亏王子先生街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用“红色电话”恳求格里莫打开障碍物，“否则，将有大的破坏发生。”格里莫想试一试，但又顾虑防止巴黎大学发生变异的保证。他们正讨论着，忽然，警察局电话员的声调变了：我们刚获悉游行队伍已解散的消息。原来，维持游行秩序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纠察队现场宣布终止敌对行为：大家回家休息。人群从容不迫地接受，并没有强迫。这时，亲华派还在突出自己，利用热斯马尔和科恩-本迪不在场使学生继续留在对抗状态^①，他们对工人的命令已经失败。亲华派掌握了一个小团体，开始向障碍物进攻。实际上，没有很多的必要去解散游行群众，他们也想进攻障碍物。暴乱在不能有“但是”的纠察队的带领下再次掀起来：铺路石飞舞，轿车烧起来，催泪弹在巴黎的夜里施放。在警察分局局长邦代的报告里是这样记述的：“在临近皇家港的蒙帕拉斯大道上，我被4个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喊住，他们很激动，其中一个甚至流着眼泪。他们已完全被事件搞得发了疯和无可奈何。他们坚持要我相信那些烧毁轿车、用投掷物投掷警察的顽固不化的示威者并不属于他们的组织，而是另一个亲华的革命组织。他们恳求我和我的人员们调解终结这些破坏行动。”^② 对抗在拉丁区继续了三个小时。这次长征在哄哄闹闹中结束。五月的神话就这样开始具体化。

^① 至少在雅克·贝纳克的作品里是这样写的，科恩-本迪和其他人也未明确否认，但着重争论群众自发性时有所修正。

^②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第七章 退 缩（5月8日）

向星星广场的长征并没有感动戴高乐将军。在这个星期三的部长会议上，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一结束他关于大学危机的长长的报告，总统便斩钉截铁地要求恢复秩序及进行必要的调职。这天上午，3位诺贝尔获奖者传来电报，并由弗朗索瓦·莫尼亚克^①署名，这也没动摇总统的决心。将军认为这次学生事件不难解决，仅此而已。他说，对大学要用有力的办法，大学的民主化也是必要的，也是他的计划之一。现在，选举的事是紧要的。那么，首先要保持正常秩序。大家议论一阵之后，总统做出结论：“一场暴乱，就像一场火灾，这就是第一刻的战斗。”^②

在对部长会议公报作出反应的同时，全国学生联合会嚷叫煽动：政府对学生的三项要求没回答一个字，也没有开放巴黎大学的表示，反而重弹选择入大学的威胁老调。热斯马尔召开记者会宣布：“不管撤走警察与否，今晚，巴黎大学将是我们的。”

协 调

从表面上看，反对派的对抗是全面的。然而在幕后，一个秘密的不明确的大杂烩式的谈判在艰难地开辟道路。学生参谋部在对抗和妥协之间犹豫不决。“3月22日运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和大学行动党一致认为像这么好的动员不会立即再到来，必须保持完全的不妥协以保存活力，充分发挥对抗和僭越的作用。当

① 法兰西文学院院长。——译者

② 关于这个时间的部长会议的报告（当然是机密），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时，一次既定的力量关系已形成，并吸引了舆论，大家都能摘果子，大家甚至都清楚获得成功的突破口就是在大学之外争取到工会的支持。明摆着，不用说，他们都认为妥协将是最坏的事情^①。

由于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更倾向于谈判，才涉及到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这两个组织的基本代表性问题，这个考虑是正常的。在大街上闹事并不是它们活动的主要目的，联合会的目标应该是使请愿有所进展。如果能在三项基本要求上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它们既能保留特权又能胜利地结束运动并准备登上权力的舞台。热斯马尔和索瓦热奥更勤便地与已成体系的兄弟组织联系，尤其是与全国教育总工会（SGEN）。它们都自然推动妥协活动，以显示各自一方的理智态度。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希望取得传统工会力量的支持，并由此扩大它们的活动。各方面，包括全国教育总工会的领导人 and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弗朗索瓦·萨尔达都想使阿兰部长相信他们和一些学生领袖们就可能顺利解决问题。前天，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已向格里莫承诺他们是一支平和的队伍，他们是信守诺言的，警察局长也确实看到他们在5月7日深夜事件的末尾对学生纠察队所采取的反对行动。为了晚上的示威顺利些，热斯马尔和索瓦热奥争取到巴黎大学扎曼斯基院长的帮助，在巴黎中央酒市场的朱西厄大院举行传统的集会，远离警察的眼睛，因为警察已先于平和的集会队伍去了好出事的拉丁区。

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了解这些，他亦想打开一扇门，以回答在议会辩论上批评政府的反对党。他提出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可能性：“如果这些条件是汇集起来的，那么，巴黎大学的复课一经校长和有关院长认可就可以达成，也就是说，我希望在明

^① 让·路易·佩尼努和阿兰·热斯马尔与作者的谈话。

天下午复课。”^①《法兰西晚报》的一个记者获悉了这个消息，他认为这是解决危机的办法。该报宣布重新复课就算最可靠的消息^②。代总理若克斯一读到这个消息，就电话责备佩雷菲特并提醒他记住总统的命令^③。教育部长解释自己没听懂对方的话，然而第二天事实摆在那儿，《战斗报》发表以《戴高乐让步了》为题的文章。学生领袖们开始考虑政府屈服的可能。格里莫则大喜过望，因为西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示威，共和国保安队和一部分警察已应召去了外省，他无力再面对拉丁区的新战火。

在这种暧昧的局势下，又下起大雨，但巴黎中央酒市场的集会如期召开。领袖们仍然呼吁他们的要求，强功率的扩音设备高高地安装着，群众目瞪口呆地听着，人们照例要求政府坚定承诺。人群都淋湿了，疲惫不堪。一直缺席的法共，大概想找回自己的体面，这一天才与运动重新胶合，他们的候选人和活跃分子都到了场，他们机械地取消“鼓动”，并号召恢复平静。

误入歧途的运动

集会之后，队伍向拉丁区进发，还有一万多人^④。“希特勒在镇压”，“戴高乐应负责”，“富歇发疯了”，人们温和地走着喊着，格里莫的警察们秘密地监视着。警察局要求群众不要参与学生纠察队的效能试验。在无事发生的行进之后，人群抵达卢森堡公园，苏夫洛街的入口。按照既定计划，头头们号召人群散去。索瓦热奥说服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人，希塞雷说服革命学生联合会

① 星期三下午在国民议会上的部长辩论。

② 1968年5月8日（星期三）《法兰西晚报》。

③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④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的人，他们在爱德蒙-罗斯唐广场为解散人群大步走来走去。但学生们不想离去，一部分还在狂热中，一部分则伤了心，他们攻击领袖们，大声责骂他们使人失望；他们眼见着好容易发动起来的群众力量如此受人控制，如此被萎靡不振的官僚主义者们引入歧途，感到十分愤慨。小团体的队伍围着卢森堡公园的铁栅栏顽强地排列着，使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失败主义者当众出丑。热斯马尔上午还在吹牛，断言今晚就可以在巴黎大学宿夜，现在却听到这些指责。巴黎大学就在几步远的地方，仍然被警察牢牢地看守着。那里，警察们面对面地排列着，精神显得更抖擞起来，因为正好在游行队伍解散之前。骚乱的快感是根深蒂固的，今夜仍然如此。学生们想在一切政治手腕和一切小团体的阴谋之外衡量一下警察的能量。但学生头头们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更多地看到危险，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出人预料的幸运。一个举动就足够了，第二天，巴黎大学重新开放，警察撤走了，完全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为了半开的大门向着不再突然关闭的一边开着，需要转动学生“负责人”的钥匙。科恩-本迪到得很晚，他忙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他同样被群众的苦涩情绪所感染，认为如此令人失望的解散是难以置信的，他理解地说：“这种情况终于到来，某些组织又一次出卖了我们。”通情达理的手段几乎危害了一切，在运动一点也未超出完全正当防卫的范围时，对偶发的妥协事件竟出现这么多的企求。必须坚决地振作起来。

热斯马尔的苦恼

在这种受谴责的气氛里，阿兰·热斯马尔经受着精神上的危机^①。当全国学生联合会和革命学生联合会宣布解散队伍时，没

^① 与作者的谈话。

有任何组织居间调停。然而，群众的愿望是不可置疑的，当群众想对抗时，领导者能出面劝阻他们吗？收音机里说：人们对运动终于赋予如此受欢迎的像样的领袖感到满意，他们既能避免暴力也能避免妥协。政府说可以直接对真正的学生们表示一个姿态，将释放被捕的学生。政府信守诺言，释放了被捕的法国学生，受到一些舆论的欢迎，人们能区分良莠。热斯马尔对自己带来的妥协后悔莫及，痛哭流涕；他对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同志们说，他本来想把那次进军引向胜利，“你们不看看我们的行动与运动的逻辑性那么不一致……为了有利于工会之间的协调，我们不得不在框框里转圈，这将与发动群众完全背道而驰。在右派和左派的常规里，我们陷入了政治陷阱。结果，我们暂时放弃那些不是法国学生的部分，这正是运动开始脱离外籍学生、工人的标志。”^①

“3月22日运动”的成员们在巴黎的另一端召开会议。热斯马尔终于决定前往参加，因他们代表着运动。会议上的活动分子们正在盛怒中，科恩-本迪宣布取消以前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协议。热斯马尔突然闯入，遭到怨恨他的活动分子的拒绝。他请求发言并做哀婉动人的自我批评，声调和脸上充满了痛苦。他解释教育工会组织如何把游行引向另一个方向并解散队伍，解释妥协的拥护者们如何涣散，经过三次梦幻般的游行才积聚起来的力量。“这使我感到倒胃口”，他说，“我将被谴责为叛卖的典型”^②。大家怀疑地打量着他，小团体的紧张状态是很过分的。他继续说：“是的，现在警察局释放了法国学生，却仍然关押着其他外籍学生或劳动者。”一些年来，吸收马克思

^①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②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主义的人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这种歧视如同激流中旋涡的威胁，假若对他们的歧视存在最小的犹豫，这种歧视就算消除了。必须战斗到底，不能有任何的妥协。

第二天，大家重新联合起来，学生参谋部也在同样的震波里振作起来。必须进行反抗，要不马上屈服。为增加分量和避免来自佩雷菲特方面的一切让步诱惑，大家决定在三项公开要求里补上第四项^①：政府不仅应该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撤走警察和释放被捕者，还应该促使巴黎警察局长辞职，为暴力行为负责。在等待中，大家终于通过了下一次示威的时间：5月10日（星期五）18时30分，从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出发。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将不再单独地动员号召。大家在传单下面补充签上中学行动委员会（CAL）和科恩-本迪的“3月22日运动”委员会。因此才有5月10日的行动及巷战之夜，它来自犹豫和苦涩的5月8日。

^①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的谈话。

第八章 战斗的前夜（5月9日）

在这些天里，真正的战士明显地数科恩 - 本迪，自第二天起，他就在争取一些温和主义者对“3月22日运动”宗旨的归顺。热斯马尔跌倒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由于顾虑相当多的兄弟工会继续存在的压抑情绪，总是优柔寡断；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仍然倾向于“扩大”与传统工会组织的对话。“红色达尼”在各组织联席会议上说：“一切都已决定，我们在星期五晚18时30分示威。我们连夜印制了15000份传单，现在正在分发中^①。”经过短暂的讨论，通过了口号，最激进的赢了：运动继续。

民 心

学生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群众认为三项要求是最起码的，特别在运动处于得民心的顶点时。法国舆论调查所（IFOP）前天对巴黎市民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1%的被提问人赞扬学生，只有16%认为三个先决条件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小团体想“扩大”与传统工会的对话只是一时的愿望。于是，塞吉回法国总工会，索瓦热奥回全国学生联合会，分头征询意见，他们约定稍后碰头。法国总工会主席塞吉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这样叙述此事^②：他迟了一个小时回总工会，他首先内疚地看到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索瓦热奥被总工会的会员安排在一个“堆放零乱杂物的地方”，正恼怒地等待着他。索瓦热奥解释自己没有刮胡子，他说，“我要等到胜利之后再刮胡子，”塞吉听到此话，狠狠地讥讽了这个激进主义者一顿。主要的协议没有达成，因为正处于激进阶段

① 作者与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的谈话。

② 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亚尔版，1972年。

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口号不符合高贵的法国总工会的口味。到下星期六，乔治·塞吉大概会改变原来的想法，没刮胡子的人还会等着他的。

政府总是犹豫不决，坚定而又软弱。戴高乐看到《战斗报》上《戴高乐让步了》的标题，怒火万丈。14时30分，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宣布暂缓复课，同时宣布审查科恩-本迪的纪律委员会庭议不定期延迟，等于什么也没做。在小团体那里，都认为继续退缩可能会导致前天晚上的后果，以致在示威进行的时候领袖们还在观望。退缩显然无人响应。大转变之后的夜，一切静悄悄。

阿 拉 贡

热斯马尔，索瓦热奥和科恩-本迪从此以后成为象征性的“三人帮”。当晚，他们聚集在巴黎大学前面的广场上，用扬声器主持着一个临时安排的集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索瓦热奥讲话^①：

“昨天，我们想出了我们可能发出的解散的命令，我们没能鼓励这场我们不占优势的力量检验。”

某人问热斯马尔：“为什么会有你今晚将驻在巴黎大学的说法，如果有这种说法，可能做到吗？”

“昨天上午，我的确宣布过将在巴黎大学宿夜，”阿兰·热斯马尔回答，“我犯了一个错误。”

这时，出现大学行动委员会的传单，宣布它们将融合在行动委员会里，号召在解除大学禁令之前占领大学。

好几个发言人接着拿起扬声器。突然，自由活动分子雅克·

^① 所有参加者都叙述了这一幕。巴克曼和里乌也参加了并做了全面叙述，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贝纳克和皮埃尔·纪尧姆打断会议高呼起来：

“苏联国家保卫局万岁！斯大林万岁^①！”

随后，一个头发稀疏的老头儿举起手指要求发言。这就是阿拉贡。人们开始喝倒彩。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把扬声器递给他……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即使他是叛徒。”阿拉贡试图平息大家，喊叫似的说话。

“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他平静下来，“请你们想一想，这应该是你们所希望的。”

科恩 - 本迪问他：“既然您声言与学生们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在大街上没见您与他们在一起！”

阿拉贡解释道：“为了给你们带来最大的联合，我将做这一切。”

面对学生们的哄闹，阿拉贡欣然展开他下一期的《法兰西文学报》，随后便在夹杂笑声的欢呼声中走下讲坛。

这时，警察加强兵力包围集会的人群。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喊道：

“我们只能在这里坚持集会！”

他又转身对在场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活动分子说话。因为他知道克里文的这个组织很早就预定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集会，应该是今晚在“法国大学生互助会”里进行。科恩 - 本迪要求该会能向“一切革命者”开放。在一片欢呼声中，托派分子们同意了他的要求。

互助会上的激昂

当晚，在墙壁已有裂纹的破旧的互助会里，人们全神贯注地

^①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倾听着一系列充满激情的发言。一幅狭长的通栏大标语横在主席台上方：“从暴动走向革命”。就是勒内·巴克曼^①和吕西安·里乌^②在风暴之后立即出版的那本关于五月的书里绘声绘色描写的一个场面^③。

互助会的集会在一片烟雾、激昂、笑声和喝彩中进行。这就是运动武装的大前夜，历史性一天的大前夜。

与会者获悉德国社会民主党学生联盟（SDS）的来宾在奥尔利机场遭警察局拒绝入境的消息。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说：

“既然政府不想让他们进来，那我们就再邀请他们，而且我们都要去奥尔利机场迎接他们。”继而，他针对他几个星期以来就在努力排除的宗派主义倾向说道：“一切团体和革命战士都必须在行动中联合起来，迅速地反抗镇压；一切团体必须在运动中抛弃一切盟主权的念头。为了显示这种联合，唯一的办法是：在基层委员会的形式下统一组织行动……‘3月22日运动’，决定重新占领农泰尔文学院；巴黎大学也必须进行同样的行动；无论如何要使法国大学机构瘫痪，因为还有那么多的外籍学生和劳动者，还有法国的劳动者仍然关在狱中。”

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发言人林哈特接着讲话，他武断地对这种狂热泼了一桶冷水：

“某些同志选择了这样一些口号：‘巴黎大学属于大学生！’而我们宁愿说并提议：‘巴黎大学属于共和保安队。’没有任何道理使我们走进共和国保安队的兵营。相反，在圣图安有一个别动

① 是运动的庇护所——《观察家新闻》的两个记者，他们在五月以后立即合著出版了《五月事件的爆发》一书。——译者

② 同上。

③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宪兵的兵营，经过一番整顿，就可以变成一个很不错的文学院。”亲华派坚持他们的顽念：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关闭小资产阶级运动陷阱的惟一起点。演说家继续演说：“社会民主党企图利用学生运动，它们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的大学生处于孤立的状态。运动实际上仍然沿着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前天所显示的姿势走。”演说家接着攻击马居斯^①：“这是种混乱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一点也不在乎马居斯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不涉及工人阶级。”演说家最后说：“学生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摒弃‘工人阶级是学生运动的补充力量’的观点。工人阶级应该是革命的先锋。是否与无产阶级大众相结合，是检验真假革命的标准。”

第二天，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禁止它的战士参加示威。在广泛的示威与暴力的对抗面前，无情地显示他们与自己的宗旨极不相称。亲华派的头头罗贝尔·林哈特终于在那个晚上骤落，孤独地从黑夜里出发，将重新回到消沉的神经质的漫漫路途。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说：“我们不再评论这样或那样的小团体，到此为止。现在，摆在面前的惟一问题就是要弄清是否进行战斗。”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著名领袖，富有杰出演说才能的达尼埃尔·邦萨伊带着图卢兹口音接着科恩-本迪说：

“我同意达尼所说的。至少在这个基础上。这不比我们提前安排散会时间或地点的一般问题，同样不比在斗争的背景之外提出运动发展必要性之类的抽象问题，而是关于组织和革命党的作用的问题，这是当前为大家寻找可以接受的战斗主题的重要问题。缺乏运动路线和方向的可能将严重阻碍运动的发展，甚至将有摧毁团结的危险。这是我们要绝对避免的。这也不是运动是否

^① 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

开始被工会组织牵着鼻子走的多余的问题。当一些小团体处于战斗的前锋时，却硬要把它们与群众结合，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和有用的。应该相反，因为它们与世界革命的潮流相吻合；它们的影响以致深化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也使学院运动与群众相接触时开始重视这些先锋团体的作用，使它们都开始自觉地修正它们固有的标准……”邦萨伊继续讲：“从大学将被占领的时刻起，就必须建立学生委员会，以使转折期的大学能够发展成为对资产阶级的大学永远不满的阵地。”

接着，行动委员会的活跃分子，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前领导让-路易·佩尼努做了一个严肃但很吸引人的报告：

“幸运的是政府终于没有退让，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还在准备退让！尽管运动表现了很大的战斗力，但却显得那么容易受到伤害。只要运动一旦遭受如此的伤害，我们就很难再组织起来。一切收回，一切让步都将是可能的……我们不需要一个罢课罢工的中心委员会！这个中心委员会的角色，现在暂由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来扮演！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则是基层委员会，这是为了在行动中尤其在组织行动中使基层形成一致……特别在运动的开端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区别好几种程度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动机。例如，许多青年劳动者只是因为对警察的憎恶才与学生结合在一起的。在学生暴动和青年暴动之间也存在一个汇合的问题，‘穿黑色皮夹克的阿飞’的奇异现象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之一。在大街上，青年劳动者始终能够站在学生身边对付警察的袭击，他们每次都有流血。好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今晚做出了向一切运动分子和革命学生开放它的集会的决定，这将有利于运动避免各行其是。”

夜深人静，革命者们筋疲力尽，但淬过火的集体战斗豪情洋溢拉丁街。他们将用革命再次约会。

第九章 巷战之夜（5月10日）

学生希望冲突。政府也将沿着冲突一直往前走，时时又像突然撞上薄冰层的司机一样急忙笨拙地刹车。这是五月的关键一天，将用战斗改变争论，并暗中破灭了政府的一切希望，它像在草原上投了一把火，打开了造反梦幻的大门，掀起了全面罢工和制度的危机。1968年5月，故事突然发生在盖-吕萨克大街街垒的后面。

失败的谈判

历史在召唤克莱贝尔大街。清晨，美国人赛勒斯·万斯^①和越南人马文楼^②握手了。两个代表团在巴黎的特别会谈是象征性的。但亚洲的和平在巴黎人的鲁莽骚动下显得黯然失色了。整整一天，各方都试图避免影响这不可补救的大政治，然而徒劳的。乔治·蓬皮杜揣测到这些吗？此刻，他带着他那炭黑的眼睛和嘴唇上有点嘲弄人的香烟正在阿富汗北部的艾因哈农和昆都士之间穿梭访问，可心思却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上。他刚收到好几份令人不安的外交电报。偏偏当巴黎傍晚的骚动预示着风暴的危险时，乌云密布的天气正笼罩着喀布尔，使他不能乘飞机折回阿富汗首都。阿富汗人建议他等到第二天再说，但总理拒绝了。他仍然想回到喀布尔的法国大使馆以便得到新的具体消息。那么，疲惫的代表团车队不得不在震耳欲聋的大雨里长途跋涉在阿富汗山区布满石头的山路上。一抵达大使馆，蓬皮杜就跳出车子奔向电话。若贝尔自蓬皮杜一行离开驻阿富汗大使馆外出访问后，一

① 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美国代表团团长。——译者

② 马文楼（Ma Van Lau）：越南代表团团长。——译者

整天都在与他们联系，甚至把自己的使命向大使馆接电话的一个不会讲法语的本地年轻男仆吐露^①。总理严峻地听着他的办公室主任的汇报，没有给予任何指示。“他可能是不急于投入难以把握胜局的迷离形势之中”，若贝尔后来如此写道^②。“难以把握”，在五月中当局的一切用词都显得这样过时。在这个时间里，代总理若克斯和内政部长富歇可充分体验了这个五彩缤纷的白天。戴高乐将军召见他们及格里莫讨论参谋部的一个意见。将军要求他们禁止预订在今晚的游行示威。“必须有值得考虑的办法，但我还没有。”格里莫回答，他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富歇与他同感。将军顺从他们的想法。警察局只能禁止在第七区塞纳河右岸游行和坚持保护巴黎大学。从上午8时开始，中学生们在克利希门“开演”。行动委员会（克里文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发出号召，人群向圣拉扎尔车站汇合，准备先去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因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定在那儿集合。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先单独出现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人们将看到他们特别让警察局难以应付。

两班谈判的尝试者两天来一直在进行^③。首先是左翼戴高乐主义者弗朗索瓦·萨尔达继续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联合阵线与使人不知所措的代总理若克斯之间穿梭；其次是全国教育工会的一些大学教授试图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与国民教育部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谈判者汇集群众团体的负责人雅克·索瓦热奥和阿尔·热斯马尔等成天在一起徒劳地讨论。面对这些志愿谈判者的声音，

①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② 米歇尔·若贝尔：《后代的回忆》，巴黎·格拉塞版，1974年。

③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在事件后确定的回忆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确认从没明确决定要他们谈判，在那个时候，对话的工会干部们在最高头头缺席的情况下总是躲避责任。

政府解释自己很希望重新开放巴黎大学，还拉丁区自由，但需要用形式上的契约来保证恢复平静，却一点也没提被关押者的命运。大家都在转圈。

占领拉丁区

18时，贝尔福的狮子格里莫被咆哮的人群包围了。一些中学生，医学院的学生，也可能是法学院或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坐的站的笑的吼叫的都有，人们倾听着争论着，形成一阵不可阻挡的骚动。一些人要去圣安托万医院，“那里躺着被煤气熏坏眼睛的同志”；或者要去卫生检疫所，“那里拘押着我们的兄弟。”索瓦热奥发表演讲：政府接受三项要求中的两项，就是不同意释放被拘押的学生。人们高喊：“释放我们的同学！”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突然出人意料地高呼：“达尼万岁！他干得漂亮，他是我们的达尼^①！”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精神抖擞，风度翩翩，他号召向巴黎大学进军，脱离区域警察局的监视，打开耻辱的小牢房。橙红色的焰形小军旗此时发挥了作用，队伍在它的指挥下出发。

在卫生检疫所前面，人们唱起《国际歌》。这是开创“3月22日运动”的行动进行曲。然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无动于衷，科恩—本迪干脆决定：“我们都是纠察队。”^②在蒙热街下端，警察拦住了大桥，队伍于是左转向巴黎大学前进。示威学生从收音机里获悉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大部分巴黎人同情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革命情绪达到顶点。红日西沉，天空反射着红色的光芒，群情激奋。这个夜将充满激情。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② 对缓和角色的讽喻，但红色达尼否认5月8日曾被全国学生联合会纠察队愚弄。

此时，官方在谈判里不知所措。萨尔达用他那炽热的哀婉动人的声音恳求若克斯让步，赦免被监禁的学生并承诺大学改革，否则将是一场悲剧。这位代总理只能听凭他的恳求，因为戴高乐将军不想让步。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再次接见全国教育工会的负责人马朗热和多尔巴继续这场脆弱的谈判。部长也只能做点小花饰，他说：4个已被定罪的示威者在刚被关进监狱时都已上诉过，我们会用宽容的心对他们的命运做出最迅速的判决的。赦免的问题不再被提出来，学生不得不放弃这个先决条件。作为交换，政府将在48小时的过渡时间之后撤走警察，巴黎大学将在检查出入证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如果木已成舟，戴高乐和科恩—本迪大概都会满意。马朗热和多巴尔在这个凑合的基础上继续与教育部协商。佩雷菲特征询刚与萨尔达商谈过的若克斯的意见。两班谈判意见不一致，代总理若克斯认为应该重新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因而教育部长佩雷菲特不得不终止与马朗热和多巴尔的谈判，萨尔达这里便成了惟一的排解渠道。与此同时，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在现场邀请了示威者的一个代表进行对话以缓和他们的冒险行动。这已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缓和状态。学生们将开始准备拉下的课程，因为就要在第二天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了。然而，是否释放被定罪的学生已经成了衡量善恶的标准。政府的谈判者面临考验，萨尔达坚持和解，学生代表要求在关键的问题上得到政府的承诺，即释放被定罪的学生问题。政府能轻易摆平法官在理论上独立的问题吗？正是这个问题，使各方一下从妥协中逃了出来。要不是这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个时刻的一张协议公告就会使已准备好的示威活动变成一场无害的欢乐。那么，在这个星期五晚上将近8时的时刻，1968年5月运动将会就此停步。历史在连贯的时刻徘徊。对于后一项要求，都失败了。政府使4个代人受过后变成了殉道者，因为政府不知道如何释放他们。这件本是无关紧要的事，带来了一切麻烦。热斯马尔今天说：“政府总是无

定见。它给我们派来的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谈判者，带着模棱两可的意见进行真正的谈判。当然会失败。”实际上，自从政府只答应学生三项要求的两项以来，就没有头头也没有群众希望妥协了。必然是要么投降要么战斗。一个星期以来，大家都在白费时间。示威者不会在如此有希望的道路上停止前进。那么，一切这样的秘密谈判不都是徒劳的么？

预定的示威时间总算只拖延了10分钟，但巴黎的人祖传革命意识使示威者们感到某种损害。当领袖们还在寻求避免冲突的时候，巴黎人照样投入运动之中。列宁主义的信条说，群众创造历史。对于这一次，它说的是真的。群众队伍在蒙热街和圣热尔曼大道踏上进军的道路，由预定的共和国保安队的宪兵引导，到圣米歇尔大道上的爱德蒙-罗斯唐广场集中，靠近卢森堡公园。学生团体彼此犹豫，互相注意，互不信任，优柔寡断。它们都认为不过早地给予命令是适当的，因为大家都对5月8日在雨中和挫折中的解散保持着苦涩的记忆。于是，群众队伍再一次处于无命令无领袖的沉默状态，如同在寻找最好战术的步兵。

是谁撬出马路上的第一块铺路石？是谁在工地上找来第一块材料，木板、沙袋或栅栏？当然，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初步的街垒在骚乱的第一天已经突然出现。而且这一次并不缺乏时间。掀翻的汽车，锯断的树枝，成堆的桶罐，拔下的路牌越来越多，有的竟然达到三层楼那么高。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振奋的人群面前找到了对付妥协的办法，他高喊：“进攻！”他知道有人还想协商解决。他继续喊道：“你们分散些，拉丁区都是我们的！你们分成小组，先坐在地上，等警察来了我们就包围他们！”^①人们于是分散围着街垒。在五月温和适宜的夜里，示威者们变成了市政土方工程承揽者。大家排队传递东西，“如同传递爱情”，一

①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个示威者说。人们堆积着截断的树枝，护树的栅栏、垃圾、汽车和水泥袋。深蓝色的制服发着光微动着，眼睛匿藏在硕大的保护眼镜后面，毫无表情，令人生畏。警察将采取行动，他们在等待命令，暂时地眼见着这一切而无能为力，这些盲目的敌人，一动也不动的吓唬人的东西，瞧他们那主人般提防的眼光，真是耻辱的象征。他们面前的街垒是暴动和暴动者团结的象征，虽然眼前的街垒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一支武装部队开火在30秒钟内就可掀翻它们，还不需要驱动轻型坦克，至于用大炮摧毁需要的时间更少。这些街垒胡乱地堆设在盖-吕萨克大街和附近，没有预先的计划，也没体现骚乱者的理性，通常是一个挨着一个，有封闭里面保卫者的危险，没有撤退的道路，甚至是从高处进入的死胡同^①。在1830年或1848年，巴黎市民之所以能坚持与政府军作战，抵抗战火，并打破骑兵的冲锋，因为他们的街垒的确是一项技术工程。街垒已是陈旧过时的工具，19世纪的遗迹。它在1968年，只是一个特征，一个现代特色的战斗决定。没有人想挑起内战，但大家都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不得不筑起街垒。它至少唤起人们对巴黎过去的战斗日子的新鲜回忆；也使戴高乐派在一切暴力之前就变成了凡尔赛分子^②；它同时重新聚合了浪漫派，激励了狂热者，迎合了头脑不清醒的共和主义者；也使每个从小学起就打盹，有老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街头机灵调皮的小流浪汉加夫罗什^③经历的法国人微微发痒。在这次舆论战中，街垒成为示威者与政府决裂的武器，它给学生的身旁增添了精彩

① 见巴克曼和里乌的《五月事件的爆发》一书，里面叙述了5月10日街垒的大概计划。让-马赛尔·布格罗控制了一个街垒，由他的人员坚守。

② 指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凡尔赛分子。——译者

③ 加夫罗什(Gavroche)，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巴黎街头小油混混，曾参与革命者们的街垒战，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下。——译者

的故事。

街 垒

电台推动了事件的发展。21时55分，电波报道戈夫街的第一个街垒的筑建。道路已经开辟。在一个小时内，邻近巴黎大学南端的街道全被应急的街垒切断了，那里街垒交织，这一个小时里筑了十几个，到午夜已有三十几个。从戈布兰到卢森堡，从邦戴翁到瓦尔-德格拉斯，到处布满了街垒路障，整个拉丁区一下变成了堡垒林立的阵地。半导体收音机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使气氛更加激荡，电台编辑们不停地描绘、赞扬和夸大事件，使群众不明真相，使骚乱者思想糊涂，很快地成为骚乱者的代言人。在一片喝倒彩声或者说在一片欢呼的背景里，在掀翻汽车和堆砌石块的噪音里，新闻记者们都用极其兴奋的语言叙述他们的体验。收音机甚至使维祖尔沙龙里或卡尔庞德拉饭店厨房里的听众也能直接地感受到革命。电台的无稽之谈逐分逐秒地不断充实着闪光的话题。

团体的负责人们在撬去了铺路石的大街上来来去去，平静地激励着每个战士。任务是艰难繁重的，经历过这一夜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对第一次这样的生活经历都看得超乎寻常生活之上。如果不是20年后在这些街上溜达，在冥思中忆及那大街上的一夜，人们或许根本不能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的左派活力，竟那样使整个一代人经受震荡和五月神话的洗礼。在构筑路障街垒的过程中，在歌声和口号声中，在兴奋的传递队伍中，每一分钟都在记录着永恒的深沉。秩序解体，常规消失，每个人都处在陌生的友爱之中。一个学生对阿德里安·当塞特^①说：“我感到幸运，在我的生活中，再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感情，一种幸福的感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情。我在创造历史，或者倒不如说在向历史挑战。我近乎兴奋地破坏……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了；我顺着群众的感情；我那时的感情是自由的强烈的……”在爱德蒙·罗斯唐广场，撬去的铺路石下面露出可爱的黄沙。一个有诗人灵性的大学生基里安·弗里奇在一面巨大的白色墙壁上刻上这样的诗句：“铺路石的下面，就是金色的海滩。”^①

红色达尼到处跑，尾随着一个充当保镖的青年卢巴尔^②——一个带有当地口音的笑剧演员。索瓦热奥和热斯马尔则呆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办公地——王子先生街，继续与政府的排解人员用电话交涉。他们忧虑地看到示威群众超出了命令的范围，向着对抗奔跑。所有的示威者都知道占领拉丁区有利于他们的计划。但对当局来说，拉丁区的占领表明示威者独断独行了，这对政府举足轻重，压力极大。

博沃广场内政部里，政府官员们死死地强压怒火。他们已得知格里莫不能按时来了，这位巴黎警察局长在现场向警察们通报情况，同时向配合行动的警察分局进行综合部署^③。政府的缺陷是反常的，内政部并不是临时机构，却要依赖格里莫和他的繁杂程序，内政部也知道这种情况，它们没有示威的群众组织那么灵巧。内政部像对待救星一般欢迎新闻专员让-皮埃尔·于坦^④，使这位有魔力的苹果身材的人物终于允许他们进入公开的欧洲一号电台和卢森堡电台。克里斯蒂昂·富歇办公室的人员整个晚上都围着这个苹果打转。这是内政部为了临时应付由若克斯和佩雷菲特领头的谈判而采取的所谓行动。内政部的无能令人吃惊。在

①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②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③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④ 让-皮埃尔·于坦与作者的谈话。

政府谈判人员与王子先生街的学生参谋部又一次进行电话协商之后，人们对新的谈判梗概一清二楚：罗什校长批准发布一个声明，他将邀请学生代表来大学商谈复课条件^①。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回应：“我们希望商谈复课条件，在此之前，我们承诺不占领巴黎大学。我们已经得到了将在星期一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保证。在这种恢复平静的前景里，我们确信检察部门不反对被定罪学生的律师提出假释宣告的要求。”原则上讲，事情在操作上是规范的。作为恢复平静的一些交换承诺，学生有满意的方面，如警察撤出巴黎大学和释放被监禁者。但这在今天19时之前实现才可能带来平静，到22时就毫无意义了，因为示威者们挖铺路石的手还是脏的，头脑还在火星里。谈判者们的时机耗过了。示威者充满激情的幻想在权力参预协调的效果下并没消失。

巴黎大学的插科打诨

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们没有把握好群众的这个重大改变。目前，示威者们正在用战斗反对秩序和法律，反对上司和传统，驱散十年来使青少年一代失望的阴霾，入迷地看着革命的幽灵显现在想象的天际。而这个时候，群众团体负责人们还在讨论大学的事务。那么，这些谈判者们就只能扮演一种不合适的角色了，对正在进行暴动的活人机械地采取滑稽可笑的贴金手段。22时，罗什校长发表了预料之中的声明。当局让步：政府将接见暴动者代表，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商讨他们提出的要求。不一会，另一位校长夏兰^②接过由法国广播电视台提供的通话线，直接传来阿兰·热斯马尔的答复。热斯马尔在被占领的大街上表示街头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② 巴黎大学校长，罗什为巴黎大学区校长，习惯上也称巴黎大学校长。

抗议者全体一致的要求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戏剧性的一幕，热斯马尔说：“我不是打算在任何条件下去巴黎大学，首先必须达到巴黎大学不被警察包围的条件。第二，罗什先生必须准备重新答复我们从开始就提出的三个问题。”谈判的大厦由弗朗索瓦·萨尔达艰难地拼凑着，一方由他身后的代总理路易·若克斯支撑着，现在被另一方雅克·索瓦热奥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句话推翻了^①。从此，将从先决条件到先决条件地把谈判摆到听众和示威者面前。下午毕竟还协商得好一点，到晚上，阿兰·热斯马尔则像一块岩石，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变卦，五个多小时的谈判必须满足学生们的三项要求。谈判按照它的步骤继续走下去^②。

夏兰校长一下还未明白是在通过无线电台转播谈话。他说：“热斯马尔先生，在您认为我们目前可以让步的地方，作为个人我都准备了，就是为了与您有一个谈判。谈判可能吗？”

阿兰·热斯马尔回答：“当然可能，但问题如下，这一点对谁来说都是不能让步的。就是在示威活动开始时，当我们从群众中收集起三项要求，当我们在贝尔福的狮子^③面前宣布时，我们就猜到他会给予我们前两项的答复，对于赦免问题不会答复，但示威群众的答复则是全体一致的：‘释放我们的同学。’如果仍然如上，没有一点新意，也就没有必要您在这儿搞乱，校长先生。”

双方都僵持起来。街头抗议者要求得到释放在监学生的公开承诺；政府为了保住面子当然不会给予这样的承诺。夏兰说：“不可能给予如上承诺。”

与此同时，萨尔达那方面的谈判计划继续进行。政府特派员

① 至少在阿德里安·当塞特的作品里得到证实，一位无可指责的历史学家，他同时希望（文中强调指出）学生领袖们应负特殊的责任。

② 这次谈判已录音，在许多研究五月的著作中都有形象的记叙。

③ 指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译者

雅克·洛朗接到着手安排校长与示威者代表见面的指令。罗什要求代表只能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大学纪律委员会面前起诉时还没这样启动过。特派员洛朗与在苏夫洛街上端的法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们进行接触，但他们要求得到当局的先决保证。热斯马尔的战线变成了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战线。22时40分，夏兰-热斯马尔的对话重新开始。

校长夏兰：“那么，我再次确认无线电台已播出的公告，并用罗什校长的名义以官方形式出现。罗什校长准备接见学生代表并与他们一起考察复课条件。经有关院长同意，复课条件能得到保证，巴黎大学将在平静中复课。”

夏兰总是解释萨尔达的谈判计划，但他对被判罪学生的命运的缄默终究使示威群众不快，他们都在注意倾听会谈实况转播。

阿兰·热斯马尔：“现在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摆在全体市民面前了。如果政府确实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负责的话，那就应该让全体市民来负责解决。这将是清楚的。”

夏兰：“热斯马尔先生，对这个问题，除了我刚才说的，不能对您说更多了。我不认为谈判应该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我相信罗什校长先生是完全同意接见你们的，他可能会跟你们讲更多，但我绝对不能使谈判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

阿兰·热斯马尔：“如果罗什校长准备跟我谈更多的……”

夏兰：“您与他直接会晤，可能与在无线电台上不是一回事。”

阿兰·热斯马尔：“罗什校长总该知道有示威群众的一方和警察的一方，我们是在示威群众的一方，而且再不会离开他们吧。”

法国电台电视台的总编辑让-皮埃尔·法尔卡斯介入：

“阿兰·热斯马尔，这对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一个电台，可以允许您向你们的战士发话下指令。我想，我们的作用只能停留在您刚才听到的方面。”

会谈期间，街垒筑建继续进行。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总是在扮演绝对自由主义的沃邦^①，他对溜号的示威者们说：“在两个街垒之间不到300人了，你们想溜总要尽量从背后溜。”在戈夫街，漫长的谈判使警察们无聊地陪着平时需要他们负担的圣德尼狐犬。拉丁区仍然像是一个土方建筑工地，科恩-本迪也担忧起来：“我很害怕，必须避免打击^②。”居民们带来水和饼干慰问示威者，商人们打开他们的储藏间，真是人人为人人。科恩-本迪后来写道：“这一夜，在大街上，大量的物资给了街垒停工以精神治疗^③。”学生们赢得民心达到了顶点，这还是在对骚乱有争议的巴黎。对面，警察们气得发狂。人们愈是期待着、愈是庇护学生被伤害，警察将愈难清理。格里莫的命令是明确的，警察只能等待着、被辱骂、被蔑视、被大量的瓶子和石块投掷，气得直跺脚，还得持枪立正。不要紧，他们马上就能释放这种积累的疯狂了。

代总理若克斯此刻正在内政部里咨询、讨论、估量和踌躇着。内政部长富歇的态度是明确的，并得到几个部长的支持：必须在午夜前清理所有的街垒路障，因为这是用手创造出来的革命象征，它使政府的威望丧失殆尽。1960年在阿尔及尔，住在拉加亚尔德的法国人必须用一个星期才能筑起街垒。特别在巴黎的市中心筑街垒更是空前的事。若克斯非常理解这些，因而他仍然寄希望于谈判。格里莫无论如何也不想在最后一趟地铁前发起突

① 沃邦（Vauban），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元帅和军事工程师。先后领导建筑和改造要塞三百多座，指挥过五十三次要塞围攻战。系统地发展了棱堡体系筑城法，使法国筑城法在欧洲处领先地位。恩格斯认为他有两大发明：跳弹射击和平行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40页）——译者

② 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③ 达尼埃尔。

击，他希望自己在这个时刻进入更年轻的年代，也希望警察不负清理中学生的任务。佩雷菲特还在格勒内尔街研究如何解开已变得滑稽可笑的谈判谜团。农泰尔文学院的教师此刻在示威者和当局之间重新扮演传统的中间调停者的角色，阿兰·图雷纳聚集了两位教师和3个学生代表，在苏夫洛街街垒提出去见罗什校长的意见，以避免悲剧发生。他们来到萨尔达的简易案情办公室进行磋商。学生代表实际上不再寄希望于谈判，惟一要求撤走警察，因此也不反对去见罗什校长。政府特派员洛朗从格里莫那里得到可以带领代表接近校长的准许^①。然而当他看到红棕色头发的人在3个学生代表之中时，考虑到目前纪律程序，便招呼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不能去见校长，图雷纳回答说教授们将先见校长，将由校长决定学生代表的组成，洛朗只有任他们如此。他们出现在校长家里，三位教授首先被洛朗引荐，接着他们请求让学生代表进来，罗什校长同意了。科恩-本迪一声不吭，校长并不认识“红色达尼”。木已成舟。红色达尼与校长谈判，他请求校长能施加压力使警察撤出，校长接受他的意见^②。

“您想怎么样？”校长问科恩-本迪。

“使警察撤走。然后大家聚集在巴黎大学，我再请来3个或4个乐队，大家庆祝一番，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电话铃响了。这是教育部长佩雷菲特打来的。原来5分钟前，电台广播了学生代表进入校长家的消息，说明其中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博沃广场内政部内的职员们围在造型苹果周围争论。富歇的撰稿人达诺跳进他部长的办公室：

“校长在和科恩-本迪谈判！”

“嗯！？”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② 随后是滑稽可笑的一系列附带小事。

富歇立即打电话给若克斯，确认谈判是被批准的。

“这简直是发疯！”富歇回答。

佩雷菲特办公室的主任佩尔蒂埃也报告了他的部长。

“校长受骗上当了。”

因此佩雷菲特才如此怒气冲天地奔向电话。接电话的是罗什校长。

“在您面前有没有一个红头圆脸的小伙？”

“的确有，部长先生。”

“那么，这是科恩-本迪！他说了些什么？您应该接见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代表团，而您却在和科恩-本迪谈判。您可以到其他的办公室里继续我们的谈话。”

校长撤下代表们到旁边办公室里去继续与部长谈话。部长命令他立即终止与科恩-本迪的直接对话。他说不应该与这些人谈判，要命令他们走开。阿兰·图雷纳走进去并要求与部长谈话。这两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窗，对话是感人的：

“我恳求你下命令撤退警察。否则，马上将有一打死者。”

“这不是我的警察，这是共和国的警察，而且是不会开枪的。”

“如果真的撤走警察，我们将协商学生不占领巴黎大学。我将去巴黎大学走一圈。只要警察离开那儿就足够了，一切都将谈得拢。”

“你有什么能力使人相信你要进行的谈判能成？你使我想起撰写法德问题的马丁·迪加尔，他才能解决法国军队是否能在恺撒^①的军队面前撤退的问题……”

^① 恺撒（Kaiser，对并作 caesar），古罗马的将军，执政官。这里泛指外国军队。——译者

“那么，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唉！要流血啰^①……”

罗什又拿起电话向部长叙述群众的狂热。但佩雷菲特再不相信妥协了，认为必须攻击。

罗什校长无可奈何地说：“送代表到门口去吧。”

在门口，科恩-本迪在麦克风前假充好汉：

“我们从没有着手进行谈判。我们说过：今夜在大街上度过，以显示整个青年一代反对某种社会的决心。”

突 击

凌晨2时，代总理若克斯与内政部长富歇联系，国防部长梅斯梅尔、财政部长多勃雷、爱丽舍宫秘书长特里科都在场。将军22时就睡了，大家不能叫醒他。“某些部长甚至接受了这种自然解体的过程，”特里科后来说，他为将军的坚定辩护^②。他们认为格里莫越来越成了造成惊惶的人，再不能把握他的警察人员了。已经由共和国保安队悄悄地承担警察局的任务。这使警官们不安，撵走了将取代他们的保安队。警察从13时就来到大街上。如果示威者还在等待时机，就必须使大街恢复原貌。然而要使大街恢复原貌又缺乏人员去清理所有的街垒路障。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唉！如果蓬皮杜在就好了。若克斯再次要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去见惟一的排解人萨尔达律师，他或许能使示威群众等到学生领袖们的解散命令。然而萨尔达失去了联系。那么，就只有堕入地狱了。在再次下达了绝对禁止开枪的命令后，代总理若克斯下达了突击的命令。富歇招呼警察局长格里莫：“干吧！”

作战室里，警察分局局长弗里德里克正紧张收集着执行命令的警官们在现场的反馈。仅分把钟，一个接一个的情况反馈使格

①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里莫一言不发。惟有分局局长的语气和嗓门暴露着紧张状态^①。警察局的战术是清晰的：对成群的街垒路障逐个地进行冲击，以避免造成普遍的惊惶，同时能给予警察们以自信的力量。市民们或许不会冒险围观延迟执行命令的警察们。果能如此的话，那就谢天谢地！

坚守街垒的示威者们也调整了部署，他们同样在分析政治——科学的奥秘，即使马列主义者们离开了阵地。如事先考虑到的，最年轻的示威者们被分派到人多的地方去，使他们能相对地受到保护。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们认为街垒不合时宜，在他们看来星期一就会实现学生——工人的联合，没有必要如此坚守街垒。真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此他们劝告街垒战士们回去睡觉，然后他们打着红旗严肃地离开了阵地。亲华派同样坚持与工人阶级联合，虽然他们不同意运动总是在拉丁区打转，但许多不顺从如此的“马列主义”者们还是在场，他们的头头和良师罗贝尔·林哈特声言他在拉丁区的堡垒阵地上仿佛看到美国——戴高乐派最大限度变幻手法地反对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阴谋。林哈特近乎超过了理智的界限^②。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突击队留在现场，他们的领袖阿兰·克里文在几个小时前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3月22日运动”的老战士组织了一个军人式的演讲，主要为了鼓励那些因骚乱而聚集的大批群众和新参加运动的学生们。那些在市内来回搬运笨重物件的大担架和过路人也因为这个不一般的夜显得蔚为壮观起来。

凌晨2时零1分，狂热的街垒保卫者们终于听到警察突击的警报：在奥古斯特-孔特街和爱德蒙-罗斯唐广场交汇处，两个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②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警察分局局长按照宣布勒令的惯用方式^①边向前走边吆喝，一支深蓝色的笨重部队跟在他们的背后助威，踏步前进。其他一切噪音顿时中断，警察局官员宣布勒令的声音在神奇般寂静的夜里回荡。街垒战士们神经质地暂停构筑工作，接着狂热地唱起《国际歌》回应他们。顷刻间，榴弹的轰隆声和沉重的冲锋脚步声便淹没了歌声。街垒保卫者们迅捷地捂上防毒头巾，手的肌肉顿时收缩，抓起石块和十字镐柄。

警察仅用20分钟就圆满完成了第一个街垒的清理：灰尘弥漫，橡皮棍飞舞。但在第二个街垒即鲁瓦耶-科拉尔街上受挫：惨遭螺栓和石头雨，队伍大乱。警察分局局长们重整人马后继续进攻，他们在吼叫中越过障碍。街垒保卫者们好不容易才烧起汽车，接着就在挥舞的橡皮棍下抱头鼠窜，有的爬上楼层向警察投掷，共和国保安队回击，紧张地对着玻璃窗射击，玻璃碎片横飞。警察和保安队员时时猛地冲入楼梯，所幸这次他们还来不及从屋顶上清理。有的居民在阳台上向马路上洒水稀释呛人的煤气。

第三个街垒本来已被警察借助从学生背后投掷的催泪弹所越过，由于风突然减慢了毒气的流畅，浓厚的雾团笼罩着障碍物，使警察一下停止了冲击，示威者们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占领了这个街垒，马上就有成千的示威者聚集在街垒后面。在爆炸声和吼叫声中，街垒保卫者们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唱着《国际歌》。这时是凌晨3时10分，盖-吕萨克街仍然在示威者的掌握之中。

受伤者开始大量拥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里面的亲华派们只有转移到后面的根据地里。在一个小时内，有好几百人拥进这所最高学府，在这些受伤的示威者堆里就像在警察堆里一样难受。

^①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此刻，电话声发疯般地响彻内政部。内政部长富歇想必要使不安的财政部长放心，他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是的，可能有破坏，但必须了结。”^①

雅克·索瓦热奥在欧洲1号电台上坚持命令：“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拉丁区，而且只要我们能留下来就一定留下来。”

科恩-本迪的声音打断了他：“他妈的，他妈的，讲重要的，给我麦克风！这儿，快点，不要用花言巧语。”

“那好，我把麦克风给科恩-本迪。”

“请大家听着，我拿起麦克风是因为我刚从第一排街垒回来。警察在这个时候投掷了氯化弹，而且到处都在扔。仅仅因为警察局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这种战术，示威者们就不能屈服。这一切将说明两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是警察局正在以比夏龙地铁站^②更残酷的大捕杀来进行所谓负责的让步，或者是警察局撤退和立即停止杀戮，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暴行。拉丁区的占领要持续到没有事端发生为止；是警察局用氯化弹的进攻制造了事端。”

热斯马尔接着说：“我完全同意索瓦热奥的意见。我们有一个想法，即脱离脆弱的街垒，坚守强固的街垒。当然，政府目前在捕杀教授和大学青年中间显然仍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政府立即再派出警察。”^③

① 见阿里德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② 夏龙（Choronne）地铁站。在1961年法共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中，在夏龙地铁站死了8个人，是示威群众为逃脱警察的追捕而拥向地铁口时被挤死的。

——译者

③ 阿拉莫（Alamo），美国西部著名城堡，此处喻学生最坚固的街垒。

——译者

在学生的阿拉莫^①，谣言流传不断，“莫诺教授断了一只手”；“一个孕妇被杀害了”；“一个儿童被煤气窒息而死”；“两千工人在斯特拉斯堡-圣德尼”。后一消息使示威学生们信以为真，他们兴奋地互相拥抱，仿佛听到了这支工人队伍的轰隆脚步声，如同执行任务的骑兵。“这才是革命！”大家高兴地抛着一个归顺的咖啡店老板赠送的三明治。

盖-吕萨克街的8个街垒路障被切断了，这是骚乱者的动脉。火光照耀，对抛掷物已失去知觉的警察群挥舞着橡皮棍抵抗一切抛掷物，在煤气雾里勇往直前。然而他们在障碍赛马场背后遇上了一个巨大而古怪的栅栏，巍然屹立在于尔姆街，克洛德-贝尔纳街和弗扬蒂纳街的交叉口。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新楼房的工地仓库里有的是材料。木棚、翻斗车、桌椅、钢管堆在栅栏工地已经有3个多小时了，还有现场找来的斗式提升输送机。“工人们在那儿”，示威战士们甚至说当工人们看到他们操作这如同无产阶级独有的一支手臂似的器械时，相信他们是能征服这家伙的^②。这面绷紧的铁网从地上立起有20米高，它下面的地上遍是油腻的布和大量的钢管铁钉。共和国保安队慢慢地靠近这绷紧的陷阱——提前即兴创作的罗网，然后有序地撤退。这个消息如同笑话一般在所有四方街垒里轰动地传开了。“他们退却了！”殊不知，警察们是在等待其他邻近的街垒被占领后再攻击铁网。老虎钳正在收缩。

最后一个方形街垒使警察进行了严酷的战斗。警察越来越密集地冲击阵地，煤气弥漫，榴弹成水平线地喷射。一些撤退的年轻姑娘甩掉衣服，拼命地奔跑，仍然遭到警察的追赶和殴打。最后一个方形街垒陷落，里面的战士被痛打一顿，如此投降。连过

① 这次谈判也录了音。

②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路的人也被警察肮脏的手按上车，拳打脚踢之后又被紧紧管束12个多小时。警察们无节制地用暴力发泄。将近4时，剩下四五个路障。在其他地方，只是在追捕逃跑者了，追逐竞赛直到屋顶上，用大头棒打人直到庭院的深处。到凌晨6时，一般是有经验的顽强战士顺从地重新聚集来，去坚守濠沟外护墙附近的最后一个袋形阵地进行抵抗^①。警察在居民、学生或知识分子的楼下推进时，不得不冒着从窗户里抛出来的各种各样物件的侵袭。共和国保安队和警察别动队忍耐着沉重地坚持清理破碎的街垒路障，直到疲惫的边缘。示威者们始终像狮子一样地战斗，承负警察的数次冲锋，逃避背后泵送汽油布喷射的火墙，组织伏击，挫败背后的阴谋。凌晨5时，阵地已完全被警察占据，不再有投掷物、汽油、路障，几乎没有了战斗。示威者四散，例如可能逃进了楼层，往往一二十人进入朋友的房间，因为警惕后来者，都沉寂而恐怖。最后一个路障的战斗在图安街，那里整整一夜有一个强硬的满头长长白发的人，完全军人般地用简短的命令指挥了30多个示威者的抵抗^②。5时30分，当一支保安队重新靠近时，他才命令散开。一支粗大的铁棍握在他手中，使共和国保安队的战士们敬畏而远之，然后他平静地消逝在街的一角。暴力行动到黎明才结束。

① 让-马赛尔·布格罗，让-路易·佩尼努和五月的领袖们重逢在最后一个街垒里。

②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第十章 工会登上舞台（5月11日—12日）

6时，8区在静谧的早晨，一支败北的群众队伍没精打采地穿过博沃广场向30米远宁静的爱丽舍宫走去。这使在内政部里聚集的将军们惊呆了，然而这些群众根本没打算去“打搅”总统。虚惊一场的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富歇和国防部长梅斯梅尔驱车去向安静地睡了一夜的将军汇报一夜巷战的情况。

5时30分，爱丽舍宫服务处的副官应若克斯的要求提前叫醒了将军。代总理不希望总统从收音机里获悉夜里事端的情况。总统是高傲的。富歇开始解释自己没有刮胡子。“我也没有，”总统回答，接着就严厉地埋怨他的部长们优柔寡断。国防部长的脸唰地红了^①。

梅斯梅尔：“有开枪的危险。假若我们有力地镇压，必须承认有这个危险。”

将军：“这是正确的。您有足够的部队可供安排吗？”

梅斯梅尔：“在白天我还能有大量的伞兵。”

将军：“还要等等吧。”

对政府来说明显地有两条路线：戴高乐将军的和其他人的。部长们在流血的烦恼中体验着它。戴高乐对国家的权威受损不安，并主持参谋部在寻求保证国家权威的具体办法。学生们在摇动着部队介入的幽灵，它像一个离奇的怪物，又是一个政治的推断。同时，将军还在沉思最大限度的军事手段，如果万一？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压迫政府坚定地留下来以扑灭初燃的炉火。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9年。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警察的暴力

运动开端时期担忧发动不起来的烦恼没有了。在这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若干小时的巷战之夜已经轰动全社会。学生们震撼了法国。凌晨5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下了解散的命令。将近9时，他为了使挨了橡皮棍的学生们与工人总罢工联合起来，给法国总工会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才睡下。示威者和头头们都不在场了。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返回高等师范学校，然后通过一个地下隧道回到他洛蒙街的物理实验室。他疲惫至极，焦躁不安：他们要召唤军队？暴动青年与老将戴高乐所见略同。然而征兆又相反，他从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方丹那里获悉：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将近凌晨5点时又在寻求恢复接触，这位部长建议上午约会。热斯马尔不打算去，他想首先看看全国教育总工会的态度，这个总工会的主席接替者兼调停人还是有权威的。他必须秘密地从拉丁区出去。司机把他藏在轿车的后部，在到处还充满了轰隆声的黎明前夕到达全国教育总工会的驻地索尔费里诺街^①。大家确认他是与政府谈判的代表后都来看他，他说：“我只是与部长谈判。”学生领袖们对谈判并不急，他们深刻地看出警察在盖-吕萨克街的胜利对政府来说是个政治灾难，甚至比政府在骚乱的压力下做出惊人的让步更糟。他们在等待着，甚至确认法国总工会这次将不得不出头冒风险了。

警察的暴行被电台和报纸夸大发挥，制造了整个国家的不安。但在大的方面，格里莫还是相对满意的^②：维持示威秩序的行动最棘手，自发生1934年2月6日惨案以来再没死过多少人。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罗：《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②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面对经过锻炼的骚乱者，警察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又被辱骂被投掷物投掷，有的被痛打，但他们没有杀死一个人。真是奇迹。这位巴黎警察局长说：“巴黎从这最悲哀的一夜更闻名了。”他想，这将会更坏。

然而，这只是这位技术专家的评价。但对舆论来说，警察又有了好久未听说的暴行了。警察无故地滥用暴力的报道开始充斥无线电广播和日报的标题：警察用橡皮棍把人打倒在地，然后塞进大客车，粗暴地对待，瞬间又被揍一顿；年轻姑娘或行人也被莫名其妙地痛打一顿，这一切过分的行为，在1968年5月警察局的黑皮书里翻开就看得见。人们无法计算榴弹爆裂的建筑物拱廊，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破额、碎骨、断臂，有多少人被煤气熏坏了肺和眼睛。共和国保安队的工会干部自我辩护说：我们保安队的作用仅限于摧毁街垒路障，一次性地完成工作，从没猛烈追击。保安人员只是出于市政警察局的安排，负责追赶逃跑者。这些人员习惯于社区警察的任务，缺乏示威治安的实际经验。同时还要承担自卫并克制他们的队伍。在暴力对抗的情况下，有的人员失去了冷静，免不了有粗暴的行为。警察局长穆里斯·格里莫对此有另外的解释^①，他认为是禁止开枪的命令导致了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肉搏战，警察队伍的屠杀行为被禁止了，又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发泄，因此才用有力的橡皮棍来进行补偿。

然而，不管警察局和保安队如何解释警察人员的放纵行为，终归是它们操纵的结果。5月11日上午，所有的党派，除了政府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全国都在谴责警察的行为。报刊社论都在愤慨里比干劲；所有的领域都重视国家的威信，反对警察的过火行为。政府试图分散难堪的抨击，发言人对法国新闻社（APF）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如是说：“示威群众被越南和平和巴黎会谈的敌对力量所操纵。”原因是说定了。但在舆论上，政体从此蒙上了黑影。

轮 班

工会的头头们很懂得轮班。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欧仁·德尚早晨5时就奔赴全国总工会的驻地，这是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在召唤他。法国总工会的领袖们十分了解工人们的反应：像全法国一样，工人们都在熬夜听无线电广播，他们被骚乱的轰隆声所震撼，发呆地听着青年人抵抗一个“专制”的制度并毫不退让的战斗消息。叛乱是有传染性的。从这个早晨开始，整个工人阶级都处在情绪骚动之中。

工会领袖们商定举行一个会议，9时在总工会会堂举行，他们相信这个会堂。塞吉当即在会上提议下周一进行一次总罢工，这使其他工会的负责人们非常震惊。塞吉长时间地坚持这个主张。塞吉的这个举动虽然有助于表现法国总工会不是总在“乘运行中的列车”，但根据一些原始资料表明，他的行为缺乏冷静。热斯马尔迟到了一会儿，他是由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纠察队护送到会场的。塞吉和德尚对工会前一夜没有参加示威表示歉意。热斯马尔说：“假若你们愿意会见我们，那是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全法国在街垒战里知道了我们的存在。”^①学生和工会的团结本来就搞得不好，看来将会更糟。但在目前，工人轮班是必然的。热斯马尔和所有学生领袖们对待工人阶级如同婴儿吸吮乳汁一样地向往，在以往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不得不乞求工会老大哥的支持，而工会老大哥们总有点以恩赐的态度相待。这一次该学生领袖以导师的口吻说话了。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整个中午，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成员都在自始至终地谨慎商议一周的行动，他们没有太大的热情与学生领袖交谈，在他们的眼里，学生领袖只是狂热和饶舌而已。两大工会发出了在13日（星期一）举行总罢工的命令，并号召全巴黎市民示威与其配合。大家将在13日下午相会。从学生与工会接触的第一刻起，法国总工会与学生的对立便成为辩论的中心话题，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艰难地居中调停，试图使他们的观点接近些。乔治·塞吉不希望13日的罢工示威以到达拉丁区为结果。“我会使学生们理解这一点的，”塞吉说。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反驳了塞吉的说法。工会示威队伍的路线决定从共和国广场到当费尔广场，学生们首先在东站会集。法国总工会还提出最后一个条件：不希望“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队伍前头。

热斯马尔：“哪个不受欢迎的人？”

一个总工会干部说：“我们宁愿不说出他的名字……既然您强调，那么就是科恩-本迪。我们不希望他出现在队伍的第一排。”

热斯马尔：“我和你们犯过同样的错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将在我们的旁边。如果你们如此要求，这次协商就没有必要了。”^①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竭力说服法国总工会。协议总算达成。

后来，学生领袖们十分懊恼在行动中这么快地就出现了官方的工会。示威号召完全可以由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联合会联合发出，它们没有总工会那么复杂的协议。可是与官方工会的协议已达成，街垒对抗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争议出自一个外籍大学生，愤慨由警察的暴行引起，动荡由政府的无能导致。工薪阶层进入运动中，五月的最大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原动力已经表现出来。

蓬皮杜回来

政府看到了危险，但不知道如何避免它。对示威运动的宽大可能要在结尾阶段，但对大学的动荡将是没有宽大的。相反地，对大学动荡的宽大会使传染病蔓延，试想当大约1万名学生就使政府和制度屈服了，工薪阶级还能平静地呆下去吗？1967年，左翼联盟只差一点儿珍贵的选票点数，险些使政府联盟失去了多数，戴高乐主义的对手们由此大为振奋。1967年戴高乐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却出现首轮投票无一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票数的结果，左翼联盟视此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意外。这是这个政权的反常现象。戴高乐在抵抗运动的光荣历史中深入人心，富有传奇色彩，现在既主宰着国家和舆论又有按照他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制度的支持，战胜过几次国内危机，赢得了所有的选举，在国外也受到崇敬，然而现在戴高乐主义却一下子显得比看上去更脆弱了。戴高乐主义对法国显要人物和保守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的宽容的代表，但面对上升的白领阶层和发展壮大的工薪组织以及城市化现代化的古老巴黎，戴高乐主义需要重新寻找它的社会基础。在共产党占20%的法国，“非共产党左翼”又在革新中汇集着劳动者的法国，中间派候选人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也占有很重的分量，戴高乐将军失去了绝对的多数，国家的安定成为头等大事。对1958年的战败者们来说，他们没有看到第五共和国的制度根深蒂固，相反认为将军的统治只是必然要重归议会制度正常状态之前的一个例外。戴高乐主义的对手们总是在树林的一角等待着，学生的骚乱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机会。

面对扩大的镇压，要求政府不能再扩大它以致更快地酿起暴乱。奇迹不能重复。政府与学生协商的失误，可能会使其后的骚乱发生流血。各方同样都在冒着全面罢工和舆论谴责的危险。部

长们都清楚自己正走在火山口上。但戴高乐对这一切仍然认为只是一个维持治安的次要问题，而全神贯注于他的国外政策。他总是那么自信。

整整一个下午，他的部长们都在说服他让步。若克斯、富歇和格里莫三位部长一直到下午4时都在为接受学生的三个条件辩解。否则，狂热将使一切变得更坏，而镇压必然要冒越来越大的危险。代总理若克斯几乎是冒火地辩论：“我们不能像对待叛乱分子那样对待学生。”他不禁想起1940年戴高乐组织自由法国时，他为国家为戴高乐主义服务的情形。但辩论毫无结果。将军仍然说：“他们不停止骚乱，国家不退让。”^①

罗什校长紧接三位部长而来。问题都摊开了。将军审查所有的细节。不一会，佩雷菲特来了。戴高乐将军十分喜欢和器重这位年轻的教育部长。佩雷菲特有一个比若克斯更巧妙的计划。他重提前天夜里的事端，说为什么不能与学生有交换条件呢？我们以接受学生的三个条件来换取他们恢复平静和拥护我们更严格地管制大学的正式承诺。

佩雷菲特继续说：“我们将有一个补偿的计划来平衡社会舆论，证明政府的主动性，证明政府有能力以人道和威严来安定舆论，并可以促使舆论降温。”^②

在这个构想里，国家没有失去面子。将军这下被吸引住了。佩雷菲特突然严肃起来，继续说：

“如果你们不能接受如我所建议的这些安排，我完全会理解，因为我不是位置上的人。那么，我认为在你们的安排里应该重新考虑我的主意。在我认为能够便利地调整危机的情况下我将这样做。”

①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② 关于全部谈话，阿兰·佩雷菲特已与作者交谈。

戴高乐做了一个气度很大的手势结束谈话：“好，同意这个计划，干吧！”

19时10分，佩雷菲特平静下来，他决定第二天召集校长和院长们。他自信地对一位撰稿人说：“一切都很好。星期一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和释放被关押的学生们。”

然而，就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蓬皮杜的座机降落到奥尔利机场的跑道上。总理轻松微笑地走下飞机，在贵宾厅稍息片刻之后便与若贝尔一头埋进官方的秘密文件之中^①。然后他穿过急急忙忙的记者们，令人迷惑地说：“我有我的想法。”他的想法不是佩雷菲特的想法，与戴高乐的想法更不沾边。

1968年是蓬皮杜担任总理职务的第六个年头，一个例外的长命总理。这个才华横溢的人，还有他信得过的引人注目的随员若贝尔，巴拉迪尔和年轻的希拉克，象征着队伍不断壮大而前途却令人堪忧的戴高乐派的连续。这个在1945年以“善于写作”而小有名气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年轻学生，因受戴高乐的青睐才即将起航，这使他的一生都处在这个伟大人物的影子里，也使他有了磨圆个性和磨尖雄心的时间。由于他善解人意、勤劳积极、坚持刚毅、灵活干练而又守口如瓶，首先成为戴高乐的特别秘书，接着便成为戴高乐穿越旷野、度过政治低潮时期的最亲密的陪伴者之一。他甚至没有参与抵抗运动，只是坚守在谨慎保留的占领区，这使他具有综合素质：忍受最厚重的档案材料的能力，耐心交往的意识和善于耍手腕周旋的才干。因而他很快地就在戴高乐派的团体里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成为戴高乐身边的组织者、闪光人物、应付棘手局势和编织最牢固的阵线的能手。1945年他离开过戴高乐一段时间，进入他的朋友罗特希尔德的公司，去做一个银行事务的学徒。戴高乐主义建立后，他领导着戴高乐在马

^① 关于蓬皮杜对危机的观点，米歇尔·若贝尔已与作者交谈。

蒂尼翁府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继续听命尽责于将军，又成为将军的研究员和提供情报者。1959年蓬皮杜被任命为立法委员会委员；1962年，当精疲力竭的总理德勃雷去了阿尔及利亚时，蓬皮杜这位不起眼者便接替了因蒙受非殖民化风暴而心痛欲裂的总理德勃雷。将军希望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政府由自己的参谋长操纵总胜于被政治操纵。对于这样一个角色，蓬皮杜是最合适的。

这位洞察入微的文学教师和戴高乐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地道行家，比他的上司戴高乐更保守更狡猾也更少些对历史和业绩的迷恋。在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谦虚谨慎的，逐渐地便越来越强有力，越来越强加他外省人的特色，近乎农民的特色，使舆论终于领略到他那贪婪的微笑、严肃的声调、使人放心的圆滑和永远叼着的金黄色香烟。随着他的人才挑选及推动他们上升，一个蓬皮杜小集团慢慢地形成了，等于他的私人近卫军^①，他的小集团一时被誉为戴高乐的“共和国预备队”。蓬皮杜任凭将军关注他的国际政治，自己则紧抓国家的工业化，这成为他的主要任务，尽管工业化促使了动荡，成了麻烦的根源。在这个小梅特涅^②的扩展中，力求以每年6%的增长率来稳定暴躁的法国社会。他细心注意农民和商人，这些奠定资产阶级共和国基础的农村和市镇的居民们，他特许他们可以在兴旺发达的边缘低声埋怨工人阶级，使一切人都为政治制度的巩固奉献用之不竭的力量。他同时运用必要的议会策略，建立相应的机构与各党派显要人物进行无休止的协商谈判；保卫新共和联盟几乎成了他的专业户；他终于对一切

① 见卡特琳·克莱西，贝尔纳·普雷沃和帕特里克·魏斯曼：《共和国的后继人雅克·希拉克》，巴黎·都市新闻版，1967年。

② 梅特涅（Metternich），19世纪中叶奥地利的首相，以“梅特涅制度”而得名。这里喻蓬皮杜。——译者

同谋者或同路人了如指掌；以极大的耐心奠定他政治前途的基础，同时显示出无限度的咄咄逼人之势。

这位第一流的人可以说是戴高乐的世界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的总指挥。

总理在前天18时已与他的办公室主任若贝尔用电话详细交谈过。若贝尔已经特别地为他提供了所有的情报，并通过测验证明了政府的优柔寡断、示威群众的决心，尤其是关于运动的民心。蓬皮杜在前天已经作出了决定，后来他叙述道：“若贝尔催促我回来，哪怕早一个小时也具有重要性，而且认为可能、甚至很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他还要我考虑回国后要做的的事情。我马上明白了，在巴黎，部长们举棋不定，将军也可能并没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就我而言，我仿佛十分清晰地看到了随之而来的出路。我告诉若贝尔，一俟返回国内，我就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并满满地打缓和牌^①。”在他两小时的返程中，始终在与若贝尔磋商，拟定他设想的调解，精雕细琢他的计划，直到飞机着陆，他的教导方停止。他知道政府处于险境中，必须鸣金收兵，也知道他的态度不被理解，但他抖擞精神准备投入战斗。蓬皮杜还能做这样的谈话：他被出访保护了；他掌管着一切事务，他不能变卦。政府将接受所有的先决条件，学生危机将结束，传染病将失去作用。在马蒂尼翁总理府，当代总理若克斯向他报告形势并在三项要求上提出相对温和的意见时，蓬皮杜打断了他的话：

“请原谅，我已做出决定：重新开放巴黎大学，释放被捕者，撤走警察。”^②

若克斯和富歇如释重负，他们完全同意。但佩雷菲特顶着：“如果您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您的缓和将被理解为

^① 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② ^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投降。”

“没有必要斤斤计较。假若我们附加条件就会破坏心理效应。”^①

佩雷菲特请求第二天再作决定，被蓬皮杜拒绝。他甚至在奥尔利机场对记者讲了他的决定，他当然知道应该先见了戴高乐将军再说。新闻部长请求总理当晚举行电视讲话，这使部长们大吃一惊：蓬皮杜没有请示总统便决定了一切。看这些征兆，他竟准备得如此细致，如此熟悉情况。

蓬皮杜21时才抵达爱丽舍宫。会谈持续了45分钟。他与总统有过争吵吗？五月以后有些说法：蓬皮杜为了强加缓和路线，权衡得失，不得不提出辞职。好几个历史学家认为相反^②。蓬皮杜说，他与将军的争吵减小到了最低限度：“我们的谈话是简短的。关于我的计划，我立即得到了总统的同意。”^③他说的是真的吗？马尔罗^④的说法是：戴高乐简单直爽地说：“如果你赢了，更好。法国与你一起赢。如果你失败，活该。”马尔罗是作家，说的比历史学家更生动。

事实上，戴高乐看到他的精神饱满的总理，没有不高兴，而是乐观有信心的。这可能是真的。蓬皮杜是他控制的角色，总统会与总理保持距离并有保留。国家日常活动的首脑毕竟是蓬皮杜。在对立的主张里，他倾向于总统的主张吗？算了。反正他脱离了危险，他在那儿就是这样的。即使他失败了，有人来替代他的。后来蓬皮杜对历史学家菲力普·亚历山大^⑤说起这件事时

①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③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④ 马尔罗（André Malraux），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著名作家。——译者

⑤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说：“其实戴高乐一直在等着我。将军不喜欢部长们犹豫不决、支吾搪塞和在行动前逃避的作风。必须对他们说：‘以下就是我要做的。’”

23时30分，蓬皮杜在电视上讲话，总理仍然完全地保持着稳健安谧的作风，这是他政治上的主要王牌：“我决定从星期一起，将重新自由地开放巴黎大学……关于在押学生提出的释放请求，上诉法院将能裁定……我们在恢复巴黎大学自由的同时，也将恢复它的天职，即在自觉自愿地遵守纪律的情况下学习。”最后他以自我辩护结束：“为争取迅速彻底地平息骚乱而进行合作。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已做好准备，为平息骚乱尽力。”

必须让步？

一个星期的骚乱，一个充满激情的巷战之夜，使4个已判罪的骚乱者终于被释放了，学生们赢了。对政府来说，这是蒙上缓和外衣的完全投降，但蓬皮杜没有犹豫。法国将不再骚乱，是这样的吗？后果将很快到来：无论是强硬的戴高乐派还是善良的其他人看来，蓬皮杜星期六晚上的讲话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打开了缺口，加速了有限总罢工。大部分保卫新共和联盟的众议员当场就惊呆了，好几位部长无保留地发言，他们说蓬皮杜这下使国家蒙受了四重谴责：对警察局；对政府一个星期来的行动；对法官，独立被扔在了桌子下面；对将军，被放在了让步的对立面。

几年后，蓬皮杜为此努力替自己辩护：“假设我不发表星期六晚上的声明，不宣布重新开放巴黎大学，那么，在13日（星期一），一定有一场预料之中的示威运动，学生还有工人、资产阶级都可能参加，人们会看到13日将变成一个从共和国广场到拉丁区的浩大的群众运动日。在到达拉丁区后，他们必然会冒险用暴力占据巴黎大学。我想必须避免流血，避免看到死亡，尤其

是让13日的示威者们丧失占领巴黎大学的明显目标。这就是我从阿富汗急速返回的原因。”^①

在这个特定时间里，总理的手段似乎是成功的。然而学生领袖们又弄出了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公告。“那时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科恩-本迪后来写道^②。工会阵线的头头们也降低了调子。星期一全面罢工将继续^③。在工会阵线那里，仅仅因为13日是一个已被召集的不能再取消的示威活动而已。不管怎样，他们必须完成这个示威？这个示威能实现学生—工人的联合？星期天，在两个会议的间歇，蓬皮杜对若贝尔说：“真是滑稽可笑，他们硬要补给我一个5月13日。”^④

①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② 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③ 劳动者的这个决定是确实的，也可以说是“技术性”的，特别是预先决定让工薪阶层参加示威活动。很难用它对运动的影响来评价它，示威者的数字是评价的最好标准。这次示威将是浩大的。

④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第十一章 10年，够了（5月13日）

小派别们胜利地进军，从共和国广场到当费尔广场。这次非同一般，因为他们的后面有30万人跟随着一辆对现状表示不满的大彩车^①。农泰尔文学学院的“疯人派”，巴黎大学的轻浮者、朱西厄的狂热分子、无政府主义的怪癖家伙、极左的玩世不恭者都在队伍里。他们淹没了温和派、猛击了反对派、打开了闸门、搅动了全法国。一场真正的大动员大动荡。奇怪的是，队伍的前面既不是工会的头目们，也不是彬彬有礼的重要人物，科恩-本迪当晚在统一社会党的集会上说：“这使我真高兴，队伍打头的竟是在运货彩车尾上的一帮斯大林派的坏蛋们。”燃起大火的火种聚积了起来。这是煽风点火者们荣耀的一天。

反戴高乐派的洪流

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们说有100万人。当人数众多时，不管怎样，人们总是说有100万。实际上人数与这个估计数少3倍，但仍不失之为一支胜利的浩大的队伍。欢乐的队伍里充满了黑色、红色的帽子和标语。“10年，够了！”因为1968年是第五共和国的第10个年头，科恩-本迪和其他人人为此精心策划了一个历史纪念日。星期五之夜的巷战，被蓬皮杜的让步镀上了合法的光环，学生们是这一天的英雄。法国总工会还企图禁止科恩-本迪在示威队伍的前头，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仍然把这个红头发小伙子安排在队伍的第一排，他双手搭在同行者的肩上。索瓦热奥和热斯马尔在“学生、教师、劳动者团结起来”的

^① 由格里莫提供的数字，是他安排情报局实际计算的（他没采用当晚电视台上的官方过低估计）。

巨大横幅标语下面。他们的后面是500名可靠的左派战士，举着琳琅满目的标语牌：“戴高乐去养老院！”“戴高乐去档案馆！”“工人和学生在一起！”“政府无能，让它垮台！”“我们都是疯人派！”“罗马、柏林、布达佩斯同样在战斗！”“我们是一小撮！”……

法国总工会等等笨拙的改良主义队伍不得不第一次跟随着革命的自由射手们。捣乱分子们带走了群众。这是五月的奇特之处：由社会边缘者们定调。群众中普遍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由的政治狂热和叛逆的芬芳，从共和国广场浮向当费尔广场。蓬皮杜希望这个示威只是象征性的。然而人们极为惊讶地看到这个示威却是如此浩大如此果断如此自由地反对政府的连续镇压及无能。5月13日重新开动了只是由于总理的缓和才刹住片刻的机器。从这以后，一切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学生后面数十万工薪阶层、工会会员、活动分子、同情者或者是纯朴的老百姓都被这个红色春天的恩赐感动了。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组成了一支巨大的队伍，它们的负责人塞吉、德尚、马朗热和其他人带着谨慎的微笑大踏步地走在马路上。后面是法共的负责人瓦尔德克、马歇、巴朗热，接着是社会主义党左翼联盟的激进分子和领袖比耶尔、密特朗、埃尔尼，还有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总书记吉伊·摩勒，不远处是孟戴斯与统一社会党的队伍。

在法共的队伍里，皮埃尔·朱坎走在罗尔·唐居伊的旁边。罗尔·唐居伊是二战时法国义勇军游击队（FTP）的老上校，1944年8月巴黎起义的组织者，他开玩笑地说：“大家去爱丽舍宫吗？——哦，我知道怎么做。这很容易。可以后怎么办呢？”^①这风趣的玩笑离可信太远。然而许久以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

^① 见雅克·贝纳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任若贝尔却说：“那一天，他们能够占领爱丽舍宫。因为学生——工人联盟已给予他们必要的力量和可靠的发端。后来，真正的危险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①

然而，示威活动的领袖们离占领爱丽舍宫的念头还有若干光年。虽然当学生们在车站集中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也炽烈地贡献出他的革命修辞：“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用这种方式，就是在大街上直接行动。全面罢工虽然不是依赖的武器，然而却是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武器……警察局用了美国人在越南的同样方式镇压我们，我们将在不久以后建立一个人民法庭来审判国家警察局……戴高乐主义的制度不得不退让了，这就是对戴高乐主义夺取政权十周年的纪念。”还有一个口号，就是“政府辞职”。实际上，这次示威活动只是浮动在另一种影子上：学生领袖们高兴地看到示威队伍的膨胀，即使这种并不可靠的联合也超出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只希望一件事，即看到“工人阶级”接班。在1968年的法国，工人阶级接班只有法国总工会。然而，它的主席乔治·塞吉却乐观而冷漠地走在数百米之后，不靠近队伍，他，并没充满革命的激情。队伍里没有旗帜，这是在总工会会堂发生的一幕所决定的：示威前，大家说用红旗和黑旗^②来代替三色国旗，总工会有人吼叫着反对，大家才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不用旗帜。

在示威期间，反戴高乐派的巨流在世间自然地涌出，一直流到当费尔广场。格里莫动员了6千宪兵沿群众示威路线秘密地布置，防卫着爱丽舍宫、市政府和一些官方建筑。警察持枪立正。在人流鼎沸的时候，并没发生骚乱，只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警察局的一辆客车送一名受伤的孩子去医院，

①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② 黑旗本是法西斯纳粹的标志色，这里可理解为代表暴力。——译者

不料陷入人山人海的示威群众之中。人们摇晃着车，把警察从里面摇了出来。吼声高涨，一名手枪露出枪套的警察为了畅通朝天开了三枪。格里莫曾一再支支吾吾地提醒警察们，一切行动都可能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假若强行下达疏通的命令，会冒着打群架的危险^①。多亏左派代表皮埃尔·戈特用一副彬彬有礼的老者模样，“让我来吧，我来解救警察们，”他用电话联系疏通，这儿的一切才恢复正常。喔唷！真险，第8区警察局的一辆大客车里装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已经向这里迅速进发了。

围绕着格里莫周围的群众慢慢地散去。科恩-本迪想带领群众去尚德玛斯场地，大概有数千人跟着他。总工会的活动分子们梳篦般清理当费尔广场以加速示威群众散开。示威队伍抵达当费尔广场后，塞吉准备离开，红头发小伙子伸手想拉住他，他拒绝了。到19时，当费尔广场还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要走向新的骚乱？当时，政府的一位秘书急得笨手笨脚地，他建议：“我帮你们联系，我有克拉苏茨基^②的私人电话号码。”他用电话在克拉苏的家里找到了已入席的克拉苏，他向克拉苏解释这些。克拉苏是塞吉的副手，他说：“我马上来看看。”不一会，总工会离开当费尔广场，带走了一大群工人^③。这位热心的政府秘书叫雅克·希拉克。这是蓬皮杜的人员与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有益的有效的直接接触。他们两方面一直都记得这件事。

当晚，各方都进行了估计。政府一方认为示威活动大致是平静的，还是满意的，并使总罢工失败了一半。工薪阶层并没有完全遵循总工会的命令，这是个希望的匣子。5月13日的游行已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使总理的政治形势十分不妙，证明他星期六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② 法国总工会的副主席。——译者

③ 米歇尔·若贝尔叙述的细枝末节，与作者的谈话。

晚上的讲话丝毫未摘掉导火线。人们对舆论越来越失去信任，即使是对电视台，因为电视台并不是开玩笑地宣布有十六七万示威群众，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官方的数字。政府镇压之后的退让鼓励了反对派，还不知道政府要退到哪里，反对派将有保存一切政治获益的可能。即使罢工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这一切已经最深刻地铭刻在工薪阶层的意识里。政府能够退让，行动已经付出。政府已经到了必须最坚决地考虑限制大学动乱的时候了。

解放的巴黎大学

正当学生们需要足够的力量来保持他们的狂热时，巴黎大学由总理宣布“解放”，这如同极大地嘲弄了权威三个星期，而且是在巴黎的中心地区。从星期六晚上起，学生政治运动的老手们就率领一班人出现在桑西耶中心，主要是大学行动党的头头和骨干们：布里塞·拉隆德、让-马赛尔·布格罗、马克·克拉苇茨、让-路易·佩尼努和塞尔日·博斯克等人。几个从容不迫的大学办事员留在这个中心^①。只几分钟，他们便占领了这个中心，一个“行动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这个“行动委员会”由一个常设的全体会议监察，这个全体会议由克拉苇茨^②主持，大家委托他具体的任务，他立即就职服务：大家开始印传单。一面墙上贴着一条很重要的标语：“当我们有一次睁开眼睛，我们就再不能平静地睡觉。”意思很明显：他们近乎不睡觉。在蓬皮杜讲话时，他们安静地听着，然后议论起来。这下反而使他们紊乱起来：如果镇压停止了，运动如何坚持下去？这一夜，他们充满了对工人的幻想。

巴黎大学，10天来，这里是所有骚乱者所希望到达的目标。

① 作者与让-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② 大学行动党的负责人之一。——译者

星期一上午10时，来自桑西耶的那支小队伍行进在拉丁区的大街上。他们几乎完全按照蓬皮杜宣布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时间来到巴黎大学的一个梯形教室前，一位温和的老太太守在那儿，把教室让给了他们，一眨眼，这位老太太就不见了。

他们会聚在蒂尔戈梯形教室里选举占领委员会。佩尼努^①和克里韦茨被选进协调委员会，还有两位有名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老兵伊夫·利什唐和安托万·格里塞。工人——学生行动协调委员会也将设在这里。他们弄来了一辆有扩音设备的卡车，是一位名叫约瑟·比德甘的年轻左派老板提供的。他们组织募捐和准备睡袋，并与弗朗克·泰诺联系找来一支爵士乐队。佩尼努叫来乔治·拉帕萨德，一位讲课讲得绘声绘色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的教师，他带来一台形象化的钢琴，象征着永远被占领着的巴黎大学的北欧传说^②。这台钢琴是六个多月前在那场关于流行音乐的争论中所谓涌现出来的巴黎式和但丁式战斗英雄——朗格卢瓦^③和他的影片资料馆的“收藏品”，当文化部要把这台形象化的钢琴扔到夏约宫^④的世袭领地之外时，被他们利用了起来。朗格卢瓦带着电影摄像机来了，戈达尔^⑤抱着圆盘准备换胶片。晚上，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拉帕萨德感到更加自由和高兴，因为这个爵士音乐晚会汇集了许多稀奇之点；哲学家卡斯塔·阿克塞洛也来了，他在关于性压迫的第一次辩论里十分活跃。人们都醉心于娱乐。这天，为了5月13日^⑥的第十个纪念日，弗朗索瓦

①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国际联络人。——译者

②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的谈话。

③ 法国的电影制作老板。——译者

④ 法国的音乐殿堂。——译者

⑤ 电影摄像师。——译者

⑥ 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成立救国委员会。——译者

·密特朗和萨莱·普莱耶尔也主持着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一个集会。都是不祥之兆。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科恩-本迪与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亲华派在一起。亲华派希望“到人民中去”。科恩-本迪反对：这将使运动毁灭^①。大学行动的幸存，就在于巴黎大学的占领有道理。古老的灰色建筑将变成当前革命的象征性圣地和巴黎这个春天中的小冬宫。它藏有不掌握政权的政治，就是它的特征，这对这场暴动中的口号、观念、推理和想象都非常重要。学生公社就在他们的墙上。

^① 见达尼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第二编 社会危机（5月14—24日）

第十二章 1968年的法国社会

在这几天里使法国陷入瘫痪的工人罢工，有它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即在国家的历史里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这就是导致罢工的原因，假若有一个普遍因素存在的话。伴随着发展的步伐、工业的调整和1965年《稳定计划》实施的结果，以致给工人阶级和全体工薪阶级强制性地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纪律。但这一切都还未经过众所周知的危机的考验，也未考虑到全国的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相反——它不可以用大罢工和“危机”来互诎。更恰当的解释是，这场工人罢工是急速和连续的经济膨胀所带来的先天性困难，打乱了传统的结构，并在法国社会里引起了不规则的反映的结果。

人口激增

在大约5000万的法国本土居民中有30万左右的外国常住居民，法国居民带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标志：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使1968年的成年人的比例低得罕见；二战后出生率的恢复（出生率从1938年的14.6%上升到1945年

的20.8%)，使1968年的青年人层次突然地膨胀^①。法国在成年人不足(1966年20—60岁的人占48.5%)的同时，上年纪的人过量，60岁以上的人占17.6%，尤其是青年人过量，20岁以下的人占33.9%。总的说来，法国居民自二战后增长了1000多万(包括外国人)。法国的变化和在1968年的背景，首先是人口的变化。

“五月事件”逮住了正向繁荣昌盛前进的法国。自1945年以来，法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奇迹般的时期。法国由于战后重建的刺激和美国财政的帮助，在像马赛尔·达索^②那样在1936年国有化以后的一些年里和战争的困难里重建它的航空工业帝国，由一个不稳定的政治阶级但一般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掌握权力的，特别由具有杰出技能的官员、改革者和工业家组成的专家治国论的权力集团所管理的一些大企业的推动下，法国产品以每年6%的比率增长。这个增长率在历史上未有过，它诱发了大批人的富足，许多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富足。

工 业

由于国家的扶持，工业部门从业人数那时占就业总数的39%，国家以最快的速度现代化。大量的消费品充斥法国社会。人们持重地信赖有钱人和美国人。1936年和1945年的两个消费高潮使能源部门和大部门的信贷业务以及运输置于国家的直接监控之下。竞争的工业也处在公开的竞争之中了，尤其在化学、汽

^① 这一切数字取自马赛尔·巴莱斯特的《法国经济》，巴黎·马松版，1969年。重版循日统计，这个册子是最完全的材料之一，也利用了官方的统计，如国家统计局和经济学院等机构的资料。

^② 法国现代航空工业集团的创始者之一。——译者

车、航空制造等部门。

国家通过财政部直接干预，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一切信贷政策和工业计划发挥作用，并形成指令和津贴制度，对半公半私的大企业则实行股票形式，如信托局。

同时，工业的集中开始使私人部门恐慌，慢慢地便把它们吸引到国家扶植之下的全民企业周围，它们一般是主动地靠拢。“信号”计划调整力量、规划远景、确定目标，支持了无所不在的国家干预。以同样的方式，领土整治的有效政策在社会结构改革方面扩大了公民权力的影响。

法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效果则相反：法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决定是上一个共和国做出的，实现则在新的共和国，这迫使法国工业扩大竞争。进入共同市场如同进入双重防区——欧洲经济毕竟变幻莫测——关税壁垒有导致经济分割的危险：一面是公开“报告”关税，另一面是最稳妥地逃避边境管理。一直到1968年7月1日，古老的关税壁垒才终于消逝。

法国工业事实上处于缺乏劳力的状态，尽管出现了30—40万使人严重担忧的“不定失业”人员。1962年从阿尔及利亚被遣返回国的人达到近100万，已经无冲突地融进本土，也没使失业统计明显地更改。法国仍然输入了大量的移民劳动者，很快超过了300万，占总人口的6%。

商 业

商业越来越快地转型，尽管有小商店的老板们——“布热德分子”^①的抵制。在1962年和1970年间，“自主商业”部分在总商业部门数字里从70.65%降到50.90%。这种抑制表明新的

^① 1954年法国布热德（Pierre Poujade）创业所谓“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抵制现代化。史称“布热德运动”。——译者

分配形式在迅速扩展。在一些年里，大商场搞乱了都市风景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大众商场、合作社、各种各样的连锁店、打折的超级市场（如勒克莱尔、卡勒富尔等等商场），并实行联营售货。

农 业

农业经历了与工业同样深刻的革命，尽管没有工业那么轰动一时，它惟一的轰动是农民生活和农村景观的改变。的确，法国停留在太乡村化之中，不管怎么说，它比其他发达的西欧国家更明显地乡村化。农业就业人口在2000万就业人口中占15%，与美国的6%和英国的4%形成鲜明对比。土地分成小块，自古根深蒂固；农业技术的继承，历来落后过时。法国农业为现代化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大量投资合并小块土地——在惊人的范围里扩大劳动生产能力，但这样从土地上驱逐了一个相当数目的青年人。农业产品只能依靠有效的政策寻找有支付能力的出路，并付出很大的代价寻求欧洲市场的价格支持。由于担忧农民群众是否稳定，历届政府都在积极组织市场帮助农民，尽管耗费巨大，仍然在寻求这种坚决的支持。因此，农民压力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总之，法国乡村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都市化，正在实现所有的现代消费目标，国民每周工作近45小时，同时加强对外开放，人人像以往一样努力致富。在1968年，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1950年相比提高了两倍多，但文化还是老样的。差距是爆炸性的。

《稳定计划》

戴高乐主义也加速了工业化，这成为米歇尔·德勃雷^①和乔治·蓬皮杜摆脱不开的烦恼。法国能在欧洲共同体里获得一体化的成功，并使内部和外部的财政重新有序，还要多亏1958年的财政部长吕夫·比内的能力和一个名叫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②的年轻的财政部长的正统管理，使法国人民的购买力有规律地增长，失业仅占就业人口的2%以下，约40万人，其中许多失业者还处在两个职位的转换之中。法国政府甚至花钱奢华企图感动美国接受它的关于货币的“忠告”——法国要求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替代疲软的危险的美元。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法国在现代化中的落后，它的对外商业存在结构性的赤字，在与发达国家的交换中，法国对于被区域法郎紧紧束缚住的老市场，无力给予它们蒙受损失的补偿。1967年，法国出口只能覆盖进口的91.8%，当年就留下50亿法郎的赤字。

从1965年，将军就担忧由于经济超速发展，经济过热而产生通货膨胀将会威胁法郎近期的正常状态。因此他指定财政部长制定一个《稳定计划》，稍稍放慢膨胀和增加一点失业的数字。1967年末的工资曲线还在上升，1968年就感觉到了财政收缩的效果，这年年初工资曲线出现了向下的转折（或者说是更慢地上升），但工会都认为这种减慢是建立在工薪阶级收入与国家收入之间的差距之上的，是它们希望获得工资最快变化的减慢。发展的减慢（很有限的）与工业结构的痛苦变革密切相关，同样导致了企业的关闭，某些地区更敏感些。最传统的工厂最受威胁，当然连同它的领工资者。同样地，农业的现代化和劳动生产力的提

① 1959年1月8日—1962年4月14日的法国总理。——译者

② 1973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三任总统。——译者

高也开始导致产品过剩的危机。农业产品价格降低，但土地还能保证大部分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工薪阶层差不多。农村世界同样对地方性暴动并不陌生，往往也同样猛烈而蔚为壮观，只是通常被政府的让步迅速平息下来而已，或者老天爷帮忙自然“惩戒”^①“绿色欧罗巴”^②，有时也有利于政府产生对农民的额外约束。

统治阶层

精英领导着1968年的法国社会。人们可以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分队里认识他们。

高等工业和大型企业一般为集中了财富和文凭的精英们所组成的不同成分的阶层所控制。老一辈的大亨们在隐蔽和稳固的权威下永远控制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心脏，为了与国家紧密粘在一起，很早以来他们就与公职的上层政界结成了联盟。大资产阶级的后代与中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子孙们一起占据了大部分高官的位置，他们在国家的高级部门里度过一个任期之后，便在资本拥有者的善意关怀下合乎习惯地去领导这个或那个大型企业，金融的或是工业的。工业界与国家合作，国家扶植工业界，国家的干预政策如同第二天性的东西，如同给工业界的津贴。为了发展，这两个精英集团往往借助于熟练的工资让步赢得社会的和平，对理论上的革命工联主义和实践上的工人请愿活动处理得相当精炼。

工业化使欧洲的转向获得成功，也使它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了分数。它们的前殖民地市场永远是它们的禁猎地，永远为它们公开地操纵。但它们与控制着国际市场的德国和美国打起交道来就显得费劲多了。德美的大企业家们风度高雅、有学问、有高等教育文凭，而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具备这些。法国中产阶级还是只会

① 指自然灾害带来的歉收。——译者

② 指欧洲农民。——译者

用拍刀子吵嘴的商业策略。他们喜欢“白手起家的人”。巴黎16区和7区是按几何学般准确严格地体现社会能力的地方；他们认为合乎道德的钱是一种过时的钱，得为自己保留着，不再拿出来。法国资本主义同时保留着国家和贵族的某些东西来准备迎接未来的战斗。遵守习俗的保守的灰色的法国资产阶级活该遭受五月爆发的鞭刑。

小型企业由其他社会阶层控制着，即地方小老板阶层，他们顽强、勤劳，穿梭于他们所控制的企业和家庭之间，往往是非常困难地接受现代管理，他们适应独立自主、习惯于冒险和竞争，习惯于专横的家长式的管理，保持着对社会关系的过时看法，但大部分获得成功，是国家工业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领导方式是准军事性的和家长制的，因此他们手下的领工资者没有任何创造和自治的余地，也很少有工会的活动，一切顺其自然，如同文化和政治侵略的一种形式，对偶尔参加集体请愿活动的人，一般都赶出去。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这些小老板的心目中只是会动的红色稻草人，只需远距离维持着就行了。暴动将比压迫来得更猛烈，反抗反工会运动和过时文化的潮流已经形成。

中产阶级

商人们形成一个令人不安的阶层，这个阶层已经大部分地现代化了。他们忍受着现代分配网络的竞争，尤其是分布在各个角落的超级市场的竞争。他们信奉努力和节俭，一方面对公务员和工薪阶层绝对不信任，一方面表现出很明显的社会保守主义的文化特征及对权威的露骨欲望。

自由职业者们同样艰难地工作，他们的工作完全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动产的交易，伴随着有关法律的健全，也在迅速地进步。这些自由职业者，如医生、法官、律师、药剂师、兽

医、公证人等与小老板和商人们在同一个等级中，他们形成地方知名人士的紧密网络，带有天主教和传统宗教的特征，因循守旧，看重社会荣誉，依恋家庭、教师、宗教和政治的权威，竭力使他们的后代相信祖传的连续性以接下他们社会责任的火炬。大批的战争时期的贝当^①分子，解放后在戴高乐主义和保守的中间派主义之间分裂。法国小资产阶级没有看到围绕他们变化的世界，也没从《巴黎竞赛报》和《费加罗报》上发现工业、群众教育、普及消费和都市化的城市在腐蚀他们的基础，融化他们的价值，侵蚀他们的历史经验……他们仍然在花很大的费用，吸引他们的后代，送他们进大学。

在这些以古老的方式生活的中产阶级身旁，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正在充分地上升，即现代“领域”的工薪阶层。工业或银行部门的干部，高水平的技术专家、工程师，他们平稳发展。他们承担起责任，使得企业发展并现代化，他们的工资也在迅速地增加，他们读《快讯》或《观察家新闻》、喝威士忌、坐DS或雷诺10型轿车，贷款购物、出外进行冬季体育活动和租船出海。中产阶级同样有许多工作，他们开始希望因自己的成功可像工薪阶层那样享受。但多变的风尚时时困扰着他们，正如新左派的观点和雅克·迪特龙的歌曲中所表现的那样。由于过时的管理方式，他们的企业里开始经常出现不满的现象，领工资者要求自治和责任性，相信效率胜于相信等级。在五月运动里，中产阶级久久地困惑，终于被骚乱者的冒险吓坏了。他们中的某些连同他们过时的生活都将被打碎，尽管是一小部分。

① 贝当（Petain），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元首”。

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刚刚开始摘取果实，由于工业化的加速，运煤工和司炉辅助工激增，失业减少；购买力也被认为是规则的，尽管仍然很脆弱。这些不可否认的改善，往往需要熟练工们付出特别的代价：分工越来越细，加之新一代机器人的发明，劳动越来越机械化，还有严格纪律的无止境的管束。

优秀的工人一般仍然进入汽车制造行业，那里服务舒适，有给薪假，或多或少地能感到些惬意。然而，当他们在城市的大街上，或从墙上、报纸上、电视里看到琳琅满目、蔚为大观的货架时，又感到自己的购买力的进展是那么慢。准军事性的泰罗制^①仍然猖獗，工头被看成令人可恶的看门狗。工会组织只有在大企业里才被允许建立。旧工人区有害健康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低租金住房（HLM）明亮、实用、便宜，尽管它以丑陋和单调而著名，还是满足不了需要。下层小人物膨胀，工人阶级颇有进入两个世界之感。资本主义的物质诱惑力并不是永远占上风的，在革命精神方面，工人阶级仍然不差。法国共产党在生活较差的巴黎郊区总是占大多数。工人的文化就是进行社会斗争和阶级团结，即使他们被舒适的小屋、小花园、电视和给薪假资产阶级化了，并伺机更好，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革命的活力。对工人阶级来说，目前他们正处在“光荣的30天”^②的半途。一般地讲，工人总是缺乏尊严和一份体面的工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的钱总要分成几瓣用。他们进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① 美国工程师泰罗（F. W. Taylor）首先实行的一种榨取工人血汗的劳动组织和工资制度。——译者

② 指五月运动中的30天。——译者

其他工薪者

雇员、公务员、教师像他们的同类一样艰难。不管怎么说，在20年的不断进步里，他们的生活也的确得到了许多改善。消费者向往的目标一般是可以达到。汽车、电视、电影和给薪假带来了成堆的文化和便宜的消遣。当社会被其他的东西如此快地改变着的时候，这些改善还是显得太慢。特别是管理还是老样子，中学校长、大学校长、监察员、办公室主任、柜台经理、银行分行经理永远掌握着挑剔的权力，他们苛求下级并偶尔地蔑视他们。当人们确认这一切时，认识到首先还是纪律带来的。劳动关系是刻板严峻的。传统的滞固和现代速度一起被肯定，等级的尊严伴随着能力的爆炸。人们渴望尊严和理解，但看到的却是强硬和怜悯。

在五月的战线，正是后两个敢于幻想的阶级将给予学生以巨大的后继力量。工人阶级和领工薪的中产阶级是五月运动的大部队。由工业化而造就出来的统治阶层虽然已经形成，但他们未曾料到会有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冲击。

第十三章 蓬皮杜掌舵（5月14日）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咨询和设想，戴高乐还是出发了，对罗马尼亚的官方访问已筹划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便取消。富歇反对出访，他认为在危机正猛烈时，将军不能远离，法国人不放心。深夜，实际上已是第二天了，戴高乐召来外交部长穆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他应该陪同将军访问尼科尔·齐奥塞斯库的国家。外交部长同将军谈到法国的威信，对当代问题的影响以及国际上的非常政治，认为取消访问就等于夸大了危机。蓬皮杜把他的砝码放在顾夫·德姆维尔的天平一端：他认为骚乱的极点已经过去，落潮将开始，应该由他和政府去面对去冒风险，总统将得到保护。取消访问，意味着最难应付的时刻将到来，尤其在危机风头刚过去的时候。终于在5月14日（星期二）上午7时30分，一支官方车队穿过福布尔·圣奥诺雷街48号的大门，在马里尼大道转弯以全速越过巴黎荣军大院前的大桥。在奥尔利机场，戴高乐对新闻部长戈尔斯说，他将在5月24日与政府通话。戴高乐走了，但留下暗示，他仍然控制着局势并掌握着他出访的时间表。

蓬皮杜如释重负。由于复杂的原因，他希望独自面对风暴。总理的作用就在于采取行动，头几天至关重要。假若自己失败了，将军随后将回来。况且他感觉到将军也“控制不了局势”，不如他独自拼一场。舆论显然在避开将军，将军并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外的发烧，国家没有失业，在无冲突中持续发展，法国已越过了大危机并在努力追赶欧洲的现代特色，已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为什么会这样？但蓬皮杜深刻了解制度并不稳固，含有自我吹嘘的水分，这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学生非常理解大学的情绪。他思考过危机的传统价值；他知道虽然工业化了，只是暂时满足了人们的急切愿望，但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他这个戴

高乐视线下的“后勤部门”造就今后的社会，这将会不会没有骚动没有震荡，过去的十天就证明了这一点。法国人失去了方位标，新一代本来没有方位标又抛弃了他们的长辈。他认为，在欧洲，到处都是大学危机，法国怎么会例外呢？他只是在考虑，为什么1789年，1792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①的法国城市能在平静中进行这种社会和伦理的转变呢？

蓬皮杜相信自己的清醒，他的话充满了谅解，但也不排除强硬。他要好好地掌权，他希望能独自掌舵，使保守的法国由他重新聚和起来，使人民由反对政府转为赞成政府。但总有一个戴高乐在他背后低声嘟哝，监视着他这个老近卫军战士，要求他品行端正，以国家利益为重，双重领导做决定等等，为的是能束缚他。现在，他强行实施了温和政策，不再提出先决或交换之类的条件来讨论，他必须带着他的计划走到尽头。戴高乐终于去了罗马尼亚，职责在召唤着这位总理。

然而蓬皮杜也有另外的动机，但他很难公开承认^②。总理想应该是总统的忠实仆人，一切都要跟随着他的明星。在六年的总管训练中，他已掌握了将军的标准，也就是国家的标准。他慢慢有些关于法国的想法，然而不再是他的将军的想法了。阿尔及利亚风暴平息之后，他们之间就发生过关于制度调整的口角，他试图说服戴高乐：法国复兴了，它的经济发展也走向了正确的道路，人们不再希望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法国人已信服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有足够光荣的历史。现在他们只是实实在在地想着真实的事情，一份体面的工资，一幢房子，休闲的时间和安宁的未来。凭

① 都是法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巴黎人民起义，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70年普法战争。——译者

② 由此构成菲力普·亚历山大：《戴高乐——蓬皮杜的争斗》（巴黎·格拉塞版，1977年）的故事情节。

他曲意奉承的能力和农民式的平稳性格以及随局势而变的政治手腕，戴高乐之后就是他，一个当然的继承人。他不再想做闪光的改革英雄；他一点也不相信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制，也不想证明新格拉尔^①所预示的前景；他的时间都用在管理上了，再没时间去摇动大批的幽灵以抖动法国和世界。堂·吉诃德^②老了，一个有学问的精力充沛的潘沙^③渴望掌握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是，为了把必然性变成事实，为了把继承的可能变得无可争议，蓬皮杜必须显示出获得解放的样子，必须与法国人建立他成为总统的独特联系。任务是艰难的，因为对手们都已着手这项工作了。近至几个月来，远至几年来，甚至在政府多数派阵线的中心都已经拔刀相见了。有忠于将军的多疑者们，有假充好汉的滑稽人物们，有让纳内^④分子们，闹哄哄地坚守将军的教条，高嚷戴高乐主义就是一个体系，一个永远未完成式的纲领，为的就是阻止蓬皮杜的某种“反叛”。社会改革是这些反对人物存在的理由，他们感到将军快动手了，准备对蓬皮杜这个因循守旧的人廉价出售，因此他们越来越大肆地操纵反对“篡权者”。还有惹人生厌的中间派分子，这些老右派的变种及臭名昭著的贝当分子的徒子徒孙们，总在使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⑤ (UDR) 吃苦头，尽管他们的头头失败了，又自称由吉斯卡尔·德斯坦——一个自负而野心勃

① 格拉尔 (Grael)：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所用的酒杯叫格拉尔杯，喝它盛的酒会平安无事，后引申象征希望。——译者

②③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潘沙为堂·吉诃德的侍从，比堂·吉诃德年轻而明智。这里借这两个人物隐喻戴高乐和蓬皮杜。

——译者

④ 让纳内 (Jean-Marcel Jeanneney)，蓬皮杜下面的劳工部长，戴高乐的另一亲信，总是与蓬皮杜作对，在将军面前吹风。——译者

⑤ 蓬皮杜所在的政党。——译者

勃的人率领，莫看他们表面上那么谦恭。如果吉斯卡尔失败，这些反蓬皮杜者的开端将毫无进展。吉斯卡尔那么想进爱丽舍宫，他有能力不断地迅速向前，特别在最初的机会里大有可能从上面跳越他这个当然的继承人。那么，必须采取大行动，抢光这次危机的赌注，使国民承认是他蓬皮杜把大船带进港湾的，哪怕只是在一阵风里。由于蓬皮杜小集团在政府的位置上，已经对后戴高乐主义开了那么多的支票，认为老头子已经安排了蓬皮杜时代，“乔治”将管保他们的位子，蓬皮杜小集团被合理的贤明的政治保留下来：远离空想的现代保守主义在动荡的年代有它适用的地方。在权力和历史之间，他们已经做了选择：蓬皮杜是他们的人，但这个优胜者应该表现出他的标志。学生们正在给予他这个机会，他不能失去。

从戴高乐起飞的那一刻起，蓬皮杜就掌握了一切权力。社会参赞巴拉迪尔和社会事务国务秘书希拉克将垄断与工会的一切接触。劳工部长让纳内则在另辟蹊径。阿兰·佩雷菲特取消了星期六晚上的讲话，因为他辞了职，蓬皮杜要求他暂时留下来，虽然他这次辞职没有5月28日的辞职实在，但这位教育部长实际上已置身事外，真正的教育部长是蓬皮杜了。若克斯已离开司法部；富歇仍留在内政部，但事事愈来愈悉听蓬皮杜；皮埃尔·松维尔掌握了维持治安的权力，特别设立了公安委员会，但没有公开此称呼，只是谨慎地称其为“罢工治安和部长责任会议”，这个重复政府在所有的上午都在马蒂尼翁总理府聚会。蓬皮杜主持，大家边讨论边做决定。富歇、梅斯梅尔、格里莫、松维尔、警察总队队长克洛德·佩里埃和各部部长围着会议桌讨论。若贝尔在他的老板蓬皮杜缺席的时候主持会议，他是总理的总理，他注意着一切，考验一切人，时而审慎，时而挖苦，时而甜言蜜语，时而冷漠无情，精干巧妙而又诡计多端也不乏冷静。他默默

地扮演着戏剧的第一角色。蓬皮杜不会忘记他^①。

如果说若贝尔是约瑟夫神父^②，希拉克就是跑腿的达塔里昂^③。这位四肢长躯干短的能干秘书不知疲倦，东奔西跑，每夜只睡两小时，轮流地给有关部长和官员送上热情、乐观，也送上专横和易怒，为他们准备一切工作和任务，秘密的或公开的，荣耀的或不讨人喜欢的^④。一个晚上，蓬皮杜拿起电话，希拉克跑来向他汇报会议的情况。在这一个月，应酬周旋和狂躁盛怒总伴随着希拉克，这位未来的巴黎市长如此缔造了他的前程^⑤。

罢工先锋布格奈和克莱翁

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布格奈工业区，南方飞机制造厂厂长皮埃尔·迪沃舍尔预感到有什么行动要来临。他在卡拉韦勒地方迫不得已减少工时之后仍不得不宣布将每周的工时再减少到45小时。但南方飞机制造厂的工人却因此吃到了苦头：工作时间减少了，工资也随着减少了。

5月14日15时，南方飞机制造厂的工人投票通过了罢工决定^⑥。很快地，有2000名工人占领了工厂。一群罢工工人在厂长迪沃舍尔的办公室围住了他。他殷勤地对待他们，并供给他们三

① 若贝尔在1968年的作用对蓬皮杜来说是这样的可贵，以至不久后就有报答，首先是总理在马蒂尼翁府设晚宴招待他的办公室主任，后来任命若贝尔为外交部长。

② 有经验有学问的老神父，常用来指老练有理智的人。——译者

③ 达塔里昂 (d' Artagnan)，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年轻勇敢能干的皇家卫队长。

——译者

④ 希拉克在1968年5月中的作用在他的传记中表现得很突出，即蒂埃里·德雅尔丹或穆里斯·沙弗兰或弗朗兹-奥利维耶·吉斯贝尔的作品。

⑤ 1995年希拉克当选为法国总统。——译者

⑥ 布格奈的罢工由所有的发起者叙述，主要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明治。一个有点滑稽的罢工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以致在他的办公室的走廊里安装了扩音设备，向他大量地灌输革命歌曲。法国总工会的一个代表想和这些罢工工人谈判，试图使他们解散，然而徒劳的。另一些罢工工人在工厂门口焊接铁栅栏并组织监视岗哨。这是1968年5月的第一次工人罢工，远离巴黎，为了减少工时不减少工资。它的领头人有个生来就不平凡的名字：埃贝尔^①。

这里的工人占领工厂来得一点也不突然^②。在我们的红色西部，即离南特不远的地方以及卢瓦尔地区一直活跃着无政府工团主义。5月11日，即巷战之夜的第二天，3000名学生在南特车站封锁了铁路交通。5月13日，卢瓦尔省的工人与学生一起游行示威，提出了无限罢工的口号，示威活动向占领省政府延伸。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伊夫·肖塔尔甚至允许工人演说揭露总工会的官僚主义及在东部地区压制工人罢工的行动，这大大损害了法国总工会的声誉。在工薪的法国，基本上由亲共的工会控制着局势，南特地区是个明显的异型。

工人力量总工会 (FO) 在南方飞机制造厂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一点也没有安德烈·贝热龙^③的支持者们的惯有的温和主义。法国总工会卢瓦尔省工会联合会的书记亚历山大·埃贝尔是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南特的文学教师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卡布里尔·科恩-本迪^④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布格奈地区工人力量分部的书记是国际共产主义联盟 (OCI) 的一个托派分子，

① 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著名左派人物也叫埃贝尔。——译者

② 见活动分子的叙述，但关于1968年5月在南特地区的资料里要完整些。见杨尼克·甘：《南特公社》，巴黎·马斯佩罗版，1969年。

③ 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主席。——译者

④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哥哥。——译者

被法国总工会开除了的伊夫·罗克通。这是社会边缘者们的创举吗？不完全是。南方飞机制造厂是个国营大型企业，原来是私人企业，原来的私人老板成了象征性的。真正的老板就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组织镇压示威并制造了夏龙地铁站惨案^①的前巴黎警察局长穆里斯·帕蓬。一个戴高乐派的高级官吏面对着极左派领导的罢工，工人的情形离大学的情形不远了。

同时在鲁昂附近的雷诺-克莱翁工业区，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代表勒内·尤伊努要求与有关领导对话。因为前天这里雷吉工厂的工人们就进行了群众游行，大部分是年长的农民和资深纺织工。学生暴动的场面为他们的行动带了头。5月13日的罢工，参加者占这里工人总数的30%。尤伊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因此要求与领导对话，但领导拒绝接见他。这一情形是早就预料到的。这将是一次真正的罢工。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欧仁·德尚也预感到某些罢工正在酝酿。他的工会驻地的电话从上午起就占满了线路，主要是地方工会的负责人在呼叫他。到处都是同样的分析：蓬皮杜的讲话给予人们政府做了惊人的让步的印象。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形：星期一的示威活动汇集了大量的工人，充满了行动的征兆。一种新局势正在开创。这使德尚冒出了幻想：如果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在几天里能够促进解决几个月来工人请愿的所有条件？在他这位工会主席的鼓动下，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进入重大事情的准备前夜。至少有布格奈和克莱翁这两个工业区的工厂做先锋，这两处是法国总工会控制不了的。这是目前发动工人罢工的惟一办法。因为法国总工会主席仍然处在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状态中，他虽然出席每周的法共政治局会议，但只能在科苏特广场44号阴暗的办公室里过时地审视着在德军的占领下被枪毙的党的负责人名单，他每次在瓦尔德克·马歇和其他党的要人摆明观点之前就熟悉他们要遵循

^① 见本书第116页注^②。

的党的路线。罗歇·加罗迪^①后来说：“他是个守纪律的战士。在1968年，他同样出席政治局会议，但一点也没使政治局不赞成他的意见。”^②法共政治局的口径是简单的：不要使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相反，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孤立左派分子。法共竟用意想不到的办法使人难以置信地从反面阻止这场运动。那时，到处都被法国总工会控制着，不管工人们多么希望参加运动，罢工到处被总工会刹住。工人阶级将随时处于反对自己的党的运动状态。怪事！

议会上的事端

政府目前担心的主要是政治上的一些问题。蓬皮杜自访问归来就决定在下周三中午召集国会开一个关于运动的特别会议。400名议员会聚在半圆形的梯形会堂里。会议刚开始，反对派就开起火来，还有政府联盟外的中间派。中间组织现代民主进步党负责人雅克·杜阿梅尔要求讨论大学的改革问题。中左派社会党人德费尔要求总理答复能否保留他下午演讲的权力。基层保卫新共和同盟的一个代表罗歇·苏沙尔以民权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决定把自己的态度对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当他讲到学生领袖们时，再也克制不住地说：有些“科恩-本迪的支持者们在1914年和1940年曾背叛过法国^③。”其实并不是这回事。在一片嘘声中，

① 法共的新闻检查负责人。见前译者注。——译者

② 作者与罗歇·加罗迪的谈话。

③ 这是指责密特朗的话。历史真相是：1942年，密特朗从战俘营出来后，难以存身，生活无计曾到维希政府中当差谋生，后到战俘署工作，曾被贝当接见。1943年，维希政府一般性地授予密特朗“法兰克战斧勋章”。密特朗后来因反对赖伐尔上台而辞职，后参加了抵抗运动，但仍与维希政府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这在当年的法国并不奇怪，许多人即是抵抗分子又是贝当分子，他们认为一切坏事都是赖伐尔干的，贝当则无可指责。——译者

大家听到弗朗索瓦·密特朗愤怒的声音：“恬不知耻！”另一个保卫新共和同盟的成员米歇尔·博舍尔向密特朗猛冲过去，被密特朗的支持者们拦住了。他们当着无所畏惧的密特朗的面差点动起武来^①。蓬皮杜没有理会这些，他在准备他的演讲^②。反对派当着他的面提出学生问题，当然不是为了提高他的威信，而是为了掀起辩论。面对他的支持者们和不安的戴高乐派及保守派的舆论，他不能逐一答复反对派的质询，他认为用演讲的形式要好些，而且必须给所有的人以强烈的印象。够了。蓬皮杜知道如何精心运用他的修辞能力，并且多少有点实际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认为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事件只是昙花一现，那不过是一种幻想。如果认为在混乱和匆忙中能产生一种有效的持久的解决办法，也同样是一种幻想。道路是漫长的、艰难的……这不仅是改革大学的问题。通过大学生反映出来的是青年一代的共同问题，即青年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义务及青年在道义上保持平衡的问题。从传统上讲，青年是遵守纪律的，是发奋图强的。不管怎样，他们是代表一种理想，代表一种道德观念的。现在，纪律大多已经废弛了。

“电台和电视的介入，使青年从孩提时代就接触到外部世界的生活。时俗风尚的改变使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而磨灭了人的上进心。这是令人震惊的。其实，人类需要某种信仰，需要确立某些基本原则；青年由于人类长期以来赖

① 弗朗兹-奥利维耶·吉斯卡尔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许是历史的趋势》详细叙述了这个事端。巴黎·瑟伊版，1977年。

② 乔治·蓬皮杜的讲话已由阿德里安·当塞特全文引用，见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官方日报也发表了全文，可以从中了解国民议会上的辩论情况。

以支撑的一切经常被否定，而使人类感到受到了挫折；家庭的不稳定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疏远，祖国也成了有争议的主题，经常被否定。在许多人眼里，上帝已经死去，教会也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并且打乱了自己的传统……

“在15世纪那个毫无希望的年代，中世纪的结构开始解体，当时，巴黎大学的大学生也在造反。在我国历史上，我只知道这样一个先例。在现阶段，受到影响的，不再是政府，不再是国家机构，甚至不再是法国，而是我们的文明。”

这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关于文明危机的辩术有它许多的好处，他在睿智和幻想里摆出了他的观点，即使在某些事情的观点上有点学院式的。乔治·蓬皮杜也许是法国最传统的散文诗的开创者。尽管如此，他的这个讲话还算得上是一段辉煌的篇章，他在重新找到道路方面大大超过了戴高乐派的同仁，他们只知道忙碌于对付红色阴谋和无政府主义的纷乱。总理看得比其他人远。

他的讲话里暗含一种很老练的兼顾。他这样从本质上判断运动，同时也在摆脱一切战术上的失策。既然是重蹈文明危机，就不可能是平静的，就像神怪不能在灯光下一样。那么，政府就有责任在风暴里让步，收帆等待。他说：这里面的奥秘超过了我们原有的能力和水平，作为领导者尤其不能迟疑不决，必须坚守岗位：这是惟一的命令，要预先堵住对政府日常领导的一切批评。而他是日理万机，竭尽所能的。

反对派的演讲使这个矮小的知识分子震惊，所以他最后说，大学生们造反不是反对政治，甚至不是反对制度，而是反对一种文明。换句话说，即像反对多数党一样同样反对反对党。这样，政治家的争论没有了对象。蓬皮杜准确地击中了清醒的和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20年之后，人们才看到1968年危机的本质有点像蓬皮杜所讲的。众人皆醉，惟有使政府全部落马的这个首脑仍

然坚持使他成名的这个观点。蓬皮杜保持了的角度：领导集团的经验丰富的知识渊博的代言人。这位未来的总统深谙自己要做的。就在那个五月里是独特的。

密特朗有责任发挥他议会演说的天才，因为他也是要人。他如此回应总理：

“我们刚才聆听了总理先生的讲话，并使我们开始思考总理先生讲话的某些段落：这好像是政府在解释给我们规定的纲领。反对派已提出了对政府不信任的动议。‘现在应该是政府离开的时候了……’你们怎么办，总理先生，司法部门、大学怎么办，总理先生？”

当时，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还提到警察局使用毒气的事情。内政部长富歇反驳，转而向孟戴斯求助：

“我知道您是位实事求是的人。您相信法国警察局会使用毒气吗？”

孟戴斯：“关于这一点，你们能接受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吗？”

然而，议会辩论全部都是在玩弄小动作。学生们连5月7日的议会会议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当时，他们正向星星广场进军。他们的行动才不是徒劳的。

第十四章 学生公社（5月15日）

奥戴翁剧院院长让-路易·巴罗拿起电话，急促地问：

“奥戴翁剧院被占领了吗？被谁？”

接电话的是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办公室主任弗朗西斯·赛松，他用与这个例外的情况相称的活泼声调回答：

“被巴黎大学的人，当然不是被俄国人！那么您打开大门开始对话吧。”

政府认为重新开放了巴黎大学，学生们不会到剧院里闹事了。殊不知巴黎大学的小战略家们需要另外的胜利。活该有巴罗的精彩电话，巴罗就这样成了1968年的殉道者。上周在一个鸡尾酒会上他还在按照克里斯蒂昂·夏里埃^①的意思向塞尔日·盖恩斯布^②如此表示：

“如果您能组织一场有点疯狂的音乐喜剧，我的舞台就是您的。”

“按我的理解，这是您所希望的，这就是骚动。”

“对，绝对地，骚动！”

晚上，奥戴翁剧院里，保尔·泰勒剧团的舞蹈演员们已在衣帽间里卸妆了，一些观众仍然在大厅里拖拖拉拉。巴罗已离开了他在特罗卡代罗的房间。他的助理贾科莫尼拿着一本小说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着学生们。学生们如期而至，是一群蛮横吵嚷的人，满口的夸张和嘲讽。他们是两个竞争的占领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空泛争论和嚷叫，他们总算找到了谅解的余地。4000多

^① 法国当代作家，五月运动后立即著有《疯人派的春天》（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见本书后“资料提要”。——译者

^② 巴罗的艺术界朋友。——译者

人突然冲进剧场，在这个新的占领地上疯狂起来。

让-路易·巴罗急急忙忙地赶来保卫他的剧院，他高声喊叫：“请让我们工作！”

他的喊叫只是激起一阵笑声和诅咒。玛德莱娜·勒诺也赶来支持他的丈夫：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剧院。”

这话到底还算准确，因为勒诺-巴罗夫妇的剧院是受国家津贴的，问题是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于是……巴罗试图与占领委员会谈判。这个委员会刚刚找到一个与他们的野心相称的名字：“法国前剧院奥戴翁革命行动委员会”。真是无可救药。巴罗即使与他们谈判，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当法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雷蒙·鲁洛突然宣布赞成占领委员会的行动时，剧院便最终丧失了。第二天，在演员工会会议上，法国著名演员西蒙娜·瓦莱尔啐了雷蒙·鲁洛一脸唾沫。

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被占领后，两个“解放区”正好在拉丁区中间。学生公社找到了游戏和政治活动的附属建筑物。剧院的墙上有一条标语：“幻想掌握政权。”极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尔·维里利奥与占领委员建立了联系，同时获得了一个生动而恰如其分的绰号：“科恩-本迪的武元甲^①。”

蓬皮杜和格里莫不高兴看到法国古老的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骚乱者们的重新占领烦恼着巴黎警察局长，使他的队伍筋疲力尽，而且还要有一次无法预料的冒险^②。

^① 武元甲（V. Nguyen Giap），1911 - ），越南大将，部长会议副主席。——译者

^②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穆里斯·格里莫很自然地想起莱昂·勃鲁姆^①在1936年的名言：学生占领了奥戴翁，但奥戴翁也占领了学生。进行对话总比使用铺路石少些麻烦：但这样，国家权威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吗？有时可能是。国家不能再用镇压手段。至于总理，他已经意识到要用狡猾的政治手段，要摆脱明显的让步方式。他在示威的一个星期里看到了学生运动所赢得的人心，这成了他的心病，只要舆论反对政府，戴高乐派就束手无策了。用粗暴的勒令恢复一切，付出的政治代价将太昂贵。但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出现的场景太过分，以致把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变成了怪诞的橱窗和混乱争吵之地。学生们看来下定了对资产阶级不满的决心，甚至可能吓坏资产阶级。当时看到这种情形的人们都耸耸肩膀。保守的法国必然醒来。

词语革命

政府策略上的被动在五月的历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显得没有诚意，蓬皮杜和格里莫给人以没有任何预见性的印象，对法国的这种词语上的精神胜利法也未预料。很难用什么词给占领一周来的这种词语上的形象发泄现象临时地下个定义，这种现象往往伴随着对大量的幻觉戏剧作品的夸张性模仿。在未深入了解法国近10年的社会各领域之前，很难弄清五月的真正起因和人民生活方式变化及日常生活混乱的原因。

变化很早就能看见。在巴黎大学那教堂式庄严的穹顶上飘扬着红旗，上面还残留着三色国旗的破布片；在巴黎大学的天井院里，第一次在晚上以异乎寻常的爵士音乐会举行“解放”典礼，并为坐在前面的盖·吕萨克大街上的和城壕外护墙堡垒的英雄们

^① 莱昂·勃鲁姆 (Léon Blum)，法国社会党领袖，1936年曾组阁，为共和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党人政府，曾为法国“新政”奠定基础。——译者

庆功。小派别们重新选定巴黎大学作驻地，并对这个革命的大市场进行了充分利用的调整。在一个大厅里，战士们各就各位，铺开战斗杂志的排字，洋溢着夸夸其谈和疯狂；一群以狂热自娱的人一直在巴黎的宣传队伍里闲逛、闲聊、倾听和攻击他人。学生领袖们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前来评论当天的形势，仔细分析、认真比较友人们和对手们的分析。

请看墙上，它比活动分子们更饶舌更富创造性。这就是五月标语的长系列，它高度概括了战士们精神，并将深深地刻在人们这数十年的记忆里^①：“把您的愿望变成现实”，“幻想掌握政权”，“海滩就在铺路石下面”，“禁止禁止”是经典作品，值得载入辞典；“奔跑吧，同志，旧世界在您的后面”，“当最卑劣的官僚主义者和最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肠子扼住您的喉咙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难题吗？”最富有战斗性；“我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我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蕴藏着造反一代的幻觉，是研究造反内心的好辞；在这种无穷无尽的词语积累里产生了许多独特的口号：“生活就是心不在焉”，“为了向无套裤汉^②看齐，请给您的漂亮话脱掉裤子，”“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词语！”，“缀字法^③是有味的橘子”，“自由包含所有的罪过，它是我们十全十美的武器”，“藏住您的目的”。

一些天来，巴黎大学成了巴黎旅游界和社交界感兴趣的地方，就像艾菲尔铁塔和雷吉娜饭店一样。巴黎郊区的居民专门前

^① 说到五月的标语，有个小册子，即使不算全面，也算广泛。阿兰·阿亚什：《五月革命语录》，巴黎·让-雅克·波韦尔版，1968年。朱利安·贝藏松：《墙报》，巴黎·特库版，1968年。

^②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对广大革命群众流行的称呼。

——译者

^③ 法语里变换单词的字母顺序构成另一个新词的文字游戏。——译者

来参观；外国游客在这里留连忘返；知名人士也敏感地嗅来。在一个月里，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络绎不绝，或着迷或激动，或怀有敌意或与之同谋，每个到此的人都可感受到五月空气的阵热。前来参观的匿名使者们传播着造反的精神，比所有的宣传都来得有效。当法国接近瘫痪、电视数周消逝之时，造反者的非正式“钦差”们深感责无旁贷，自觉地替代舆论宣传。不管怎么说，在还没有降格为附庸国的国家里是不应该如此的。

以缜密的理性教育而著名的巴黎大学将变成创造非理性的象征。一个世界性的神话将平和地出自这座被亵渎的古老石头建筑里，以最美妙的也是最靠不住的名义降生，这将是共同理想的神话的降生，解除了义务的信徒们的降生，也将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机遇剧^①的降生。在这些神话创造者内部，两种不均等的活动分割了他们的时间和空间。首先在梯形教室里，革命的词语掌握了权力并永远占有席位。人们议论着这一切，向四面八方的人们传播这一切，几乎达到了反映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宏伟画幅的尺度，深沉而无声地。革命占据了人们的精神和谈吐，也占领了社会、政治、冲突、死亡、爱情和性欲。知识分子、雇员、工人、流浪者和工会、政党的活动分子们都在一种无法摆脱的修辞混乱里混合。人们都在谈论行动、理解词语、解放自己，为议论而议论，带来一阵浑浊的激流般的雄辩潮流。好像一大片厌倦的人在听凭上帝抓住这动荡的30天来弥补过去平静的十年似的。

其次在其他大厅里，辛勤的活动分子们在不懈地干着他们的技巧工作。一个布满别针别着的各种消息资料的印刷大厅，也是为会晤和服务的地方，有人坐在两排用旧了的皮沙发上编写“事件”新闻，一个临时配备的秘书正在神秘的蜡纸上打字。一个占

^① 源于美国的一种戏剧，要求观众积极参与，演员随着观众带来的偶发事件自由发挥。——译者

领委员会控制着速印室，正在印刷不知是谁编写的传单，门口散乱着空奶酪盒、面包屑和油腻的废纸。一组电线和一些按钮控制着一堆扩音设备，三个高音喇叭悬挂在教室里，人们在这里广播公告或实用的通知。在另一个大厅里，是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分子们，主要是大学行动党的佩尼努、克里文、格里泽和运动的第一次示威中解散队伍的拉隆德，他们在狂热中组织了法国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到处出现，首先在罢工前线 and 中学里，接着在银行、办公室和工厂里。他们印制组织名单，整理运动卡片，不停地打电话，以协调运动，避免各组织突然单独采取无价值的行动，并在所有活动分子的大脑里激起对工人委员会的伟大记忆。如果这个行动委员会是真正的？如果法国能在造反的魔力中尽快改革已生虫的机构，创造真正的政治、理想的政治、真正民主的政治？一家名为《行动》^①的日报使这些梦想具体化起来，这个更有意识更狡猾更富经验的小团体几乎导演着整个学生运动。

雷诺启动

造反的文化氛围在被占领的巴黎大学凝结，许多戴高乐派的团体并未看出这点，认为在那儿不过是孩子气的发泄，至多是青少年的狂欢节或徘徊着的革命幽灵罢了。重大的事情往往在心不在焉中进行。布格奈的罢工实际上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最明显的证明是法共的《人道报》仅在第二版第六段用14行字报道了

^① 《行动》报由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意大利人”的前成员让·沙利创建，由他原《光明》报时代的朋友和反对党的内部斗争使该报活跃起来。弗雷德里克·邦、米歇尔-安托万·比尔尼耶、贝尔纳·库什、让-保尔·多莱、大学行动党的活动分子马克·克拉蒂茨和让-马赛尔·布格罗都加入了这一队伍，还有居伊·奥尔康、西内、沃林斯基、雷塞等画家。

这个消息。布格奈的工人还不知道真的是托派敌人在领导罢工，所以《人道报》不得不迅速改变排版以示重视。星期三，雷诺—克莱翁工业区的罢工顺利进行。好久以来，这里的情形就很糟。年青的厂长早就在注意调整与工人的关系，他还是很有胆量的，好几次罢工他都没有让步，尽管工人们的要求成堆。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尤伊努和法国总工会的达内早就准备搞一次一个小时的停工以抗议社会保险条例，虽然这已是一种过时的形式。1967年夏，蓬皮杜政府在完全掌握了权力的情况下进行了社会保险改革，使工会遭到某些损失，尤其对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从那以后，这两个大工会组织就在寻求报复的机会。下午，工会代表们相继出现在国民议会上。劳动的中断象征着全法国已经动荡起来，行动日已成为极其普通的事了。

在克莱翁，一个小时的停工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了；气氛有利于工会会员们。中午是松扣的时候，他们从收音机里获悉南方飞机制造厂罢工的消息，激起大约150名熟练工在车间里游行，他们高呼口号、讨论问题、情绪激昂、状态紧张。他们要求见厂领导，但遭到拒绝，于是，克莱翁进入动荡状态：熟练工们与工会会员们一起动手用铁栅栏封锁了工厂大门；工厂干部被工人包围起来；马上，厂长被工人关了起来。直到深夜，厂长才同意会见工人代表，在次要的问题上做了些让步。对于工人的主要要求，如在企业里回复到每周工作40小时并不减少工资，各业最低保证工资（SMIG）为1000法郎，厂长无权答复，必须经巴黎的领导批准。一个雷诺工厂进入行动状态不是件小事，而且是法国总工会第一次在冶金工业中强制行动。在冶金工业中，汽车工业处于尖端地位，而在汽车工业中，又主要是雷诺在给冶金工业提供汽车。法国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这次应该有所作为。但人们都知道他从不从左翼包抄，这是他的黄金规则。

第十五章 法国停滞（5月15日—16日）

到星期四上午，已不允许再犹豫了。运动已到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夜。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自13日大规模示威的次日就敏感到这一点，该工会的活动分子们加速传播这种预感，他们认为突破口已被打开了。下午，该工会主席欧仁·德尚召集工会的主要负责人下达命令：罢工和占领同时进行。

法国总工会接上

在法国社会的这种时期，要使运动向大规模发展都少不了法国总工会的参与。直到这种时候，法国总工会对学生的理论仍然持有保留和怀疑甚至是排斥，它对左派的急切愿望总具有变态的反应。乔治·塞吉的总工会已经演变。雷诺-克莱翁的停工显示了工人的意志，使总工会从5月11日就意识到往后的运动形势将不可阻挡。除了工人，工薪阶层也渴望战斗。博韦地区的洛克厄工厂已与运动结合起来，奥尔良的于纳勒克工厂将跟上。人们预感到比扬古的罢工正在酝酿，它将成为工人运动象征的象征。拥有总工会地方上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书记埃梅·阿尔贝埃已预料到17时工人会商的结果是：工人将投票确定罢工。塞吉及其助手密切与法共中央联系，并获得工人会商的结果^①：罢工一旦启动，就

^①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应该说前者从属于后者的党中央之下更真实些。对这两个组织的关系，共产党和“空投”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明显持有异议。雅克·福韦和阿尔·杜阿梅尔的《法国共产党史》在那个时候是权威作品，假设为前者在后者的默契下自治。一些历史学家们没有深入分析，同样认为法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也是从属关系。还有的认为法国总工会是“秘密的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关于法国总工会与法共的关系，大部分作者为了省麻烦，接受法共训练有素的直接检查。是罗歇·加罗迪在进行这方面的文字检查，例如他向作者提问，甚至不与作者谈这明摆着的事而言它进行试探，加罗迪知道如何判断。1968年5月，他在法共政治局占有席位，并用塞吉和克拉苏茨基的名义来彻底贯彻党的领导者的路线。

猛冲进去，然后在运行中再迅速地做调整。当晚，雷诺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同时，大约1万工薪阶层者在各处仿效他们。四面八方的要求汇成潮流：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1000法郎；减少工作时间不减少工资；给予工会活动的自由权。

巷战之夜的一周之后，法国明明白白地不顾一切地向总罢工前进。为了控制事态发展，法国总工会控制着全部的罢工准备，除了雷诺工厂无法控制之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于16日白天在里昂附近的一个小编组站巴丹制造了停工，抗议解雇临时工。总工会的战术很快确定下来：由资深的常驻铁路员工中的乔治·塞吉第二天去圣拉扎尔车站考察那里的气氛。这个车站是法国的主要车站之一。如果所有的大车站都准备罢工，这位总工会主席将会彻底发动运动。因为如果铁路停滞，国家就停滞了^①。运输将变得艰难，企业将无法交货，批发商将破产，工业将停滞。从连带性或必然性方面来讲，法国将处于阳光下的冬眠状态。数百万罢工者将使法国社会陷入瘫痪。法国总工会掌握着危机的关键，它将如何动作？四年来，总工会一直在一个复杂的程序里进行左派的归并，忧虑左派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更加根深蒂固，漠不关心一切暴动准备方案，却满意戴高乐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安于根据宪法在它的红色郊区、工会系统和数不胜数的企业联合会里建立起稳固的次社会，法国共产党就此轻率地停滞不前，使它失去左派的支持，任凭国家机构对人民形成可怕的威慑力量，面对人民都不想用一点共产主义的力量来号召，只在自己的次社会里或具体战斗方法之外寻求出路。然而，法共却很少赢得选举，总达不到既不冒毁灭或放逐的危险又能获得政权的目的。这是取消暴动的必然结果。很久以来，法国共产党就不再相信革命的前夜，也不相信必须有红军。

^① 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世尔版，1972年。

然而，法共能对如此偶然出现的神奇的人民运动视而不见吗？能保证倒霉的执政者在政治的天平上总是恩赐自己吗？由于学生——工人靠不住的联合中的差错和不幸，在学生的过分胜利之后，总罢工的希望并未露出地平线，难道是大罢工还没有令人震惊的征兆吗？在谨慎和保密的心态上，问题总是需要研究的。总之，不管怎样，法共依然要在党的回力球场上刻上“共产党人都是革命”的字样。法共总是那么天真地妄自尊大，不断发表声明，甚至认为在这样的运动中，共产党人是当然的职业运动员。实际上，全都是胆怯者和改良主义者。当然，法共在五月中并未完全拒绝考虑政府的垮台和在有人已开辟道路的情况下再开启“进程”的问题，但它决不是在关心革命，而是在关心另外一个政府，只关心必须在另外一个政府里为它这个劳动者的党争取留几个更好的位置。人们将远远地看着它怎么办。

科恩 - 本迪在电视里

“从16日星期四开始，我就感到不安。”乔治·蓬皮杜后来对作家亚历山大^①这样说道。这天上午在内政部，格里莫竭力请求总理立即在电视上发表讲话^②。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与格里莫有同样的意见。总理同意在下午录制一个简短的讲话。这又是失策的一步。当晚，全法国都在电视机前面，不是为了看这位政府首脑，而是要听听看看十天以来政府究竟如何说。几乎同时，阿兰·热斯马尔、雅克·索瓦热奥和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直接接受了3位资深记者的提问，即《法兰西晚报》的让·费尔尼奥、《费加罗报》的米歇尔·巴西和《巴黎快讯》的皮埃尔·沙皮尔。科

^①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② 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恩-本迪说：“我们马上就会感到技术专家们热情。而广播电视总是或多或少地强加于人。”^① 听众开始注意这种考试。几分钟以后，科恩-本迪脱口而出：

“好了，够了，这种说话的考试我们受够了。”

当时，这3个年轻人勇敢地投入对现实不满的理论练习之中。这是他们最有希望获胜的方面。

记者费尔尼奥问道：“你们知道你们在冒内战的危险!?”

热斯马尔：“我们知道在冒这个险。”

然后继续谈话。记者沙皮尔神经质地用钢笔多次地轻轻敲着桌子。热斯马尔不客气地：

“听着，沙皮尔，当什么事使您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制造噪音使别人听不好。那么，您让我讲下去呢，还是停下来。”

幕后，技术专家们笑弯了腰。

3个捣乱分子赢了一着。他们表现得果断、鲜明、放肆，时有点滑稽，整个过程是热烈的。乔治·蓬皮杜准时在电视上出现，一副教训人的不自然的样子，在预先制作好的胶卷上用全面讲话的声调声明：“法国的女公民们，男公民们，表现出你们的冷静是你们的权力，表现出你们的坚定也是这样的，由于你们的政治愿望，由于你们的社会要求，你们应该拒绝无政府主义。政府也将履行它的责任。政府要求你们帮助它。”实际上，无政府主义在一个罢工刚刚开始和学生示威已经终止的国家里已没有强调的必要了。仅从表面上看，总理在要求他离去的青少年中是缺乏魅力的。政府这下什么也没得到。深夜，总理签署了动员警察总队预备军人的政令。

^① 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海 啸

在24小时内控制住工薪的法国是件令人晕头转向的事。雷诺已发出了信号，罢工迅速蔓延。在全国总工会的驻地，乔治·塞吉在呼叫刚停工的阿代雷车站。他看到罢工到处在升温。他赶到庞丹，这里正在召开一个经全国总工会长期筹备的“全国青年会议”。他在会上号召立即进行罢工^①。大会一致通过。塞吉是谨慎的有保留的，他没有使用“全面罢工”一词。实际上，这是一回事。活动分子们一致表示奋起反抗并与地方罢工结合起来。蒙帕尔拉斯车站和沃日拉尔车站停滞，郊区已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到14时，克莱翁集会，停工变成了有限罢工。雷诺所有的工厂都罢工了。邮电系统来自外省的青年送货中心同时开始罢工，所有的邮政支票办事处紧跟着罢工。在鲁昂附近的特赖，造船工地的工人宣布有限罢工。罗迪亚瑟工厂和克勒索的富日尔工厂也罢工了。到17时，大约有30万罢工者。北方飞机制造厂，伊斯帕诺·叙扎，巴布科克，贝尔利耶，罗纳·普朗克都停了工。到22时，已达60万罢工者。在这个白天里，法国总工会紧紧地控制着一切罢工，并监视着罢工的象征——雷诺，同时将在使国家陷入瘫痪的铁路上掀起罢工。运动的象征性和威力随着总工会的意志转移。从这以后，法国将存在着两个权力：政府和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似乎开始独断独行了。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动摇

当晚，乔治·蓬皮杜的危机办公室第一次正式召开会议。这个办公室到危机结束一直存在着。这个政府的小参谋部有两个作用：把罢工的影响限制在日常生活的范围内；保证国家继续运

^① 见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世尔版，1972年。

转。总之，按照蓬皮杜规定的路线坚持着。尽管总理使这个办公室人员的思想观点十分明晰，但这个小参谋部面对全面罢工没有一点作为，面对得人心的学生运动自然瘫痪。但又不能取消它，因为取消这个办公室就意味着任凭无政府主义和非法改变制度的危险泛滥并将造成舆论的不安。在这种危险里，被占领的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幸的是，政府却忽视了电视这一关键性的怪家伙。自上周末的巷战之夜后，大记者米歇尔·奥诺兰写了一篇关于学生暴动的报道，播送前，广播电视公司的负责人把它交给新闻部长乔治·戈尔斯的顾问让-皮埃尔·于坦审查^①。于坦认为这篇报道对不满现状的学生们的褒奖太过，要求奥诺兰“重新平衡”一下。奥诺兰因此起义，他的报道自然被冻结。周一的示威之后，记者们从另外的渠道知道了这件事，因而对晚8时的新闻对周一示威的不公正报道更加愤慨。第二天，一个“为新闻自由而斗争的委员会”便诞生了。几天之后，法国广播电视公司（ORTF）开始呈现全局性的罢工。政府立即承诺将保证记者最起码的表态权力，但舆论一点也不相信了。而舆论本身由于想象力和评论的贫乏也常出现一些职业性的错误而遭到各方的非议。

电视原来为第四共和国服务，后来转而为第五共和国服务，直到这时，它一直是政府的驯服工具。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领导被任命进入作为制度的支柱的部长会议，公司的新闻主任和总编辑被部长们视为同僚。可能是为安定团结的缘故，公司的历任领导都承认共产党的部分权力，由大导演斯泰利奥始作俑，有一批杰出的导演亲近法国共产党，控制着故事片的制作。这是一批高素质的人，而且热衷于对当代问题表态或采取行动。这批人因为后来被称为的“比特-肖蒙学校”而享有盛名，这个专门培养国

^① 让-皮埃尔·于坦与作者的谈话。

家电视台的接班人的学校是戴高乐派和共产党妥协的奇特产物。戴高乐派作为补偿，新闻部门便成了政府的禁猎场，即使有许多左派记者在里面工作，也只能隐瞒自己的观点。前些年，阿兰·佩雷菲特担任新闻部长的时候曾来到广播电视公司直接布置新闻工作。总之，电视必须宣传戴高乐派的思想。

1968年的大罢工给电视新闻部门中的左派记者们提供了一个爆发的机会。在整个五月中，记者和技术专家们掌握了权力。在最关键的时候，政府失去了广播电视公司，他们都记得这些。在这段时间里，舆论孤立了政府，使蓬皮杜不得不等待着比他的预料要多得多的震惊的到来。

走得太远

在这种时候，必须顶住法共的攻势。蓬皮杜不相信共产党会进行暴动式的罢工，因为他深知共产党人对这种轻举妄动要权衡它的现实性。对非共产党左翼力量，蓬皮杜同样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也不会擅自进行暴动式罢工。的确，密特朗的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开始焦躁；孟戴斯在住所里也像热锅上的蚂蚁。

提到著名的保守者，勒卡尼埃民主中心的总书记皮埃尔·阿贝兰就令人奇怪，使人想起使他声名鹊起的话：“共和国的总统，要保障国家的连续性，要以一个政界要人的身份承担政府的责任，同时应在痛苦的形势里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并有能力推动民主进程，要人们应更有经验更有交际能力。”第二天，他表达得更明确：“我希望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担任总统。”一个历来冷漠地离群索居的非戴高乐派人士如此寂寞地要求，一下子集中了人们的目光。这个星期六，他与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激进会员穆里

斯·拉比以及阿兰·热斯马尔一起进餐闲聊^①。他们意见有分歧。于是孟戴斯对热斯马尔表示：“关于我们之间的所有分歧，我都准备与您开诚布公。”孟戴斯的行动在具体化^②。

但在蓬皮杜看来，法国共产党这次为什么助政客们一臂之力，比将军更大西洋主义，甚至完全与反共分子们的步调一致呢？惟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法共准备进行大的社会协商，需要与各方大大地缓和一下关系。说起来，法国制度的幸存多亏这种政治妥协代价的付出。蓬皮杜在他的回忆录《恢复事实真相》里对此作了解释：“首先，我们要争取时间。危机没有抓住态势，这种态势在舆论领域里同样严重——其中主要是巴黎的舆论——各类渴望上台的反戴高乐派的急切愿望一如既往地突然发泄，如在1953到1954年也是这样。大街上的混乱，发生在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经济瘫痪，这种局面或迟或早总会走向反面的。外省早已流露出厌倦的情绪了。因此，要争取时间，要避免大学生的流血悲剧（法国不会采取屠杀青年人的方式，本人对这种想法也不能忍受），政治阴谋都会遭到失败，令人耻笑。现在只剩一个重要的有组织有能力尝试掌权的对手了，即法国共产党。目前，法共尚持谨慎态度。因此，我应设法使它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我将在工会的阵地上与它相遇。因此，我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② 关于孟戴斯行动的详细研究，阿兰·佩莱从五月的原始资料着手获得进展，写出巴黎政治学院1969年的高等教育文凭（DES）论文：《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与1968年5月事件》，并与有关的证人证词比较得到印证。让·拉库蒂尔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从另一方面全面而精彩地记叙了同一历史。

开始了会谈。会谈是在格勒内尔大街的劳工部举行的^①。”

蓬皮杜很快有了测验他的假设的机会。随着罢工的扩展，一个急切的问题摆在法国共产党的面前：罢工能走得太远吗？供电和通讯将中断，难道要达到政府和国家瘫痪的极限？第二天（星期六）上午有了回答：法兰西电力公司举行罢工，运动很快进入一个自相矛盾的怪圈。一个罢工中心委员会掌管事务，由可靠的法国总工会会员组成，并发展到地方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却是要避免罢工和保证继续生产！原来的领导干部被剥夺了权力，降低到罢工者“顾问”的行列。水电供应还没有中断^②。

邮电局同样有罢工计划。邮电罢工者凭借他们所掌握的特有设备的优势，很容易产生同样占领通讯的欲望。这可是政府留作专用的领域。邮电部部长伊夫·盖纳警告他们这种行动就是造反，并准备呼叫警察来保护国家通讯的独立。法国总工会不支持邮电罢工^③。为了澄清事实，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在接见刚从莫斯科访问返回的总工会代表团团长伯努瓦·弗拉商之后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说明目前没有全面有限罢工的命令。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个问题突然从他的嘴里冒出来：“你们在想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什么呢？如果有人向我谈起这个家伙，我的回答是：他是谁？”

晚上，塞吉与德尚一起又到欧洲一号电台讲话：“你们要使列车运行吗？在所有的列车由于法国总工会的创举而全面停开的时候，这是困难的。”他利用电台与布格奈的南方飞机制造厂联

① 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③ 伊夫·盖纳与作者的谈话。

系，因为那里的厂长皮埃尔·迪沃舍尔还被罢工者关押着，塞吉直接与他们通话，不赞成这种非法监禁。第二天，厂长迪沃舍尔被释放了。

事情很清楚，法国总工会要瘫痪的是国家而不是政府，它举行罢工但不进行革命。它不与大学生发生联系，已经有两次这样的例子了：5月13日，一队大学生活动分子，大部分是亲华派，行进到弗兰大街，碰上由一些脾气不太好的工会会员封闭的栅栏大门，厂内集会已经开始，但大学生们却被堵在工厂外面。因为这是在罢工中，法国总工会有人在里面，大学生不能擅入。在整个五月中，亲法共的工会控制了罢工中的现场请愿活动，而现场请愿是特别具有分量的。政治上的愿望和实质上的要求正是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追求。总工会主席塞吉在这里不失时机地阻隔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大学生联合起来的愿望和努力。

塞吉能革命但不进行革命，他的战士们不颠覆国家也不颠覆政府。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保持一点地位。为了国家和政府不甩掉他，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

戴高乐发怒

“当时戴高乐走了，当他回来时，一切都落了地。”将军头脑冷静、声音洪亮地发怒。部长们缩着脑袋，戴高乐继续说：“这是无政府主义，都百事不管了，丑化一切，嘲弄一切，什么尊严、权威、国家都没有了。这个国家无可救药了。在这五天里，反对我这个坏心眼的人，战斗的十年都忘了。”

从星期二到星期五，将军有的是时间仔细思考他的抨击。爱丽舍宫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和骑兵卫队队长格扎维埃定时向将军汇报国内的情况。将军与蓬皮杜也进行了好几次通话。他如此方便地远距离审慎遥控，又好像完全置身事外。将军反对无条件的让步，对此他可能觉得有百倍的道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只能

以恢复上课为条件。如果不这样的话，巴黎大学的奇观和怪诞的煽动就会经常呈现在国家的面前并被置于政府和警察局的善意保护之下。当奥戴翁被占领时，学生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最起码的注意，只是注意到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狂言和反戴高乐派的机遇剧，以致被占领的奥戴翁成为巨人般高举的手臂耸立在巴黎市中心，成为超现实主义隐患的象征，只能显示政府的无能和社会的解体。在那时，的确如此。工会有助于形势的发展，工人们在校场上加紧训练；公务员不能履行职责；部长们消沉；政客们纷纷走出他们的巢穴；法国衰落的职业政治活动者们乘机在这种闹哄哄的社会里纵横交错，高声喊叫：“孟戴斯万岁！密特朗与我们在一起！”在吵吵闹闹的后面，就是搞极权和分裂的老对手共产党人，尽管遭到莫斯科的正式申斥，仍然在调着沙司等待着时机。法共在权衡着，法国这次到底值不值得它竭尽全力？

至于将军发怒的原因，罗马尼亚之行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将军在那里遭到冷酷无情的讽刺。访问的第一天，正值克拉约瓦的工人罢工。原来这是奉党的命令，以此表示对戴高乐的欢迎，想在罗马尼亚和法国都试试戴高乐。5月15日，戴高乐参观大学，一大群狂热的大学生，一色的短发，一致地喊叫、喝彩，如同剧院门口招徕顾客的滑稽表演。学生们挥舞着法国和罗马尼亚国旗，没有红旗。当时，戴高乐把身子倾向罗马尼亚官员说：“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进入大学的特别考试。你们做得对。而我们那儿却没有。我们被一个相当数目的大学生所吞没，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仿效你们。那么，自然地，他们骚动起来。我们必须引进考试选择制度，学习你们的样子。”当然，法国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国家不同，暴动的大学生会使罗马尼亚政府让步吗？如果真的如此的话，恐怕早有人向人群乱开枪了。

戴高乐回国之前，无意中又定下一个滑稽剧，大概是为了向罗马尼亚人民汇报此行，戴高乐向再一次被通知会集的罗马尼亚

大学生发表了将在法国大学生中引起大笑的简短讲话：“现在，在那儿，刮起一阵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大风，驱散着乌云，震撼着城门……的确，在那儿，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能够协调得更好。”法国的捣乱分子们闻此言如遇大赦。那么，只有任凭将军从他的快帆式喷气式飞机一着陆就发怒了。由于全面罢工的缘故，星期六晚22时30分，戴高乐比预定日程提前一天回国。

“见到你们很高兴，先生们。”寒暄之后，戴高乐转向佩雷菲特：“那些学生们还在胡来？”

“还是波涛滚滚，后浪马上会再来。”

“他们已经占领了奥戴翁，上面成了集市。”

然后，将军转向蓬皮杜：

“我们将重新掌握这些，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像我们以前在困难的时候总能解决一样，我将向法国人民发出号召。”

秘密会议接着在爱丽舍宫进行。蓬皮杜总是那么精神饱满、引人注目。他有信心：舆论将转向，罢工将在谈判后结束。必须耐心等待。戴高乐已经在嘟哝了：“到处乱七八糟。”于是，阿兰·佩雷菲特和乔治·蓬皮杜都提出了辞职。没问题，不只这一位，也不只另一位。戴高乐首先赢了，后面我们将会看到。

一夜醒来，戴高乐有了精神，才有星期天上午的发怒。末尾有三个决定：警察撤离巴黎大学周围，重新占领奥戴翁和法国广播电视公司。这是富歇在感情爆发时果断提出的。戴高乐对他嘟哝着：“你能避免开火吗？内政部长先生，您想想吧，下达开火命令的时机必须清楚。”戴高乐确定了当夜反击巴黎大学的行动。格里莫赶来救援富歇，他向将军解释攻击行动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开火，蓬皮杜在旁添枝加叶地支持格里莫的意见。这样，戴高乐才勉强同意放松巴黎大学，但坚持攻击奥戴翁。然后他们散去。

格里莫和他的助手安德烈·弗里德里克共同准备攻击奥戴翁，

另一个警察负责人赶来报告刚从学生中获悉的最新消息：奇袭变得不可能了，学生们已有准备，伤亡将是可能的。格里莫立即通知有关办公室。将近22时，总理办公室主任若贝尔呼叫格里莫，蓬皮杜的一班人与他一样总是反对这个行动。他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说服总统放弃攻击奥戴翁的行动。若贝尔建议巴黎警察局长走捷径，呼叫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富歇对这种作法怒气冲天，但还是呼叫了特里科。特里科叫醒了将军。十几分钟后，特里科呼叫格里莫，说将军确认命令。格里莫只得放下当前的评判，当然不能放在两三天之后。实际上，攻击奥戴翁的命令在此之后并没实行，因为蓬皮杜的路线仍然占上风。“公安委员会”的松维尔也完全倾向取消预定的命令。当格里莫电话告之此事的经过之后，富歇气得透不过气来，因为是他主张攻击奥戴翁的。

关于星期天上午爱丽舍宫会议的结果，新闻部长戈尔斯向记者们做了通告，他以戴高乐的格言方式概述会议的内容，戴高乐的其中一句话后来广为传诵，即“改革可以，乱来不行”。这当然是根据蓬皮杜的意思，中和了戴高乐的意思，“la chienlit”^①一词才如此继续使用。总统想立即采取行动，总理想等等看。前者希望立即恢复现有制度的尊严，以权威和改革相结合，后者希望争取一下资产阶级和保守派的舆论。但都是希望以庄严的法国代替恐慌的法国。鸿沟在戴高乐派和蓬皮杜派之间出现。

戴高乐派内的叛变

埃德加·皮萨尼是个留着过分雕饰的胡子的庞然大物。他从

① 对学生们的行为，戴高乐用了“la chienlit”一词，该法语词除了“乱来”、“混乱”的意思外，还有“在床上大小便”的意思。戴高乐的这种说法传出来后，在学生中曾引起轩然大波。后经蓬皮杜中和才渐平息下来。该词是否有这个意思，恐怕只有戴高乐自己清楚。一般认为有这个意思。——译者

青年时代起就跟着将军，在别的青年人还在操心女人和大学毕业文凭的年龄里，他的觉悟就驱使他投入了抵抗运动。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枯燥的部队里默默无闻地服务。1944年8月，在解放巴黎的最初，他取得了起义的巴黎警察局长的位置，那时勒克莱尔^①的部队离巴黎还很远，抵抗运动的战士们还在任凭德军野兽般暴行的摆布。将军没有忘记他，让他做了第五共和国的农业部长，在政府屈服于农业压力集团之前，皮萨尼在农业部里留下了他的标记。随后在1967年，因为反对社会保险条例，他在工业配置部部长的位置上辞了职。他永远充满热情。后来在曼恩-卢瓦尔省进行再次被选举。

五月事件一开始，他就处在不安之中。年轻人的暴动触动了他的肺腑。他深刻理解像这样全面否定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就意味着现存制度已开始慢慢地让保守势力重新占了优势，也意味着在蓬皮杜的富有者的党控制下的选择正在削弱戴高乐主义的社会意愿。人们注意着他的动向，大部分人仅仅认为他在耍手腕，人们窃窃私语他觊觎阿兰·佩雷菲特的国民教育部部长的位置。还是希拉克，又一次担负微妙的使命，前去见皮萨尼，因为蓬皮杜对此事不安：连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也放弃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提案，而戴高乐多数派里却有人如此狭隘。内部一旦有人叛变就可能威胁到政府，那么，戴高乐就可能在浅滩中更换总理，要不像1962年那样解散政府，只是原位维持政府，没有部长会议，只负责日常事务，然而那是什么样的事务啊！

21日(星期二)和22日(星期三)举行了议会辩论。实际上，在前一个星期就应该聚集部队，稳定秩序，使被引入歧途的

^① 勒克莱尔 (Leclerc, Philippe de Haute-cloque)，法国将军。法国和盟军把解放巴黎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的部队。——译者

人知返^①。尤其在戴高乐派内部，哪怕在迷途上有较小的叛变也可能影响全部。于是政府给皮萨尼安排了职位，但他犹豫不决。“我只是在自省，但不会对政府投不信任票”，他对放了心的希拉克说。爱丽舍宫相信：皮萨尼应该完全是将军的人。然而当另一个众议员招呼他表态时，他却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不祥之兆。

另一位戴高乐分子也正处于苦恼中，他就是勒内·加比唐，曾是一个火热的抵抗运动战士，也曾是戴高乐主义的口似悬河的代言人，现在成了蓬皮杜的异端分子和私敌。这位罗德希尔德银行的前代理人曾骗得一笔遗产并准备在16区廉价出售。他在蓬皮杜派看来是个不讲信义的人，一个该死的家伙，大家暂时宽容他是因为他是将军选中的人。这位前司法部长经法律委托在总统官邸避乱。加比唐丑闻已有三周了。这个假戴高乐派的内阁分子实际上已完蛋，但戴高乐派畏首畏尾，因循守旧，给他庇护，这将给将军带来灾难。5月17日，加比唐和他的朋友，另一位戴高乐主义的社交典范路易·瓦隆一块吃饭，他对瓦隆说：

“我打算对政府投不信任票。”

“将军对此是如何想的？”

“我是为将军服务的。假若政府被推翻，将更换不适合的部长，将从总理开始。将军会感谢我的。”

18日，加比唐接受电台采访，他说：“我认为政府是这次动乱的根源，这在法国是众所周知的……我将对政府投不信任票。”这个分裂分子还请求将军接见他，特里科答复他，戴高乐不能马上接见他，并对他说：“我们认为政府危机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加比唐犹豫起来。

20日（星期一），在危机办公室的会议中，大家议论纷纷：

^①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此书对戴高乐派的背叛者和准备在议会上投不信任票的活动有形象的记述。

“真是无望。”有人递给蓬皮杜一张小条子：“独立共和党主张自由投票。”为了促使自己成功，做暗示直到如此程度：吉斯卡尔和他的4个朋友与加比唐，皮萨尼搞到一起，政府成了少数派。吉斯卡尔·德斯坦自离开已由他的冷静谨慎的作风所支配的经济部以来，就在进行政治活动。在政治游戏中，他同样是出类拔萃的。自1967年那次总统竞选以来，他和他的朋友都遵循着“可以，但是”的辩证法按情况行事，这已成为他们达到目的公式，并以此表示对将军的有条件地支持。独立共和党主席吉斯卡尔·德斯坦历来不那么完全地监视他的队伍，惟有使几个亲信如波尼亚托斯基和奥尔纳诺等盲目地跟着自己，他们也确信他能率领他们走向巅峰。蓬皮杜有些朋友是这个半乡下气半现代主义的中间派小组织中心的成员，如工业配置部部长雷蒙·马塞兰，是政府内部强硬路线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自危机开始以来就无所顾忌，还有保守的亿万富翁安德烈·贝当古也在独立共和党内。但自由投票将分裂蓬皮杜派：每张票算数，明显地，不信任票完全有可能超出。

都把这天的议会讨论不放在眼中。下午的讨论一开始，蓬皮杜就来到独立共和党小组^①，他说：“这是一个反对国家的阴谋，问题在于要把事做在当面。”意思是指有人有投敌的企图，但论据没有说出来。带有浓厚南方口音的中间派重要人物罗朗·博斯卡里-蒙塞万见状前来援救，他带有偏见地为独立共和党辩护，波尼亚托斯基加入辩护：“这不过是一场糟糕的小号独奏而已。”蓬皮杜此举打消了一些人的犹豫。独立共和党仍然占据多数派的阵地，但吉斯卡尔分子们接着有了取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的打算。然而，戴高乐派中悲怆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加比唐猛烈反对

^①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此书对戴高乐派的背叛者和准备在议会上投不信任票的活动有形象的记述。

蓬皮杜，他说他之所以要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是“因为对将军的崇拜”。他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政府垮台岂不是对戴高乐派的打击！他不明白在检验政治道德的同时会对国家带来震撼。他说，“必须知道向对方的弱点进攻，”尽管事实上对方在这方面是无懈可击的！加比唐还是得出结论：“政府被盲目崇拜的同谋关系搞坏了……我永不宽恕造成在大街上嘲骂将军的部长们。”这一次是社会共和党的领袖沙邦上前拯救蓬皮杜：“我们刚刚生活在人类的历史中不可忽视的几分钟里，我们刚刚听到热爱的信任的呼唤以及为了微不足道的事而永不和解的人类苦难的呼唤。我们都是戴高乐将军的拥护者，我们互相之间不能分裂。推翻政府，只会有助于孤立戴高乐……国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应该奋起捍卫政府。”^①沙邦的演说受到欢迎。加比唐随机应变：“这话讲得很好，我将不投不信任票。我将在投票前辞职。”皮萨尼接着发言，他请求参加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安排的会议。大家都考虑将支持政府^②。

议会上的攻击

蓬皮杜稍稍放下一点心之后，就又要去忍受反对党的开火。他缺乏睡眠，感到疲惫，声音嘶哑，动作也有些神经质。这真来得不是时候。由于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全体人员的压力，议会讨论第一次在电视台转播，因此在这两天里，议会讨论成为头条新闻。这将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在危机中的做法。

第一天议会讨论在传统的初步小争论中度过。现代民主进步党的雅克·杜阿梅尔是欧洲式的温和，法共的瓦尔德克·罗歇是无产阶级的爽直，罗贝尔·布热德以保卫第五共和国的名义抱怨“大街上的暴力”和“罢工损害劳动自由”。当社会共和党的雅克·沙邦

① ② 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宣读勒内·加比唐的辞职信时,一阵激动掠过会场。罗朗·勒鲁瓦接着对多数派的发言者们含沙射影地攻击法共表示不满。

其实,更值得关心的事是在幕后发生的。议会的走廊是享有议会特权的人无拘无束地闲聊的地方,保卫第五共和国的专栏编辑雷蒙·图尔农在这里到处都有耳目,以便意外地猎取更加放肆的话语。主角们的真实意图往往在远离谨慎讲坛的地方更容易表达出来。这会儿许多人围着孟戴斯,他开玩笑地说:“你们想想,戴高乐如何称呼我,这将是他的菊花^①时代要做的事。”戴高乐分子们总是在这个有四个圆柱的走廊里传播他们自身的恐惧感:“共产党是专门部署造反的机构,我们有证据。他们在工厂里建立行动委员会,几乎到处都是,不知骗了多少人。”这里突然发生的事是最有趣的。利用这里意外猎取的信息,法国共产党的领导至少可以避免不利于其他派别(多数派)的一切冒险行动,也可以利用这里向戴高乐派和蓬皮杜派更清晰地捎些信。这不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是借助于议会上的开诚布公,必要地告之对手,大可不必去追逐公共展览式的冒险。在议会走廊里休息是名不符实的,每当散会时,大家都希望在这里留一下看看集中了所有顽强对手的斗争场面。目前,孟戴斯和密特朗都处在行动假设之中,或者说处在更糟的难以想象的局势中;而法共面对左倾主义的学生暴动,宁愿与戴高乐在“大西洋主义”的左翼进行正常的竞争。此时,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正与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的主席亨利·雷伊单独在一起,他说:“我告诉您,请您注意,政府在攻击法国共产党。你们在玩火。颠覆共和国的威胁不是来自我们这一方。这是诽谤。我们不可能应付托派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行动委员会。”^② 明哲的瓦尔德克更坚定围着戴高乐的连襟、加来海峡省的议员雅克·旺德鲁

① 菊花在法国一般做祭祀之用,这里喻戴高乐的晚年。——译者

② 引自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说：“我请您劝劝你们的朋友们，不要攻击我们。这是可憎的。我们是你们最好的保卫者。您看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必须停止对我们的攻击。”瓦尔德克兜了一圈继续告诫他的同盟者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你们要使科恩 - 本迪与左翼的一伙不团结，这一切又不需为那些家伙负什么责任。当然，我会让他们搞不到一块的，我嘛，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恶棍。”^①

法共议员皮埃尔·朱坎同样上前与蓬皮杜的教育顾问迈克尔·布吕吉埃交谈：“你们不了解你们的人所做的！应该结束一个小头上校的监视行为，他是贴在我们背上的一个小球。先保护你们自己吧，上帝啊！”^②

第二天的议会开会，头面人物们鱼贯登上主席坛。这时，政府发言人乔治·戈尔斯准备向反对派解释什么，蓬皮杜却要从头到尾地检查一下政府发言人的发言稿，他竟在百万电视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夺下戈尔斯的话筒。政府提供的这个奇怪场面，是事件中惊人一幕。

蓬皮杜总是在战斗。这会儿他没有辩论和修辞，而是宣布一项重要新闻：他准备与工会会晤，“重要的是政府要收集所有工会组织所提出的全部具体要求。它们的所有要求都将被审查和讨论，如果它们希望得到某些要求的满意答复。但如果它们希望另外的事，例如罢工是政治性的，这就完全不同了，这不属于工会的权力，哪怕代以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名义。”

接着发言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他的发言像往常一样尖刻而引人注目：“总理先生，您是政府的德苏比斯先生。”因为德苏比斯是个失去军队的将军，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看到司法部长在寻找公正，教育部长在寻找大学，而总理则在寻找他

^① 引自让 - 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② 塞弗丽娜·勒格丽与迈克尔·布吕吉埃的谈话。

的国家，因此才如此称呼蓬皮杜，他很不客气地说：“总理先生，我对您说，您必须离开了……根据目前的情况，你们制造的你们的合法性，人民承认吗？该不该走，您看着办吧！”

高个儿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继密特朗发言，他为了有一个冷静的明了的结尾，便模仿萧伯纳^①在《皮格马利翁》中的一个文学式的结束语：花匠总是对他的师傅不满，为什么呢？苛求他的恩师，“总理先生，这就是我苛求您的原因——于是今天，玛丽安娜^②可能苛求政府——这是正常的，没有关系。”

埃德加·皮萨尼此时以戴高乐派的身份登上讲坛。这是剧情突变的一幕。这位前农业部长声音失了真，演讲结尾，一滴眼泪滴在他的胡须上：“你们已经使局势恶化……你们已经失职……我将投不信任票。”皮萨尼同时宣布辞职。蓬皮杜在他的席位上一动未动地说：“戴高乐派不可能反对戴高乐。”总理从这时起放了心，皮萨尼将是惟一的反叛者，其他所有人都遵守了纪律。18时15分，不信任票获233票，未达到所要求的244票。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被否决。

两个人在议会上进行接力赛，刚刚提供了一场精彩的议会辩论。另两位完全对抗的人则好像地球直径两端的对蹠点^③，一个是小人物，在危机中狡猾灵活，另一个是伟大人物，却笨手笨脚。那就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和夏尔·戴高乐。

① 萧伯纳（Bernard Shaw, 1856 - 1950），爱尔兰作家，1876年起移居英国，一生著作丰富，在全世界很有名。法国波旁宫皮格马利翁角挂有萧的画像。——译者

② 玛丽安娜（Marianne），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即法国革命女神。法国各级政府的门楣上一般有她的雕像。——译者

③ 对蹠点指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例如上海的对蹠点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比喻两人的身份相差太远。——译者

第十六章 罢工中的法国(5月17日—20日)

法国在“革命”的假期中。常规不复存在，时刻表取消，一切约束无效了。由于第三周危机的拉开，全国都在抄近路，到处是罢工，一切规则被粉碎，一切权力被废除；言论自由，打破记录；不再有盖子、界限、领导和时间的概念。这就是法国的五月……

这过去的十几天将永远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对整个一代人来说，这是全国性好看的瞬间，尤其是一切日常烦恼的突然消逝将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人们只是恐惧、谈虎色变、醉心于事件，已经相信在这令人可怕的内战里或令人喜悦的革命里不知会被谁夺得政权。但人们已经有了实际经验，不管怎样，不能忘记自己的利益。

够 受

罢工使法国够受。不再有火车、公共汽车、地铁。大街上到处是油腻的废纸和垃圾。所有的城市都因为不可思议的交通阻塞而陷入瘫痪，人简直呆不下去。四分之三的加油站干涸，没有供油的希望。这使法国人发明了一个新花样：用导管在邻车的油箱里偷窃珍贵的液体。汽油在黑市市场卖到平时的一倍半的价。银行限制存户最多只能提取 1000 法郎。法国银行联合会声称没有货币匮乏的危险。这是假的，因为法国银行、储蓄银行、邮政银行都罢工了。人们囤积基本食物，如面条、大米、白糖等，所有的超级市场被顾客们占领。有 1000 万罢工者，非法占领单位和随便查封货物成了很平常的事。在里昂，贝利耶工厂的工人突发奇想玩弄文字游戏，把自己的厂名 BERLIET 改变字母位置变成“LIBERTÉ”（自由）。从这以后，所有的企业都呼唤自由了。

狂热很快从工人阶级队伍里扩散出来。在法国作私人访问的侯赛因国王让他的秘书向普拉扎·阿泰纳的罢工者表示声援。笔战也开始了，作家们占领了位于玛莎饭店的作家协会的驻地。青年医生们学习年轻的创造者们也占领了他们的同业协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断，戈达尔^①，特吕福和某些人一起企图在电影界掀起革命。雪铁龙汽车制造厂的罢工者们突然占领了他们厂在巴黎的驻地，一幅白布从此刻起装饰着驻地大楼的三角楣，上面的标语在对他们的厂长讲话：“贝尔科在流水线^②上”。在演员工会里，著名演员弗朗索瓦·佩里埃主持全体会议的议程，在演员代表卡特琳·德纳夫监视下投票表决罢工。此时正是著名演员雅克·达克米纳担任演员工会主席和著名电影演员阿兰·德隆积极参加该工会的活动期间，仅有工人力量总工会拒绝罢工命令。在罢工期间，法国总工会真是个好媳妇，仍然保障首都的食品供应。从这以后，吃饱了的巴黎市民总是感激地呼唤着总工会供应委员会的书记马里诺·利维的名字。

外省的五月

没有人逃过五月。法国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在法国的革命历史中，巴黎总是成为革命的主要场地，虽然其他地方同样在进行革命。然而在1968年5月，外省的动荡一般与首都相媲美。这在法国是很少有的。

地方和农村同样令人惊奇，那里是真实的法国。巴黎在燃烧，它们注视着，目瞪口呆，上中学的孩子们也被震撼了。法国不知道它的桎梏是多么可怕，到处可看到工人们互相拥抱欢呼，然后相约停止生产；市民们慌乱地囤积食物；商人们和小老板们

① 法国左派电影摄影师。——译者

② 法语“流水线”一词（La Chaine）的本意有“枷锁”的意思。——译者

焦急不安；学校工薪人员的旷工蔓延，虽然示威活动在他们那里还处于开端，一些红旗由豆蔻年华的中学生们从窗户里伸出来，细心地保护着，在一个中学里，3个顽童在一个天窗里护卫着红旗，显得那么认真负责；汽油在黑市交易；车站废弃；通讯中断；非常新闻在一个国家里只能靠少数相通的电话传递，因此谣言漫天飞。

法国人在这一个月里被周围的疯狂感染得发狂。每当巴黎和大城市一响起示威队伍的步伐，就成了大部分市民的风景点，被感动的、消遣的、好奇的、看情况的都有。的确是一大风景。政府被鞭挞，大部分人开心，除了有切身利益需要政府保护的人，大罢工就像这个春天赐予人们的一个大假期。

大部分工薪者默认罢工或工会委员会的活动分子们的领导，他们乐于在工厂或办公室里捕捉新闻，或呆在家里，或去散步、钓鱼、泡酒吧间。海滨城市的法国人多半去沙滩休闲，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周围的人则去这两座山旅游。人们玩纸牌、看书、等待，尤其是漫无边际地闲聊。

然而也有许多工薪者仍然准时上岗，如果交通允许，也去观光几分钟。这些人惟一的目的是要向老板显示他们并不关心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红旗，他们留在老板身边，希望给老板留下良好的印象。

中学生的革命

中学是这场大动荡的重传染区，大动荡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传染更甚于在工人和职员中。中学在1968年以前和以后简直是两个世界。几乎所有的公立中学和一般的私立中学的学生都是在跟巴黎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穿靴子。教育的人性决定了必须废除旧的教育方法。大部分教师来自以前的时代，但同样具有爵士音乐、摇摆舞的素养，50年代的青少年一代对这些方面都很有兴

趣，法国中学生们早就在酝酿着革命。

在五月以前，中学里还保留着拿破仑式军营里的某些东西，虽然冲淡了许多，中学仍然显得过时，如排队走，强制性地留短发，课堂上不准抽烟，时不时地统一服装；对高高的古老讲台，有的热忱，有的冷漠，默默地听着免考的课程。另一方面，中学生们也听约翰尼和斯通斯的音乐磁带以及“向同伴敬礼”的节目，同样没完没了地谈论异性——深奥莫测的领域，这一般是最被禁止的，除了星期四能在有可口可乐的家庭舞会上偷会儿闲。

大学生们嘲弄大学当局，与警察对抗，使政府未加报复地让步，这对中学生来说是爆炸性的。中学生们下课后高喊：“老师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到指导神甫那里聚会，寻找与附近中学、大学的联系，并选举年长的和能对当代问题表态或采取行动的高年级学生组成中学行动委员会；他们特别能使用时代的词汇与还想恢复训斥的转而极为惊讶的老师们讨论、“对话”，使他们的老师不得不免除那么多的关于共和国知识的说教。他们勇敢地搬走旧讲坛，对有保留态度的老师喝倒彩，强加他们的议事日程。多数中学生跟着时髦，在大革命和国民基本准则之间动摇不定。

中学生的主要口号不是革命的字眼，尽管这是巴黎人的错觉，但它是一个改革。“自觉遵守纪律”是他们的大标语，伴随着幻想的队伍，隐匿着狡猾的观念，以学生的责任性代替了家长式的腔调。这没有什么关系，老师们会讨论解释这个大标语的，因为他们从来没这样做。对所有的教师团体来说，这一周是精神上受到强烈震荡的一周。1968年5月改变了一切，精神状态、行为举止、计划安排、方式方法等等。中学被这些改变弄得混乱不堪，成了教学的乌托邦；中学校长们像他们的教育部长一样悄悄地辞职是通常的事。然而也改变了中学生的某些意识，并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开始现代化。

卢瓦 - 谢尔省的红旗

中学里这种平静的革命，一般发生在外省，那里生活节奏缓慢，总是处于巴黎的冲击波之中。在乔治·沙法尔^①的著作《五月风暴》中详尽叙述了1968年5月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同时揭示了拉丁区和旺多姆的纷乱。卢瓦 - 谢尔省是个平静的老城，那里人们的生活和精神节奏都像卢瓦河的流水一样缓慢，卢瓦河水从博斯起就缓慢得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南下到宁静的山谷城堡去。

卢瓦 - 谢尔省是个以小老板和农民十分勤劳而著名的地区，这个农业区慢慢被布卢瓦市和旺多姆市的某些集中工业所改变。在这个敏感地区里，农民和工薪者们也是因为工业化才产生了他们的要求。旺多姆接纳了一个工业区即罗泰城，还接纳了社会党学校的一个谦虚的校长，他后来甚至慢慢成了市长，多亏他的职业意识和到处公认的活跃才保全了他自己。

当5月1日巴黎有20万人游行示威时，在布卢瓦仅有一支50人的游行队伍进行专区的工人动员。而在旺多姆的大街上连游行者的影子也没有，因为旺多姆的工人都出身于本地，还不具备工人阶级的传统。

必须等到5月11日才能在旺多姆看到动荡。像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中学生首先进入运动，他们在贴满流行广告的房间里，通过永远忠实的小半导体收听他们的最佳节目——巴黎巷战之夜。星期六上午，命令可以说是通过科恩 - 本迪发出的，旺多姆龙沙中学很自然地进入罢课，走上大街，高呼“解放巴黎大学”。专区区长洛吉耶不得不接见学生代表团，这在旺多姆是空前的。

13日，在与巴黎的示威者团结一致感召下，旺多姆专区的工人罢工，专区区长眼睁睁看着一支由工会会员、中学生、教

^① 法国当代历史作家，见本书后“资料提要”。——译者

师组成的队伍朝他走来，递交了改变中央权力的请愿书。这一次，布罗瓦同样动荡起来，惟有专区的第三大城市罗莫斯坦仍然落在运动的后面，虽然那里已例行了投票表决向左走。

5月20日，是旺多姆的工厂被占领的日子。尽管早在三周前就颁发了三四十枚劳动奖章，这里的主要企业之一耶格工厂还是打破了旺多姆工业区中被占领时间的最高纪录。教训是清楚的，证明了那个时代的混乱。旺多姆像全国一样，被“激增的一代”的青年近卫军带入了工业的工薪者的法国，在三周里掌握权力反对传统的精英阶层。旺多姆以它彻底的清醒，使它的暴动成为30年代反对落后的等级运动的直系，比经过了“光荣的30年代”运动洗礼的让·富拉蒂耶所领导的运动更引人注目。

是旺多姆乳品公司(SLV)的工人们首先发出的信号。下午，该公司的罢工者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工会自由”，并占领了农业合作社的大厅。大厅里人头攒动，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负责人向他们演说，接着与会者选举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他们公司里的新代表，有5000名参加者来到他们公司助威，一份请愿书当即被通过，其中要求更换同业人员中与公司领导关系太密切的代表，给予组织工会的自由（在此之前，旺多姆乳品公司还没有独立的工会），减少劳动时间，每月发给工人服务年数的保险费等。第二天，继耶格工厂罢工之后，旺多姆地区德迪耶特里克工业区的大多数企业进入罢工状态。上午，一支700人的队伍跟在红旗和耶格工厂的铜管乐队后面在工业区游行；下午，有2000人拥向旺多姆街头，使旺多姆人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突然被送回到了1936年的纷乱之中。“从没见过像这样”，千百万人重复着这个日常用语，其中有幻想者有显要者有商人。布卢瓦和罗莫斯坦却是平静的，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和统一社会党活动分子的存在，大概能解释旺多姆动乱的原因。

23日，旺多姆的商人们降下了金属帘门，商业联合会解释

说：“表示团结一致。”以防止店铺与红色运动对抗。竟说出如此不友好的话，实际上并没任何事发生。而且，专区区长洛吉耶刚从东部的工业区布里埃回到旺多姆。尤其当他去了洛林之后，旺多姆的动荡现在对他来说不过是小事情。

由于自命不凡的工会中心的疏忽，罢工仓促地转向德迪耶特里克工业区，虽然耶格工厂的罢工还在持续，但旺多姆乳品公司的罢工却因为从属于农业合作社的农民的压力而中断，迫使工薪者妥协。因为邻近旺多姆的所有乡村里，每年都在进行对1914—1918年的牺牲者^①的点名纪念活动，村民们已习惯于聚集在三色旗下进行这些传统的活动，红旗的突然侵入当然使他们反感。旺多姆的教师罢工，正好适时地让城里孩子们承担抗议者的家务，却使附近的农民不满，他们抗议“城里的懒人”。专区的小型企业、小型手工业者、小型产业者很难被罢工运动所触动，它们的农村观念根深蒂固。乡村的小学教师们召集学生家长解释大学生运动的意义，然而却启示不通，即使在某些投票倾向于左派的最易接受革命的乡村里也是如此。在旺多姆市同样如此，好像火焰哥特式教堂——特立尼达教堂堂区善良的教民们，即使每周重临教境，仍然不理解鼓足勇气的神甫所宣读的难懂的启示一样，哪怕是巴西累西腓的“红衣主教”来解读，也启示不了他们。如果神甫也从科恩—本迪身旁经过一下，会怎么样？革命在诱惑温和主义的旺多姆。必须停止这种诱惑，以乡村式的法国对抗工薪的法国，明显地，蓬皮杜说的没有错。

30日（星期四），当巴黎已在驱魔的时候，旺多姆市政府仍然被五月的精灵所搅乱。在市议员的会议上，一个法共的活动分子要求表决资助罢工者的家庭生活。议会上的显要人物们对这个干扰十分不满，长时间地谴责社会党的市长助理容许这件事，带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保卫法国的牺牲者。——译者

着对孟戴斯和密特朗的非法指责，如此伤害一个如此得人心的勇敢的社会党市政官员，而这位市长助理当时并不在场。卢瓦-谢尔省的显要人物们动员起来反对捣乱分子们，他们在30日的议会上演说咄咄逼人。在六月整整一个月里，旺多姆的显要人物们仍然在激烈地胡言乱语，大肆攻击学生与工人，这与他们对五月的恐惧是相称的。热拉尔·伊冯在旺多姆是个令人放心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却被农民协会会员、政治上的中间派保尔·科尔米耶一下子打败，被控有颠覆政府的同谋罪。秩序已经稳定，罪魁祸首们却付出了代价，但中学生们、工会会员们、工人们、教师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旺多姆与全法国一样。

格里莫的苦恼

格里莫对他的警力薄弱一直不安^①。说到底，他的警力不足，而且过度疲惫。偌大一个巴黎警察局总共才2000名警察，巴黎的大示威已使他调动了全部的警察。在首都和外省同时发生骚乱的情况下，他的人员显得太捉襟见肘了。尽管他的警察是最优秀的最有经验的也是最冷静的，对农民示威的镇压就是学习了他们的冷静。共和国保安队属于第二治安力量，显得粗暴一些，但很守纪律。巴黎的警察中，传统性地雇用了一些负责道路治安的人员，这些人在骚乱的情况下一钱不值，他们在漂浮中执行任务，胆小怕事，一赶上非理性的暴力调动使用一下，当示威群众被驱散之后，他们也随着不见了。

警察工会不断地使巴黎警察局长不安。当总理在电视里对警察有明显的责难之后，基层警察便一下处于两头受气的窘境之中。不是吗？前一天，学生们还在巴黎警察的橡皮棍的追逐之下，今天，总理就对他们让步，蓬皮杜在电视里以国家的名义证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明学生无罪。巴黎警察越是不停地执行任务，越是得到低的评价，这一次，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任务，却成了所有人的谴责目标，包括周围亲密的人。巴黎的低租金住宅区是共和国保安队队员的妻子们通常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家庭总是处在被排斥的困境下，他们的潘朵拉^①遭到的殴打比他们所接受的安置多得多，群众必须使他们有一点认识。由于这些习以为常的麻烦事，警察工会把这些怨气转为物质要求。迦太基^②曾差点养活不了它的国外雇佣兵，第五共和国也不乐意改善它的御用军的日常生活。当格里莫向将军抱怨时，将军曾板着脸说：“给他们烧酒吧。”而蓬皮杜总是不理宪兵们的要求的。由于不懈地要求，格里莫终于获得了所希望的好处，警察的工资、退休、工作条件都有了较好的改善。当时，全社会都在请愿，为什么要忽视保卫共和国的根基的要求呢？为了巴黎的安定，的确值得按照一定的指数向他们表示一下。

巴黎警察局长同样对享有盛名的国家公仆们的松懈感到吃惊^③，这与一些部长不忠实于他们的职守有很大关系，某些部长明显地被神经质的消沉所苦，一位已濒临“不知害臊的边缘”的部长曾对他吐露真情：“万一发生流血，将多么可怕。”一些高级警官成天守在电话机旁，以期获得警察因为罢工群众的压力撤出所占据的机构的消息。鉴于这种各行其是的状态，格里莫决定在警察局实行令人生畏的淘汰制度，他要求在各级警察局里安排专

① 潘朵拉，希腊神话中人类第一个女人。这里比喻保安队员的妻子们。

——译者

② 迦太基，北非突尼斯的历史名城。公元前264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同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迦太基战败。迦太基的军事将才汉尼拔长期在国外作战，非常艰苦，不断消耗，最后战败。——译者

③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职官员审核开除不称职的人员，但此类苛求的做法多遭到粗暴的奚落。格里莫高度操心警察局内部的整顿，以至他没有注意到某些部已开始向野营中心转移，这是高度警惕并保护战略要塞的命令及其最起码的准备在开始运行，这是借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所制定的紧急计划而采取的行动。真够人累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计划带有古希腊神话的色彩，在现代完全是苍白无力的。这些计划并没把全面罢工所造成的状况考虑在内。格里莫虽然有些晕头转向，但他还是看出这些计划是建立在电力和通讯正常运转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两个辅助因素，一切计划将是一纸空文。明显地，法国总工会掌握了这两个辅助因素的权力。

萨特到巴黎大学，科恩 - 本迪自知之明

这个星期一晚上，巴黎大学像节日一样热闹。让 - 保尔·萨特光临巴黎大学中心梯形教室，教室里人满为患。人们等待的哲学家穿着有些窄小的灰色西服，像古罗马哲学家莱克格一样有幽默感：

“据说你们正在充分地上一些特别的课程。这正是我的想法。那么，我等着你们的问题。”^①

讨论开始，学生们充满激情，极有兴趣，一只手举起来：

“我提的是另外的问题，您曾说过‘魔鬼’，您指的是什么？”

“谈这个问题会耽搁我们的很多时间。”

“根据您的观点，建立工人学院可能吗？”

“学校应该向全体劳动者开放。必须使青年工人和青年学徒都能进入这些工人学院，大学城应该变成青年城。”

“无产阶级的导师必要吗？”

^①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详细叙述了萨特的演讲。

“我不能确切地答复这个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不首先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失去时代的自由权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也关系到资产阶级的子弟以革命精神与工人相结合的问题。”

萨特时而理智时而激昂，他赢得了听众，他们从没听过这位抽烟斗的文学大师的嘶哑的声音，现在竟如此抚慰着这些有教养的听众——青少年一代，他们从他的作品《恶心》里和德国评论家格茨·冯则利欣根的评介中就崇拜他。奇怪的是，当天，萨特又以《观察家新闻》周刊记者的身份访问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这个周刊是知识分子的义务论坛，旨在左派主张和官方左派之间谋求团结^①。“疯人派”的领袖这次表现得相当务实和清醒，果断地远离这位老哲学家的演讲内容，他说：“对我来说，不涉及做形而上学的空想和寻求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更喜欢靠近社会的永恒改变，以革命行动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挑战。我认为一下子根本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将是不可能的，相反会集中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浩大的工人运动和猛烈的学生运动。现在，这些条件还没有汇集起来。这中间可能有人希望政府垮台，但没有必要希望资本主义爆炸。这并不是说一点也不触动资本主义，相反地，必须开始全面的抗议斗争。”这位五月第一周的煽风点火者，由此向狂热的气氛泼了一桶冷水。革命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只是更有力地发动前述的革命，自五月运动的发起者们探讨运动本身以来，他们的分析一直没得到充分的提高。革命的意义一般由最具象征性的最权威的声音表达出来，学生抗议运动的领袖们都知道这一点，尽管他们在以无尽的浮华的革命词藻进行发

^① 《观察家新闻》周刊在危机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好几次采访五月的领袖们以及所在地区的左派，成为运动意识形态争论的共鸣箱。让·达尼埃尔利用该周刊交汇左派知识分子、政界和学生的战略位置，经常组织这个或那个有影响人士的报告会。

泄。但形势不是革命的，学生运动将不夺权，即使有全面罢工的帮助。他们不夺权，不用暴力，不凭借技术能力，也没有知识分子的野心，他们甚至不考虑这个问题。五月运动只是另外一回事的造反，即反对父辈的暴动，而不是杀害父辈。五月运动将不是政变，更不是攻占冬宫，甚至不打算在市政厅的阳台上举行晚会。学生们和工人们希望的是另外的事情，他们不希望死亡，只希望有另外一种生活。内战的构想不是五月运动的答案。革命者们梦想革命，但又不希望进行真正的革命。

居留权被剥夺

当人们正在惊奇地评论着《观察家新闻》周刊的访谈录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已经坐在由《巴黎竞赛报》租用的一辆老式小汽车里穿过福巴克附近的法国边境。“3月22日运动”的领袖已经疲劳了，数周的会议、示威、暴动迫使他处于魔鬼的状态^①。全面罢工扩大了危机的领域，登上舞台的工人阶级使学生运动失去了原动力的作用，巴黎大学的占领为不满现状者们定了影。从此闻名全法国的红发小伙子的演讲天才和战术才能再也找不到施展的机会了。在此之前，科恩-本迪去了圣纳泽尔给工人们演讲，有1000多工人到场，是一次成功的演讲，但他不得不取消了访问被占领工厂之行，失去了一次接触工会的机会。工人和学生的联合依然是完全停留在词藻上，这使农泰尔的学生领袖处于技术性的失业状态。这时，他的德国同志们邀请这位巴黎暴动的象征给他们带去美好的革命报告。这位学生领袖愉快地接受邀请，离开了法国风暴的中心。

但他身无分文，他于是向《巴黎竞赛报》的摄影师提出陪伴

^① 与作者的谈话。

他拍照，以负担他此次旅行为条件^①。交易做成，在记者的镜头下，“红色达尼”重返他的第一祖国。科恩 - 本迪才离开那辆《巴黎竞赛报》租用的老爷车。以后，这位青年领袖在凯泽的火车厢里就用革命与他的祖国连在了一起。

想不到这次微不足道的旅行却成了五月运动的另一动力。法国政府自以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认为应该适时剥夺这个红发家伙在法国的居留权。这将重新燃起学生暴动的烈火，而且给这个捣乱分子再一次领头嘲弄法国制度提供了机会。

^① 在不满现状者里，这是通常的做法，一贫如洗，但能很正常地利用“资产阶级新闻”。

第十七章 负重的战略家们(5月21—23日)

五月运动突然来临，没有预兆，在一切预想和计划之外。学生们是在领袖们缺席的情况下发生第一次骚乱的，工人们是在没有总工会命令的情况下开始罢工的。洪水自由泛滥，当然没有人知道如何控制它。无论是夏尔·戴高乐，乔治·蓬皮杜，或是法国共产党，这些社会工程师们都不是刚来的人，然而都没料到，都无法控制局势。所以，这些角色在运动开端都受了挫，都被搁浅，以致法国在五天之后才弄清面临的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把整个统治阶层都搞得晕头转向。

人们都知道乔治·蓬皮杜的策略：先放一放等一等，然后寻找社会谈判，以他的热忱和诚意尽力实现这个简易的方案。星期一晚上，法国总工会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巴尔若内的电话响了，这是他的合作者法国全国雇主委员会（CNPf）的主席保尔·于弗兰的电话。这个老板们的老板告诉他说，他准备与有诚意的人谈判。谨慎从事是巴尔若内的风格，关于法国总工会的策略问题，一直使他处于极度困惑的折磨之中，第二天他把于弗兰准备谈判的消息告知塞吉，塞吉持谨慎态度。这位法国总工会主席认为罢工还没到最高潮，如果法国全国雇主委员会想作让步，就等于公开了妥协计划。工人力量总工会主席贝热龙也建议暂持中间人态度^①。

由于有蓬皮杜做靠山，在谈判一事中，蓬皮杜的一班人很快地投入第一轮接触。他们认为，如果法国总工会上钩，那么一切都将停止，危机也将随着结束。必须摸摸底，弄清总工会要求的底牌，尤其是要抓住谈判时机。公开是无益的，必须守口如瓶，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否则后果将是糟糕的。蓬皮杜直接与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德尚联系，定于27日或28日适当的时机会晤。但在此之前，蓬皮杜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关于谈判的信息。

希 拉 克

勤奋而忠诚的国务秘书希拉克，早已具有研究的头脑。这个伟大的雅克，早在做总理参议时就引人注目，现在又复得他在马蒂尼翁府的办公室。他几乎每天与他的顶头上司若贝尔、巴拉迪尔、朱耶一起吃饭。总理赋予他监视劳工部长让纳内的任务，这位全面负责劳工事务的角色是将军直接安插在总理府的人，希拉克总在考虑执行他这个伟大的任务，却发现让纳内是个坚定的聪明的进步的改革者。这位前劳工部长现在说：“希拉克不能作大事，他老是特别关照特雷兹。”^① 因为希拉克有特雷兹地方的股权。希拉克与一些工会建立了联系，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安排了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一个成员洛加和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一个活动分子德尔皮。他经常与法国总工会的一、二把手塞吉和克拉苏茨基通电话，因为目前正是利用这些关系的时候。无论白天黑夜，他不懈地纠缠他的谈判对象们，什么条件能谈判？法国总工会的要求是什么？法国共产党希望到哪一步才能妥协？如此等等，希拉克终于使法国总工会同意与他秘密会晤。

那天，这位年青的国务秘书自己开车直接到安特卫普公园，然后步行到蒙马特尔高地。他们约会在公园的一个长椅上见面。不巧的是一些工程弄乱了小公园，人们再不能进去，而且没有了长椅。希拉克正在焦急，有人拍他的肩背，正是他的谈判对象。分手时，这位协作者对这位政府秘密大使说：“假若这是个陷阱，假若绑架您？那我们就有好看的。”希拉克耸耸肩，这位阿尔及

^① 与作者的谈话。

利亚战争时期的中尉是不怕危险的。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藏了一支老式左轮手枪在口袋里^①。

对话达成，但人们不知道对话的内容，然而这两个对话者的逻辑头脑是很清晰的：法国总工会正在启动中，法国共产党在做它的选择，形势不是革命的，革命不可能存在。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不久在他的著作《法国总工会的五月》中开诚布公地解释^②：“军队和警察是牢固的，共产党人不能赋予它们对抗的责任。西欧在西方，它将永远留在那里。”20日（星期一），法国共产党发表了一个公报，讲得再清楚不过了：罢工不带一点起义的性质。塞吉一直在强调这种意义：这只是一场广泛的请愿冲突，决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进程。他们准备谈判。人们这下获得的将只是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多年来徒劳请愿的结果，然后一切恢复原样。对希拉克，人们对他有許多说法。

然而人们不再那么轻信：如果政治变动是可能的，法国共产党真的将不会推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传言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一种传言是戴高乐派在事件后企图使人相信法国共产党是危机的操纵者，决定夺取国家的一切大权；另一种传言是极左派在五月以后将不懈地重新开始活动，共产党人比激进社会党人更严守法规，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将是粉碎运动和廉价出卖革命。因为共产党人同样在谋略。5月20日（星期一），弗朗索瓦·密特朗访问法国总工会，总工会提议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三方组成联盟，并提议以建立左派政府为目标，同时趁热谈判实施一个共同纲领。密特朗当然拒绝，他有些担忧在面对面的联手里同样危险。共产党人并不气

^{①②} 关于左轮手枪的事已由亚历山大在《爱丽舍宫在危急中》一书中叙述过，并经希拉克的传记作者沙弗兰确认。但希拉克办公室当时的成员之一奥利弗·斯蒂恩否认了这件事（与塞弗丽娜·勒格丽的谈话）。但当事人从没否认也没确认这件事。

馁，他们认为如果危机继续加深，需要改革的左派将与他们一起经受锻炼以备接班，当然是在限定的形式内。左派主张如此贬值。塞吉在考虑他的请愿纲领，瓦尔德克在进行一个不可信的但是可能的假设，即另外一个政府的假设。这样，在法共的战略里有两支火红的剑，谈判的剑甚至比另一支剑更有用。

非共产党左派被学生运动掀下了马，艰难地守着它的牌子，它惊奇地看着政府的艰难，但又不太相信自己能在符合宪法的程序里获得接班候选人资格，即在不信任案——政府辞职——普选——上台执政的宪法程序里。然而在权力的竞技场上还是出现了两位杰出的选手。首先是密特朗，这位野心勃勃的前部长和左派边缘人物因为天文台事件^①坠地，由此造就了这颗脆弱之星的艰难历程，终于在1965年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激进派和社会党人与密特朗共存于一个象征性的联盟里，艰难维持着非共产党左翼的团结。在1968年，一切党派始终都在政治游戏中争演重要的角色，对这位未来的总统来说，现在的位置是极其脆弱的。密特朗只是左派的象征，但不是左派的首脑，他的实际权力仅限于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内，社会党的首脑是摩勒，激进党的首脑是比耶尔。密特朗必须与他们协商纲领、立场和所谓的神圣事务。密特朗真是不可思议，终于获得左派总统候选人的正式提名，1965年的相对成功，多少削减了天文台事件中不好的影响。然而他长久是一个没有队伍的发言人。1967年，他终于找到机会，利用对社会党的批评和改革，取得了左派中的真正权力，尽管暂时地还是一个没有真正指挥权的主席。这还需要通过必要的辩论

① 天文台事件：1959年10月15日深夜，当时作为参议员的密特朗在天文台公园遭暴徒枪击，幸免于难。此事在巴黎轰动一时，旋即成了政治丑闻，右翼宣称这次枪击是密特朗自己策划的，把此案说成是密特朗沽名钓誉的苦肉计。舆论大哗，真伪莫辨。密特朗再次处于政治低谷。——译者

以及施诡计耍手腕达到名副其实。在这方面，他真正是出类拔萃的。

与法共的面对面的强硬斗争几乎占据了密特朗的全部时间，没料到有一个行动在他的背后出现了，有人企图利用运动把他扔到路边。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统一社会党和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们选定了他们的共同代表，这就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现代主义的左派们几天来就在密谋使这位前议会议长重返左派阵营。在这种形势下，命运是如此青睐他。他较密特朗具有大公无私的名声，有使人放心的温和，他的话和意见完全能得到青年们的注意倾听，能与学生运动团结一致，并与统一社会党保持着宽松的然而不是真正的关系，也具有所要求的国际形象。21日（星期二），法学家协会成立支持孟戴斯的委员会，准备工作业已展开。密特朗——孟戴斯，这是1968年的另一个决斗场，以致使未来的社会党主席很久也不会忘记这种完全幼稚的背叛。

5月10日，孟戴斯在格勒诺布尔受到欢迎。11日上午，他的两个朋友米歇尔·罗卡尔和应募于左派的律师乔治·基耶日曼恳求他及时返回巴黎^①。孟戴斯请他们俩“保持冷静”，整个白天，孟戴斯就是这个态度。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罗卡尔是个享有盛誉的小党派领袖，他希望在自己的领地密切一下与另外几个人的关系，即陪伴接待孟戴斯的学生领域的负责人马克·厄尔贡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索瓦热奥。第一次接触是艰难的，然而终于建立了关系，尽管他们的性格各异。孟戴斯是个爱争辩的人，虽然他一直接近青年人，也是大学问题的专家，却怀疑这种缺乏现实态度的关系和在夸张的词藻下表现出来的空洞联系。

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奇怪。既然确信戴高乐主义在法国民主的正常生活中是个题外话，而且孟戴斯也总在预言这种强加的制

^① 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度迟早会在一种震荡中轮换完结。在这种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假设里，孟戴斯对他们把自己看作一种依赖感到欣慰。既然时机可能来临，那么接触就是必要的。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孟戴斯特别忧虑如何避免暴力冲突。他是各党派中心人物的调停者，尤其是个人道主义者，他甚至参与由作家莫诺、洛朗·施瓦茨、雅各布和图雷纳组成的一个小型非形象作品作家说情者委员会^①，以避免各派别的极端行为。5月13日，孟戴斯与统一社会党一起游行，浩大的动荡使他感到震惊，忧虑随之而来。在议会上，他缄默不语，在没有列好具体的提案之前，他认为不宜干预罗卡尔和厄尔贡的意见。21日，他第一次与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密特朗接触^②。这时密特朗缩在运动后面，孟戴斯认为随着青少年一代运动的爆发，政治人物们可以会见。孟戴斯强调他们的责任，密特朗不以为然。第一次接触中，他们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往后将进一步恶化。

征 询 意 见

将军同样暂停推行他的路线。他的意见终于明确：法国处于一种文明的危机之中。对于这一点，蓬皮杜说的是有道理的，正如他所说的：工业化只是“机械文明的进步”，它必然打破旧的规则，使新的愿望诞生。仅仅发展是不够的，必须在法国这幅外国的图画上加上法国自己的蓝图。人们将从高处理解这场危机。政体，如果对国家是必要的，往后应该远离公民；如果对国家是有效，那么应该承认资本主义仍然在践踏劳动者的权力。必须重新调节法国的权力，必须使资本与劳动更好地组合起来：权力分散，公民参与管理。围绕这两个创意，将军酝酿着对法国人的承诺。但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恢复秩序，没有这一点，一

① ② 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切都不可能。秩序和改革成为争论的主题，强大的呼声再一次要求将军表态，将军宣布将举行新的全民表决。那么，人们基于合法性和改变的愿望企盼着。部长们、蓬皮杜和整个统治阶级再也忍受不了了，将军将再一次重新安排一切。首脑总是孤独的。

从星期天开始，将军积极地接见客人。老资格的戴高乐派的忠诚战士们鱼贯而入他的办公室，尽心竭力地建议、分析、计划。星期二，筛选完毕。上午，部长会议审查通过刚从阿富汗返回的蓬皮杜批准的大赦令。将军几乎是小跑步赶到：“先生们，你们将审查大赦令。我认为大赦的事完全是次要的。但既然宣布了，那么，干吧！先生们，我将有极其重要的事在后天星期四开始的议会上对你们宣布，在宣布之前，即在星期五晚上，我将有一个广播电视讲话^①。”司法部长若克斯接着向他陈述大赦的计划。戴高乐说：“都没意见了吗？先生们，我们对这件事就这样了。还有一句话，你们不要忘记，对政府的占领企图将构成对国家权力的损害，政府官员中若同意这样的将立即被解职。”

稍后，将军接见在巴黎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埃夫里尔·哈里曼。总统显得老了，累了，头垂在肩上，说话时好像在想别的事情^②。

剥夺居留权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正在度假中。《巴黎竞赛报》的摄影师总是伴随着他，在柏林布兰德堡门前给他拍了一张拎着手提箱的照片。然后，他与荷兰联系，那里，阿姆斯特丹的活动分子们说对新鲜消息有饥饿感。“红色达尼”说：“革命应该扫除旧世界，三色旗已被撕破，应该换一面红旗。”这将成为剥夺他在法国的居留权的口实。稍后，当有人把他在法国的厄运告诉他时，他哈

^{①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哈大笑：“我还要回去的。”^①

在巴黎，因为科恩-本迪的居留权被剥夺，重新唤起了经过5月10日的胜利而变得更聪明的学生革命的欲望。索瓦热奥和热斯马尔在王子先生街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们号召当晚在圣米歇尔广场示威抗议，随后他们与法国总工会联系。总工会不打算抗议这件事，而用另一个预计的示威与学生的这个示威相对抗。人们在法亚尔街议论纷纷：“这是挑衅。”新闻评论说这是总工会——大学生的决裂，就像先前曾有过的联盟一样。总工会主席塞吉不想迅速动员他的队伍，他只是在考虑谈判，这个时候正越来越清晰明确，怎么会为了一个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的居留权组织示威？你们开玩笑！

那天晚上，学生们单独地游行，仅有5000人，但他们用词语的想象力弥补了人数的不足。那天晚上诞生了五月中最著名的一些标语，如：“我们都是德国的犹太人！”游行队伍在热斯马尔的带领下登上蒙帕尔拉斯高地，然后下去向国民议会大厦前进，在波旁宫的栅栏前举行集会。克洛德·埃斯捷等一些议员们带来他们对学生的支持。不一会开始下雨，活动主义是不喜欢乌云的，队伍散开，让开索尔费里诺街的位置，给一些企图煽动支持戴高乐的组织的顽固分子们。一个叫夏尔·帕斯卡的戴高乐派的活动分子，似乎变成了学生的辩护者，他在电话里说：“人们向我们泼水，扔瓶子，到处都是。”^②警察不得不战斗到凌晨5时，驱散狂热的人群。一个不祥之兆。学生们的战斗欲望在重新唤起。第二天又有一个示威。格里莫已经几夜不眠。内政部富歇办公室的一个人员散步到巴黎大学，看到这样一条可笑的标语：“我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他于是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竖上了这

① 与作者的谈话。

② 米歇尔·布吕吉埃向塞弗丽娜·勒格丽讲述的轶闻。

样一个小标语牌：“我越是维持秩序就越是想睡觉。”^①

意外的骚乱使格里莫心绪不宁，在几个不眠之夜的一个晚上，想不到乔治·蓬皮杜光临他贝蒂纳堤岸的家。自骚乱以来，就没有这种私人意义的社交活动了^②。格里莫的太太准备了夜宵。总理显得面如死灰，眼神疲倦，背也更佝偻了，一言不发地坐着，呷着夜点心。蓬皮杜的女朋友路易斯·德维尔莫兰正好在格里莫家做客，蓬皮杜像往常一样请她朗诵几句诗助兴。她请求做一会样子，然后在席中选择一个名字叫内瓦尔的人做朗诵对象。她咽了一口唾液，身子前倾，开始朗诵：

你认识她吗？瑞香，
哼着古老的浪漫曲，
顺着无花果的芬芳，
或在白色的月桂树下，
爱情的歌声，永远是开始。

突然，她停下了，局促不安，用眼光询问着客人们，她为自己的记忆漏洞羞愧。一片沉寂，突然，满座目瞪口呆，一个阴沉的声音接上诗句：

你认出来了吗？
在这雄伟的列柱神殿里，
苦涩的柠檬上留下了你们的牙痕。

① 1968年五月的克里斯蒂昂·富歇办公室的主任让-皮埃尔·达诺与塞弗丽娜·勒格丽的谈话。

② 居伊·贝亚尔讲述的轶闻，1987年10月3日《费加罗画报》。

接着轻松地诵完全诗。这就是蓬皮杜的声音。后来还是喧嚣的口号声使蓬皮杜离开，去平息那带字眼的音乐。

占领市政府？

危机到20天，人们的神经开始放松。从科恩-本迪的居留权被剥夺，学生领袖们看到了已陷入纷纷占领和与工人阶级的大罢工靠不住的联合困境中的运动再发动的机会。即使是征收年贡的委员会好歹也比眼下全法国直接推动运动轮子的上百个行动委员会也协调得好得多。除科恩-本迪的这次情况之外，所有的游行示威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大家都抗议戴高乐，抗议第五共和国，为了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然而变成什么样的国家呢？谁也说不出来。尽管人们感到政体在开始摇晃，但是用什么来替代它呢？革命的轮廓总爱在老一代战士的地平线上显现，比上帝还模糊！难道必须迫使法国共产党掌握权力，或者打孟戴斯牌？声明罢工委员会的权力如同不久以前的苏维埃政权？好在这一切还不那么急迫。最急迫的镇压力量呢？它们在哪里？如何与它们对抗？在巴黎大学，一些狂热分子开始散布攻坚战的主意，某人提出占领市政府，就像巴黎市民在历史上好几次曾做过的那样。有人甚至秘密侦察了市政府^①。谣言总是散布得极快。这个朝天抛掷的主意激起巴黎市议会的黑色恐慌。保卫第五共和国的议员米歇尔·卡尔达盖斯惊恐地告诫同僚们赶快腾空办公桌抽屉里的东西^②。一个戴高乐派的评议会在勒克莱尔元帅的儿媳尼科尔·德奥特克洛克的带领下去到博沃广场的内政部，感人地请求富歇拯救即将遭到叛逆们袭击的市政府，“包括使用坦克车”。内政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对他们说了许多劝慰性的话，而且有格里莫

① 让-路易·佩尼努在承担这次侦察任务的几个人之中。与作者的谈话。

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承担保卫上帝的选民们的责任。格里莫沿着塞纳河安排了一些警察分遣队。在这段时间里，格里莫打电话给王子先生街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从对方的笑声里得到了担保：“攻占市政府？我们攻占它干什么呢？”让-马赛尔·布格罗，大学行动党的负责人今天回忆说^①。他们真的一点也没想过冒险在市政府的阳台上看宏伟景象，而且热斯马尔也不是拉马丁^②。况且，共和国保安队的一个装甲连就能立即撵走僭越者们。不到十天前，任何一个学生领袖都还在希望不死亡一人。1968年将不是1848年。学生阵线的头头们仅限于发出第二天晚上的示威命令，即5月24日（星期五），他们将在戴高乐讲话时和讲话后游行。大街也有理由表示它在思考戴高乐的讲话。只是在游行的经过中，人们将攻击巴黎证券交易所，代替了市政府。示威者将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欢乐火焰中点燃它。就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走向格勒内尔^③

法国总工会总想着谈判。预备性的接触由特别的社交性对话向前推进得不错。但必须对政府施加一点压力。让-路易·穆瓦诺在电视新闻发布之前看到总工会的一个公告：总工会准备在第二天在全法国进行示威活动，罢工继续。这是总工会为了针对政府和雇主们出点高价使运动停止而采取的行动。

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又被一个总工会会员在火口上加剧。他就是总工会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巴尔若内，8天来他被革命的洪流

① 与作者的谈话。

② 拉马丁 (Lamartine)，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中由革命者自己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成员之一。——译者

③ 格勒内尔街，法国劳工部所在地，五月中政府与工会的谈判将在此进行。

——译者

所触动，他与他的同志们相比有他的独到之处，他发现在稳定秩序的前面有一个明显的突破口：人们都在勇敢地向前，全面暴动是可能的，随后工人阶级将彻底掌握政权。狂热的巴尔若内发现运动只是建立在最正规的请愿计划上，只要突破这一点，一切都是可能的，他认为总工会主席塞吉和他那班萎靡不振的顽固同伙们正在放走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太蠢笨！星期四晚上，巴尔若内向法新社的社会记者，一个永远的托派分子让·博弗雷尔吐露肺腑，并坦言告之他要在第二天11时正式宣布辞职。接着，他从收音机里获悉总工会的公报：“所有工会组织都表达了它们的愿望，愿意迅速打开与政府和雇主对话的大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局对这种期待的答复竟如此缓慢。”巴尔若内又打电话给博弗雷尔，说他立即辞职，以“抗议法国总工会控制运动方向，竭力把法国这个十几年来最著名的运动在戴高乐派的制度陷入绝境的情况下，最不可思议地硬拉入谈判的轨道”。巴尔若内继续说：“我声明我的信念，运动完全有可能走得更远，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或者至少打倒戴高乐派的制度……爱国主义扼杀了这一切可能性。我们要保护组织，使它不至于在这种交易中遭受危险。”^①

人们在共产党的机构里同样感觉到这种爆发。36名党的知识分子联名写信给党的领导，对领导人的软弱不满。党的干部格鲁迪和勒鲁瓦担负了使他们恢复理智的任务。国家工业调整部的共产党员高级官员让-皮埃尔·迪朗心坚如钢地认为起义是可能的，部里干部们用他的话叙述他如此的精神状态：“5月20日上午，我去找一位住在阿尼埃尔郊区的女同志，希望她能向我讲讲罢工工厂的情况，如战斗的困难等等。”她对我说：“昨天，我和

^① 巴尔若内在《1968年的革命反叛》（巴黎·J·迪埃版，1968年）里叙述了他在五月的经历。

我的丈夫一起去了好几个工厂与劳动者们交谈。你猜怎么样，一切进行得非常好，小伙子们非常敏感，认为目前的形势对戴高乐派是危险的。”^①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也在寻求接触。总是希拉克与该工会的主席德尚对话。德尚对国务秘书希拉克说：“让纳内^②应付不了局面。”那么，他们就与这位年青的国务秘书进行谈判。于是，蒙托隆街的民主工人工会中枢变成了共产党人夜以继日地准备谈判的战场。他们在地下室里做饭，“真臭啊！”一天晚上，德尚忍不住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嚷叫起来，以致同志们曾想办法换一下正常的地方烧鲱鱼^③。

一部分学生不愿意等到5月24日，他们决定在拉丁区举行示威抗议。从23日起，新的冲突发生。嘈杂声一直回荡到孟戴斯的亲近人夏尔·埃尔尼家里，这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正与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好几个领导人在会面。

由于骚乱不断扩大，罗朗·迪马决定给他的老板密特朗打电话：“我在埃尔尼家与孟戴斯在一起，左派不甘心处于静止状态，必须做些事情。”

密特朗：“来我家吧。”^④

密特朗很想做大家想做的一切，但两件事使他有顾虑：他是左派的正式领袖，1965年左派的惟一总统候选人，掌握着法共以外的主要反对党组织，这使他不能有企求掌权的表现。如果有

① 阿兰·施纳普和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学生公社日志》，巴黎·瑟伊版，1969年。

② 劳工部长。——译者

③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④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一个换班，就该他来。另外，他知道，也感觉到了，学生们不喜欢他，仅仅认为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奸诈政客。这位1954年的内政部长，天文台事件的主角，佛罗伦萨的资产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传统的等级已自然崩溃，学生们把他不当回事，认为孟戴斯是位廉直的勇敢的政治家，密特朗的书只有放在孟戴斯的书旁边才有点价值。然而想不到孟戴斯这一次却如此顽固，取消了几个夜晚的骚乱活动，持久地调整运动直到不可能有起色的地步。因此，一些捣乱分子才宁愿喜欢另一位孤独的人，即这位左翼联盟的主席密特朗。从一开始，密特朗和孟戴斯就互相监视，假若一个向前进了一点，另一个就连忙动员他的队伍；当对方失败时，两人则在握手中暗笑和偷看。

这种竞争在那天晚上进行到更微妙的一轮。在拉丁区的战斗看上去搞得很激烈的时候，密特朗以有利的左派形象前去调停，以避免太严重的冲突，同时以此象征他可能使国家的各派别和解：看，合法的反对派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带来平静，在避免革命，在以掌握的权力为暴动寻找一个和平的出路。当时，密特朗的亲近朋友基耶日曼、达扬和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反政府”成员记者马克·帕耶都敦促密特朗和孟戴斯深入到大街上去发挥街垒说情者的作用：秩序的保卫者警察们和请愿的学生们同时都在那里^①，这两类人没有沟通，互不听取，都在转折关头冒着被袭击的危险，都面临严峻的形势。密特朗和孟戴斯分别派迪马和埃尔尼做街头通讯员，他们对街头的人们说：“假若一切变得严重，请呼叫我们。”然而，一切都还没太严重。

^① 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和阿兰·佩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与1968年5月事件》（巴黎政治学院高等教育文凭论文，1969年），均通过他人之口叙述了这一幕。乔治·基耶日曼特别对让·拉库蒂尔详细叙述过此事。

离开街头时，孟戴斯对密特朗说：“如果示威活动扩展，就会导致镇压加剧，我们要随时准备介入共同协商。保持这种联系。”^①但密特朗心里清楚，一方不动是不会引起另一方的注意的^②，他打定主意先不动。第二天晚上，孟戴斯变得狂热起来，他又与他的朋友兼律师乔治·基耶日曼去了拉丁区。孟戴斯的朋友们都对这位前议会议长不满起来，他已被戴高乐的关于公民投票的讲话刺激得兴奋起来，戴高乐在电视里说，“公民投票，这没有争辩，就是进行竞赛”，野心一下征服了他，使他本能地下到社会，去巴黎大学，然后去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驻地。然而这在密特朗周围的人看来，只是一种简单的圈套。孟戴斯不难想象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主席密特朗此时的想法：“孟戴斯想重复我。”

政府分析危机

进入部长会议大厅的时候，将军的脸阴沉得像大理石一般。政府高官全部到齐，准备聆听总统介绍他的公民投票计划。年长的戴高乐分子当然愿意相信他的公民投票，忠实于戴高乐的人士希望再一次出现奇迹。蓬皮杜则持怀疑态度：老头子还要上演什么？如果赢，当然好；如果失败，他就得离开。

将军讲得很严肃很长^③：国家正值变化期间，技术文明的来临扰乱了青少年一代，法国再一次爆发了运动，法国人陷入分裂之中，大学的不安宁扩大了，因为大学不适应。“我放弃出牌，

① 同本书第213页注①。

② 克洛德·埃斯捷在《一个巴黎公社战士的日记》中肯定孟戴斯的密使向他断言孟戴斯根本没有对密特朗封锁消息的意图，但让·拉库蒂尔对此持怀疑态度。就是从这时开始，孟戴斯和未来的总统之间蒙上了阴影。

③ 图尔农的《将军的五月》叙述了这次部长会议。当塞特《1968年的5月》也简短地叙述了。

但大家都知道我所要说的”（影射部长选举延迟到预期之后，并拒绝实施）。谈到政府最近的表现时，将军是严厉的：“你们的心理已经自由放任了。过去的一切都还好，只要不更远地超过损害国家的限度。”这当然也谴责了蓬皮杜过去的行动，但不包括他下一步的行动。为了挽救局面，他还要蓬皮杜尽力做两个方面的事情，即“有利于基础的事情”，一方面要保证食品供应和通讯，另一方面要与工会谈判复工，这都是蓬皮杜的任务，需要他同时抓住两方面的问题不放。那么，将军自己将着手恢复自上年6月18日中断的与地方的对话，他要求地方同意实施必要的改革；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发挥地方组织的能动性。然后，将军再根据严峻形势的需要转动一下台面。

议会讨论期间，每个人发言变化无常，别致的讲话与琐事唠叨，高远的观点与深刻的分析交叉在一起。农业部长埃德加·富尔改变态度：“法国的主体构成不好，缺乏稳定。”多变的中间派领袖要求建立一些社会性的中间团体，认为法国议会被总统制过分地削弱了。从这个观点上看，地方化倒是合适的。中间派领袖发现经济缺乏再发展是导致危机的媒介之一，这使脸色不好的财政部长米歇尔·德勃雷更不愉快，德勃雷总是在所有重大决定的开端缺席，以至使他的继承者不愿再如此惹人讨厌。领土规划整治部部长雷蒙·马塞兰希望有一个更新鲜的地方化。他的意见被记入公民投票的计划之中，在一个谨慎的位置用“权力下放”来表示，是在允许完整的行政权力对地方单一的经济开发进行预测的同时。然后，他要求更坚决地恢复秩序。米歇尔·德勃雷不满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出尔反尔，并对议会多数派的削弱表示遗憾。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不能进行。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部部长皮埃尔·比约特鼓起勇气读一篇难懂的哲学论文，反对消费社会并要求推广职工参与管理的计划。改革的乌托邦风吹遍议会。当研究基督教历史的戴高乐派人士埃德蒙·米什莱发言时，气氛

突然活跃起来，他的老好人癖性也同时显露出来，他像一般的神父在教堂里一样劝戒将军：

米什莱：“我的将军，必须理解学生们，对他们必须轻一点！”

戴高乐：“怎么，轻一点？”

米什莱：“总而言之，轻一点，就像对我们的小孙子说话一样。”

戴高乐：“好吧，轻一点！”

有口才的舒曼^①用洪亮的声音发言，属正统的戴高乐派的精彩片段。还没公开提出辞职的阿兰·佩雷菲特给这种狂热泼了一点冷水。他真的刚刚做完这方面的工作，他解释说，关于职工参与管理的计划他已交由农泰尔文学院院长，左派人士格拉潘实施，已引起了瓦解和骚乱。好事竟是这样深入人心！职工参与管理没有丝毫的作用，没有责任精神。文化部长马尔罗扔出一句名言：“政府没有必要在罢工者的拘留所里跳舞。”真正的辩论由紧急事务开始：好几个部长如米索夫，戈尔斯等同意举行议会选举，但蓬皮杜反对，他担忧议员们竞相许诺会使选民们的下一次反对提前。后面是外交部长穆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的一个冷冰冰的严峻的外交报告，记载着国家影响的损失，最后是总理概括当前形势的一般情况，并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和再一次声明忠实于将军。在议会大厦的出口处，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一句话总括了这次辩论：“……辩论使第三天复活。”乐天派的语言。将军则完全投入公民投票中，戴高乐在向他生涯中最严重的失败逃跑。

^① 戴派议员。——译者

第十八章 最严酷的一夜（5月24日）

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温厚而引人注目地来到上万青年中间以图缓和，他们都是按照里昂车站的大时钟准时来到里昂站的。这些青年人不仅仅是大学生。随着工薪阶层的罢工，不满现状的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学生不再是孤立的。蓬皮杜所忧虑的农村人口外流和工业化的严重后果在这里充分表现出来了。在60年代，银行和邮电局愿意大量雇佣可预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数的农村青年经各种介绍所和中心选择进入工厂和办公室，他们通常毕业于中学，接近大学生的身份，他们被昔日同窗们的成功所刺激，他们走出他们的企业欣赏昔日同窗们的造反风采。这个星期五，学生与工薪阶层的团结不再是一个神话，知识青年和劳动者们将肩并肩地与警察战斗^①。

人们穿着蓝球鞋，手握防毒纱巾，携着摩托头盔，口袋里装满了螺钉，战栗地、再一次如此大批地重临战斗的气氛中。“3月22日运动”和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一直保持着临战的队伍，首先从巴黎的东大门出发，去与想象中的在城廓下拥挤着踏步的工人阶级汇合。然而，那里并没有多少工人，只有下午总工会的两次示威活动之后剩下的数百工人。工人们都集中到里昂车站去了，那里经警察局批准可以集会，但不准游行。学生参谋部已经分裂，其中的朱利、热斯马尔、勒当泰克后来出现在无产阶级左派之中，他们是与政府对抗的拥护者。工会中心主义的信念使他们确信总工会的零散工人将是革命的使者。形势再度紧张起来，无产者有可能大批地脱离太谨慎的总工会重返革命的战场。革命

^① 除了健在者和当时的报纸提供的证据，贝纳克、当塞特、阿蒙、罗特曼、巴克曼和里乌的著作里对5月24日都有叙述。

共产主义青年领袖韦贝尔、克里文、邦萨伊认为有必要耐心地预先建立一支“先锋队”，否则大批群众在镇压面前，要么走向冒险主义，要么乱七八糟地逃跑。这是一种审慎，但从中已嗅到了火药味。

灾难性的高谈阔论

议员们陆续到达国民议会大厦，有的鼓着掌；他们来后散布在前庭的楼梯上、过道上和狄德罗大道上，他们围着、谈论着、吵嚷着或享受片刻。议员们等待着。到20时，当夜幕笼罩着前厅的大时钟时，他们都聚集在小房间里围着半导体收音机。戴高乐在讲话，声音还是那么有力，节奏还是那么威严。然而有些方面没顾及到，他那古典式的修辞顿时显得过时了，有意使用的古老词汇也不再显得古色古香，他的魅力不再。在电视里，总统显得疲倦、虚弱。

将军说：大家在目前的事件里看到“我们的社会转变的必要性”最终“直接关系到更广泛地职工参与管理的每个步骤和活动成果”。国家的首要责任是保证“国家的基本存在”，但随后“有一个改革”。“鉴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特殊形势，根据政府的建议，我决定提出全民投票的法案。通过它我请求给予国家，首先给予国家的元首以改革的委托”。

冷静地复读将军的讲话，并没什么不好，为了法国社会的充分改革，语言是稳妥的，观点是有力的，20年以后，国家刚刚实施地方化方面的计划，企业也刚刚在吸收职工参与管理方面起步。“这是最好的讲话”，劳工部长让-马赛尔·让纳内今天评价说，虽然他把这个反论推进得有点远^①。但在瘫痪的法国，在准备战斗的学生面前，总统的新讲话最好是对一项遥远计划的许

^① 与作者的谈话。

诺，而不是对全体人民的现实忧虑的具体答复。巴黎人民等待恢复秩序，工会希望立即得到社会特权，学生只管在暴动的梦幻里迅跑，保守派由于惊惶太萎靡不振，改革的拥护者又太抽象和谨慎，戴高乐的讲话并不有关这些眼下的直感现象，他那毁灭性的惯用语和历史想象力蕴藏着多么十足的轻巧。当晚，这位演说家对福卡尔^①说：“我已站在勋章旁了。”^②

老元首讲话的倒数第二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也就是人们在里昂车站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到的：“假若你们回答不，我将不再担任我的职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总统刚刚讲完这句话，马上就被呼啸的风暴所淹没。随后，成千上万的学生没有商量，不约而同地掏出防毒手帕，在炎热的夜里行动起来，三个音节一组有节奏地高喊：“永别了，戴高乐！永别了，戴高乐！”于是，1968年5月最长的一个夜开始。

冲 突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请求警察局让开一条通向巴士底的通道，遭到拒绝。警察大批地集中在里昂街上，他们利用多梅尼大道上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悬挂通讯设备联络。罗网是严密的。于是示威者们开始挖掘广场上的铺路石。巴黎大学的“歹徒们”带来电动锯锯倒一些道旁的树木。都是白费劲，因为格里莫准备好了消防车和推土机。里昂车站将不是盖-吕萨克大街第二。经过第一周骚乱洗礼的示威者们，在装备和干部配备方面都吸取了教训，两个派出所仍然遭到了他们的攻击。警察局决定狠狠地回击示威者，他们以榴弹投掷手低伸投掷催泪弹为掩护，迅

① 福卡尔（Jaques Foccart），将军、戴高乐的亲信，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部秘书长。——译者

② 雅克·福卡尔与作者的谈话。

速准备攻击。顿时，榴弹盲目爆炸，碎片横飞，受伤者嗥叫着倒下。共和国保安队的队员们承受着扔过来的石头，并挨着示威者短粗木棍的敲打，其他什么也没做。到23时，刚刚构筑好的街垒被占领，警察控制着里昂车站的所有范围。在这段时间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纠察队以坚决的现实态度迫使正在进攻一个武器商店的“不受控制的组织”撤离^①。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与死亡做伴的。

那么，必须去其他较少实行警察分区控制的地方继续行动。于是示威者分成小组在巴黎的许多地方突然出现，笨拙的保安队队员随后到处追逐着。格里莫本来不希望有示威活动，现在却出现了上十起，那么狂热、好斗，无法控制。5月10日的教训使格里莫再不敢忽视下面一件事：警察局和邮电局必须重新发射频率与广播电台的记者们联系，使他们不再有过火评论，激起更大的骚乱，因为街头电话亭都已被骚乱者掀翻。

火烧证券交易所

一支小队伍溜进大道，头上蒙着防毒纱巾，手里拿着短粗木棍和垃圾桶盖子。热斯马尔赶上高喊：“去交易所；去交易所！”^②他们来到两天前就选定的目标前——耻辱制度的威严神殿。这里没有警察的黑色头盔出现，首都的看门狗们忘记了保护它的象征，当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这支小队伍就很果敢地撞破铁栅栏，侵入这座布龙里亚宫，毁坏椅子，倒空抽屉，人群挤满各个办公室，还有人弄来一点汽油点燃，火焰上蹿好几米高，但并没烧起来，只是象征性的罢了。这些纵火者并不知道他们将被记录下来。警察局设置障碍，允许示威者沿塞纳河右岸通行，禁

^{①②}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止从左岸通过，这完全是有意意识的，绝不是战术的错误。蓬皮杜直接指挥着警察局的行动，格里莫按照他的指示办事。蓬皮杜需要唤醒恐慌的党，同时让富人区承受混乱，学生帮了他的忙。在蓬皮杜去世后发表的回忆录里，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命令堵住所有的桥，阻止他们向拉丁区进军，我希望他们向西分散，因为他们在那里会分成不起什么作用的小突击队，行动后自会消散，同时还因为他们会使16区的资产者感到恐慌。起初，就是这样进行的，后来在交易所发生了一场小火灾。”^① 计谋改变了战场。

当共和国保安队宪兵连赶到巴黎证券交易所时，示威者们边战斗边撤退。他们撤退到歌剧院，在这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又下达了撤退到拉丁区的命令。他们取道和平街，穿过旺多姆广场。这时司法部的一扇窗子后面有一个影子在俯视着他们，他就是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他索性拉开窗帘观察这支队伍，一位如此沉默而又木然的目击者。司法部没有守卫，他的办公室主任再三恳求他离开，这位部长终于同意从一个小后门溜走。示威者们为了去协和广场，行走和奔跑了3个小时才到达里沃利街。这时，某人高喊：“去爱丽舍总统府！”热斯马尔希企有这样的时刻^②。革命前夜的气氛竟如此可能使荒唐的念头一下变成实际行动。然而他们的对手却换了级别，是手持武器随时准备战斗的精锐宪兵，死亡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向前冲，被屠杀是肯定的。在深渊的边缘，禁条还是发挥作用的，示威队伍没有向前。守卫总统府的宪兵虽然已经疲劳，但一旦示威者进攻，再累也将开枪。格里莫惊恐万状，为免激化，他决定允许动乱者们经过左岸。必须开

^①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②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放新桥并封锁通往西部的街道。右岸的示威者们蜂拥而入博沃广场，这下可启动了真正的电话中枢，各部、议员们、各类显要人物们纷纷用电话呼叫部队，准备开枪，不惜一切办法终止这一切。内政部长富歇坚定不移地回答：“付出流血的胜利将是一种失败。”富歇和热斯马尔有同样的思考。明显地，法国在那天晚上发生了极大的恐慌，但并没准备进行内战。

保尔-玛丽·德拉戈尔塞仍然在博沃广场接待不安的记者们^①，他们前来告诉她在无政府主义的威胁下到处发生恐慌的情况。这位戴高乐派的记者马上感到：舆论倾覆。

动乱的顶点

从交易所脱险的示威者们来到拉丁区寻找战场。奇特的街垒已匆忙筑成，上面布满了树枝洞和街道指示牌。在学校街，不合规则的街垒堆到3米高。经受过锻炼的示威者们对突击和瞬间撤离都内行了，也能准确地投掷石块和熟练地用铁棍伤人；警察们自从盖-吕萨克街的战斗以来也变得聪明了，他们不再留在街垒附近，他们的战术将是首先大量投掷榴弹，下一场煤气雨，然后密集地从容地有条不紊地冲锋。有一次，街垒的守卫者们突然四散，原来是一些清洁车毫不留情地向前推进，卷走了一切反击的可能。为了回击这种罗马支队的战术，学生们在街垒前面大面积地燃烧，使进攻者不得不蒙着眼睛，守卫者如此自卫。此时，第五区的街道与电影《这不过是几句空话》中的亚特兰大的街道差不多，狂热的组织到处砸碎玻璃橱窗，抢劫商店，焚烧汽车。五月的暴力达到了顶点。不止如此，他们还险些酿成大祸：在邦戴翁广场，怒吼的人群包围了第五区警察局。警察局请求增

^① 与作者的谈话。

援，但增援没有到达^①。突然，分局的建筑物起火，威胁着陷入陷阱中的警察们。格里莫有过此类经验，但一时缺乏力量解救他们，必须授权他们开枪以便脱身。否则，他们将被活活烧死在里面。这位巴黎警察局长一下坠入了地狱，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他一直退到尽头的尽头。这时，突然有30名警察从克洛维斯街赶到了，队伍密集但没有装备。包围者这才停止战斗。格里莫松了口气。

巴黎大学没有邀请密特朗，但孟戴斯在那儿受到了欢迎，他说：“就做证而言，在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看到过拉丁区的许多街垒路障，但从没过过如此野蛮的。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战斗也太不规则^②。”他并不知道一切，恐怕还不止这个程度。在警察逐步夺回拉丁区的过程中，俘虏了許多人，塞进囚车，大批地运往博戎医院。在那里打开车门，把人拖出来，推到外面，等着他们的是两排拿着橡皮棍的警察人墙，非常恶劣地检查他们的身份证^③。

第二天上午，人们抬着两名死者，一个叫菲力普·马特里翁的青年，据官方的公告，死于拉丁区的白刃战，另一个据说是死于榴弹爆炸中。在里昂，因为警察自己开动的卡车加速器卡住了警察分局局长勒内，被撞在拉法耶特桥的栏杆上死去。在拉丁区，锯掉的树木，捅破的橱窗，烧毁的汽车框架成了战场的景观。这一次，舆论转变为谴责学生。在5月3日到13日的第一周骚乱中，学生们尚有一些富有魅力的令人感到新鲜的东西，现在却变得可恨起来。法国因罢工而瘫痪，大大小小的富人们开始担心他们的财产了。在他们的眼里，骚乱变成了不可容忍的侵犯和走向内战的可怕路标。被破坏的停车场，私人房产业主的部分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②③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不可能得到任何赔偿，这深深地触到了法国的敏感点。法国因此产生恐慌。在5月24日，捣乱分子们精灵到如此程度，在民众中失去了支持。法国共产党加倍谴责他们，这一次得到了“左派民众”的认同，和平占领工厂的工人们也开始怀疑这种不得人心的暴力。刚刚恢复镇静的右派们又开始不安，因为凌晨3时，内政部长富歇发表了无线电讲话：“这种来自巴黎社会底层的盗贼是真正的狂人，匿藏在学生后面利用他们的昏乱疯狂闹事，造成极大的损害，我请求巴黎市民们唾弃这种破坏学生名声的盗贼。”学生们不止一次地颠倒其中的词：“盗贼，就是我们。”但是这一次不再被市民接受，富歇正说在点子上。对这次的巴黎公社来说，5月24日是退潮的末日。那么，蓬皮杜的计划就有了开始实施的必要。

第三编 政治危机（5月25—30日）

第十九章 格勒内尔（5月25—26日）

戴高乐败北

戴高乐知道自己失败了，蓬皮杜认为自己可能成功。宣布举行公民投票是糟糕之举，徒劳无益。将军自电视讲话之后就感到这一点。“这不是法国人所期待的”。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后一次电视讲话^①。第二天，将军宴请约翰·肯尼迪的内兄弟，美国新任驻法大使萨金特·施赖弗，凄凉地说：“大使先生，未来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上帝。一切预示可能继续存在动荡，甚至会再一次严重。”^②他们喝完咖啡之后，将军忠实的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继大使而来。他是最干脆地反对公民投票的部长之一，这位青年体育部部长认为这是不适当的决定，无异于解体。

将军：“您认为我的讲话怎么样？”

米索夫：“我的将军，这是失败之举，这不像以前的戴高乐。”

将军：“再给我说一遍，昨天您为什么反对公民投票？”

米索夫向戴高乐作了解释。

① 作者与让-皮埃尔·于坦的谈话，并进行了录音。

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将军：“总之，我离开是有道理的。”

米索夫：“我的将军，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您应该马上穿上晚礼服，在这个办公室里把权力交给密特朗或孟戴斯。”

将军：“我不走。”^①

如果读者相信这位部长对笔者的证言，继而便是戴高乐勇敢地投入上述有力的结论所决定面临的战斗，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上述两幕成为随后四天正剧的预言，即自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来国家历史中最富戏剧色彩的几天。在政府的束手无策和它的软弱特性中间，戴高乐感到自己受到束缚，甚至感到完了，即使挣扎。本来，国家在革新，法郎稳定，制度稳固，经济充分发展，法国在国际上重新赢得了独立自主，这都是他个人的业绩，也是他留在历史里的原因。现在一切都在他眼前失败，仅仅在几天内。悲伤几乎吞没了这个伟大的人，如同他以往的生涯，他有了离去的欲念和死亡的诱惑。

许多旁观者和历史学家较少看到将军的这一面，五月的后几天如同将军统治的寒冬，然而一些知情人，如米索夫就在其中，不相信将军的消沉。他们说，遭受的挫折只会使将军更强烈地战斗。然而将军却处于烦躁、悔恨和疲惫之中。他精疲力竭之余，如同吸毒者状态，但他仍然在寻找出路。公民投票的大门在他的面前咯咯作响，他似乎要从中找到另一条出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进行，甚至装出退却，欺骗所有的亲信，弄糊涂所有的朋友，他还是没有放弃。这就是他在五月最后四天的非常谜底。戴高乐终结了吗？或者正在导演什么，在星期五晚上的电视讲话之后，采取非常的战斗策略是元首的特权吗？星期六上午，一个悲剧在悲惨世界里开始：英雄默默地与自己搏斗。

^① 塞弗丽娜·勒格丽对弗朗索瓦·米索夫的采访。

格勒内尔的角色们

蓬皮杜没有将军的这些痛苦。他虽然同样疲惫、阴沉、愤懑，只是因为他所布置的工作实际上已不再奏效的原因，他装满阿司匹林药片，装出乐观的样子，但他在政府辩论的黑暗时刻看到了有一线希望通向另一个终点。暴乱的夜是狂暴的丑恶的令人反感的，但这一夜有巨大的功绩，就是使舆论厌烦了。恐慌有时如同一个好的顾问，证明骚乱是广泛的，为总理集中了恐慌的论据。社会谈判的大门终于打开，如果需要，总理将在整个周末与工会对话，并将取得成功。共产党希望恢复平静，他们的行为已表明了这一点，必须与他充分地统一意见，剩下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当戴高乐与萨金特·施赖弗进行悲凉的对话时，蓬皮杜正与一班部长朋友们聚餐。这有点放肆。

社会性的空泛大讨论是在是日15时在劳工部开始，即格勒内尔街127号，前沙特莱旅馆。大厅里扩音设备不好，会议桌又窄又长，坐在同一边几乎互相看不见。这还不算，装修也很寒酸，但房间是宽大的。蓬皮杜面色苍白但显得轻松，塞吉则是一副乐观而果敢的样子，谈判将在这两个中心人物之间进行。前者希望有一个协议以带来秩序，使经济复苏，但又不想显得那么太失面子；后者同样希望有一个协议以带来秩序，但想以复工和保留对形势的控制来争取政府最大限度的让步。他们仅仅相信用数字来确定这些，这对面临深渊边缘的法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让-马赛尔·让纳内早已开始进行接触，为谈判作准备，他在场是因为他是有头衔的劳工部长，但现场主要是社会事务参议巴拉迪尔和国务秘书希拉克在做准备，他们俩是蓬皮杜权力的代表。格勒内尔谈判是蓬皮杜的事务，他操纵着整个谈判，他安排发言、提要、概括、依次深入到谈判内容的各个细节，且不参阅任何记录，然后从无失误地回到最重要的赌注上。工会干部们都

承认他的高超。他无可挑剔直到最后一分钟，三夜未眠。

谈判间，蓬皮杜只是请示了戴高乐一件事：“我能避免德勃雷的命运^①吗？”这刺伤了前总理现财政部长德勃雷，他愤然脱离谈判。这个信号对参与谈判的工会干部们来说是醒目的，他们准备去规劝德勃雷。但德勃雷还是准备在谈判稍有起色之后再递交辞呈。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只是请求他不要把此事公开。

老总工会队员伯努瓦·弗拉商和总工会副主席克拉苏茨基在塞吉的身边如同钢铁警卫，老伯努瓦跟在后面仿佛回到了30岁，他在1936年曾出现在马蒂尼翁府协议的谈判桌上，他有口才，还是个老好人，在他40年的工人经历中充满到处吸取的趣闻轶事，喜欢调侃，当他在谈判厅里看到雇主评议会的男爵珀蒂耶时，快活地打招呼：“我认识您的父亲，他在马蒂尼翁府呆过，一个论战者。”克拉苏茨基在老伯努瓦的身旁微笑着，并假装天真地慢慢选词用词，带着极细微的差别。法国雇主协会在面带愁容的主席保尔·于弗兰的带领下将跟着政府走，但欧仁·德尚的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不卖账地“质的”插手一切辩论，这将使最可能的谈判事宜复杂化。当法国总工会首先着重工资水平问题的谈判时，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则希望谈判涉及权力并总是涉及它的代表在企业的特权问题。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总相信政府会变更，因此它与学生结合在一起，并对孟戴斯抱有假设。使谈判破裂对它有客观利益，这样可以促使蓬皮杜政府垮台，自然而然地使孟戴斯走出社会僵局而上台，但它也顾忌是不是不再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塞吉和蓬皮杜当然识破了该工会的伎俩。鉴于共同的需要，他们将单独商定。总之，他们有好运获得成功，但路将是漫长的。

^① 德勃雷（Michel Debre），于1959年初任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于1962年4月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辞职，蓬皮杜接任。——译者

从根本上说，工会组织并不缺乏论据：有3000万法国人每月只有600法郎以下的工资，1967年他们仅提高了3%的购买力，而经济发展超过了5%，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工会组织在企业里总是立不住脚；在许多中小企业里，罢工是被禁止的，参加集体请愿者被驱逐。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远远落后于社会的普遍进步。数十万工薪者生活在悲惨的边缘，被迫拖着精疲力竭的劳动步伐，驯服于吹毛求疵的基层管理人员，没有前景，近乎没有权力。对于这一切，在格勒内尔的谈判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种幸运。因此，工会会员们甚至未来得及走上这场权力游戏的前台。但他们知道在谈判桌上应该体现百万罢工者的愿望，也认清自己正在经历他们的历史上决定性的一页。

各业最低保证工资：“傻事！”

谈判从各业最低保证工资开始。塞吉已经公开要求每小时3法郎，将提高35%，然后在幕后与希拉克艰难地协商妥协到2.7法郎。为了有点收获，这位总工会主席重申他的要求，删除按区域性削减的一条（最低保证工资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调整），并删除农业最低保证工资（SMAG）一条（农业最低保证工资低于各业界最低保证工资，删除后与普通最低保证工资排齐）。全国雇主协会主席保尔·于弗兰马上答复：“我们同意。”塞吉简直不相信，一下惊呆了。事实上，资方已被工人占领工厂所造成的大权旁落吓破了胆，他们准备付出重大代价恢复正常，复兴自己的权力，然后将在通货膨胀里再捞回大部分的经济损失，受气的将是政府。蓬皮杜倾向于劳工部长让纳内的看法：各业最低保证工资是“傻事！”^①

① 作者与让-马赛尔·让纳内的谈话。

在工资问题上的讨论继续着。大家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类工会的抱怨。然后大家吃夜宵。关于普遍工资水平增长的争论是激烈的，于弗兰想放松到5%，塞吉则希望增加13%，形成僵局。由于讨论不下去，塞吉做了一个手势说：“转到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将拟一个谈判要点的清单，然后再返回到难题上来。”会议因此得以继续。大家到凌晨3时45分才散去。

谈判在星期天晚上重新开始。此时，蓬皮杜同意对国有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里的工薪者的要求单列出来进行谈判。他同样逐个地征询各个工会的意见，当问到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时，该工会代表脱口而出要求企业工会分会的地位能够确认。蓬皮杜的调查委员会整个下午在黑板上统计各个工会的要求。工会从此以后在企业里将有一个合法的场所，它可以发布公告，征集会费，收发传单。工会存在的合法化使资方充满了恐惧，资方认为会被工会的不断宣传打开缺口。这有点像动真格的，甚至是有目的的。

蓬皮杜和莫斯科

蓬皮杜随后去总工会会见塞吉、弗拉商和贝尔特洛，特许工会代表在企业里与官方代表在人数相等的形式下出现，因为那时工会在企业里尚处于被排斥的状态，在国有企业里，占重要地位的只有派出所和企业董事会。工会能出现在现实的中心，是经过激烈的斗争的，尤其关于双方代表人数相等的机构问题，在塞吉的回忆录里大体是这样记叙他与蓬皮杜争论此事的：“戴高乐将军的对外政策方针在国内外存在许多反对者，包括你们中间有的，希望像盟国反对我们^①一样。这就是一些主张向东方开放^②”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盟国一致反对并阻止强大的法共掌握法国政权。

——译者

② 指向美国开放，“亲美”。——译者

的顽固反对者们……他们希望利用事件恢复第四共和国的大西洋主义政策。这是目前形势的基本点，我确信你们不会对这一点无动于衷……对我这一方来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我宁愿做一个共产党政府的普通官员，而不愿做一个受控于美国的法国总理。”^①人们没察觉到塞吉夸大了蓬皮杜的反美主义，使他上升到更喜欢共产党人的大西洋主义^②的高度。不管怎么说，塞吉的这个谈话是形势的必然趋势。在戴高乐和蓬皮杜为一方与密特朗和孟戴斯为另一方之间，共产党人不能犹豫。根据塞吉的讲话，总工会会员们当时就行动起来，疾呼他们的意愿——在最正规的工会领域内，维护总工会主席的讲话。然而这项使命已成过去。在谈判期间，法国总工会将提出更好的意愿。17时，谈判重新开始，塞吉宣读概括了总工会要求的一个声明：废止社会保险条例，付给罢工日工资，对工薪者实行底薪制^③。蓬皮杜打断他：“这是预先安排的程序吗？——不要讨论这件事。”^④

竭尽全力

大量的协议条款还是满足不了所有工会的要求。法国总工会在谈判中承担了大部分的事务。总理关于社会保险条例的改革方案开始讨论，根据政府专家的预测，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出现了，即实行工薪阶层底薪制将启开通货膨胀的大门。蓬皮杜不能完全松口，他的权力有限。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代表仍然在使谈判复杂化，它的负责人

① 见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世尔版，1972年。

② 指法共的“亲苏”倾向。此处为反语。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亲美”政策相对。

③ 按生活指数调整的工资等级制度。——译者

④ 见克里斯蒂昂·夏里埃的谈话。

德尚和德特拉在社会状况、资本主义改良和人民意愿方面进行长篇大论，这使总工会主席塞吉也施展起激化矛盾的才能：“多么可笑，多么可笑，真是多么可笑！”

20时15分，代表自行吃晚饭，塞吉在没有安排的情况下对记者说：“谈判实际上已结束了，意见很分歧。”弗拉商则去睡觉，他是悲观的，第二天他便承担了去比扬古向工人们阐述协议书草案的任务。工人们听了阐述之后，纷纷打电话给雷诺工厂的总工会书记埃梅·阿尔贝尔：“这没有进步，还是必须使所有的小伙子继续革命，施加压力。”^①

到这个时候，总工会不再太相信直接谈判了。他们认为必须再放任一两天的罢工。

午夜，塞吉出去活动一下腿脚，碰上一个记者，他扔下一句话：“星期二之前，不存在协议。”^②

让 步

凌晨2时，有人前来通知谈判中的法国总工会代表团：全国学生联合会，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及其他许多组织将于星期一晚上在沙莱蒂体育场举行大型集会，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将出席。这个消息来自法共驻地的电话，其他工会由总工会转告得知^③。就是这个消息使塞吉和他的谈判对手改变了一切。

这个消息是决定性的。这个行动可能使法共进入自运动开始

① 总工会的错误手段好些作者都有叙述，如当塞特的《1968年5月》和贝纳克的《重新发现五月》。当塞特的作品中还发表了雷诺工人宣布继续罢工以施加压力的传单。

②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③ 亚历山大和当塞特采用的是这两种说法。

以来最担忧的轨道：由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串通，学生——工人联合起来了，将使孟戴斯进入政府候选人资格的最高位置。谈判的失败和随后的罢工将使这种权力的要求变得刻不容缓起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宣言里概括说：惟有这种新联合才同时可信地使青年人接近政府的目前的趋势，才可能使法国终止混乱，重新回到正常的局面里。当然，在这种假设里，共产党人同样有给人们带来一份本堂神甫薪金的可能。法共认为在一个不安定的国度里，上述组织的存在只能使事情复杂化。面对这一切，法共认为再不能犹豫，不能像这样下去了。

将近凌晨3点半，又过了一会，工会与政府的谈判重新开始，讨论仍然在细节问题上磨蹭，总工会副主席克拉苏茨基忍不住站起来做了一个大手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好啦，必须停止这些细节的争论。”^①从这时起，一切讨论加快了。将近4时，希拉克与塞吉再次单独地交谈，但内容不为人知。只知道希拉克再次谈到政府的外交政策问题，这正是总工会内部所忧虑的敏感问题。年青的国务秘书希拉克既抓住总工会的敏感问题又抓紧向让步的最大可能性前进：50%的罢工日付给工资；敲定在六个月后实行底薪制；社会保险的医疗费自理部分减少5%；并交议会讨论批准社会保险条例。塞吉表示同意。作为交换，他放弃工薪阶层的底薪制要求，并取消了社会保险条例中的两个使政府感到最为难的要求。随后会议讨论通过，希拉克走过去给总理递上一张纸条。协议达成^②。

凌晨4时15分，组成了两个委员会加速谈判工作。7时40

① 作者与让-马赛尔·让纳内的谈话。

②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分，各代表团重新坐定，人满为患，疲惫的蓬皮杜有点结巴地宣读格勒内尔《议定书》。但工会都还没有签字，它们需要回去征询基层的意见。这次谈判的一切文献将像《格勒内尔议定书》一样保存下来，这是国家社会历史中的历史性日子：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提高35%，工资立即提高7%，10月1日再提高3%，劳动时间稍有所减少；工会组织在企业里正式存在；退休制度有所改善；实行家庭补助金和单独的工资津贴；职业培训费用将由企业支付。

国家经济为冲突所消耗，但还没有崩溃。通货膨胀的危害将主要由高薪者承担，法郎稍后必将贬值，在后来的11月，产生了极大的恐慌。蓬皮杜为恢复平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法国将永远记住他。

还必须解决复工的问题。在大厅出口，蓬皮杜挽住塞吉的手：

“您认为将很快复工吗？”

“我认为劳动者将从这个众所周知的协议中找到几个不足的方面。”

“他们的意见和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向他们阐述的方式。”

“我会客观地阐述我们讨论的内容的。”^①

据可靠资料来源，塞吉终于同意在星期二复工^②。正如这真实的消息一样真实地，他一头钻进小汽车里直接奔赴比扬古，向工人阐述《议定书》，然而，等待着他的将是大大的失望。

^①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② 见非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第二十章 从比扬古到沙莱蒂（5月27日）

清晨，塞吉穿过清凉的巴黎直奔比扬古，这时，他才勉强有点时间在一张纸上写点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工人罢工的堡垒面前的报告将是决定性的，这竟使这位工厂集会的老手有些怯场起来^①。

塞吉的错误让步所带来的

塞吉还不知道自己的赌注已经下了。由于雷诺吉的真正老板法国总工会雷诺工会的书记埃梅·阿尔贝尔根据不确切的传言，认为谈判还在继续，仍按照昨天晚上制定的策略强调继续罢工。罢工工人在6时和8时之间到达了罢工现场，工人散发着连夜印刷的传单^②，传单的标题是：“坚持罢工直到胜利”。工人们读着传单：“我们号召雷诺工人在下面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普遍增加工资的基数使每月工资达到10万旧法郎^③黏上；恢复每周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不减少工资；工人到60岁退休”等等。只等格勒内尔的谈判代表团回来，工人们都认为完全胜利是必然的。昨夜零点半，工人们听说塞吉表明放弃罢工日的给薪、底薪制以及废除社会保险条例的要求，就认定要么完全胜利，要么继续罢工。

埃梅很符合逻辑地登上讲台对工人们简单地宣布：“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号召劳动者们继续罢工。”人山人海的工人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埃梅列举下列

① 同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世尔版，1972年。

② 由阿德里安·当塞特印制传单。

③ 旧法郎为新法郎面额的100倍。——译者

要求：付给罢工日工资，拒绝普遍工资在1000法郎以下，坚持底薪制和废除原社会保险条例。每项要求都得到工人的欢呼。这时埃梅还不知道塞吉在上述要求上已让了步^①。他寻找塞吉的影子，发现塞吉还没到场，他把麦克风递给弗拉商。弗拉商这位老战士于是投入地讲述30年代以来工人斗争的艰难发展史。工人们聚精会神地默默地听着。正在这个时候，来自总工会的一个电话告之协议已经达成，这个消息还需10分钟才能传到讲台上。这太晚了。民主工人工会的安德烈·让松讲话，他号召工人与学生们团结起来，但没多大反应。他要求继续进行革命运动，接着讲述民主在企业经济领域在国民中的进程。“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当时在集会上，这种强烈的呼声不断高涨。

在这种气氛下，塞吉和德尚抵达比扬古。他们能扭转这种局面吗？这当然不允许有任何错误来进行试验了。塞吉夺过麦克风，慢慢地列举协议的要点。大家用沉默接待他，相反地，资方的每条拒绝都引起长长的嘘声。塞吉索性泼下一盆水：“资方已经要求我们是否能立即发出复工的命令。”全场一片喝倒彩的声音，等于回答了一切。

于是塞吉沉着地解释总工会从没发出罢工的命令，所以也不能发出复工的命令的原因。大门等待打开：只要劳动者们自己能决定复工，就表明不是总工会在推动罢工。但罢工者们不理睬这种细微的差别。工人们认为，只要总工会不发出复工命令，就继续罢工。塞吉毫不退让，试图强调协议的要点，但他已感到很难继续讲下去，只好勉强解释协议中其他令人满意的部分。工人们不理睬他，当即投票通过继续罢工。一切与总工会和蓬皮杜的希望相反。

^① 见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共和国史》（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1年）对这次集会进行了详细的记叙。他利用了集会现场的全部录音。

晕头转向

真正的恐慌开始了。上午，雪铁龙汽车制造厂、南方飞机制造厂、罗迪亚瑟塔工厂决定继续罢工。到中午仍没一点显著的复工迹象。格勒内尔的谈判完全失败了。从上午起，电台就把这些通告全法国，同时广播工会——政府的协议以及被罢工者拒绝的消息。对于极端不安的舆论来说，周末的谈判如同最后的希望，现在被基层工人拒绝了，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控制的。令人晕眩的革命使全法国人感到震惊。在一部分人看来，法国总工会突然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恢复秩序的象征，怎么基层劳动者却暗中掌握了决定权？在另一部分人看来，这将打开制度变革的大门。对蓬皮杜来说，是糟糕的，表明了他不能带来平静。如果孟戴斯能使罢工停止，他可能会去做。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全面颠覆的形势。对另一部分人还意味着这一切将完全疏通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学生暴动者们这一次将凭借工人掌握政权，政府将倒台，而革命者们将重新找到国家的元首。科恩-本迪人主爱丽舍宫？一切都是可能的！

家庭主妇们频频光顾超级市场，焦躁不安地充实自己的冰箱和食品橱，贮存食糖和面粉。一些银行不得不关门，不能应付钞票的需要量。为了争夺汽油的战斗变成了全面的游击战，大批作弊者携着导油管 and 桶罐在停车场上偷油。一些有钱的巴黎家庭受古老谚语“战争期间，惟一不挨饿的是农民”的启示，撤向他们在农村的屋子。另一些人忙于收拾自己的黄金、首饰、证券、货币，匆忙踏上靠近边境方向的道路。由资深戴高乐派积极分子组成的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不得不面临强有力的参与。人民民主的幽灵在法国徘徊，混乱出现，法国摇晃地走向内战。

格勒内尔协议为什么被工人拒绝？昨夜塞吉的错误退让并不能解释一切。即使没有昨夜的错误让步，要雷诺接受复工同样是

很困难的。协议本身并不那么会激起工人继续罢工，而是那天有另外的事在工人阶级领导中发生。一件对人人都有威胁的事是明摆着的，罢工者的要求实际上是难以表达完全的。塞吉可能有点过分地承担了指挥的责任，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能在企业里叫牌，说谈判与基层工人的意愿不一致，他们在凭空谈判，好像在那个时候，罢工等于总工会本身，好像对这种社会秩序的神奇中断显得过分的承诺包办。所有的工人都在高喊一句话：“我们不答应所有的工资只增长10%。”领导者过分地理智，在那天人民尖利的眼光下，格勒内尔的协议结果是可笑的。看来，还需要整整一个月，法国才可能复工。长期的谈判，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将接踵而来。工薪的法国并不想马上中断它的长假期，也不想走出它的梦想。但形势又将不是革命的，因为缺乏暴力、仇恨和夺取政权的欲望。然而将有一阵骚乱，因为人们在一个世纪里遇上这样的机会只有两三次。

这天上午，在为讨论公民投票而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怀疑主义占优势。因为在国家目前的状况下，投票的具体组织是不可能形成的，部长们都怀疑这一点，而戴高乐却丝毫不为所动。蓬皮杜仍然想保持斗志。希拉克已要求再见塞吉，但塞吉没有答复，他是在衡量拒绝再谈的时间长短，权衡着人人都在逃避的局势。

面对政府的软弱无力，被局势搞得晕头转向的反对派不得不采取各自的措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三个星期过去了，当局仍然没有一点有作为的趋势。巴黎已被盛大革命日的气氛所笼罩，当时的气氛如同装上炮架的大炮，人们幻想倍增，一切策略正在确定。由于异常的竞争形势，左派重新向一些官方大厦进军，竟然没有一点干扰地到达那里。这个充满历史的政治阶层正目睹着前辈篇章的巨幅图景从它面前经过，这景象就是拥入堡垒，掀翻宝座，权威顿失，刹那间掌握政权的历史画面。那8月10日的疯

狂人群^①，缪拉^②的投弹手，从厄尔巴岛^③的归来，市政厅的阳台^④，一切政府垮台，一切合法性被打破，这一切在骚乱者的记忆中隐隐约约地重现，被制度的破坏者狂热地沿用，使他们深信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将在一天内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幸运地参加了可载入史册的大骚乱。

法共的不安

几天以来，有三条道路，三个危机的出路，三种策略交织在左派的面前：对法共，对密特朗，对孟戴斯的设想。法国总工会掌握着罢工，比扬古的挫折并未改变它对运动的控制。政府还在进行一些让步，乔治·塞吉的总工会仍然在尽力复工。这永远是最优的解说词：法国共产党总是付出重大代价挽救政体。权力总是与共产党擦肩而过。塞吉从比扬古返回，与罗歇·加罗迪^⑤碰头后，便在星期一召开特别会议向法共政治局汇报。根据他调解的结果，瓦尔德克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结论是坚定的：“必须寻找着陆点。”塞吉回答：“我会的，但可能会被打碎。”

既然知道会被打碎，就必须抓住时机。于是，一切围绕着法共加速行动起来。学生们是无法预料的；密特朗和孟戴斯在疯狂地行动；无能的政府只能完全孤立地运作，至少在法共还来不及

① 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众集会，推翻君主制，国王被“停职”。

——译者。

②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时代前夕的法国著名将军，一个农民的儿子，拿破仑就是依靠他的军队登上历史舞台的。——译者

③ 1815年2月，拿破仑从流放地厄尔巴岛归来，巴黎万人空巷，欢迎拿破仑。

——译者

④ 1873年3月18日，巴黎公社战士占领市政厅。28日，20万人在市政厅广场集会，宣布巴黎公社成立，市政厅阳台成为集会主席台。——译者

⑤ 与作者的谈话。

向它抛出救生圈之前。法共于是把第二支剑——“人民政府”投向火炉，假若有一个新政权从罢工和骚乱中非常偶然地诞生？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如果权力从天而降，当然不能拒绝。假若真能这样的话，法共明智地认为自己也不能单独掌权，否则将会激起内战，必须开始合法、和平的战略，必须与其他组织联合起来，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领袖们，摩勒^①和比耶尔^②是两个关键性的重要人物，还有脾气不好的密特朗，这个人虽然暂时没有组织可依赖，可是惹人讨厌。自1965年以来，法共就养成了注意密特朗的习惯，这个人疑心重重、独往独来，但注重现实，他需要法共的票数，如果他认为有机会，而且与他内心深处秘密的反共主义不太冲突，他会付出代价争取法共的票数的。于是，当法国总工会试图拯救戴高乐的时候，完全出于点缀自己的需要，瓦尔德克写信给密特朗，而密特朗收到这封信之前，这封信已变成了公开信，这更说明了法共在耍手段。瓦尔德克建议：“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人民民主联盟的政府。”政府形式是相当温和的。五六年以来，法共为了在共同纲领方面有一个谈判的开端，一直在申明团结左派的愿望。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趁势建议推举政府的候选人，这是经过长时间冷静考虑的。

临界温度的差别往往改变一切。在1968年，法共的力量是异乎寻常的，然而它的表现从这以后甚至最应受到尊敬；它与苏联的联系是不容置疑的，但社会党的民主骑士们以后与法共签署共同纲领和组成政府联盟，仅仅是新社会党开端的需要。在

①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旧社会党的总书记吉伊·摩勒，在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内。——译者

② 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内的重要领袖之一，激进党负责人之一。

1968年，法共极度不安，不仅仅因为右派，主要是因为左派。

密特朗一般不会同意共产党的建议，除非政治上迫使，或者在某种尝试中，密特朗能与法共同船，但条件是自己处于少数或第二位时，需要法共的支持。

密特朗的策略困扰是左派的“重新平衡”，即清楚地显示他的民主极端的加强和法共斯大林主义极端的改良主义的削弱。

那一天，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密特朗会见共产党的领袖，但最终拒绝讨论瓦尔德克的信。密特朗在与社会党人和激进派达成协议之后，宣布他将在星期二发表声明。他提议在他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之后再召开有关会议。

孟戴斯在跑道上

在拒绝与法共联手的同时，密特朗知道应该尽快地确定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因为在他的背后，孟戴斯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统一社会党的战略家马克·厄尔贡是雅克·索瓦热奥的导师，是支持孟戴斯联盟的骨干之一。学生们已几次拜访了这位前议会议长孟戴斯，好几个中间派知名人士互相串通以个人身份支持孟戴斯为候选人，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支持这种假设。比扬古的工人拒绝“谈判议定书”引起了恐慌，一直影响到戴高乐派活动的中心，人们在寻找顽强反对第五共和国的意外支持者。政府高官，孟戴斯的朋友西蒙·诺拉好几次接到被孟戴斯的恩泽所感动的议员和部长们的电话^①，都表示支持孟戴斯。戴高乐将军不得不召见孟戴斯，但旋即忘却，他们那次谈到继续罢工会使国家陷入无望的阵痛状态。

5月18日，孟戴斯与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阿兰·热斯马尔

^① 与作者的谈话。

在蒙托隆街的一个餐馆里共餐^①，这位前议会议长表示他终于满意地看到突然产生的制度的对照力量已发展为另一种推动力量，他相信戴高乐会求援于军队。热斯马尔确信有产生新的政治形式的趋势，孟戴斯对这一点是兴奋的，但他看到生产领域已被社会动荡搅得一团糟，使他担忧自己处理经济问题的经验问题。他说：“法国还不知道，它正在向退化为不发达国家的危险境地逃跑。”热斯马尔却回答：“您看，人类关系已在车间里改变。”在民主现实主义者和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对话是困难的，但他们还是有谅解和尊重。热斯马尔同样见了密特朗。密特朗保持着作演讲的有力语言：“在大街上，我们都是职业政治运动员，我们都受到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谴责。”年青的工会主席热斯马尔注意地听着，他知道密特朗在学生中口碑不好，而且密特朗也在实施与孟戴斯同样的计划。明显地，如果对话深入，在政府候选人方面密特朗和孟戴斯会有协商的余地。使学生不满的温和主义者只知道革命不能长久地沉溺于纯粹的理想中，必须有一个政治出路。孟戴斯可能是个过渡办法。

格勒内尔谈判的那个星期天，孟戴斯赴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弗朗西斯·卡恩的家庭晚会，实际上是在那里召开会议，因为已得知学生们还要示威的消息：在知名人士雅克·莫诺和姆格尔·马蒂的帮助下，学生与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和有关警官穆里斯·舒曼进行了谈判，允许他们在一个封闭的地方示威^②，就是在沙莱蒂体育场，这里既远离中心区又接近拉丁区。

在卡恩家里还有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代表，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代表戈南和埃德蒙·梅尔以及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雅克·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②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索瓦热奥。他们现在的议程是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索瓦热奥第一个发言：

“有人向我们提出有魔力的人物，有魔力的人物密特朗，有魔力的人物孟戴斯；必须向全体居民提议而不是向另一个政府提议，但所组成的政府应该是对企业的劳动者有效的政权。应该由人民来决定。一旦人民组织起来，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这话不实际。”一个工会干部说。

大家争论着，孟戴斯保持缄默，显然缺乏勇气，因为缺乏现实的气氛^①。过了一会他说：

“政权正在分崩离析。法国人不再由议员来代表他们内心的意愿。形势是革命的，为了寻找出路，必须筹备一个完全是左派的政府，包括巴黎公社式的战士和共产党人。假若需要我与戴高乐派政权作战，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解决危机进行尝试。”

学生们对谁接班的问题是否一致，索瓦热奥一点也不想知道，他对孟戴斯说：“开诚布公地说，你惟一可能为国民效劳的机会是在革命的形势下。”

大家散会，没有找到任何解决办法。民主工人工会代表戈南对索瓦热奥说：

“您本来是同意推举孟戴斯执政，并完全同意他承担艰难的使命。”^②

同一天，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同样进行了争论。索瓦热奥和厄尔贡认为必须保持运动的主动性，甚至不管在某个暴动的夜里如何重新跌落。乔治·蓬皮杜在上周六发表了声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② 见阿兰·佩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1968年5月事件》巴黎政治学院高等教育文凭论文，1969年。

明，但第二天仍然发生骚乱。一切新的集会都在被禁止之列，格里莫虽然知道一切命令都不起作用。但学生领袖们没有发动更不得人心的活动，因为他们已感觉到24日的夜战有损他们的声誉。后来他们曾说：“自24日以后，我们就在终结。”^①从那以后，学生领袖们有了新的考虑，即在封闭的场所集会，孟戴斯上午参与协商了这件事。学生领袖们与经济国务秘书罗朗·农热塞协商，农热塞支持这种想法^②，格里莫也赞同，但他将防备学生用这种方法反对将军，于是，才有后面的沙莱蒂体育场大集会，一个克制冲动，没有失去控制的和平的大集会，一个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起码改变了法国的大集会。总工会同学生领袖们联系想加入这个集会，遭到拒绝；总工会中一些人将自己组织一些近卫队以集中想干的工人与“冒险主义者们”再联合。总工会的这些人稍后将形成左派主张的队伍以及“第二左派”队伍，因而才有后来的让蒂利门的偶然形势，找到与孟戴斯重新联合的道路。格勒内尔和复工并不是革命者聚会的场合，沙莱蒂体育场就这样成了孟戴斯主义^③者聚会的场所。扩音器里讲得很清楚，这将是前议会议长的第一次大的公开行动。面对畸形政权，孟戴斯显得颇得民心，因为由这个人接班是理所当然的事，惟有他有能力控制这种谁都在躲避的形势。

一切都是可能的

将军了解了沙莱蒂体育场集会协议的情况，对允许在封闭的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②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③ 总而言之，孟戴斯主义的宗旨是使法国适应现代世界，有大国气派，富有民族色彩并卓有效能。——译者

地方集会大发雷霆，所有的部长也都惊叫起来，反应相当强烈！但戴高乐还是让了步，条件是必须在一个封闭的地方集会，参加者必须在集会之后立即散开。警察局长格里莫大喜过望^①，因为在前一天的协议中就有这样的措辞。总统的裁定带来了另一个巧思：陪伴伟大领袖戴高乐穿过荒漠的绝对忠实的秘书奥利弗·吉夏尔认为将军有潜在的活力。在他看来，沙莱蒂体育场的集会是孟戴斯的活动，密特朗一定在不远的地方坐立不安，再没有比老对手所激起的力量更旺盛的了。吉夏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②一直还不觉得，他们是在为国效劳^③！”正如米索夫和吉夏尔在星期六所理解的，尽管宿敌们产生影响的情形激起了将军的盛怒，却决定命运地卷走了将军的气馁，使他振作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喊沙莱蒂万岁！

18时，橄榄形体育场绿色的中央草坪上挤满了混杂的政治人群，颇为壮观。人们高喊：“工人政权！”“社会革命！”“我们继续战斗！”充满激情的幻想在跑道上白色的起终点之间涌动。运动场正好在大学城和克勒曼大道的国营飞机动力机研究制造公司（SNECMA）之间，这已经是一种由学生带来的起飞象征。三万多人拥向观礼台和用细煤渣铺的跑道，无政府主义者在跑道上奔来奔去，少女们骑在男孩子们的肩上摇晃着红旗。一些职员、干部和一切感到新奇的居民也都来接受政治烈火的洗礼，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当工人代表团，弗兰的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南方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以及里昂信贷银行的职员进场时，激起一阵阵喝彩。一些工会会员高喊：“塞吉辞职！”比扬古的工人在沙

①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② 指孟戴斯和密特朗。——译者

③ 奥利维耶·吉夏尔：《我的将军》，巴黎·格拉塞版，1980年。

莱蒂煽动^①。

东道主全国学生联合会索瓦热奥首先致辞。同一时间，法国总工会主席塞吉在收音机里讲话，他宣布准备再与政府谈判。两个战略家继续对抗。索瓦热奥竞技状态良好：“我看到盗贼^②已经大批地来了。”笑声顿时席卷全场，“国家暴力可以证明自己无罪。今天，我们不再相信它是有效的。政府已经寻找到了同盟者（笑声），现在政府又在寻找工人和学生的分裂。”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纺织工业分会热情的领袖弗雷多·克鲁诺夫接替索瓦热奥发言，然后是穆里斯·拉比发言：“我们要求不谈判，这就是征服。”卷起一片欢呼。轮到安德烈·巴尔若内发言，就是刚辞去总工会经济顾问的职务，加入统一社会党，一夜成为有争议的英雄的那个人，体育场登时沸腾起来，巴尔若内斩钉截铁地说：“形势对我们来说是革命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当马尔索·皮韦尔的影子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人群狂喜，他讲道：“依靠行动委员会，一切都是可能的。发动同一组织的人组成同业行动委员会，你们将登上舞台。今天在这个体育场上点燃的火炬，不再会熄灭。”

这时，孟戴斯来到离观礼台不远的地方，由他的秘书基耶日曼和和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罗卡尔陪同着。为了鼓励大家，索瓦热奥于是转向前议会议长，邀请他上台讲话，孟戴斯拒绝并说：“不，这是工会集会^③。”但索瓦热奥对这种习惯说法表示不满，他向这位集会的发起人明确说明与会者都是您孟戴斯的密使，需要您讲几句话，索瓦热奥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出于有关的默契？他比统一社会党的长辈们更贴近运动，他认为这种僵局完全可能

① 除健在者的证词外，所有发起人都对沙莱蒂体育场集会都有叙述。巴克曼和里乌的记叙最为生动，还有阿蒙和罗特曼的记叙。

② 指法国总工会主席塞吉等人盗取运动果实。——译者

③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与政客们的某种收回十分相似，索瓦热奥明显地不满。此举留下许多说法，认为孟戴斯的行为过分固执，至少对他的朋友们，以至表现在大庭广众的台前。

前议会议长的出场后来同样受到指责，因为陪同他的罗卡尔的统一社会党以整个左派的名义参与明争暗斗。左派从此更喜欢抓住 莨蒂精神，即在那种现场下的组织形式，与革命的某种非形象、结构相类似的东西。对极左派来说，从此开始五月后十年革命幻想的长期历程：沙莱蒂变成一种空想的开端，一个革命前夕的傍晚，人民在造反的熔炉里熔融的幻觉和走向政治冒险的起飞跑道。对“第二左派”来说，同样是一个创始行动。对左派演说家们来说，如同看到了雄鹰在苍穹里展翅。一个人以锐利的目光全神注视着，他就是在左派的小世界里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的米歇尔·罗卡尔，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在改良和革命之间，他在开端遥控着路线，后来被沙莱蒂集会背后的议论甚至搞得疲惫不堪，他表面上与学生领袖们一直保持着距离，是个很善于耍手腕的改良主义者，第二天他不得在公开的场合单独地作作样子，他同时引起了法共、左派分子们以及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注意。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 20 年后说：“一切力量都汇集起来寻找政治出路，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而我们的机会，就是呼唤孟戴斯。”

第二十一章 密特朗摊牌（5月28日）

“我是候选人”

有五百多名记者和官方左派的上层在一个大厅里，他们没有出现在沙莱蒂体育场，而是围着密特朗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关于危机的声明，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是尖锐的，以他一贯的风格演讲^①：

“在法国，自1968年5月13日以来，已经没有了国家，甚至没有一些表象的权力安排来替代它……对目前的情形，我对全法国人全神贯注进行的大辩论提供以下几点思考：

“1. 不言而喻的是，拥护共和政体者将对公民投票说不……”

“2. 在戴高乐将军6月16日^②将离开的第二天，如果他不在这以前露面的话，将自然导致总理以及他的政府的消失。

“在这种假设里，我提议：应该立即组成一个临时的管理政府……”

他明确临时政府的10名人选“没有专属的，没有比例分配。”它将具有以下天职：“使国家重新运转，同时应当在大庭广众之下成为与学生和劳动者的对话者；正确地答复社会职业组织的要求；创造总统选举的实际条件。”

“若有必要，我将自觉地承担组成这个临时政府的责任。当然，与我持不同政见的人都可以合法地觊觎这里。我想首先是孟戴斯-弗朗斯先生。”最后，对于总统候选人问题，他宣布：“我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讲话全文在当时的报纸和好几部记述五月的作品中都有转载。

② 6月16日是戴高乐将军宣布的公民投票日。——译者

是候选人。”

当晚，由法国广播电视台的技术专家精心制作的仰视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密特朗下巴前倾，声音果断，同时恶作剧地配以运动受难者的蒙太奇，一副十足的乱党分子的化身^①。自这位左翼联盟的主席采取这一举动以来，就激起了某种非议，在风暴之中，他的申明犹如平地一声雷，随后将激起一百次一千次的非难。在密特朗——法兰克战斧^②、密特朗——阿尔及利亚，密特朗——天文台事件的后面，这位左派的领袖额外地聚集了一连串的攻击。参议院议长，戴高乐的反对派加斯通·莫内维尔狂怒地对激进党领袖勒内·比耶尔说：“这下将使我们失去200万张选票。”^③密特朗还是占据在一个候选人的位置，然而选举的战略家没有被召唤。人们议论纷纷：密特朗一政变，来自大街上的制造政府者。密特朗，由野心家变成了政变者。

对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认真宣读的讲话，也有另一种解释：当时总统已宣布进行公民投票，总理也及时明确地重申了密特朗所表达的内容，希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将如愿举行公民投票，议会也确实在相反意见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通过了，而且，将军在这种假设里已表示他将离开，这必须有一个使人放心的代理人。密特朗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确：在新总统选举期间，参议院议长加斯通·莫内维尔将赴爱丽舍宫主持国事^④。作为左派

① 作者可以验证这些“镜头”是操纵的结果。

② 法国古代战斧，1940—1944年的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曾以此战斧为标志，密特朗曾涉嫌为该政府服务，并传言曾获该政府颁发的“法兰克战斧”勋章。参见第十三章第二节译者注。——译者

③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④ 这种语句形象地出现在密特朗的记者招待会的讲话全文里，戴高乐派急忙否认了。

领袖和1965年的总统候选人，这样做是很正常的事，在这种尝试中，没有一点政变之嫌。作为反对党阵线的领袖，分析国家的危机，提出选举纲领，是为了解决问题，他在他的角色之中，人们在他成为总统之前攻击他的确是错误的，因为将军离去的假设一点不是凭空捏造，甚至会比人们所预料的来得还要快。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夏尔·戴高乐将军确实处在国内不幸事件的痛苦之中^①。

问题在于密特朗呼唤一个“管理政府”的机构，使那里的一切都复杂化起来。他也没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在总统辞职的情况下，蓬皮杜政府保留下来。既或是参议院议长加斯通·莫内维尔也不能任命组成其他的政府，除非总理和他的一班人也辞职。涅夫勒省的议员的讲话因此招来批评，他认为蓬皮杜政府将随总统辞职“完全自然地消失”。这种消失和自然就成为难题。人们仅仅只能假设戴高乐的离去将促使总理同样离开，但没有一点必然性，乔治·蓬皮杜的政府仍然可以决定保留下来，因为这有好处，可以保障日常事务的进行，戴高乐派可能希望在最佳的条件下准备总统选举。假若一点不说政府的另一种“消失”，必然会导致另一种力量的产生，或者是特殊的情况，迫使政府消失。在记者招待会上，密特朗的讲话是坦白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明显，罢工和大街上的压力将迫使蓬皮杜离去。在公民投票之后，也可能在之前，因为在他的讲话里精心设置了这种假设。这种可能性从他的整个意图里流露出来：我们正处在黑色恐慌之下，密特朗的计划不单是从公民投票失败的政治前景出发。他的提议有即时提案的价值，即使这种提议在他讲话的正文中表达得不那么严谨。密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回忆录《我的历史真相》（巴黎·法亚尔版，1970年）里逐条回答了他的指控人，在他给阿德里安·当塞特的信中也讲得很清楚，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特朗面对强大的法共和在左派中（甚至在右派中）意外得人心的孟戴斯，处于脆弱的地位，而且在战略上处于面临抉择的关口。至于汇集共产党人以及孟戴斯率领的传统非共产党左翼力量，没有任何比密特朗更合适的了。在1965年的总统竞选中，由于总统候选人德费尔的失败，给密特朗打开了一个有限的缺口，能使他竞选到最后。那时，共产党人和孟戴斯在既成事实面前，如果想保住他们的既得权力，就必须把他们的选票转给密特朗。由于大批选票的支持，取得了偶然的全面胜利，使密特朗幸存下来与戴高乐对抗竞选到底。如今，由法共掌握的权力反对“五月潮流”，由孟戴斯的名义号召欺骗学生们，这使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满意，也使中间派放心。然而，以孟戴斯来号召，毕竟不能干大事。

在这种逻辑严密的操作里之所以使人感到烦恼，是因为政府的“消失”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必具备任何条件。密特朗以合法的政治程序行使某些自由权，而且运用得那么简洁明快，就犯了大罪？就是反民主的阴谋？这是不公正的。再说远一点，在这位左派领袖的前面同样有一个最富争议的活榜样：10年前，戴高乐将军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告，申明着手进行权力转移到他手中的“合法程序”，也是没有任何选举，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力召唤，没有任何合法的名义允许他去做，惟一的“合法性”是他能够控制阿尔及利亚军事叛乱者的政变形势。比较之下，密特朗的“程序”则是一个死扣法律条文的典范。他只是在这方面犯了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他有过失败。

法共理所当然地根本不欣赏密特朗的讲话。当密特朗委托沙托·希农转告法共要求会见时，法共特使兼律师博尔凯太太星期天拒绝了^①。上周一，当巴黎郊区的代表们要求举行一个即时会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议时，也是被法共冷冰冰地接待了一下。法共就这样从收音机里获悉它的联盟者密特朗的计划。这个计划勾画了一幅奇妙的前景，好像为大西洋主义者孟戴斯-弗朗斯还保留了一个候选人的位置，即使在党不提名的情况下。于是，在刚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共以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公报，其坦率令人瞠目结舌：“在法国，不存在左派政治，也不存在没有共产党积极参与竞争的社会进步；何况更不存在没有共产党而走向社会主义的严谨打算，而且像沙莱蒂体育场集会那样反对社会主义的努力太少了。我们不同意出现一个以超越为借口的不符合要求的权力取代现存的政权。我们不同意开辟听命于美国政治的政体道路。”人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表达：左派掌权，可以，孟戴斯不行。

17时，共产党在它的机关驻地利勒大街会见左翼联盟的战士们。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虽然不高兴，但还是说：“如果你们能够自觉地接受临时政府的领导，那就没什么问题了。”^①他们讨论着临时政府的组成。密特朗预计未来的临时政府里将有10名共产党的部长。瓦尔德克说：“这太少了。”但共产党对这种安排没作根本的反对。惟有孟戴斯不满。第二天，他将再发表一个公告，反对“另一个幸运者”。

事实上，共产党人并不真正相信这种掌权。法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戴高乐派会重新控制政权。对法共同样重要的还有别的方面：在工厂里，在大街上。塞吉宣布他准备再谈判，但他设置的栏杆又太高了。下午，谈判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但没有结果。共产党人等待着。为了显示力量，总工会决定于第二天29日在巴黎举行一个庞大的示威活动。首先是现时的力量关系对比。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求助于军队？

法国总工会的示威队伍经过 15 分钟的行进到达市政厅，然后转向爱丽舍总统府。共产党自己预料到这种突然的威力吗？在政府和富人区里，恐慌扩散了一个多小时。格里莫和蓬皮杜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蓬皮杜在 5 月 16 日已经进行了部署，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动员预备役军人。上午，照例举行治安内阁会议，研究军队部署。正如爱德华·巴拉迪尔^①不久前叙述的那种假设的方式^②，下达萨托里基地宪兵部队处于戒备状态的命令——1000 名训练有素并配备有轻型坦克的士兵，还有好几支外省的部队，加斯特尔和卡尔卡松的伞兵部队，土伦的海员射手们以及驻扎在蒙莱里和迈松拉菲特的摩托部队。前不久，一些部队穿过弗雷纳和伊西·莱穆利诺向朗布伊埃的第二装甲旅聚集，因为罢工的原因，他们演习步行归营。在这个白天，坦克在郊区的大路上转移不会不被人注意。这助长了军队处于戒备状态的传闻^③。然而，无论是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和他的助手们，还是内政部长富歇，国防部长梅斯梅尔，或是参谋部都还没有意图在他们维持秩序的行动里安排部队，因为他们根本未作这样的准备，充其量不过是分派部队保卫官方的一些重要的建筑而已。况且，宪兵部队的轻型坦克对镇压骚乱并不适用，它们在街头战中特别易受攻击。在让·拉库蒂尔^④的著作《戴高乐》第三卷里叙述了这些天的情况，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富尔将

① 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ur），五月的重要角色之一，蓬皮杜的社会顾问和亲信，著有《五月的树》。——译者

② 爱德华·巴拉迪尔：《五月的树》，巴黎·马赛尔·朱利昂作坊版，1979 年。

③ 让·拉库蒂尔：《戴高乐》，第三卷《君主》，巴黎·瑟伊版，1986 年。

④ 法国著名传记作家。

军表明了当时军队中这样的精神状态：

“军队首先是惊讶地目睹着这一切骚乱，然后在不安中对骚乱搀和着一点反感。不可否认的是，军队有担心、烦恼和困惑，正是这些情绪促使部队介入。因为部队从没任何介入政治领域事务的愿望，国家几近内战的边缘（1961年4月阿尔及利亚危机令人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军队完全意识到人们20年来总是面对孩子们的示威，有神经衰弱的可能并有引起灾难的危险（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的排射场景同样令人记忆犹新），面对示威，军队太痛苦，太痛苦了……”

“既然如此，我们有责任考虑到更坏的情况，我于是来到弗里勒斯军营，那里仅有一些复合部队的现役人员（隶属于海军陆战特遣队），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大概能够承担接济机动保安队的重大任务。但他们没有诉诸武力的要求，尽管某些政府内阁阁员由于惊慌失措产生过要求部队介入的念头。”^①

由此可以说，尽管法国军队历来反感承担警察任务，尽管他们心碎，尽管阿尔及利亚危机的创口还没愈合，还是准备过“履行它的义务”。但没有人要求它这样做。然而人们总是相信军队的协助，不管怎样。

调动坦克部队的谣传在巴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并不是空穴来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有他们的道理：当关系政权存亡时，国家机器会自动地转而使用镇压手段，历来是这样的，在最后的办法里，叛乱分子将倒在血泊中。

戴高乐派的示威计划

乔治·蓬皮杜还是持怀疑态度地同意了戴高乐派预计在5月

^① 让·拉库蒂尔：《戴高乐》，第三卷《君主》，巴黎·瑟伊版，1986年。

30日下午举行示威的计划^①。这是保卫共和国委员会（CDR）的组织者，忠实的老战士皮埃尔·克里格的意见。自5月13日的大示威以来，好几个不同组织的发起人试图组织起来抵制“颠覆”活动。保卫共和国委员会于5月11日由两个通常担负棘手任务的，包括选举行动的传统戴高乐派组织，即国民行动处（SAC）及其联合会为了支持戴高乐将军而创建的，由居住在索尔费里诺街5号^②的皮埃尔·勒弗朗和伊夫·朗西安发起。将军的前秘书，保卫新共和联盟的要人，上塞纳省保卫新共和联盟的议员雅克·博梅尔在他的家中特别聚集了各种倾向的秘使，这在右派中很带有特征性。5月14日（星期二），虽然大量减员但仍然很精悍的“西方运动”组织，由年青的阿兰·马德兰特别率领在星星广场游行。这个右翼小组织，虽然疯狂地反对戴高乐派，但这次自巴黎大学和农泰尔文学院骚动的几个月以来，却致力于“粉碎布尔什维克”，并准备与政府进行短暂的合作以阻击“红色”计划。雅克·福卡尔^③在他的爱丽舍宫的小办公室里，从他那一方使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忠实网络重新活跃起来；政府与议会联系部部长罗歇·弗雷^④同样与他往昔反对秘密军斗争的老战士们进行联系，由安托万·桑吉内蒂代替他四处活动。这样，1961年的政变^⑤和反政变者们为了“阻止科恩-本迪及其一伙”，在7年后重逢并携起手来。自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开始活动以来，并未引起

① 当塞特、图尔农、拉库蒂尔共同写了这个示威计划的梗概说明，见他们的书《1968年5月》《将军的五月》等。

② 戴高乐派的总部所在地。——译者

③④二人都是戴高乐的心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都很活跃，忠实于戴高乐。雅克·福卡尔时任“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司”秘书长。——译者

⑤ 指“西方运动”组织，由一些好战的赞成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分子领导。此处以“西方”代指1961年的政变者。反政变者是指戴高乐派。——译者

实际反响，该委员会5月20日发布的示威请愿书仅获35个要人的签名，仍然报送到马蒂尼翁总理府。但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电话蜂拥打到该委员会，该会的示威公告在戴高乐派要人中遭到怀疑。“你们可能有10000人，但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议员对该会说，另一些要人则建议该会不要安排在协和广场中心示威，以免广场太大使他们的参加者显得太可怜，建议他们安排在广场的旁边集会。但是，戴派示威的组织者们都充满信心，良好的愿望蜂拥而来，使他们更坚定，行动更有底。

恐慌与分裂

尽管有这些治安和策略上的安排，政府的斗志还是随意低落。布里夫的戴派议员让·沙博内尔说：“我们真像石头一样地坠落。”前一天，将军迫使内阁会议采纳了公民投票的计划，将在6月16日举行公民投票。对于大学、企业和地方的改革，计划文本给予了很广泛的公共权力。将军认为这个办法能够稳定人民对他个人的直接信任，并使人民委托他进行他认为是必然的社会转变。由此，戴高乐主义的杰作将日臻完美。在非殖民化之后，由于新宪法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将军给予他的国家以特有的社会制度，回应了时代的挑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使法国走在独创道路的前列。在将军看来，公民投票这个赌注是决定性的，而且将大大超越它即时的偶然性。

乔治·蓬皮杜的看法相反，这取决于他的角色，因为他被“形势”缠住了。他认为公民投票实际上在罢工的国度里是不可能组织的，国家处于爱挑剔的反对党的威胁之下，虽然同时赋予国家元首以更广泛的权力，可到处与宣布废除公民投票近似。蓬皮杜认为国家行政法院将同样反对公民投票。他不相信公民投票，只是不得已接受他上周五排除的假设：公民投票是传统的选举方式，很容易进行，因为在危机中任何人都将容易接受一条天

赋的出路。法国人不理解罢工如何妨碍蓬皮杜的管理，舆论也因为学生暴力和罢工的延长而转了向，开始谴责骚乱。这将是摆脱1967年议会阴影^①的机会，对多数党来说，如此有限而已。

戴高乐对这些反对派是恼火的。他嘲笑地注意着，这是左派要求的合乎法律的投票。在公民投票按区域分散进行的情况下，他掌握着公民投票的主要程序，即他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他认为人民至少会首先假定他，选举也可能是乔治·蓬皮杜的胜利，而不是他的胜利，即便如此，乔治·蓬皮杜将同样偏离胜利者。那么，他将使他的总理为五月初的错误负责，堤坝已经决开，而且不久前他已看到蓬皮杜在格勒内尔谈判中的失败。两个决斗者悄悄地对抗着。

最上层的这种分裂加速了政体的全面解体。星期二整整一天，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都在向各个政府部门打电话以稳定它们采取各自的措施组织公民投票。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再没有别的回答。在邮电部（PTT）出现了一个情况，说起来好长：在警察镇压的威胁下，罢工者们没有中断与政府的内部联系，于是有了这样一个行动，邮电部长伊夫·盖纳做出规定^②请工作人员注意划分普通罢工与暴动性罢工之间的界限，不要随意中断它们与政府的联系，如果工会组织力图使国家瘫痪，这就是对抗的信号。一个“暂时解决办法”就这样确定下来，这样，罢工者们的通讯权力一点没受到侵害。28日（星期二），在与内政部相邻的一个公共机构里，邮电传播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确保各

① 1967年议会选举中，左翼联盟获46.4%的选票，议席比上届增加63席，共121席，成为仅次于戴高乐派的第二大党，加上法共的73席，戴高乐派失去了在议会的绝对多数。——译者

② 与作者的谈话。

部与各省下属机构的联系，但有些机构罢工^①，必须用一些干部和无关紧要的人员建立一个另外的小型机构以保证通讯，这个解决办法暗含着工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将开始断裂。

恐慌同样蔓延到政治阶层。一些要人重新秘密聚集到弗朗索瓦·密特朗家中，更重要的要人则聚集到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家中^②。反对党里的中间分子都准备与孟戴斯结合，甚至打算与密特朗结合。戴派处境艰难。只是公民投票不再引起嘲笑而已。蓬皮杜的情况最坏，他看上去很镇定，实际上他好像看到地面在他脚下下沉似的。他本来准备向法国总工会完全让步，但比扬古工人的拒绝破灭了希望，战后最大的社会协调让步毫无作用。由于工会的不妥协，下午在领导层面间所进行的第一轮谈判毫无进展。对总统和总理的许多忠实者来说，十年的统治在完结。

一个附带事件的发生更证实政府处于无策之中。这天晚上，被占领的巴黎大学像往常一样举行集会。形势的变幻莫测和日趋紧张使与会者困惑不堪，辩论的局面有些散乱。突然，在校医务室里演出一幕：一个医生单独地被一个有点胖乎乎的小个头抓住，这家伙戴着蹩脚的黑色假发，他说：“我是科恩-本迪^③。”医生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那人摘下假发，掏出护照，正是科恩-本迪。医生把他带到会场上，科恩-本迪要求讲话，会议主席拒绝了，然后再次辨认他，会议主席才兴奋地宣布：“这里有个人可能能使辩论解冻。”红色达尼拿起麦克风开始讲话，全厅

① 塞弗丽娜·勒格丽与米歇尔·布吕吉埃的谈话。根据这位马蒂尼翁府顾问（后者）的说法，克里斯蒂昂·富歇当时有过向罢工者进行威胁性开枪的计划，想以这种方式强迫复工。

②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③ 作者与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谈话。

的人呆了一会，没有反应。科恩 - 本迪摘下黑眼镜，科恩 - 本迪！全厅的人全站起来，欢呼声震动四壁，持续了5分钟。红色达尼热泪盈眶：“边境线，我不在乎呢！边境线，我才不在乎呢！”他迅速恢复镇定，接着发表火热的讲话：号召到处建立行动委员会；必须以暴力回答暴力，进而打倒政府。电台终止正常广播，报道了这个新闻。

接着，由全国学联的国际联络员佩尼努和几个行李搬运工在两天内替科恩 - 本迪办理了一系列遣返回国的手续。政府在这件事上失策，现在成了笑柄。那天晚上，许多戴高乐分子入睡时还在想，他们能活到第二天——最后一天的掌权吗？

第二十二章 戴高乐失踪（5月29日）

贝尔纳·特里科是个冷血动物，一个谦恭而冷漠的高级官员，这位总统府的秘书长自危机开始以来一直保持着高傲的冷静。就是这样一个人，在5月29日（星期三）将近14时，却脸色苍白，精神委顿，焦躁不安，在蓬皮杜的办公室里，几句话像戏剧中的霹雳一样从他嘴里突然迸出来：“戴高乐失踪了！他没有去科隆贝，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①

蓬皮杜叫了起来：“那他到外国去了！”^②在这个办公室里，将军的亲信沙邦-戴尔马、罗歇·弗雷以及奥利维埃·吉夏尔都与总理谈过将军可能崩溃的问题。他们都很震惊，戴高乐失踪了！立即打电话给将军的另一位亲信福卡尔，也毫无所知^③。问地面防空部队，只知道将军的直升飞机朝圣迪济耶方向飞去了，在那儿加满油以后，将军的云雀3号和护航机突然下降以躲避雷达的探测。询问国防部长梅斯梅尔，他发怒地：“我什么也不知道，问蓬皮杜去！”必须承认难以置信的明显事实：戴高乐失踪了。

蓬皮杜从上午就有这种阴影的预感。9时15分，特里科给总理府秘书长多内迪厄·德布雷斯特打来电话，通知他说，将军决定把照例的星期三10时的内阁会议推迟24小时。当时，多内迪厄·德瓦布雷斯特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汇报：将军疲劳了，他已出发去科隆贝休息24小时。内阁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下午。蓬皮杜在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另见作者与贝尔纳·特里科的谈话。

②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的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③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他的回忆录^①里写道：“我立即感到极其忧虑，长期以来，我了解将军的心理变化，也了解他周期性地想辞职不干。我知道科隆贝的气氛多么有利于促使他实现这一愿望，而且戴高乐夫人多年来就希望将军退隐。然而，在5月29日这天上午，辞职的假设就像一场灾难摆在我的面前。”戴高乐不在，参议院议长将代理总统，就是长期的反对派加斯通·莫内维尔。本来有点把握的内阁会议无疑地将在反戴高乐派的阵线里翻倒。这将是戴派的终结。

“我拥抱您”

上午，蓬皮杜曾怀着惟一的念头给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打电话，想使将军在离开之前签署解散议会的命令。假若将军在科隆贝闭门谢客或宣布辞职，一切都晚了。特里科答应尽力去做。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抓紧起草解散法令，但特里科总没打电话过来。将近11时^②，蓬皮杜又与特里科联系，这位爱丽舍宫秘书长暗示自己很为难，因为将军与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在一起，闭门谢客已有1个小时了。其实，蓬皮杜刚刚挂上戴高乐给他的电话，将军说自己三夜未眠，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安静地思考一下，明天将按照预先考虑的方式进行。当蓬皮杜一涉及到解散议会的问题时，将军回答说：假若我们没有能力控制公民投票，我们将同样失去议会选举。即他不同意解散议会。接着，将军突然换了声调，对总理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像往常一样，说他有前途，说：“除意想不到的情况以外，前途是有的。但我对您说，我会回来的。”然而，当蓬皮杜可以说话时，将军突然说：

①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的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我拥抱您。”并挂断了电话。蓬皮杜感到震惊^①。将军拥抱他？这话竟如此出乎意料！总理只有紧接着打电话给特里科，强调解散议会的问题，特里科回答：“太晚了，将军和戴高乐夫人在走廊里。”他们只有商妥协蓬皮杜办公室的一个成员携解散议会的法令去科隆贝见将军。

14时总统失踪的征兆使蓬皮杜更肯定了自己的凄凉预感。将军因气馁而消逝，他走了，这令人惊恐的情景无情地矗立在他面前。这天下午，总工会的队伍在巴黎行进，罢工更加壮观地继续着。孟戴斯和密特朗似乎互相看到他们中的一个已经走进马蒂尼翁府，另一个走进爱丽舍宫了。科思-本迪则当着警察的面重返巴黎。三周以来，总理时刻在遭受感情的侵袭，面对骚乱时他是内政部长，面对学生时他是教育部长，面对工会时他是劳工部长，在议会上排除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则是联络部长，还有财政部长德勃雷的背叛。资深戴高乐分子暗中攻击他的行动，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总围着将军不停地说他的坏话。他总是优柔寡断，而一会儿的工夫，好些多数党成员叛变，聚合在孟戴斯的麾下。现在的关键是脆弱的政体在遭受风暴的摧残，在他的身旁崩溃。在危机之初，乔治·蓬皮杜还能耍他的牌，使人相信他的能力和活力，人们还把他当作戴高乐主义的救星和无可争议的接班人一样敬畏。然而到这个星期三的14时，赌注都输光了。将军完结了，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他最阴暗的时刻。

继 任？

然而必须坚持下去。形势是空前未有的，戴高乐失踪了！悲剧转为闹剧，蓬皮杜成了大笨蛋。总统失踪的消息不可能长期保密下去，政府应该走在前面，以国家的名义公布这个消息。然而

^① 蓬皮杜显然是这次谈话的源头。

总理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无论如何，决定第二天在电视上宣布，蓬皮杜还不知道怎样宣布为好。但适当宣布可以赢得24小时的时间。14时30分，构成议会多数派的两个组织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独立共和党组成的代表团来到马蒂尼翁府，为了促进解散议会的假设，蓬皮杜接见了他们。在10名代表，两个组织各5名的代表团面前，蓬皮杜平静地报告形势以及内阁会议延期、戴高乐去了科隆贝的情况，惟一省略了不知道将军在哪里^①。

蓬皮杜继续讲：直到现在，共产党并没支持全面暴动，但自从格勒内尔协议被比扬古的工人抛弃以来，某些情况有了改变。无论是塞吉还是其他工团主义者都谨慎地没有再准备坐下来谈。现在他们改变了主见以及共同的温和主义倾向，包括瓦尔德克·罗歇在内，面对革命的形势，共产党曾希望拯救戴高乐，但现在准备抛弃他。共产党将在两种解决办法之间选择：希望建立一个由孟戴斯或密特朗领导的联合政府，利用过渡状态强加它的主张和被接纳进入政府。或者在罢工和大街上的压力下，共产党自己掌握政权。蓬皮杜补充道：这就是我们将面临的革命形势。

蓬皮杜不相信人们议论了许多年的国民联合政府在目前是个解决办法。另外是埃德加·富尔^②，也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蓬皮杜给他打了电话，他对蓬皮杜表示坚决拒绝考虑参加联合政府。蓬皮杜结束讲话：迄今我已尽到了我的力量，现在我们都到了说真话的时候，我希望听听你们的见解。

埃纳省的戴派议员居伊·萨巴蒂埃首先发言：

^① 《将军的五月》(让-雷蒙·图尔农著，巴黎·普隆版，1969年)及《1968年5月》(阿德里安·当赛特著，巴黎·普隆版，1971年)详细叙述了这次会议。

^② 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激进党领袖之一，1955—1956年曾任第四共和国的总理。——译者

“如果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就该我们瞧着他们干。必须立即阻止。”

这时，某人提议在骚乱的情况下下达开枪的命令，“这对有人希望的战斗而言，正是一种回应。”独立共和党的雷蒙·蒙东和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闻此言大叫大嚷起来：

“这是疯了。这是加速破坏，这是为全面暴动提供理由和借口。”

亨利·雷伊^①对总理表示自己的信赖：“您必须发生影响。”

蓬皮杜回答：如果戴高乐能离开，他将按自己的决定做，“必须能让我实现我的计划。”

于是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的一个议员走得更远：

“您必须带头，并且需要您挑明戴高乐应该离开。在我们能够做到的程度上，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比他离开更好。如果形势需要的话，您应该成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②

对一向严格服从纪律的戴高乐分子来说，这次辩论成为蓬皮杜分子反对将军的阴谋的证据，好些文著都引用过。它们认为在危机期间，蓬皮杜的整个姿态就是要掌握一切权力，不理睬将军的命令，处于权力的真空中，成为总统的缓期反对派。人们不了解这是蓬皮杜在这位议员紧迫下的回答，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戴高乐在哪里，甚至担心有更糟的情况发生。他必须首先挽救政体，因此不得不如此回答。

独立共和党已经推出它的年青领袖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此时有些急迫地希望看到蓬皮杜达到最高的职位，以使它的领袖有出任总理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它的党员们站在德斯坦的立场上说话。波尼亚托夫斯基和蒙东的意见是一致的：

① 亨利·雷伊（Henri Rey），戴派政党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主席。——译者

② 根据许多传闻，这位保卫第五共和国的议员可能是阿尔班·夏朗东。

“如果戴高乐离开的话，相信由您来继任可能易使人们产生错觉。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必要首先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进行选举。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支持您的。”

蓬皮杜以结束谈话的口气说：“现在必须等待将军的决定。但是根据我所看到的他这最近几天的精神状态，并不排除他离开。那么，我将尽到我的责任。”

离去时，这两个组织拟定了一封给总统的信交给蓬皮杜转呈，恳求组建联合政府，并要求进行合乎法律的选举。蓬皮杜对此很欣赏。然而总统在哪儿呢？

孟戴斯掌权？

如果蓬皮杜下台，孟戴斯就可能上台。在5月29日这一天里，前议会议长孟戴斯大概自以为理所当然地该重新出来掌管事务了。尽管据说他服务卓越，但12年以来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①。然而奇迹正在发生，从骚乱中诞生的第五共和国都顶不住骚乱的轮回。左派可能掌握政权，孟戴斯就是左派的头。

这天下午，围绕着这种假设，孟戴斯分子分头行动。首先是法共的态度。法共相反地被认为是这种政体中的胆小鬼，没有走出合法树林的打算，至少目前不。法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官方的一些建筑物，使经济最终瘫痪，建立新政府。问题在于法共担忧以后怎么办？在台上如何顶得住必然由国家掌握的警察和军队的暴力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非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的民众反对的形势。

这天上午，一个非常事件向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报警。法国总工会电力分会引起停电停水。28日（星期二），巴黎地区从14

^① 孟戴斯曾在1954年6月19日—1955年2月5日任第四共和国的总理。

时到19时停电，星期三从9时30分到11时停电，随着14时又开始停电。是电力工会单一地采取行动？还是正如法共以前所经历过的那样使局部罢工慢慢地走向全面罢工？或是共产党人在通过逐步的全面罢工走向暴动或罢工？接着，总工会安排它所掌握的巴黎地区的出版业突然发表恶意地攻击民主工人工会的文章。29日下午，民主工人工会的总机被切断了^①。欧仁·德尚大怒，派人前去特律代纳的邮电部门查询，那里回答说有些技术问题。德尚难以抑制愤怒，给总工会打电话，并威胁要派得力的人手去查询技术问题的所在。总工会才不再坚持，民主工人工会的总机线马上被安装起来。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看来有把自己假设为正处于垮台状态的政府的智囊团的意念，它们下午的示威游行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意念：一系列的口号在它们的队伍里铺开，诸如“人民政府”之类。人们都知道“人民”这个词是个空泛僵硬的词。而且游行示威严格地停留在合法性里，它们平静地游行，甚至是欢乐地，充满节日的气氛。但人群还是浩大的，大大超过星期一它们反对沙莱蒂体育场支持孟戴斯的集会的示威。

共产党的机构法国总工会大显身手了，但这不是惟一的解释。工人阶级同样希望显示自己的力量，沙莱蒂体育场的示威同样是其一部分，工人阶级在那个体育场里集会是为了显示必要的团结，并非单纯地反对共产党。人们在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大楼前鼓掌欢呼，然后在拉斐特陈列廊前拉起一条禁止通行的巨幅标语：“在拉斐特陈列廊随时发生着某事：罢工。”在圣拉扎尔车站，由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一个招待会。有人安装了一些喷水嘴，准备在左派擅入的情况下发射，还特别在阴凉的地方准备了一些酒瓶，这是为了给老铁路员工现总工会主席塞吉祝酒用的，

^①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也给弗拉商老头儿，因为塞吉以前当铁路员工时在这里有过一些趣闻，弗拉商永远同情地围绕着他。看来，总工会暴动的微弱愿望将到此打住。

从围绕着孟戴斯下赌注的观点来看，实际上重在非应用地显示力量。在这个时候，孟戴斯登上政治舞台似乎是不可阻挡的。1小时以来，将军失踪的消息在巴黎迅速传播，这使戴高乐派陷入惊慌之中，也使它的对手们惶惶不安起来。电台也报道了这个消息，顿时全国凝固起来。这下完了，第五共和国骤落。消息公布两天以来，领导人中间一片惊慌并有上升到顶点的趋势。孟戴斯队伍的重新聚合变成了大动荡式的，特别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天际，因为为了遏制革命的浪潮，人们只有都转向他，主要是过去年代的革命对抗的幽灵留下的古老仇恨在作怪，只要某人某事能阻止这种骤落，不管是谁，孟戴斯也行。而且他有未来政府的两名部长顾夫·德姆维尔的亲近和贝当元帅的保卫者颂扬者和极右派律师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像救星一样地指导他。1965年的中间派总统候选人让·勒卡尼埃则在思考统一社会党的议员掌权。弗朗索瓦·密特朗昨天回避了来自孟戴斯的会见要求，但他不能长久地保住这个赌注，他有必要与这个当前的著名人物协商。雷蒙·巴里永在《世界报》上概括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感觉，他发表了一篇短文《明天的双套马车》，毫不含糊地分析了孟戴斯和密特朗。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仍然对孟戴斯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该工会主席欧仁·德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认为这场危机不可能在传统的议会方式里找到解决办法。孟戴斯-弗朗斯是适合回答学生界和工人界广泛民主愿望的，能使政府班子兴旺起来的可接受的人选。”在此期间，德尚向总工会发出警告，即担忧在戴高乐之后他的工会会不会妨碍总工会的议事。“在一些企业里，有多数派工会忽视少数派工会权力的倾向，尽管人们知道少数派应

受到尊重，少数派也知道自己的希望，因为我们不是社会民主党赫赫有名的国度。”

德尚好几次拜访前议会议长，使他接受了主要的要求。这位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主席后来向作家菲力普·亚历山大解释说：“我认为如果戴高乐离开，正如我们所有的好的预感一样，70%—80%的人将马上变成孟戴斯派。他们将与广泛代表法国人民的临时政府一起重新找到解放的道路。是的，共产党人懂得这一点，当然，将与他们有一场特殊的争吵，然而最终共产党人将取得进展。我相信这种假设。我对孟戴斯说过，临时政府可能将由他来领导，并以二战时的‘解放’^①组织为例，说明这个临时政府将成为我们的灵魂，代表所有的左派，同样可以理解为将代表在大学、工人和农民界突然出现的新兴力量，它也将是转移权力，使戴派权力再也达不到的必不可少的程序。”^②

晚上，孟戴斯会见密特朗。为了使直接的秘密会谈成功，孟戴斯希望到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主席的朋友乔治·达扬家中会谈，并带上左派的良师、社论作者、他俩的朋友让·达尼埃尔，孟戴斯是在里沃利街的人行道上与记者们攀谈认识他的。当孟戴斯到达乔治·达扬家中时，看到密特朗由居伊·摩勒、加斯通·德费尔和勒内·比耶尔^③陪同着在等他时，便对此大发雷霆。他认为这样会把议会左派代表们协商的组织未来政府的计划以及他的伟大路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老实说，关于过渡阶段的政府班子的组成，官方左派的重要人物们在此之前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抗战的一个团体，由新闻记者马纽埃尔·德拉维吉里创建。——译者

②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③ 此三人见前译者注。——译者

在总理的人选上还在使他们操心。但所有党派都已指定了他们的代表以组成联盟。孟戴斯对密特朗说：“我遗憾自危机开始以来，我们没有举行过任何严肃的会议。”善于敏捷对答的密特朗挑明一个难题：“共产党人不希望您担任总理，但他们将接受您出任国民教育部部长。”另一方面，联盟不相信学生运动。孟戴斯反驳说，工会、学生和农民的新兴力量应该出现。密特朗反对，他说：“这是怂恿，您这样做会使一切归于失败。您想为热斯马尔谋一个部长头衔？”实际上，孟戴斯是想让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主席德尚做这个“运动”的代表，并希望雅克·莫诺做教育部长。加斯通·德费尔从中调解，并暗示孟戴斯自己向共产党陈述关于学生代表的观点。密特朗打断他的话：“这是我的事。”他们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尾中散去。孟戴斯掌权？不久将复杂起来。

21时30分，前议会议长孟戴斯孤注一掷。明显地，时机是成熟的，明天或许是后天，戴高乐主义就会被打入历史的冷宫，时机将不会再来，现在或者永远。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除了破釜沉舟，别无它路，至少要采取争取候选人的行动。他去波旁宫^①，大概是为了显示他的合法性，并在一个有点长而且过分雕琢的声明中向记者表示，他准备在临时政府里领头掌权，其中他说到：“没有取得已经显示出来的一切反对政体的力量的信任，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了明天的复兴，明显地，国家一切有生命的力量都应该汇集在一起，正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说的，‘无一例外地不定比例’。”奚落的用语是漂亮的。孟戴斯乞求于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使五月运动的代表合法化，但被拒绝。

孟戴斯终究没抓住，在这种时候，这些争吵已不再重要。大家无休止地不着边际地议论着的临时政府将永远不会诞生。电视

① 法国国民议会大厦。——译者

在20时的《每日新闻》中播出：将军返回。

失 踪

美丽的风光在直升飞机下掠过，老元首出神地凝视着他古老的祖国大地。灿烂阳光照耀下的祥和的法国，也是决斗场和人墙的法国。几分钟以前，顺从的驾驶员使云雀3号突然做了一个俯冲，以这种方式避开雷达的监视，在飞机上几乎看得清香槟地区的麦田，远处便是阿登山的凸起部分，安静地躺在那里。戴高乐知道，他这下将使全法国惊呆。飞机突然转向德国方向，他在进行他一生中最离奇的赌博之一，这就是向巴登——巴登的轻举妄动，五月中最有迷惑力的插曲之一，人们将谈论它数十年，并将收入政治策略的所有经典之中。

戴高乐此行干什么？是法国多年来始终讨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假设也最多，有的达到荒诞的地步，现在这方面的说法有所进展。某些人说将军是在萨托里基地通过秘密网络与军队的将领们交谈，有的文章说是在阿尔萨斯；有的作品声称已澄清将军此行是要用军队力量收复被占领的地方及其具体布置；某些文章甚至想像将军是在通过特别的秘密网络与美国和苏联通话，协商保住将军的位置的条件^①。将军默认了这些预测，虽然他要求过绝对保密。无论是在此前还是在此后，神秘、假象、掩饰都是他计划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他计划的实质，如果他有过计划的话。因为从蓬皮杜开始，将军的好几个亲信都认为伟大老人在这一天的动摇是众所周知的。他可能不打算回来了，那么，这是逃跑还是躲闪？20年过去了，主角们都开口说话了，除了主要的。由于缺乏主要的证据，将军去巴登的奥秘还没完全弄清。某些主角们出于高深或是天生的谨慎仍然想隐匿部分真相。然而，细节

^① 见某些关于五月运动专号的读物，准确地说这些东西是事件后供人消遣的。

已慢慢积累起来，新发现不断增加，特别是随着皮埃尔·维昂松-蓬特^①的杰出篇章^②和弗朗索瓦·戈盖尔对这个问题的关键文章^③的问世，也多亏让·拉库蒂尔在他的杰作《戴高乐》^④一书中用一个有分量的篇章综述此事，还有马絮^⑤将军的证言，详细记叙了他与将军的会谈^⑥。今天，列出将军失踪的时程表是可能的。

28日晚上，戴高乐叫来他的儿子菲力普·戴高乐。将军交给儿子两封信，其中一封信好像装的是将军的“最后愿望”。然后，戴高乐召来参谋长拉隆德将军，交给他护送家人的任务。第二天，戴高乐一家来到巴登——巴登马絮将军身边。戴高乐又在将近18时，打电话给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叫他紧急来巴黎。就是说在此前一天，将军就已做出决定。是逃跑还是施计？他们都不能说，无论是将军还是他的儿子，即使知道什么，对这天晚上的事，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

29日上午，在静谧的爱丽舍宫，将军起得很早，可以说是他的军人习惯。7时，他召来他办公室的主任格扎维埃·德拉舍瓦莱里，他来到爱丽舍宫，看到将军疲惫地直立在他的小厅里，将军对他说：“我精疲力竭……我去科隆贝休息一会，睡一

① 《世界报》的一名记者，著有《戴高乐的共和国》一书，其中详细记叙了将军失踪的一天。

② 见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共和国史》第二卷《孤儿时代》，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1年。

③ 弗朗索瓦·戈盖尔，《希望》杂志，第24期。

④ 见让·拉库蒂尔：《戴高乐》，第三卷《君主》，巴黎·瑟伊版，1986年。

⑤ 马絮 (Jacque Massu)，法国将军，法国驻西德军队司令，戴高乐去德国巴登就是去他那儿。——译者

⑥ 马絮：《巴登68》，巴黎·普隆版，1983年。

会。”^① 将近8时，将军召来爱丽舍宫参谋长拉隆德将军，向他交代任务，说他要去看南锡的博瓦莱将军、梅斯的于布洛将军和巴登——巴登的马絮将军，以询问他们及部队的思想情况。此外，拉隆德将军将陪同戴高乐将军的儿子菲力普去巴登，那里将是安全的。我们已经陷入糊涂中，拉隆德带走将军的全家，这意味着将军将长久地引退；然而将军又去咨询军队的将领，这又是为什么，如果说将军已决定离开的话？

9时30分，总统短暂地召见秘书长特里科，对他说内阁会议将推迟到第二天15时30分召开。当时特里科确实一点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将军已经疲惫不堪。连日来，特里科主要操心的就是按照规定格式通报将军的好消息，尽可能避免不祥的消息，因为不祥的消息太多了^②。

下面介绍布瓦西厄将军。他上午乘直升机来到巴黎。布瓦西厄在他的回忆录^③里已叙述了有关谈话。他叙述面临骚乱和颠覆的将军如何局促不安、失去信心，如何演就变形的法国中这不幸的一幕。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证言的话，那么，布瓦西厄便一本正经地起了一个大早模仿他的岳父：

“我的将军，站在您面前的不是您的女婿，而是代表军长和军区司令（布瓦西厄的两个顶头上司）向您汇报情况的第七师师长。”代表两个军队将领，这位女婿说得有些浮华，他坚定地表示：“保卫祖国，随时准备反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任何侵犯。”

戴高乐似乎满意地问道：“如果到了必须考验军队的时候，军队的态度会怎样？”

“军队从来没有如此遵守纪律，它等待着命令。”

①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② 作者与贝尔纳·特里科的谈话。

③ 阿兰·布瓦西厄：《为将军服务》，巴黎·普隆版，1982年。

“这就好，我要去看看马絮那里是不是同样的精神状态，随后我将在科隆贝或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如果状态是我所希望的。我要离开巴黎，这样，如果今天下午共产党的示威偏离并指向爱丽舍宫，它将不再有目标，人们也不会攻击空空的爱丽舍宫。”

巴 登

戴高乐接着吩咐布瓦西厄预先通知马絮，这是军官做不到的事。然而戴高乐已做好在联系不上的情况下直接去巴登的准备。照布瓦西厄的意见，去巴登的计划清晰、详细、巧妙。特里科当时预料到总统会呼叫蓬皮杜，布瓦西厄于是走出办公室，戴高乐打电话给他的总理，试图使蓬皮杜放心，但没向总理解释清楚。然后戴高乐与他的夫人一起下楼梯走出爱丽舍宫。在庭院里，警戒局的一个黑人士兵与总统的司机保尔·丰塔尼耶在等着他们。11时24分，一个传达兵前来汇报，他大概秘密走出爱丽舍宫沿着府邸镶有雄鸡标志的铁栅栏兜了一圈，然而才到停车场迎接总统夫妇的。一辆警戒局的车临时担负运送保镖的任务，尾随在将军的轿车后面，朝伊西·莱穆利诺方向驶去。中午，两架云雀3号从机场向东方飞去。知道的人都以为总统要去科隆贝，谁知道将军突然换了节目，大家推测可能去圣迪济耶，因为那里向北离戴高乐的家乡科隆贝才50公里，但只在圣迪济耶加满了汽油。这时，出了一个小情况，布瓦西厄必须打电话预先通知马絮，由于罢工电话不通，得不到巴登——巴登的回应^①。

他们照计划再次出发。几分钟后，将军的电话机掉在机舱的地板上，因为将军的座机突然超低空飞行，尾随着护航机朝东方飞去。戴高乐稳坐在后面的座椅上，这位令人敬畏的旅行者向他

^① 阿兰·布瓦西厄：《为将军服务》，巴黎·普隆版。1982年。

的副官弗洛伊克递上一张明细地图，这位副官摊开地图坐在领航员的旁边（因为噪音太大，不能讲话）。“抵抗运动的总司令此刻成了法国田径运动协会的主席。”^① 法国从他的眼下消失，望着巴登——巴登方向，戴高乐感到孤独至极。

前天5月28日，马絮将军在他的巴登——巴登官邸会见了苏联元帅科切沃伊，这位苏联驻东德部队司令官与他的法国对等人一起喝了烈性的伏特加酒，在粗鲁的谈话中流露出反德情绪，还询问了关于“粉碎”惹起法国政府那么大忧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今天5月30日（星期三），雅克·马絮这位五星上将，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官，一副木刻般的面孔^②，在简单的午餐之后，穿上红色的翻领上衣和天鹅绒长裤躺在他冬园的长靠背椅上做短暂的休息。到14时45分，一个青年仆人呼叫在这里临时担任符合规定的职务的迪潘，然后迪潘一阵风似的跑进苏珊·马絮的办公室，向正半睡半醒的马絮将军的夫人说有人打来电话，是某个叫“弗洛克”的上校，马絮将军夫人连忙下来接电话，她念着这个名字，拿起电话之后她听道：“这里是海军中校弗洛伊克，请设置跑道信标，5分钟以后，我与总统及戴高乐夫人一起到达。我们就在巴登——巴登西南地面上空。”

马絮夫妇既惊讶又激动，已没有时间去思考了。大家在慌乱中准备住所，呵斥仆人，在一片混乱中腾出一个有大床的房间。5分钟之后，两架云雀在驻地着陆。马絮在准确的时间里换上军装。一个传奇般的身影钻出直升机，在弗洛伊克拿着的公文包里寻找眼镜，他看到站在眼前迎接他的一行人，对他终于看到的马

^① 弗朗索瓦·弗洛伊克：《戴高乐之外的回忆》，巴黎·普隆版，1982年。

^② 见马絮：《巴登68》。巴登之行的叙述要点来自马絮及他的夫人苏珊的书，证实了弗洛伊克和马絮的副官之间的某些对话。将军间接地证实了对话的声调，即使他的计划没有在马絮的身上生效，他一边仍然说：“马絮还是马絮”，或类似的话。

絮说：“一切都完了，共产党人煽动国家完全瘫痪，我再不能左右局势了。所以我躲避，因为我感到威胁，以至我们全家来到您这儿寻找避乱，以便决定怎么做。”马絮不同意将军的悲观想法^①：“您不要这样想，我的将军！您是有威望的人，还有行动的办法。”马絮挽着将军的手臂，一直到他的别墅内，携将军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这时间，苏珊·马絮承担了接待元首夫人的任务，她从元首夫人委顿的面容上就完全看出了一切灾难。在一个房间里，伊冯娜·戴高乐向马絮将军夫人详细地叙述着前天在巴黎的遭遇。在另一个房间里，坐在警戒局驾驶员旁边的一个男人也在讲述他被粗暴凌辱的遭遇，当时他的轿车曾在一个红灯处被扣留^②。

马絮的“训斥”

不一会，两辆轿车载着将军的儿子海军上将菲力普·戴高乐和他的夫人及孩子们抵达。他们在贝克拉夫停留了几分钟，在总统的直升机之后抵达巴登西南，由爱丽舍宫的军事参谋长拉隆德将军护送，拉隆德是在分别完成了向于布洛将军和博瓦莱将军通报情况的使命之后陪着行李和戴高乐的孩子们到达的。

将军向马絮解释：“我对我的儿子说过在这里与他的全家团聚……”然后将军便陷入长时间的自言自语之中，埋怨正繁荣昌盛的国家自取毁灭，埋怨国家使他失望，唠叨着普遍的惊惶和人们的欲望，甚至嘟哝最好的办法是看着他悄悄地离开，接着说道：“蓬皮杜可能错了，开始就向学生让步。但后来他的表现还是好的。”马絮很快地相信将军所言的。将军不再是原来的将军，

^① 弗洛伊克听到过马絮的回答，见弗朗索瓦·弗洛依克：《戴高乐之外的回忆》，巴黎·普隆版，1982年。

^② 苏珊·马絮的证言。

变得敏感、疲惫、忧心忡忡。将军又自言自语：“去哪里呢？”然后他面向斯特拉斯堡方向对马絮说：“只有向德国当局提出庇护的要求了。”马絮，这个爱好战斗的人，爱饶舌的粗鲁人，老傻瓜，心痛难忍地看着他心中的偶像陷入这种沮丧的状态之中。他暗自庆幸他的德国记者不在场，也可能在等待时机吧。这时，有人端来一盘煎蛋卷，谈话继续下去。马絮后来写道：“我鼓足勇气，下定决心与将军一起干，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一场竞赛，也将是最自豪的事。”当时，将近有1个小时，马絮直立在总统面前，随着他对将军气馁行为的愤言，一篇鼓励将军战斗的演说词也完成了：“为了您和您的国家，您要是再打算离开，将会失去人望。您应该保持您的形象，解脱自暴自弃，并抓住您所拥有的权力阻止混乱。您气馁了，这确实是您自1940年以来尝试过的第二次灰心。您应该在您所选择的战场上战斗到底，在您所选择的公民投票的战场上同样应该如此，只要您仍然坚持公民投票……即使公民在投票被证明不可能赢得，您仍然有时间辞职……”说到这里，马絮犹豫并咳嗽起来。将军被感动了，因为马絮敢于对他这样说。将军慢慢地站起来，眼睛盯住他的对话者，渴望地敦促他继续说下去^①。马絮继续说：“……然而没有事前逃跑的，因为您的前线在法国，对您来说，在巴黎。为大家所熟悉的战斗者是戴高乐将军。他应该在前线战斗到底。而他并不缺少人为他效忠。”

在这个为时已太晚的谈话里，马絮仍然抓紧时机最后有力地补充道：“我的将军，算了，您还希望什么，您在泥潭里，必须重新留在那里。回那里去吧。”^②

^① 让·拉库蒂尔认为这种传奇般的起死回生有点过分，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②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戴高乐这才恢复知觉，不再有犯罪感。这时，马絮走出办公室以通知法国驻德大使来见国家元首。他对他的两个副官说：“我们难以脱身，他像骡子一样固执。”

然而，马絮返回办公室不一会，将军突然站起来，靠近马絮，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说：“我走，请叫我的夫人。至于我的儿子，他会决定他该怎么做的。”

下 定 决 心

18时，将军返回科隆贝，在花园里跨着大步，并与弗洛伊克谈起花和诗来。乔治·蓬皮杜已决定17时左右去巴登见总统。17时30分，法国军队参谋长富尔凯将军为了证实总统是否仍在巴登而打电话给马絮^①。国防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在他身边。

“部长想知道拉隆德将军是否在您家及在您那里所做的。”

“拉隆德来过我家，巡回通报情况，他又去了梅斯，博瓦莱将军家。”

“您见过另一位吗？……最大的？”

“见过，但他又走了。”

“小心点，马絮，不要装傻！”

“什么？装傻？”

“马上给我一份报告。”

“为什么？我再没什么可说的，您尽可请部长放心。”

对马絮来说，福尔凯问话的含意是明确的。法国国防部长不仅仅要了解戴高乐是否去过德国，而主要要了解的是担心戴高乐背着他是否组织了部队的任何介入，至少担忧马絮对整个内幕说假话，被过多的国家机密所控制，使他们军队首脑眼睁睁地看着却一无所知。戴高乐的确在了解部队的精神状态，对部队做调查

^① 见马絮：《巴登68》，巴黎·普隆版，1983年。

并直接试探马絮。然而将军历来未曾提及向武装力量求助的假设，这仅仅是惟一的一次密谈。这种假设只是存在于他的内心里，后来他曾对沙邦^①说过：“从斯特拉斯堡开始夺回国土，我曾面对它这样想过，但要以最后的意外情况为前提。”由此消除了五月之后上百种文章和书籍所充斥的所谓奥秘：军队将介入吗？人们已看到蓬皮杜仅仅只采取了预防措施，再没做其他的。然而，富尔凯和梅斯梅尔的担忧都表明戴高乐派的阴谋手段之一已经付诸实施：巴登——巴登之行的后面显露出无声威胁的端倪，尽管含糊不清，然而内战和召唤军队的威胁是真实的。它虽然没有形成，但始终存在。

稍后，戴高乐打电话给他的总理，向他说明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总统“视察了部队”，需要休息，将在科隆贝呆到第二天中午。总统的声音显得年轻起来，并用命令的口吻。他同样对特里科说：“我在协调自己内心的想法，现在清晰起来了，我知道我要做的。我将在15时主持内阁会议。”^②然后，在晚餐时，他向他的夫人和弗洛伊克朗诵起关于他们刚刚穿过的莱茵河的诗句：“凄凉的莱茵河，永恒不安的见证人，您卷起的波浪，永远准备着汇集泪水。”诵罢他问道：“这是谁写的？”他的副官坦言不知道，戴高乐于是嘲弄人地说：“我一点不奇怪，这是我写的。”^③第二天早晨，夏尔·戴高乐早起，吩咐将在下午发表声明。

① 沙邦（Jacques Chapon - Delmas，雅克·沙邦 - 戴尔马）。社会共和党领袖之一，1969年6月20日—1972年7月5日曾任法国总理。时任国民议会议长。

——译者

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③ 见弗朗索瓦·弗洛伊克：《戴高乐之外的回忆》，巴黎·普隆版，1979年。

将军的两个5月29日

在总统有了5月29日的表演之后，五月运动之后的20年来，对这一天的分析就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雅克·马絮，乔治·蓬皮杜以及形式上的蓬皮杜派是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将军有过昏厥，曾打算离开，准备打退堂鼓，是马絮的详细有力的陈述才使他重新产生信心。蓬皮杜在将军返回巴黎的那天晚上打算辞职。他有理由恼恨将军使他不知晓如此重大的行动。他首先产生将军在耍“计谋”的念头，后来可能产生另外的想法而否决了，还是用他下面的话来恰当地表达他有克制的苦衷吧：

“我在此说明，我希望此行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太多的人已经了解实情，所以没有必要不将此事公布于众。不过，最好还是如实地介绍情况，一定要如实。事实上，将军曾因气馁而出现了精神危机，确信自己输了，因而选择了退却。他一抵达巴登——巴登就做了在那里长期逗留的安排，菲力普·戴高乐一家也在那里。将军召见了法国驻西德大使，并指示他将此事通知西德政府。马絮将军胆略过人，并敢直言不讳，他向将军谈到了过去的历史并表示了部队的忠诚，终于动摇了将军的引退决心，随着又使将军完全改变了主意。法国应该深切感谢马絮将军在这一天的行动。后来，我会见了马絮将军，他向我证实了皮埃尔·梅斯梅尔所说的话。我还要补充的是戴高乐将军本人也向我证实了此事，第一次是在6月1日（星期六），第二次是在此后的某一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听到这位伟大人物对我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衰弱，我以此为耻。’后来，我又得知阿兰·布瓦西厄将军直接去过科隆贝，持有一封将军给我的信，信的具体措辞我不清楚。然而却把全部权力都委托给我。如果我竭力从宪法

的角度去体会的话，这就是信的实质内容。”^①

对上述说法，马絮的证言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将军关于世界末日到来的谈话，大概从朝他而来的5月24日的大示威就使他产生了这种感觉，正如特里科在那段时间所看到的，将军实际上再不能入睡，呈神经衰弱状态。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主席米歇尔·德巴蒂斯^②在28日傍晚在电视采访记者米歇尔·德鲁瓦面前和当晚在克里斯蒂昂·富歇面前，都跟在乔治·蓬皮杜面前所说的一样，按照戴高乐派的惯用词汇，他再一次证实了将军关于“世界末日”的谈话。在巴登，将军带去了全家和行李，并要求法国驻西德大使把他的到来和庇护的要求通知西德当局，与马絮的有关谈话最为悲凉。

假象的黑幕

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并不接受马絮和蓬皮杜的说法，他们认为将军玩弄了最重要的政治手腕，属于他惯用的战争策略之一，并援引戴高乐的著作《未来的陆军》^③和《剑刃》^④里的两个军事信条为证，即用丰富而严密的词汇给统帅行为下的明确的定义：“奇袭，古老的出类拔萃的军事艺术……然而，奇袭是在统帅组织下的奇袭，不仅仅是借助于秘密，在对方设想和决策的时候注意他们的意图、部署和泄密，或者以准备工作迷惑对方，而且在假象黑幕的幌子下进行一切。”当然，对手可能截取一些情报，“然而这样正好，我们可以使对手糊涂起来。根据对方的目标，我们只要稍微使对方认错目标，就会有意引对方误入歧途，甚至

①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的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② 米歇尔·德巴蒂斯：《农民计划》，巴黎瑟伊版，1983年。

③ 夏尔·戴高乐：《未来的陆军》，巴黎·普隆版，1971年。

④ 夏尔·戴高乐：《剑刃》，巴黎·普隆版。1970年。

尝试使用预选考虑的诡计，以至传播迷惑人的假设，有那么多方法可以使用，现今认清每个党派往往是从另一个党派里，我们将发现，真相往往隐藏在假象的后面。”总之，“策略应该是用来使人相信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希望如此又不希望如此的手段。”

根据戴高乐的战术小册子提供的内容，对巴登——巴登之行，人们完全可以描述成另外一回事，作家弗朗索瓦·戈盖尔、皮埃尔·维昂松-蓬特以及让·拉库蒂尔笔下的重要部分就是这样的。

在星期六，戴高乐才明白公民投票活动将是不可能进行的。他还处在气馁之中吗？当然。说他从高处抓住了东西，说法国由于他的影响才进入现代社会，法国之所以走上“机械文明”的道路，应归功于他履行了拯救国家的社会使命。然而现在，法国人被分裂和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攫住了，不听他的。法国人又一次地顺从为改变而改变的煽动，他们不满伟人在不太好的愿望里寻求避乱和打小算盘。伟大老人沉浸在痛苦里，他确信国家在复兴，民族在崛起，稳定地走向繁荣富强，然而现在却看到这三方面在造反行动和总工会的罢工下化为乌有。“混乱”卷走了他10年的作为，人们将为更小的事情而动摇。

可以说，在星期一或星期三，戴高乐当着来访者的面的爆发的诅咒肯定是由衷的，从比扬古的工人拒绝协议的时刻起，就揭开了政府脚边所面临的深渊。在风暴之后的6月份，他对米歇尔·德鲁瓦^①所说的也是由衷的：“是的，我曾有过引退的欲望^②。”在5月30日的讲话中，他承认有“面对一切可能，没有例外”的准备。根据安娜^③和皮埃尔·鲁阿内^④的回忆，常看到将

① 电视采访记者。——译者。

② 6月公民投票活动期间的电视采访。

③④ 爱丽舍宫的服务人员。——译者

军在不眠之夜里束手无策的场景，部下无能，相继背叛，他的信徒们对戴高乐派的一举一动了然于胸，也认为他是在台上打发时间，这一切使将军陷入悲凉苦涩、精疲力竭和深深的抑郁之中。应该说他的一切努力是非凡的，平息阿尔及利亚战争、建立新体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OTAN）、涉过艰难的欧洲期、制定伟大的对外政策、使国家工业化，这一切似乎都在玩笑中完成，而现在却面临路易-菲力普^①的怪诞命运，因骚乱而陷入绝境。这太糊涂，太平庸了！

然而，法国已善于识人，认为戴高乐并没有江郎才尽。多亏他有一天体现国家的命运，多亏他在无尽的衰落之后再度出山掌权，他曾在动乱的风暴中控制着一切，无所畏惧，有效地平息，称他是暴风雨中诞生的人是恰当的。因为他具备拿破仑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种禀性：“凌晨三时的勇气”，也就是让统帅在最意外的失败中保持安宁和冷静，允许统帅在恐慌和疯狂的黑暗中完全理智地做出决策。

戴高乐具备这种天赋，就像他的第二天性，尽管他有易冲动的毛病，炽烈的性格和循环性精神病，这些都可能使他产生周期性的紊乱。当时，其实是明摆着的，虽然他在冷角落里陷入绝境，但还在谋算反击，酝酿可能的出路，探测对手，寻找他们的弱点，用他那出于本能的现实态度澄清错综复杂的“形势”，他总是决定着历史。

蓬皮杜太无能为力了。在他以宽宏大量的态度提前安抚的时候，给予他的让步的回答却是全面罢工的闸门的打开，他对这一点似乎不可原谅，但他有道理：舆论左右着事件。因为舆论支持使国家陷入瘫痪的学生们，舆论也受到使国家没有抵制地陷入停

^① 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法国1830—1848年七月王朝时期的国王，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逃往英国。——译者

滞状态的全面罢工的欢迎。这一次，舆论确实宣传够了，使潮流倒转了，使人们不再向往秩序。这就是孟戴斯突然得人心，一些人更失去人心的深刻原因。这似乎就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惟有这样才能恢复平静。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正面临毁灭。

的确，如果国家突然恢复清醒，如果突然有一个毋容争论的权威发出有力的声音，那么一切不安、忧虑、恐惶就会立即转为支持。5月24日，戴高乐未能用雄心征服法国人，30日，他大概在用恐慌召集法国人。正是因为在这一天他公开表示了决心，一切才可能翻转过来。

阴 谋

面对时局，戴高乐大概认为必须有一个事变，一个使剧情突变的霹雳。这声霹雳要吸引全国人注意，使他们恐慌，同时能促使对手揭去面纱，并引诱他们露出原形，这可能就是将军神秘失踪、引退的滑稽剧和有意识地安排自己从悬崖跌进深渊的真相，戴高乐将毫不掩饰地向世人证明，混乱中的法国人将痉挛地拼命地抓住他。

但是必须选择时机，精心设置一个意外。于是，三天^①的时间被戴高乐积极地利用起来。铺开这愚弄朋友和敌人的“假象的黑幕”。不需要许多的伪装，戴高乐就显得疲惫、消沉、优柔寡断，使他的政府、内阁、亲信以至他的总理都被他的假象所欺骗，尤其是总理在获悉他失踪的消息时，未能抑制住内心的喊声：“那他是到国外去了！”言下之意，他不再回来了。戴高乐板着惯常的面孔，狠狠地武断地在心里想：眼下，只能这样。因为他仍有必要维持总理对自己的忠诚。青年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自星期六上午起实际上就在准备将军下周的谈话。电视采访

① 指5月28、29、30日三天。——译者

记者米歇尔·德鲁瓦星期二下午前来见将军，定下六月初在爱丽舍宫的电视采访。同一天，他打电话给他的情报部长乔治·戈尔斯，这位部长是那么惊讶（因为戴高乐不喜欢用电话），毕恭毕敬地立在电话的另一端^①。这是要求他密切注意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并要求他立即驱逐广播电视台的占领者们。

将军终于最后约见乔治·蓬皮杜，按照当天会晤的需要，他对蓬皮杜隐瞒了一切意图，并对政府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仅限于关于政府行为的过问，将军说：

“从运动开始，您就太乐观了。”

“我错在哪里？”

“您说您会与总工会达成协议的。”

“我达成了这个协议，是总工会未能使它有效，而且共产党有理性保持谈判方向。这个代价是有点大，但我们仍有可能获得成功。”^②

离开将军时，蓬皮杜很沮丧。本来，他已获悉戴高乐夫人发生小事故受伤的消息和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将继任总理的风声，已使他够沮丧的了。

实际上，将军仍然在筹谋，一系列的假设继续在他的头脑里按序排列。还有一个因素促使他尽快地后退一步以便猛冲，那就是共产党的态度。蓬皮杜总是不相信共产党会发动突然袭击。戴高乐深知欧洲的事务就是为了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虽然法国并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国人也基本上没有碰法国。但这样的事总是说不定的。总之，将军忧患法共的欲念是强烈的。第二天下午，法国总工会的游行队伍只离爱丽舍宫几步远，但他们并不愿直接对抗冒流血的危险，认为远

^① 乔治·戈尔斯的新闻顾问让-皮埃尔·于坦向作者叙述过。

^②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离一点好些。戴高乐针对这个情况对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说：“他们不会占领空空的爱丽舍宫。”他认为他们朝他本人或他的家庭而来才值得。我们能想象到这种暴力：将军的近亲将易受到伤害，对将军的伤害可能会是间接的。这种现状和想象对总统夫人的精神刺激触动了将军。那么，只有令人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接着假设的一着，是在戴高乐确认发生暴动的情况下惟有依靠军队。但军队在东面。法国的精锐部队驻扎在阿尔萨斯、洛林和德国。军队和军头们的态度究竟怎样？向国防部长梅斯梅尔探询会暴露意图，察觉他依赖军队进行对抗的可怕打算。戴高乐与内政部长富歇和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一起进行探讨，曾确定逮捕群众组织头头的流血选择，这同样是迂回的冒险。他们秘密召来将军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并要求总统府军事参谋长拉隆德将军进行有关的沟通。他们准备去拜访认为有牢固基础的马絮将军，由戴高乐的亲信陪同前去。将军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被认为是惟一最可靠的人，第二天9时30分，将军又召见了。在共产党人准备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逮捕决定性的革命者做人质，保障国家行动自由和重新赢得这种自由。完全从这种假设出发，一切部署就绪。从远处旁观，只见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将军，这管保使舆论惊呆并加速倒转。剧本写好了，只等上演。

对这种假设的支持者马絮来说，将处在第一个殉难者的位置上。如何试探这个军头？“马絮，您与我站在一起吗？”将说明不了什么；马絮如果说“不”怎么办？过分泄气的场面相反地将表明这位老好人的真实思想。马絮是那么犹豫、困惑、不安，并由此开始担忧：这是军队，总之，不可能。消息是准确的。马絮就是马絮。戴高乐不怀疑他会叫嚷。戴高乐反复思量，马絮的这种忠诚对他同样是一种激励。戴高乐总是忧心忡忡，他知道自己在这种时候是多么需要这种他从未珍惜过的同伴的绝对忠诚，而自

己总是在最后才重新发现这种忠诚。马絮说他的角色在当时是无懈可击的。于是，到15时，将军的另一计划已拟定一半，只待舆论的反应。戴高乐不需要再等下去，他从科隆贝返回巴黎，只需他的支持者们倾听收音机评论他的完美成功就够了。法国充满了恐慌，反对党已经在觊觎政权，但是法国人已经以恐惧的心理拒绝了这种前景。血腥计划，通过6小时的核实已化为泡影，只有抛弃布拉格政变^①在巴黎重演的可怕幻影。与此相比，公民投票是最好的选择，阁员们像一个人一样投票通过，因为都害怕流血。这幕后的晴天霹雳和这种用走过场表演出来的完美敷衍，使演员们个个沉默不语，观众们目瞪口呆。只能如此显出向前走的样子，却使完结的轮廓分外显示出来。

^① 布拉格政变。1948年2月，以捷共领袖为首的联合政府中的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人民党的反动分子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阴谋被捷克人民在捷共领导下彻底粉碎。——译者

第二十三章 起死回生（5月30日）

5月30日11时5分，将军乘直升飞机去科隆贝，12时25分又飞回爱丽舍宫，他说：“我需要新鲜空气。这样，我睡得好，休息得好。”他召见心腹、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司秘书长雅克·福卡尔，告诉他自己准备好要讲话。根据将军的暗示，福卡尔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并号召戴高乐派在18时举行游行示威。将军趁热打铁：“好吧，会议后16时30分，我将发表讲话。”

一切都改变了。将军这次突然向前。因为国家一直在等着他，即使他不失踪（昨晚已宣布他返回），也多少象征政权走投无路了，上午的报纸对他做了如此的夸张评论。昨天已经进一步恶化，解体在目前好像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傍晚出版的《法兰西晚报》载让·费尔尼奥的文章如是说：“公民投票是不可能的。工会组织不再寄希望于戴高乐。在将军转向戴高乐派求救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感到他现在的孤立。我们常说戴高乐将军的民意测验，那么，这些被拴着的60%的法国人现在到哪儿去了？……老君主手中的剑正在落下，这就是由他编造的符合宪法的剑……戴高乐是孤立的。”

新闻并不能洞察一切。

解 散 议 会

由于罢工，政府部门面临全线瘫痪的局面，警察局与内政部的联系中断，政府部门之外的人们则一致地在罢工。面对骚乱，警察人数显得不足。在格勒诺布尔，省政府已没有预备力量了。这种情况自农泰尔骚乱以来就长期存在着。在图尔和鲁昂，示威群众将不会再碰上警察。在好几个部里，已有人在清洗或焚烧档案。巴黎的某个议员与警察分局联系，索取关于他的有关问题的

档案材料。一些政府高官甚至在编写准备供孟戴斯的政府班子用的分析报告。反对党人士到处寻求靠近孟戴斯的机会，共产党人同样在觊觎反对党认为越来越靠近的政权。30日上午，前国民议会议长孟戴斯再一次会见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德尚，向德尚介绍他准备实施的重大措施。德尚再次强调戴高乐的失踪可能只是出于自尊心。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十分担忧蓬皮杜利用将军的失踪控制一切权力。蓬皮杜在接见了他的传统政敌戴高乐左派人士们之后，于11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将军应该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他应该任命一个由扩大的多数党所支持的政府。普利文^①和杜阿梅尔^②都曾有过加入缺少人员的、他们经常往来的戴高乐主义多数派的念头，现在都打消了。总之，一切阴谋诡计、秘密会议到处膨胀，从昨天下午起谣言漫天飞：戴高乐死了，戴高乐跑了或准备逃跑等等。一切都涌出来，一切在重新组合，一切在改变。

这个时候，蓬皮杜在反复斟酌辩论的言辞。14时30分，即部长会议开始前半小时，他获得将军的许可被接见。他当然不是没有苦恼，他已拟定辞职信^③，准备递给将军，将军使他打消了此念头：“您留下吧，我们的命运是相关的。”将军对他的总理说着早已准备好的话。一切只能如此，蓬皮杜心里想，除了一件事需要立即落实：解散议会。于是他重申昨天和前天已经发挥了的理由：征询公民意见昨天已经开始。您的失踪引起了不安，一些名字已被说成是您的继承人；任何人不希望如此。大家现在都渴望秩序，这代表您。我们还有惟一的机会赢得胜利，即以广泛的

① 普利文（René Pleven），抗战民主联盟成员，1945年曾任殖民地部部长，1958年5月8日，戴高乐再次出山前夕，曾任一天的总理。——译者

② 在野中间组织现代民主党的领袖。——译者

③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多数派取代这个靠不住的议会。

戴高乐不愿被说服，他想独自赢得胜利，即以他单独的语言力量保住政府，以简单的讲话战胜危机。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人们因而猜测他不想再用蓬皮杜，因为蓬皮杜将是选举中强有力的优胜者。老君主都不喜欢迫不及待的王储们。戴高乐说：

“总之，如果说公民投票不能举行，同样的道理，选举也不能举行。”

“不，公民投票是难以理解的。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妨碍公民投票的组织工作会有过错，这与选举完全不同。任何人都不会妨碍选举。解散议会，可以促使罢工结束，至少在公共事业机构里。”

戴高乐没有表示支持。蓬皮杜只有打出他的最后一张牌：

“您要求我收回我的辞职，我请求您解散议会。”

这是关键的原因。戴高乐仍然需要蓬皮杜。如果总理辞职，他的讲话效果就大打折扣。只能与这个人一起说服全国人民，而最有力地应付了风暴的这个人却要辞职！当蓬皮杜要继续说时，将军立即缓和话语，然后在一张白纸条上写了一小段话递给蓬皮杜：这是给参议院议长的信，根据宪法第12条^①，解散议会必须遵循的程序。参议院议长加斯通·莫内维尔不一会就会接到这封信，是在他刚刚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做巴黎行政长官的朋友说这句话时：“我将掌权。”

“我是不会引退的”

4时30分，部长内阁会议讨论了日常事务之后，戴高乐讲话。全法国人都在他们的接收机前面或收音机旁边。传奇般的声

^① 法国宪法第12条：共和国总统咨询内阁总理及国会两院议长后，得宣布解散国民议会。——译者

音响起，没有图像。将军选择了无线电传播，但他的声音仍由电视台转播，因为这样少些被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罢工者切断的危险，也可能是将军担心自己在镜头前显得衰老的缘故，或者如让·拉库蒂尔认为的最简单的原因，这个时间没有多少人看电视，而收音机的收听范围可达至任何地区。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使人们自然想起将军在伦敦发起自由法国运动的1940年，那时就是这种方式。

收音机里的声音像鞭声一样砰砰作响，一切听过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讲话仅有4分半钟的时间，但字字千钧：

“法国女公民、男公民们：作为国家和共和政权的合法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做出了决定。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引退的。我受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我不准备更换总理，他的稳健作风和出色才干值得所有的人尊敬。他将就政府组成问题向我建议并做出他认为有益的更动。

“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我向全国人民建议举行公民投票。这将使公民们有机会确定是否应对我国的经济和大学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革，并通过惟一可接受的途径，即民主的途径，表示他们是否依然信任我。

“我注意到，在目前的形势下，实际上缺乏进行这一公民投票的具体条件。我推迟了举行公民投票的时间。至于议会选举，它将按照宪法规定的时间进行，除非有人企图压制全法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在妨碍人民生活的同时不让他们发表意见，同时有些人以同样的手段阻止学生学习，阻止教员教书，阻止劳动者劳动。这些手段就是恫吓、毒化宣传和暴力行动。一个蓄谋已久的集团和某个具有专政企图的党（尽管该党在这方面已有竞争对

手）都采用了这样的手段。

“如果这种暴力的行动继续下去，我将有责任支撑共和国，那我就得依照宪法，放弃在全国立即举行公民投票的计划，并采取其他做法。总之，应该立即在全国各地组织‘公民行动’，其目的首先是帮助政府，其次是帮助地方行政长官成为或再次成为共和国的特派员执行他们的任务，尽可能地保障人民生活，随时随地制止破坏活动。

“法国确实面临专制统治的威胁。有人企图迫使法国接受一个在全国普遍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政权。这样的政权显然在本质上是战胜者的囊中物，即专制的共产主义政权。

“开始时，这个政权当然会利用那些被弃之一旁的政客们的野心和仇恨，为自己涂上一层骗人的保护色。而在此之后，这些本来就无足轻重的人物就会变得一钱不值。

“是的，共和国决不屈服。我们的人民会重新振作起来。进步、独立与和平将与自由一起取得胜利。

“共和国万岁！”

“法兰西万岁！”

这是一篇政治杰作。句句谦恭、深邃，有针对性，充满箴言，抑扬顿挫，恰如其分，富有效力。使每个“我”老是在记忆中重现入伍之初在战场上排列战斗序列的一瞬间。接着根据人民的委托，立即下定维护总理，进行选举和继续干下去的决心。然后渐进地抨击法国共产党的“专制威胁”。这是他诡诈的部分，因为当前威胁政体的是孟戴斯而不是瓦尔德克·罗歇，几天来狂热的戴高乐派清楚这一点。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早已有人表明制造恐怖的是共产党。在法国，反共产主义思潮最能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弦。最后显出科恩-本迪之类人的轮廓，这更是令人恐怖的七头蛇。人们在熟人很多的地方会重新镇静下来。如果敌人就在那儿，并被摘掉了假面具，他就会可憎得令人跺脚。

接着的威胁是，如果人们继续罢工，阻碍选举，总统将运用宪法赋予总统全权的第16条^①。为了增加威胁的分量，在需要呼唤部队时，戴高乐换成号召公民行动，组织保卫委员会，这将成为一切非法企图的最大障碍。并隐约点明要打倒我戴高乐，就必须踩在戴高乐的身上过去，这将掀起内战。戴高乐的修辞，像所有精彩的修辞一样，夸张了现实的严重性。总之，他在向当前的敌人突然袭击，并把“被抛弃的政客们”置于一钱不值的境地，这些政客们被这样的话刺痛，像昆虫被针刺了一样。使密特朗和孟戴斯不得不安排时间清洗戴高乐所指的党派标记。接着鸣笛，帷幕落下，戏剧结束。1968年5月运动结束了。

戴高乐派的洪流

波旁宫里，议员们分散在厅内和走廊上，分别围着半导体收音机。多数党则汇集在科尔贝尔大厅里，都微微颤抖地。当听到“我是不会引退的”，爆发出欢呼声，立即被“嘘”声制止。他们在大厅里游行，接着举行集会，最终是爆发、高喊、哭泣、互相拥抱，震动四壁，两次唱起《马赛曲》，如同运动场观赏台上在足球守门员鱼跃救球的一刹那。

在巴黎大学和桑西耶中心，倾听讲话的场面转成集会。他们嘲骂讲话，叫嚷内战，揭露所谓的“保卫委员会”与新的盖世太保相似。在桑西耶中心，学生们甚至相信部队会立即介入，坦克和伞兵聚集巴黎，便衣士兵将进攻学院的谣言不脛而走^②。全体

^① 法国宪法第16条：在共和制度、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或国际义务之履行遭受严重且危急之威胁时，以及宪法上公权之正当行使受到阻碍时，共和国总统正式咨询内阁总理、国会两院长及宪法委员会之后，得采取应付情势所必须之措施。总统应以公文将此措施布告全国。——译者

^② 见雅克·贝纳克的《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会议指定了负责保卫大学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立即派出一些装备了步话机的侦察兵到邻近的大街上去巡逻，这些侦察兵一个多小时后返回，他们只是疲劳地注视了一番冷漠而安详的过路人。

学生领袖们终于很快地明白，节日过完了。正如运动的角色之一雅克·贝纳克^①所写的：戴高乐这下打断了运动脉络中象征性的一环。在他失踪的前一天，他让人们认为戴高乐主义大概要真正完蛋了。在宪法第16条和内战的幽灵产生威慑作用的同时，戴高乐消除了死人的阴影，迄今没有任何人希望死人；但戴高乐可以杀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法兰西这块土地上，人们都不希望再有杀戮。对任何人来说，1968年5月不是为死亡而斗争，只是一种言论的造反。戴高乐并未制止言论的造反，如同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用言论。总统以毫不掩饰的权威和简洁的技术性的说明了结了危机。人们将用他的讲话来反对象征性的暴力，即示威者和街垒的暴力，也反对他在恐吓中真正使用暴力。至于那些空名的战士们，正如皮埃尔·戈尔德曼所挖苦的，革命者们准备好了一切，除了真正的革命。那么，革命者们只有暗自卷起红旗，以准备在另一次革命中再展开，当运动准备好时，当群众跟随他们时，当工人阶级动员起来时，当革命的党建立起来时。总会有一天……

共产党人没有犹豫多久，当天上午，他们还在要求得到政府里的部分权力，并声明他们号召人民的宿愿。法国总工会照样做，并要求尽快地谈判。弗朗索瓦·密特朗则抨击戴高乐的讲话只是“雾月18日^②、12月2日^③或5月13日^④声音的老调。”但

① 见雅克·贝纳克的《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② 指波拿巴1799年雾月18日政变。——译者

③ 1851年12月2日，路易一拿破仑发动政变。——译者

④ 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成立救国委员会。密特朗引用这三个日期，影射戴高乐的讲话具政变性质。——译者

他显然将参加选举。戴高乐在4分半钟里，严守法规地赌博，重新抓住了他的权力。节日结束。

这样结束似乎缺乏高潮，是否还会有高潮，有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预测了好几天。在这个时间里，沙邦-戴尔马^①主持了议会历史上最短的会议之一。他在感谢了议员们的完美工作之后，便宣读国家元首的一封信：

“议长先生：

按照宪法第12条，并关于这一条咨询了预先规定的要人之后，我决定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多数党的议员们鼓掌拥护并开始离场。但他们看到左派议员们仍然留在座位上，又退回来，反对党议员们站起来唱起《马赛曲》，多数党议员们模仿他们也唱起《马赛曲》。两个营垒唱着同一歌曲。接着，戴高乐派走出去，并排队走向广场上那座古埃及方形纪念碑，完全占据了那里。从戴高乐的讲话结束的時刻起，恐慌的巴黎人不约而同地倾巢而出。有恐慌的资产者们、不安的商人们、受损的老板们，还有钟爱秩序的职员们、保守党的工人们、守规矩的年轻姑娘们、右派大学生们和极右派活动分子们，都奔向协和广场。保卫共和国委员会的组织者皮埃尔·克里、朗朗·布热塞和总理府负责与议会联系的联系部部长罗歇·弗雷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多人，简直可与工会的游行队伍相匹敌。右派一般是不喜欢到大街上示威的。几天来，他们一直在不安地与反戴高乐主义的极右派协商合作的问题，即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反戴高乐主义的极右派，他们提出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和左派的暂行协约。这个协约反对关于已被判刑关押了10年的秘密军组织成员的大赦令。这个派别将在6月18日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街头。在此期间，怀念“过去的阿尔及利亚”的光头小伙们与老布热德

^① 国民议会议长。

分子们，老贝当分子们以及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们汇同“阿尔及利亚的廉价出售者们”，即反贝当的支持者们暂且肩并肩地重新走在一条道上。

情报局没有预测到当天会有5万人汇集。人们10多次越过杜伊勒利宫铁栅栏的范围，他们或开车或步行，通过塞纳河上的所有大桥，从四面八方奔赴同业工会的大约会。人群中布满了三色旗，胖乎乎的猪肉食品商和年轻的老板娘们还围着短围裙，退伍军人们在队伍里高举着镶金边的军旗，还有焦急的小市民们，他们厌倦了暴力，厌倦了焚烧小汽车，厌倦了停滞的法国和对“伟大的夏尔”的侮辱。

狭长的小旗在五颜六色的人潮中摇晃：“戴高乐不孤立”，“共产主义行不通”。人们向一个标语鼓掌：“我是工人，我有7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戴高乐将军万岁！”人们喊着时代的口号：“前进，戴高乐！前进，戴高乐！前进！”“密特朗，江湖骗子！”“科恩-本迪回柏林去！”或是难听的：“科恩-本迪滚蛋！”

一支队伍向星星广场进发，由部长们和斜挂着议员肩带的议员们打头。蓬皮杜拒绝前来；在拥挤的人群第一排，浮动着文化部长马尔罗和悲剧性的人物前总理德勃雷，他在罗贝尔·布热德的眼皮下扯着嗓子高唱着《马赛曲》。

游行持续到21时，人群围绕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火焰散开，怀着对孟戴斯和密特朗，共产党和科恩-本迪的仇恨，他们确信自己的力量，确信未来。明显地，节日确实结束了。

第二十四章 报 复（6月）

五月运动在六月里慢慢死去。这是临终的一个月，报复的一个月。

学生运动的退潮

从5月24日起，学生运动便失去了人心。到5月30日，运动加速超越历史，接着便敲响了戴高乐起死回生的钟声。大学总是被没有工作的大学生们占领着，工人们总是罢工，的确，他们在运动的开端说了不少大话，当离心的趋势仍然成进攻的火势在戴高乐退却中烧得更剧烈时，运动还在徒劳地寻找它的筹码和冲击波，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6月1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又组织起3000人的游行示威，从蒙帕尔拉斯车站到奥斯特利茨车站，一路高喊“选举，叛卖”，在从右向左转的法国很难再发现不得人心的口号了。全国学联副主席索瓦热奥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领袖克里文在人群面前鼓吹学生——工人的团结，号召继续战斗下去。他们高喊“嗨——嗨——嗨，我们越来越‘疯人派’”，“我们不为选票廉价出卖罢工”。人们还相信吗？

当晚，在巴黎大学的一个大梯形教室里，科恩-本迪疯狂地反对复工的可能。一些学生队伍好几次去弗兰试图再次与工人联手，然而法国总工会却提防着暴风雨的再到来，总是冷淡地对待，并设置许多无法理解的障碍，即使工会内的青年工人们可能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毕竟挡不住比“要求满足后的复工”更富幻想前景的诱惑。但工人阶级中这类“激进化的派别”，即变成的左派分子们，过分地出现在传统工会旁边，这将成为继承五月的奥秘之一，以他们的名义，左派主张在他们的这次梦幻之后将再延伸十年。

继续运动的唯意识论倾向表现得相当强烈，继而表现为分散的小型冲突，有的甚至很激烈，这将在15天内继续占据舞台的正面。美术学院的防御据点是最后一个战斗方阵，联合作战行动仍然匆忙地上了马^①。6月4日，警察进驻弗兰，但那里的工人纠察队阻止他们收回工厂，被赶了出来，罢工还在继续。雷诺汽车制造厂到6月15日才收回。第二天（6月5日），被号召的大学生们前来协助工人们。他们连夜赶印了一万份传单，并准备第二天凌晨5时到工厂门口集中，重建罢工纠察队。直到这时，由于神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呼唤，每每高傲地判定运动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亲华派才重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发表了一个火红的声明：“戴高乐派的独裁……已经向工人阶级发出了挑战书。雷诺的工人们知道全国的工人都在支持他们。工人阶级，再次紧密团结起来。同志，坚守您的战斗岗位——工厂！”他们煽动武装斗争，但人们在这次疯狂中终于保持了理智，他们只有暂且搁置，等待工人阶级的觉醒。只有工人阶级愿意，才能通过武装斗争。为以防万一，一辆装满莫洛托夫混合物催泪弹的警方卡车通过秘密路线开往弗兰。

5时，对事件激化应付责任的工联主义者热斯马尔与上百个大學生一起与工人们汇合，奇迹产生了，罢工纠察队重建起来了。热斯马尔鼓动：“我们听从工人阶级的安排，共同重新占领工厂！”但将近10时，警察采取行动，猛烈冲击，工人纠察队和学生边撤退边用石块反击警察。于是他们分散在附近的场地上进行田园诗般的小型游击战。接着，共和国保安队又控制了附近的场地。亲华派分子们只好返回。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佩雷尔广场举行示威，但只有上千人到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来，也被警察驱散。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大发雷霆，反对这种“左倾行动”，他认为这样实际上是在帮助资方使弗兰-雷诺这个“工人堡垒”遭受损失。在弗兰，许多工人撕碎法共的《人道报》。亲华派这才相信工人的动员可能要长期围绕着一一条僵硬的路线。弗兰成了他们的困扰。

三个死者

6月10日，一个小团体由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纠察队队长让-马克·萨尔蒙带领着准备去战斗的地点集合，他们先在默朗^①附近的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上集中，几个别动宪兵向他们冲过来，学生们一下找不到比跳河更好的逃路。萨尔蒙在冰凉的河中游着，看见十几米远的河中有一个战士在挣扎，他试图靠近，但衣服妨碍了他的动作。上面是一座桥，一个过路人跳入河中营救，但太晚了。这个年轻人沉于河底，他叫吉尔·托坦，一个17岁的中学生，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纠察队员，就这样沉入塞纳河中。

消息迅速传遍拉丁区，大约五千学生自发汇集到圣米歇尔大道上，与警察对峙了一昼夜。第二天，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号召在19时举行示威。这一天，在索肖地区，共和国保安队的一粒9毫米大的子弹击中了皮埃尔·贝洛，一个呆在朋友珀若家中的铜匠——包铁工人。另一名工人亨利·布朗歇在逃离时从墙上摔下死去。从五月到六月直到最后，人们都在避免这样的事，权力机构对这些人的死亡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牵涉。然而在两天里却死了3个人。在撤退时，通常会造成大量的伤亡。1968年事件的死者总共达5人，2名学生，2名工人，1名警察分局局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长。5名死者在错误的内战里显得太过分，这是为革命的空名而献身的真正殉难者。然而也是那时在那么多地方仅有的5名死者，由于权力机构的铁腕行动所导致的残杀。

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东站举行抗议。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现在的确感到难以相信这些事，他同样为恢复了镇静的政府所敦促。他完全包围了东站，示威者们坠入陷阱之中。这一夜同样是漫长的、激烈的，起码会有72座街垒路障在巴黎筑起来，它们每一个都可能丢掉上十万张新戴高乐派选民的选票。大家嘲骂公民投票：“投票，叛卖”；“这只是开始，继续战斗下去”。在1968年，法国共产党和传统的左派明显地将失去许多选票，而他们却还在认为一会儿就会获胜。

第二天，为了尽快结束运动和终结无政府主义的复兴，部长内阁会议决定取缔十一个左派组织，其中有三个是五月的主角，即克里文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科恩-本迪的“3月22日运动”和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除此之外，全体部长会议只能机械地举行，讨论的话题已衰竭，一切事件都在狂热里过去，这个第一级委员会已经好几次计划改变社会和大学，但其效果实在不佳。科恩-本迪已从德国返回，他疲惫不堪，手足无措，看穿了一切，又看到难以置信的这几天，他需要时间和距离来思考这次运动。他就这样在落潮的阴沉早晨里平静地回忆已结束的醒着的梦。巴黎大学的占领在穹顶建筑里结束，使人难以摆脱的流浪汉们早已容忍不了这个古老学院的所有正式房客们，想不到6月12日，新来的警察们也将他们统统驱逐了出去。6月16日，同样的驱逐在奥戴翁剧院上演，这是5月14日占领者们的第一个目标，从那以后，占领使这个剧院徒有其名。这次警察没遇上冲突地收回了奥戴翁。巴黎大学中一个难以协调的行动委员会曾占领一个速印处，使他再不能印刷自己愿意印的宣传品，里面的废纸和垃圾几乎泛滥到所有的大厅和梯形教室，招来大批的老鼠，

大学生们纷纷离去，拉丁区的流浪汉们乘机占领了大学生们感到不适的位置。这些流浪汉们肮脏、好斗、肌肉发达，有力的手里通常旋转着自行车链条，提着短粗木棍，几乎主宰了巴黎大学本来就成问题的秩序。当警察到达这里时，几乎没有人表示反抗。被取缔了的小团体的头头们决定不再用暴力反击警察，他们只能考虑在五月以后再说。暑假已经来临，这有利于必需的缓和，也有利于不安的、大有作为的战士们找个僻静处学习、反思。

“疯人派”的这个春天结束，左派的夏天和左派往后整整10年的北欧神州般的梦幻开始。他们将沉浸在榴弹的回响和街垒的回忆中。缺口已被打开，只需扩大就够了。然而历史的方向并不总是战士的方向。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缺口仅仅只是暂时地合拢。1968年5月的光芒将辐射法国社会，风尚的革命将改变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革命反而变得朦朦胧胧。

恢复运转

一个月的工人罢工也在消散，与学生运动落潮的节奏差不多。从戴高乐讲话的第二天起，汽油便灌满了加油站。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周末，可以看到法国人在阳光下度假的影子。星期一开始恢复，起初很慢。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不希望罢工无限地拖延下去，却希望以巨大的让步来证明他还是严守法规的。于是，谈判切切实实地展开，从公务员问题到雇员问题，从一个行业谈到另一个行业。5日，谈国营铁路公司，邮电局，巴黎运输公司。6日，全国教育联合会撤消罢工的命令，并通知孩子们可以返回学校。但是，冶金行业，这个阶级觉悟最高的堡垒，对妥协不满。雷诺工厂需要等到6月15日才能复工，因为雷诺工人虽然同意恢复运转，但必须以完善格勒内尔协议为条件，这需要时间。时时有许多最顽固的企业，坚决不同意复工。至6月19日，只剩下15万罢工者。6月中的弗兰工业区，仍然有两个单

位在罢工，即国立行政学院和福利 - 贝尔热企业，还是关于女搬运工的要求问题。

海啸·蓬皮杜将是胜利者

从6月1日起，举行新的部长会议。形势在6月第一周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也付出了几乎集体辞职的惨重代价。代总理、内政部长富歇，国民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已辞职）都将面临下船人的旧境地。情报部长戈尔斯和劳工部长让纳内也将辞职，他们的部门实际上停滞整整一个月了。青年体育部长米索夫早已感觉不好，人们已看到他所管的青年一代的所作所为。弗雷·比约特和迪马也都准备登上离去的火车。

德勃雷早在格勒内尔协议期间辞职离开了财政部，去了外交部，外交部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则更换他去了里沃利街的财政部。领土规划整治部部长马赛兰在风暴中表现甚佳，有可能转到内政部。还有一群坚定不移的戴高乐派的混合人物和突出的戴高乐左派人物莫朗达、加比唐、玛丽 - 马德莱娜·迪内施、德沙尔特以及蓬皮杜派分子夏朗东、勒·特勒、加莱被允许进入会场。是蓬皮杜提升了他们，然而蓬皮杜却不得不忍受加比唐之类事件的发生，公开地叛变、甚至正值风暴期间建议他和他的政府班子辞职。戴高乐坚持他的计划，加比唐在那里表明他的计划。仅仅为了准备选举，戴高乐的确有一个过渡政府的计划。在罢工渐次停止的情况下，延续的学生运动对罢工的及时援助，扩大了5月30日总统讲话之后所掀起的反击的影响，如同海啸。如此的不祥之兆，使他们难以置信。两天来，左派试图追回他们的幻想。密特朗像裹煤球一般延迟他的记者招待会。孟戴斯 - 弗朗斯看到让 - 马赛尔·让纳内突然去格勒诺布尔反对他，这位劳工部长与工会组织在一起比他更自如，使他不得不艰难地战斗到精疲力尽。虽然戴高乐回答米歇尔·德鲁瓦的电视采访时有过坦白，“是

的，我曾有过引退的念头”，可是他也抨击了他最好的同盟者共产党，这些天来，共产党同样是孤立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戴高乐曾特别说过这样的知心话：“我也是个革命者。”他的确比一篇关于工人分享利润的长篇论文^①走得还要快。一个月前，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第一次就此好好地幽默了他一番：“我们十分愿意相信戴高乐的完全改革……但这种改革的进程可能需要我们用充分的兴趣和十二分的好奇心陪着。”

6月18日，拉乌尔·萨朗^②和一串1961年至1962年的叛逆军人，即珀蒂-克拉马^③别动队的成员们被赦免出狱。雅克·苏斯戴尔^④也已经返回法国。政府有人保证这次赦免不是任何交易的结果。

6月23日，波涛涌起。多数党汇集在“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UDR）的首字母缩略口号下，选票激增10个百分点达到43.65%，中间派略有衰退，左派失去5个百分点。到第二轮投

① 指经济学家、财政监察委员和国家储蓄组织储备金库的负责人布洛赫-莱内（Bloch-Lainé, Francois）的一本题为《争取企业改革》的重要小册子。该册子试图研究怎样使工人从雇佣他们的公司分享到一定的“利润”。戴高乐仔细读了这本书，在公共场合赞扬了作者，并在私下和他进行了多次长谈。

② 拉乌尔·萨朗（Raoul Salan），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部队总司令，秘密军组织领导人之一。1961年4月22日，四名将军在阿尔及尔逮捕了法国政府代表莫兰和罗贝尔·比隆，夺取了政权，申明他们的意图是以武力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拉乌尔·萨朗是四将军之一。释放他们的决定在复活节以前已做出，但谣传这是戴高乐巴登-巴登之行与马絮进行的交易。——译者

③ 珀蒂-克拉马，法国地名，因1962年秘密军组织在此谋杀戴高乐而闻名。

——译者

④ 雅克·苏斯戴尔（Jacque Soustelle），戴高乐的亲密战友之一，因反对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主义政策和温和行动而与戴决裂，1960年被戴高乐摒于新内阁之外。1961年流亡国外，达7年之久，1968年回法国。——译者

票，戴高乐派和独立共和党拿走 485 个议员席位中的 358 个，例如保卫新共和联盟就赢得 97 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在丧失中取得 61 个席位，法国共产党在丧失中仅取得 31 个席位。自法兰西第二帝国以来，人们从没见过多数党取得如此骄人的战果。

投票的第二天，蓬皮杜在迟疑片刻之后，终于首先明白自己被张冠李戴地解了职，然而只有忍受着，外交部部长穆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已被任命为总理，自动乱以来，他就不断抨击蓬皮杜的行动。戴高乐将军当然不会忘记上半月来的方方面面，三年来，他就在限制蓬皮杜势力的上升，然而还是有蓬皮杜如今的解散国民议会的断然紧迫措施。何况，还要圆满完成自己的杰作——工人分享利润和地方分权的计划。一年前，他就在争取国家和政府通过，然而蓬皮杜并不欣赏他这一杰作，认为他的改革措施是可怕的，也是很难以试验的，使他的杰作与成功绝缘。将军于是另选一人振兴自己的路线，以他总是给人以决定性影响的天性，在最后的刹那间摒弃了蓬皮杜。然而，三周的强烈震荡却是永远的，戴高乐将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苦行的折磨隐含着胜利。乔治·蓬皮杜是“共和国的储君”。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的总管是注定是要失败的。然而，他的孤寂穿越将比他想象的还要短暂。1968 年 5 月的胜利者将是他。他的政治彼世，仍然是托起法国的希望。对他的记忆将永远刻在人们的思想里。

尾 声

怎么可能呢？难道就这样算完了？这场造反何以难以置信地失败了？这些问题和另外好些问题，从将军5月30日讲话的最后一个词落地，法国人就开始把它们搁置起来，没想到他的讲话明显地竟使现实重新找到了一个秩序的外壳。

可以说人们都很自然地公开承认这个运动，知识分子们根本没有预测到这一点。只有一个例外，即《青年的攀升》这篇预言的作者阿尔弗雷德·萨维，早在十几年前就描述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不规则地在社会上开辟一条道路。

正因为事件之前缺乏理性的研究，分析家们必然要在事后弥补。20年以来，对五月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都把它说得一团漆黑。这里将提供一个简明的概要，可能会为研究这个错综复杂的事件增添一点线索。面对那些长期左右这个事件研究的评述，好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强调指出提供简明线索在今天尤为必要。事实上，1968年5月并不是暴力决裂的先兆，不是一个将来会成功而现在注定要“失败的革命”，也不是在技术官僚主义的制度里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这不是这个事件应该过重负担的任务。这是暴动缺乏连续性的缘故，尽管运动的魅力和创造力后来竟意想不到地消失了，这是暴动缺乏连续性的缘故，而社会民主化的连续性，却是两个世纪前就在争取的东西。1968年事件并没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所显示的仍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推广趋势。在这场运动中，集体主义的愿望显得小于个人主义的愿

望。运动没有表明多元化的旧民主制度和混合经济已经衰竭，相反巩固了这种制度和经济^①。

外国阴谋？

《阴谋的理论》是极右派^②的一些书所研究的对象，其中间或提供了当时一些多数党成员的谈话，有人援引这些谈话，毫无根据地说什么从中发现了以色列插手1968年5月运动，明确地致使亲阿拉伯的戴高乐主义的失败。另一些人认为莫斯科在以往的许多次动荡中插手，虽然这一次还没发现。法国共产党对准备和掀起这场运动什么也没做，相反以惊人的努力使运动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因为戴高乐的外交政策太符合巴黎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的口味，以至于他们都不希望有另一个人来替代他。当五月运动降临的时候，要想使它变成真正的“巴黎的布拉格政变”，法共必须有具体力量的准备，然而法共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即使政府安排了警察和部队的介入。

还有人控告“小团体”或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国际保持联系。这无可辩驳。欧洲和世界的激进派大学生们鉴于多方面的急迫需求曾特别举行过多次会晤，如大学生代表大会，托派分子的第四国际例会等等。但这些活动总是停留在有分寸的范围内，而且这样的联络总是不可靠的，很难为某国某项请求有组织地特

① 这一点，并不只是作者自己的看法。1986年由《权威》杂志组织的关于评注68年5月的讨论会使这种新看法形成。吕克·弗雷、亨利·韦贝尔和吉尔·利波韦茨基（《权威》第39期）发挥了这一观点（当然还有其它重要的不同观点）。在这个讨论会中，作者冒昧地派送了一本献给1968年学生运动的小册子，题名为《青年的突变》，以陈述在相同范畴内的分析。

② 见林朗索瓦·迪普拉和穆里斯·巴代什《革命周刊》，巴黎·保卫西欧版，1968年。

别协调好。任何国家，任何党派为了摆平一切此类的事，就必须提供资金、部队和进行秘密尝试。苏联像对待瘟疫一样地不相信这个运动；中国一直谨慎地对待欧洲国家，尤其是对戴高乐主义。惟有越南出于自身利益立即对骚乱抱有希望，但宣传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极左派团体在运动中扮演了战略性的角色，可它们没有真正意识到，它们无意识地促使美国削弱了坚持越战的决心并准备后来的撤兵，因为美国亦害怕发生此类内乱。但是，越南人为什么要远距离地操纵法国这场靠不住的革命，法国的什么制度会对他们增添什么好处呢？

事实终究使一切假设破灭。

造反是自发的，没有准备也没有命令的，没有计划也无法计划。

1968年的奥秘超越它所有的角色；今天任何人都不能虚构出它有一个策划者。

保守派的评论

最著名的保守派的评论是雷蒙·阿龙的《无双的革命》^①，严厉地批判这个运动。他认为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消极的，是集体的心理剧、革命的梦幻，是一场大混乱、一场大规模的起哄，是来自大学的出自破坏目的的反民主运动，并使经济遭受严重的衰退。

雷蒙·阿龙长期指责这个运动，离奇地否认整个运动的前景，这种武断的顽固的态度，显然缺乏众所周知的清醒头脑。最近，从保守派怀有敌意的武断分析中，一些读者从反面悟出了这个事件的积极意义，从而把1968年5月风暴重新放置于法国历史的连续性中去思考，并揭示出这个运动的特征：近乎全面地开放法

^① 雷蒙·阿龙：《无双的革命》，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国社会的深刻革命。在托克维尔^①之流的资本主义的赞美家们看来，阿龙对五月的评论运用的可能是法国思想家的方式，因而使他的分析深奥莫测。他当然有他的道理，然而，后世却要批判和唾弃他的评说。

说到底，这种分析只是戴高乐派的现象，无论在事件中还是事件后，戴高乐派之中每个叙说五月运动的人一般都用这种方式，夏尔·戴高乐^②和乔治·蓬皮杜^③都有类似的表达。在30年代，戴高乐上校就预言过知识分子的骚动和必然将产生的“机械文明”的社会将割断知识分子个体传统的根基以及过去对他们的有价值的评价。不管怎样，知识分子总是要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总是要揭示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并提出了改革的观点，力图参与调节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利益分配。

从5月14日起，乔治·蓬皮杜就一直围绕他的“文明危机论”阐明使青年一代晕头转向，使国家混乱不堪的“文明危机”。他认为，过去的价值观已经落在了更加进步的技术和工业的后面，这就是危机的基础，这需要领导者们能广泛超越保守党派的传统纲领，并具有人文主义的和改革开放的意识。乔治·蓬皮杜

①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巴黎有条街以他命名。他虽然把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但并不彻底，他承认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性、合理性，却否认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译者

② 戴高乐将军在几本著作里阐明了他的观点，如《剑刃》和二战期间在牛津大学发表的讲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68年5月24日的讲话。

③ 乔治·蓬皮杜在他的回忆录《恢复事实真相》里已有解释，同时在1968年5月14日的议会讲话里也解释了。

几乎被迪斯累里^①所俘虏，迪斯累里就是位明智的保守党，为避免应该遭受的混乱和受压制的状态，而实现反对党的某些改革意见。

两个伟大人物都在勾画危机的有形结果，并不是单纯的修辞手法的差别。戴高乐反对大多数参议员的意见实施公民投票，近乎固执地使自己认为必要的改革流产；乔治·蓬皮杜在1969年当选为总统，他召唤沙邦-戴尔马为总理，给他3年时间尝试建立“新社会”的改革经验，然而由于他的参议员皮埃尔·朱耶和玛丽-弗朗斯·加罗的强烈要求而终止，他们以极大的胆量说服蓬皮杜，说这样改革下去会使他本来拥有的多数派和社会失去稳定。1974年，吉斯卡尔当选为总统，差点不行了，才重新采用沙邦的部分改革纲领；组织解除政治生活中的“痉挛”，并实现“社会改革”。这些与1968年5月风暴的前后联系是不容置疑的。换句话说，右派在1968年5月中左右为难，摇摆不定，6月以后的镇压和报复，使他们更加明白：人们还是相信煽动造反的社会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阶级斗争的理论的确是数不胜数的深奥论断中的纲领性东西，其依托面极其广阔，在总体上揭示了一切错综复杂的潮流和宗派的本质。

从阶级斗争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②，五月是资本主义达到帝国主义垄断阶段（有人粗略地统计过，这些专用名词经常变换）

^① 迪斯累里（Disraeli Benjamin，1804—188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首相。在他任首相期间曾实现反对党的某些改革意见。——译者

^② 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所作的书目摘要概览，即法国共产党和极左派关于1968年五月的作品。

的额外灾难。法国资产阶级应该面对工人阶级的暴动，因为超剥削联盟中的富有阶级的消费呈现过分奢华的景象，他们当然抵挡不住暴动浪潮的冲击。学生暴动是知识劳动者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和资产阶级的规范的决裂，资产阶级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为暴动所利用。

运动显然是复杂的，因为运动中相对激进的思潮是依靠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推论并用来摧毁对手的推论的。正统的共产党人、托派分子、主张工人自治者、甚至社会主义者都是依仗同样的方法论互相刻毒地攻击。以至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五月以后都经历了这一天：徒劳地用相当的篇幅企图解释这个事件。

当然，在这些分析里，都有它的道理。法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其危机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一切如遇到经济难题的时候一样，应届政府的反对派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为什么在经济繁荣、失业程度很低、人民购买力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反而引发了社会危机？而马克思原则上认为社会动乱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

其次，他们应该解释青年的作用问题，观察家埃特加·莫兰以他的天才阐明：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青年一代正在以近乎阶级的阵营阻碍统治阶级的传统方案和社会生活的决策。

还必须注意运动角色们意识中的错误和因偶发事件所带来的自身混乱等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观点，这是“唯心主义”、“虚无观念”、“小资产阶级狂热”在作怪，尽管不涉及这些，对我们理解事件并不重要。马克思在他的历史性著作里，以浩如烟海的数字立住脚，以至使他没有必要赞成“马克思主义

者”的存在^①。他的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继承者们稀罕他的天才，却忽视了认识五月的独特性之一，即正值上升时期的中产阶级，将以他们在社会的中间地位，使两个最大对抗阶级之间不断扩大的纲领分歧点逐步消逝，而无产阶级一边和新生的中产阶级物业主为另一边的对比却渐渐明显起来。由于忽视中产阶级广泛存在的缘故，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在假设五月将表明的是另外一回事：终究有一天，先前的中坚力量——工人阶级和它的代表们将达到更高水平的觉悟和组织，并将直接提出它在社会中的权力问题。

然而对不幸的是，相反的进程产生了：混和性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惯常承诺改革不断增加，工薪中产阶级的砝码一直在加重，而依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建立起来的组织却迅速衰退。以致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向托克维尔的资本主义的观点转化来解释这场危机^②。

莫兰、勒福尔、卡斯托里亚迪和图雷纳的评论

应该在某个广场上特别地建一座纪念碑纪念这些同情五月运动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他们几乎是冒险趁热进行 1968 年的总研究。那时，他们的研究、假设很难找到材料印证，然而他们都以严谨的态度和理论上的想象力在研究五月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的研究比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研究还要细致入微和光彩夺目。

① 马克思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曾对自己在法国的虚伪的追随者们说：“有一点很明显，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见《恩格斯给伯恩斯坦的信》（1882 年 11 月 2—3 日）。——译者

② 西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样混合着资产阶级的唯心的阶级斗争理论。——译者

前三位作者的《缺口》^①，虽然基调与马克思主义者们有差别，却揭示了五月所表明技术官僚主义社会的脆弱和危机，青年和工人阶级正是以正义和人道的名义反对这种社会。五月造反在这种社会和政治监督的体制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同时开辟了一条走向更真实民主的、工人自治的，而不是代表制的可能道路，使社会的每一份子走进更适合的社会。

根据一切表象，这个缺口在制度里已合拢了；青年和工薪阶级似乎觉得处在技术官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改革中比他们处在不满的抗议中更满意一些。然而他们可曾知道，可能有一天，缺口会重新打开……

阿兰·图雷纳^②则从五月里发现了“社会运动”的新出路，即以民主和抗议的活动替代传统的对现状不满，借社会骚动的机会进行宣泄。根据图雷纳的观点，还允许今天在议论中最好相对地忘却“社会运动”这个概念。他的作品的关键点对70年代以来非常有用。这种奇特的历史性预断，的确大大超越了社会学家的论题范畴。

民主的假设

为了弄清五月，必须从含糊不清的问题开始。这种研究已经常性地开展起来了，即从造反的两个面对开始，既面对古老的东西又面对现代的东西，既评述过去又预测未来。

1968年的法国，是人们从没见过的，可以说是一次来自古老的农业社会和传统的工业社会的强行军。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都混合在里面。那时，在工业中，最使人厌烦的雇主们主宰

^① 埃德加·莫兰、克洛德·勒福尔、让-马克·库德雷（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德的化名）：《缺口》，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② 阿兰·图雷纳：《空想共产主义》，巴黎·瑟伊版，1968年；1972年有缩印版。

着大部分的经济，而大工业集团在蓬勃发展之中，但戴高乐主义已取得部分进展，某些工会和资方左派开始积极为社会关系的缓和辩护。在农业中，地方小地产仍然占优势，但出口的、多产的、机械化的农业同样在兴起。在商业上，小店铺仍然充斥市区风景，归并的大商业只能占据市郊。在外贸方面，法国总是能与海外领地的贸易中获取大量收益，而欧洲总在强制法国进入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法国当时成为世界的第四大出口国。在政治上，那时还只能任凭法共的法国总工会照旧掌握着发起工人运动的主动权，但工联主义开始参与竞争并更富创新，尤其是法国民主工人工会；马克思主义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是机会主义者；左派总是摇摆于共产党的国家干涉主义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社会党）的模棱两可之间，但左派正在社会主义的表面上自我翻新，主要表现在居伊·摩勒的社会党或孟戴斯的激进党以及罗卡尔的小统一社会党内部；右派的表现方式也完全是一种大杂烩，戴高乐醉心于大改革计划的保守党状态。蓬皮杜，这个出生于蒙布蒂夫的工业主义者式的农民，则处于现代蓝图收集者的状态。宗教仍然左右着许多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然而梵蒂冈二世的风已刮起法国天主教教堂的灰尘，基督教左派开始指挥法国天主教的唱诗班。在舆论上，电视严格地服从政治权力，可电台已如愿实现自由，这是多亏周边国家的电台以及半导体收音机神奇地转移电波的缘故。让·诺安^①和让-克里斯托夫·阿韦蒂在法国广播电视公司里完全像让·德拉努瓦^②和让-吕克·戈达尔^③在电影界里一样竭尽全力地争取自由。那时，在避孕药已经成批量生产的时候，在超短裙和家庭舞会耗费着青少年一代的聪明才智的时候，许多法国女青年还能在是处女的时候结婚。

①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左派人士。——译者

② ③ 法国电影界的左派人士。——译者

有人说，全社会竟如此地混合新与旧。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传统道德的沦丧，1968年的法国正紧张处在这种双重性里。那时，当80年代的道德和思想已经在流行的时候，30年代的家长制社会依旧存在。战前还能控制道德，战后就松弛了。

造反当然要借用途反对传统。学生运动要求大学改革，但学生领袖们用的还是世纪初的革命语言。拉丁区的不满现状者们虽然要求教学法现代化，要求放松纪律，要求改革知识的传播，但又拒绝大学向经济或企业开放。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往往处于与最重要的工会组织对抗的状态，然而当劳动者的各种愿望在各个工厂里表现出来的时候，工人阶级紧接着提出的却只是纯粹的工资“数量”上的要求，而且，还有相当的工薪者不管工资“数量”如何低而无动于衷。工薪者们模糊而又强烈地要求采纳他们的意见，并要求赋予他的部分的责任，可是他们的代表又拒绝一切可能与工会的职能相仿的冒险管理活动，因此人们用一个侮辱性的词“阶级合作者^①”谴责他们。大部分行业在骚乱中都争取更多地分割权力，这次运动双倍地证明行会主义斗争尖锐。但终究没有人想引起内战，也没有人想非法地夺取政权，虽然任何人都都在运用革命的词藻。所有的主角们都在谨慎地避免走向极端并抑制他们的战士，因为不这样就可能导导致伤亡。无论在革命的词藻激烈变换的时候，还是在残酷镇压的时候，主角们都随时一致保持这样。暴动的学生们完美地运用象征性行动，虽然有任性、嘲讽的举动和咄咄逼人的暴动设想，总之还是平和的。然而，他们还是抑制不住战斗的刚性，使五月运动仍然在强求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同时将魔术般地绘出未来社会的轮廓，企业的、市场的、资方的以及资本主义竞争的蓝图，并将需要15年的时间

^① 合作者（Collaboration），在法语里有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奸与敌人合作的意思。——译者

才能取得法国对左派的承认^①，这在欧洲邻国好早就在实践了，即对社会民主党的折衷选择。

从那时候起，对五月的一切评论都是可能的，既然社会群起反对这个运动，正好发挥运动双重性的作用。狂热的评论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或列宁主义的一切变种以及结构主义^②或尼采主义^③的无数说法左右五月以后。这是可理解的事，当时人们可能为例如列宁也未曾想到过的这种全面罢工和推翻一切的大批街垒力量，以及一切权威的世界舆论对这一个月不顾社会监督的无尽的阴谋、造反的评论所慑服，未来得及思考许多。接着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十年。自由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主张工人自治者和国家干涉主义者并存。这有利于一切社会“抉择”和一切社会边缘活动。而政治和社会活动分子们在这30天的造反里都尽可能远距离地给予促进。少数学生先锋的激进言论表面看上去是合法的，因为他们用的是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或上百万罢工者的名义，这需要他们以耐心和强有力的战斗来重新获得这种斗争的合法性，并用假设来表明这种战斗比选举的银样镏枪头更具打破一切格局的代表性。

然而，大部分人对五月的现实有误解，没认识到五月在除了对人性的否定之外迸发出了个人的和集体的创造性，并在两天里就跑出了摆设性组织中的思想家们能构想出的所有图解。评论家

① 法国到1981年才选举左派领袖，社会党党魁密特朗为总统。——译者

② 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唯心主义思潮。认为一切人类行为构成的社会现象都内蕴着一定的结构，这种结构支配并决定着一切社会现象的性质和变化。——译者

③ 尼采主义：尼采的哲学就是“唯意志论”，“权力意志”，“权力斗争”等等。是极端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公开为资产阶级剥削和侵略辩护，是“法西斯思想”的先驱。——译者

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① 非常明智地提到一本小册子《1968年的思想》^② 的指导作用，根据这个著名的小册子的主题，1968年以后（和以前）的思想的指导作用在往后70年代的冷酷战斗里比在五月的民主沸腾里要成功得多。有人说在五月里，阿尔蒂塞^③ 的东西没起到一点作用。当林哈特^④ 的理论崩溃的时候，科恩-本迪自发地充分发挥。人们害怕五月被右派和改良者们复得，曾首先有过宁愿让左派及理论占领的思潮，只是没有实现而已。因此，五月以后的十年成为极端政治化时期，必然要引起论战和极左的迸发。

五月的政治活动分子们在前线的终点失败了。从1973年皮埃尔·奥弗尔内^⑤ 在雷诺汽车制造厂大门口死于殴斗以来，左派主张曾一度超过了它的鼎盛时期。五年以后，左派将不容置疑地从它的衰落中突然一跳^⑥。在五月风暴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发现革命的传统已散成丝缕，雷吉斯·德布雷^⑦ 举行一个同时是墓志铭的小型纪念尝试，他认为与其说五月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高涨，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狡猾更准确些。

直到20年以后，五月运动的内涵自然清晰起来，即五月在文化方面无声地取得了胜利。它在风尚方面的革命是完美的。多亏过去的时光，使人们才能在事件的纷繁中发现五月原来是未来

① 他参加了《权威》讨论会，《权威》第39期。

② 吕克·费里和阿尔·雷诺：《1968年的思想》，巴黎·加利马尔版，1985年。

③ 法共党员，亲华理论家。

④ 亲华团体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领袖。——译者

⑤ 左派战士，在1973年的一次冲突中死于雷诺汽车制造厂大门口。

——译者

⑥ 指1978年3月议会选举结果，密特朗的社会党得票上升至22.8%，首次超过法共，成为左翼第一大党。三年后，密特朗终于当选为法国总统。——译者

⑦ 游弋于马列主义和密特朗派之间的作家。——译者

的报喜人。五月运动之后，合法的国家再没濒临倾覆，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直，“制度”在它的基础上更巩固。相反地，只是日常生活变了。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某些休闲方式悄悄地侵入工作交往（当然不是在工厂里）和家庭交往之中，纪律变得松弛起来，许多规则不再起作用。遗留下来的宗教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的身体检查同时放宽，直到新的自由愿望产生。在大学城里，男生去女生住处的权力问题已全面掀起争取；五月加速了日常生活中的性感化，主要用图像和广告来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对某些人口范围如在少年中或都市中心同样不回避。五月以后，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也不再那么没有一点趣味。教士、显贵、医生、翻译、律师、法官等世俗权力同样出现在法国的例行公事中，人们对此不屈不挠地提出异议，直到他们自觉无趣逐渐消逝；但他们也在进行公开的耐心的持续的和符合法律的辩论，直到得到同样的重新评价。“对话”“商讨”等变成了一切权力尝试的代名词。法定的秩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都慢慢地被弃置到权力的博物馆里。从这以后，权力大概只是成了为自己辩护和说服、引诱别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五月造反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这个定义有些模糊但是准确，这个定义所代表的意义比权力的意义好，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他们各自的面貌里更加日常化。女权论，工人自治主张，地方主义，生态学，反传统精神病法^①，同性恋的合法斗争，近赤化主张的夫妻共有财产制，麻醉探测嗜好，迷恋旅游，追求享乐的自恋癖，性自由，奇装异服，亲美和厌美的混合，团体狂热，主观主义偏向等等，不分昼夜地泛滥，这一切现象都是在五月里萌芽的。那时，人们在巴黎

① 对精神病人反对用粗暴的治疗方法，主张对病人以同情和安慰。——译者

大学和奥戴翁剧院的墙上，在一些悬挂在工厂大门口的狭长的标语上初识了这些，从示威者的口号中，尤其是在无休止的战斗到处蔓延的那些日子里听到这些，同样可从拉丁区，从被占领的企业里，罢课的中学生那里，离婚的家庭中，停滞的行政机构中和拥挤的大街上接受这些。

这些梦想渐趋平静。但人们仍然在以不完整的方式稀释、重温或偶尔再接触这些梦幻。这些东西已辐射到一切社会关系中，改变了所有人的感觉，并在20年里改变了所有的常规和无数的规则。“激增的一代”是造反的主要角色，社会把他们输送到各处，随着几乎独揽了一切社会角色——青年工人或青年干部，教授或工程师，军人或公务员，然后成为丈夫或“伴侣”或家长，有的成为他们曾经不满过的那个社会之后的负责人，他们从容不迫地越过了那里的栅栏，但从没忘记过作为另外一方的滋味。尤其是现在占据社会金字塔中间的那些大腹便便的广泛的中产阶级，已被五月运动塑造成型了。他们在没精打采的和分散的形式下，不慌不忙地主宰着群众社会，1968年使他们遍地开花。

五月在是政治的以前已经是文化的，另外一种生活的要求比另外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要好得多。由于保守的恐惧感和担心引起论战的复杂因素，人们没能马上看到这一点，因为造反一镇压赌注的发生程序将仍然要在台前占据五六年的时间，同时报纸上仍有助长“骚动”的专栏文章，而且共和国警察的牙齿也在武装。正如亨利·韦贝尔^①着重提出的“救世主降临说”所提供的启示：在暴动中政治上的收获只是通过政府的承诺使极左派领袖们的学生群众合法化了而已。

① 托派倾向的学生组织革命共产主义青年（所谓“第四国际”）的负责人之一。

作家阿蒙和罗特曼^①的热情而详尽的叙述使人们今天认识到这个战斗的北欧传说总之并没有思想和行动，没有个人一生和个人命运的慢慢转化那么重要。他们认为五月的遗产就是它的扩散性、混乱性以及逐渐消逝而又无所不在的真实性。即内在的革命性和实践中的混乱性，是一种个体的造反，而不是一种集体业绩的暴动，是个国民的大故事，是结构改革的希望，也是世纪上半叶历史倾覆的一次模拟。相反地，市场、社会竞争、自由主义的自治、国内和平、冲动的满足，成为五月以后最大的胜利果实。

那么应该把头从马克思那边转过来（当然不要忘记他），看看托克维尔^②那一边。在那里有人将提出一个重要的假设：五月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而是一场改良的大暴动，一场民主暴动。

因为20年以后，五月将持久地显示它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而是一次成功的改良。

进一步地说，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亚历克西的可贵概括，就是走向平等的不可抗拒的步伐，在这步伐里将慢慢地忘却社会差别并逐步把全体公民带向一种共同的命运。五月就是在这个方向里的一次大飞跃，一次为了平等的暴动。青少年们拒绝选择入大学，不服长官，嘲弄权威；人们要求各业最低增长工资限额为35%，而不是10%，以达到与以前大不一样的工资；他们在完全拥护第五共和国的民主方面的同时，要把戴高乐的专制送进历史博物馆，打破戴高乐派在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政治垄断，使所有同业工会的领导人失去合法性，抨击一切头面人物，行业保护

^①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② 指托克维尔的唯心的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观。——译者

人、行政长官、良师权威、思想家、知名人士、显贵等一切重要人物。他们希望在一切领域里制定标准，减少差别，遏制奢华。

一些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五月的复杂性在进一步肯定“五月是一场民主暴动”的结论。在第一个星期里，除了观念和革命方面的东西，具体要求都提出来了；暴力被用来作象征而不是用作改变力量关系的具体手段；在对抗中，人们不自觉地达成默契，寻找避免越过红线的一切办法，即伤亡的红线。在5月10日，街垒只是一种表示，而不是一种军事手段；在街垒旁边，政府也是本着有限打击的底线，等待着承担责任的最后时刻。巴黎大学的占领仅仅使空话的造反开始；为了不至于为此再诉诸武力，政府对占领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蓬皮杜没打算依靠警察力量或部队，当然主要是顾及舆论的倒转，也有保护民主的理由；工会罢工使经济停滞，但未曾超出暴动性罢工的界限；政府在社会妥协里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在与工人阶级的对抗中寻找；戴高乐想以公民投票摆脱困境，蓬皮杜则想以立法议会选举来摆脱；大学生们曾想占领市政厅，后来意识到不妥而放弃了；革命共产主义者青年的纠察队制止示威群众冲进武器商店。当戴高乐摇动真正内战的魔瓶时，每个公民都自觉地放弃权力更替的要求并顺从地走向投票箱以渡过危机，这是事实。总之，尽管有言语的狂热和街头对抗，但人人始终都心照不宣地保持民主的默契，以避免流血的对抗。人人所关心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权力归谁持有，而是社会的实际改变，正如科恩-本迪在形势转折关头接受《观察家新闻》^①的采访所明确解释的：尽管一切有些过分，但毕竟还是恪守在民主的范畴内。

6月以后的对抗的确使一切再度停滞并退到社会的深处进行。然而为时已太晚，因为民主的默契已形成，流血的警告已发

^① 1968年5月9日《观察家新闻》。

出，而且社会基础也再不会与以前完全一样了。各团体的头头们知道一点，也考虑到这种情况。兰佩迪西安的谚语说：为了什么都不改变，就必须改变一切。而这一切仍然只是某一件事。

个人，不是阶级或团体，经过五月得到强化。个人不是孤立的或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有关社会命运的每个不安的个人，希望相通和参与的个人。这是重要的一课。个人的欲望和意愿将更好一些地负有社会责任。为社会所排斥的阶层非常小（还必须注意造反的危险，但五月以后的保守的政府仍然没有停止社会让步），上升的中产阶级中的初步当选者越来越多，他们为销售世界所倚重，也为政界所爱护，同时形成群众文化，群众休闲，群众交往，群众自治，这一切现象无不带有五月的印记，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博德里亚^①在五月的幽灵里^②看到整个历史的末日，利波苇茨基^③在克里斯托夫·拉施之后看到的是民众的无意义的自我陶醉的喝彩^④，费里^⑤和雷诺则看到的是公民个人主义的发展^⑥，然而是有责任的和希望参与的个人主义。人们会无尽地议论这些，于是将可能发现丰富事件的另一种双重性：在革命者们的救世主式的移植术后面，人们在后退的个人主义和公民参与的个人主义之间摇摆不定，除非倾向之一明显地占上风。

有人可能遗憾在五月中打开历史缺口的狂热在如此民主的和

① 法国当代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② 《神化的戴高乐》一书尤值得注意，巴黎·格拉塞版，1983年。

③④ 法国当代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⑤ 吉尔·利波苇茨基：《空洞的时代》，巴黎·加利马尔版，1983年。

⑥⑦ 法国当代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⑧ 吕克·费里和阿尔·雷诺：《1968—1986，个人主义的道路》，巴黎·加利马尔版，1987年。

小资产阶级的单调乏味中骤落，而动情地反对一切理智和谨慎。有不成熟是正常的，甚至两天里犯同样的错误都是可能的。人们都将有理智。而且同样应该负有责任，如果此外的真正理智是冒犯的爆发，然而只要有益于走向更加民主化，那么，战斗将有所值，此外，辛劳将是白费。

附 录

资 料 提 要

书 目 提 要

劳伦斯·怀利、富兰克林·德查和玛丽·特伦尔：《法国 1968 年事件》（Laurence WYLIE, Franklin D. CHU et Mary TERRALL, *France, the Events of 1968*, 匹兹堡·欧洲计划委员会版，1973 年）。

由美国的三个大学生编纂的关于法国五月运动的重要书目提要，截止 1973 年。

记 叙 类

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 年 5 月》（Adrien DANSETTE, *Mai 1968*, 巴黎·普隆版，1971 年）。

这是出自旧学校的一个历史学家对 1968 年 5 月的最完美最可信的记叙，作者因关于第二帝国的详尽而杰出的著作《巴黎解放史》而著名。阿德里安·当塞特抓住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令人吃惊地对五月运动感兴趣。该书（1971）年出版，当然不可能透彻地记叙，在揭示事件中也存在一些从未听说过的错误证据，主要是关于警察和学生的行为以及 5 月 29 日的情况；该书因思想和手笔陈旧而受到影响，但仍然是讨人喜欢的读物，另外往往太

偏离主题，尤其在关于学生暴动方面。但这反而使该书显得丰富和深沉。

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共和国史》（Pierre VIANSSON - PONTÉ,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gaulienne*, 第二卷《孤儿时代》，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1年）。

该书以简练紧凑引人注目，但不及当塞特的书完整，是《世界报》的一个记者的记叙，该书使他从此成为第五共和国的经典历史学家。书中关于五月的篇章第一次特别详尽地叙述了5月27日的雷诺集会，并提供了解释5月29日使所有的发起者重振的一天的线索。不过，该书缺乏一些重要的数据，这主要是出版时间过早的原因。

菲力普·亚历山大和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Philippe ALEXANDRE et Raoul TUBIANA, *L'Élysée en péril*, 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亚历山大和蒂比亚纳的调查是个突出的体裁。尽管没按事件的完整编年叙述，资料却是来自主要角色的相继证言。仅在五月之后一年，揭露了大部分的幕后活动，成为今天共享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当时正是全法国人所纳闷的东西。

勒内·巴克曼和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René BACKMAN et Lucien Rioux, *L'Explosion de mai*, 巴黎·拉封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是运动的“庇护所”《观察家新闻》的两个记者撰写的关于五月事件的编年记叙，资料丰富，但是粗略，这明显是五月之后立即出版、时间仓促的原因。涉及政府和学生组织幕后所发生的事情，有些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Hervé HAMON et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该书与五月一年后出版的《尘嚣的年代》和1968年前后的学生战斗的

北欧传说，都是从记者采访开始，作者与 50 名左右的运动参与者一起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关于他们所经历的五月的记叙是很真实的。

这是一本不可替代的关于五月政治史的书，也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缺陷是只叙事实，未加评论，例如应该评说朗贝尔分子实际上是在沉默中度过五月的；再如，对 1968 年 5 月的“文化”因素估计不足，各党派只是在抓政治精英，当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际上这是一种运动观点的结果。这是一部杰出的完整的政治一代的历史，而不只是大致上一代的历史。

皮埃尔·安德罗，阿兰·多韦涅和路易-玛丽·拉古特：《革命的五月》（Pierre ANDRO, Alain DAUVERGNE et Louis - Marie LAGOUTTE, *Le Mai de la Révolution*, 巴黎·朱利亚尔版，1968 年）。

全书另一本记者记叙的五月书，他们熟悉情况，栩栩如生，但有些过时。

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Jean - 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巴黎·普隆版，1969 年）。

采用戴高乐派的官方年月记事，获得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尤其是转折关头大人物的活动和事实，涉及政府内部进行的政治手腕，并辅以令人震惊的档案材料。

让-马克·萨尔蒙：《未来的大厦》（Jean - Marc SALMON, *Hôtel de l'avenir*, 巴黎《今日新闻》，1978 年）。

战士的回忆录，激情的叙述，1968 年式的分析，作者是 1968 年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纠察队队长，现已归附改良主义的左派。

让·贝尔托里诺：《捣乱鬼们》（Jean BERTOLINO, *Les Trublions*, 巴黎·斯托克版，1969 年）。

第一次对 1968 年五月学生运动及运动史进行系统的研究，从扎实的调查和众多的采访开始。然而自阿蒙和罗特曼合著的《一代人》出版后，就没那么有用了。

雅克·贝纳克：《重新发现五月》（Jacques BAYNAC, *Mai retrouvé*, 巴黎·拉丰版, 1978年）。

运动的角色之一贝纳克对运动进行的生动而详尽的叙述,带一点战士的口吻,同时借助发表的著作、档案材料及从未刊行的证言。书的第二章是关于众所周知的桑西耶大街事件的长篇概述,那时,贝纳克和他的朋友们是自由主义倾向,他们使劳动者——学生行动委员会活跃起来,成为整个运动行动委员会的一支。他以这个名义在事件的未知领域里提供了有关的详细档案材料,但也使这本书因此难读。

克里斯蒂昂·夏里埃：《疯人派的春天》（Christian CHARRIÈRE, *Le Printemps des enragés*, 巴黎·法亚尔版, 1968年）。

作者在事件之后及时地发表了完整的叙述,也是可读的,但作者往往用抒情的方式表达,且时时充满大胆的印象,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缺陷。

安德烈·方丹：《冷静的内战》（André FONTAINE, *La Guerre civile froide*, 巴黎·法亚尔版, 1969年）。

作者以社论作者和《世界报》未来领导的有利位置,对事件进行了熟练的杰出的综合性叙述。

克洛德·帕亚：《1968 - 1969, 秘密档案》（Claude PAILLAT, *Archives Secrètes, 1968 - 1969*, 巴黎·德诺埃尔版, 1969年）。

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专业观点在未知的档案材料里研究五月的内幕,很多观点是有用的。

菲力普·拉布罗和米歇尔·芒索：《这只是开始》（Philippe LABRO et Michèle MANCEAUX, *Ce n'est qu'un début*, 巴黎·德诺埃尔版, 1968年）。

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次自我记叙,在拉布罗的领导下,在五月的群众队里出现了新闻工作者队伍。该书有些粗略,且已过时。

菲力普·亚历山大：《戴高乐和蓬皮杜的争斗》（Philippe ALEXANDRE,

Le Duel de Gaulle - Pompidou, 巴黎·格拉塞版, 1977年)。

提供了两个大人物在1968年的关系详情。

证言类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 《大市场》(Daniel CHON - BENDIT, *Le Grand Bazar*, 巴黎·贝尔丰版, 1975年)。

以永远保留的五月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奉献的一部有声有色的象征性故事。这是位让人们一看到往往就心绷紧的革命者。

乔治·蓬皮杜: 《恢复事实真相》(Georges POMPIDOU, *Pour rétablir une vérité*, 巴黎·弗拉马里翁版, 1982年)。

一本研究蓬皮杜 - 戴高乐的关系和风暴高潮阶段政府首脑思想的关键书。

穆里斯·格里莫: 《五月使你愉快》(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巴黎·斯托克版, 1977年)。

五月的主角之一对五月的动人叙述, 充满了动人的细节和沁人心脾的观点。可以从中了解巴黎警察局长并不总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爱德华·巴拉蒂尔: 《五月的树》(Edouard BALLADUR, *L'Arbre de mai*, 巴黎·朱利昂作坊版, 1979年)。

五月的重要角色, 蓬皮杜的社会顾问所写的半虚构半真实的专栏作品。从中可以发现政府的顾问正如人们所议论的那么敏感。此书以高素质的文笔和激情, 在费力掩饰的程式下, 对事件的进程提供了有用的详情。证实当时如果需要总理周围汇集的班子的能力, 是可以继续政府的长期执政的, 乔治·蓬皮杜的拐杖、弟子、在五月中活跃的年青的希拉克就是其中之一。

雅克·马絮：《巴登 1968》（Jacques MASSU, *Baden 68*，巴黎·普隆版，1983年）。

以主要的证人，对将军的巴登 - 巴登之行详细叙述。叙述的事实是没有争议的，马絮的评论也是丰富的。

克里斯蒂昂·富歇：《昨天和明天的回忆》（Christian FOUCHET, *Mémoires d'hier et de demain*，巴黎·普隆版，1971 - 73年）。

1968年的内政部长的回忆，非常忠于事实。

弗朗索瓦·弗洛伊克：《戴高乐之外的回忆》（François FLOHIC, *souvenirs d'outre - Gaule*，巴黎·普隆版，1979年）。

以他曾长期是戴高乐的副官的身份回忆。

奥利维耶·吉夏尔：《我的将军》（Olivier GUICHARD, *Mon Général*，巴黎·格拉塞版，1980年）。

有关五月的某些有意义的评注和轶事。

米歇尔·若贝尔：《后代的回忆》（Michel JOBERT, *Mémoires d'avenir*，巴黎·格拉塞版，1974年），《另一种眼光》（*L'Autre Regard*，巴黎·格拉塞版，1976年）。

米歇尔·若贝尔的回忆大部分是准确的，往往说反话，写得很好。

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Georges SÉGUY, *Le Mai de la CGT*，巴黎·朱利亚尔版，1972年）。

五月的主角，法国总工会主席的有意义的奉献，对事件的进程提供了一些资料，尽管为自己辩护的基点有损该著。

安德烈·巴尔若内：《1968年的革命反叛》（André BARJONET, *La Révolution trahie de 1968*，巴黎·J·迪迪埃版，1968年）。

总工会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对总工会反叛经过的简短叙述。作者在风暴高潮中因抗议总工会的懦弱行为而辞职，并证实在突然降临的沙莱蒂

体育场集会的局势下，“一切都是可能的”。

阿尔贝·德特拉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会员们合著：《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1968年五月的立场和行动》（Albert DETRAZ et les militants de la CFDT, *Positions et actions de la CFDT en mai 1968*），巴黎·《工人运动》1969年特刊）。

该书自述工会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

安德烈·加沃：《街垒的另一边》（André GAVEAU, *De l'autre côté des barricades*，巴黎·西莫埃版，1978年）。

警察分局局长之一加布里布埃·维亚利充分发挥了他的叙述才能，对五月提供了丰富的证言。对于想了解发生在“对面”的事的人很有用。

费里克斯·加达里（和几个作者）：《我们的朋友哪儿去了？》（Félix GUATTARI, *Que sont mes amis devenus?* 巴黎·萨韦利版，1978年）。

十年后收集的运动角色们的证言，已知和未知的材料都有。

伊夫·盖纳：《支撑国家》（Yves GUÉNA, *Maintenir l'État*，巴黎·法亚尔版，1970年）。

1968年的邮电部长所看到的事件，这个政治家，戴高乐的高官，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未来的总书记，政府部长之一，在事件期间自始至终地保持坚定和冷静的态度，五月后负责解决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罢工。

阿兰·佩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1968年五月事件》（Alain PELLET, *Pierre Mendès France et les événements de mai 1968*，巴黎政治学院高等教育文凭论文，1969年）。

对1968年的孟戴斯的行动事实的详尽研究，并与几个有关的证人证词比较，属宝贵的资料。

让-克洛德·凯布尔什：《五月的过客》，（Jean-Claude KERBOURCHE, *Le Piéton de Mai*, 巴黎·朱利亚尔版，1968年）。

由他为今天的欧洲第一新闻杂志所写的大街上的景象和报道。

埃米尔·科弗尔马恩：《3月22日只是开始，战斗将继续》（Emile COPFERMANN, *22 mars, Ce n'est qu'un début, continuation le combat*,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8年）。

关于3月22日运动的活动材料。

克莱翁集体著：《我们的武器就是罢工》（Collectif Cléon, *Notre arme, c'est la grève*,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8年）。

克莱翁罢工者的证言，这里与布格奈同时开始罢工。

资料类

阿兰·施纳普和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学生公社日志》（Alain SCHNAPP et Pierre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巴黎·瑟伊版，1969年）。

关于1968年学生公社的大宗材料、传单、谈话和各种印刷品。混乱、复杂，但无可替代。

米歇尔·佩罗，马德莱娜·勒贝里乌和让·迈特龙：《索邦凭它自己》（Michel PERROT, Madeleine REBÉRIOUX et Jean MAITRON, *La Sorbonne par elle-même*, 巴黎·社会运动资料64期，1968年）。

由三位历史专家收集推荐的原始资料，很有价值。

马克·克拉蒂茨，雷蒙·贝卢尔和安妮特·克拉桑蒂：《5月2-13日的学生暴动》（Marc KRAVETZ, Raymond BELLOUR et Annette KRASENTY, *L'Insurrection étudiante, 2-13 mai*, 巴黎·联合出版社，1968年）。

关于五月第一周里大学抗议活动的详细报告和日程表，附有相应的材

料。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五月日子的黑皮书》（UNEF, *Le Livre noir des journées de mai*, 巴黎·瑟伊版, 1968年）。

控诉警察暴力行动。有价值, 但往往有些夸张。

集体著：《1968年五月的传单》（*Les Tracts en Mai 1968*, 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 阿尔芒·科兰书店, 1975年）。

五月重要的有价值的传单的词汇学分析。

阿兰·阿亚什：《五月革命语录》（Alain AYACHE, *les citations de la révolution de Mai*, 巴黎·让-雅克·波韦尔版, 1968年）。

标语、格言、“蹩脚的空话”和墙头语的汇编, 由《精粹报》未来的领导主编。

朱利安·贝藏松：《墙报》（Julien BESANÇON, *Journal mural*, 巴黎·特库版, 1968年）。

五月墙上的标语和宣传品, 由广播电视台的这位记者汇编。

费拉迪米尔·菲塞拉：《1968年5月的标语》（Vladimir FICERA, *Writing on the Wall, May 1968*, 纽约·圣马丁新闻版, 1968年）。

由一个美国研究者收集的1968年5月的标语。

《1968年5月的招贴》（*Affiches, Mai 1968*, 巴黎·特库版, 1968年）。

·如题所示, 收集的五月的招贴。

朱丽叶·芒塞斯：《一个工人的话》（Juliette MINCES, *Un ouvrier parle*, 巴黎·瑟伊版, 1969年）。

一个罢工者的证言。

传记类

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Jean LACOUTURE, *Pierre Mendés France*, 巴黎·瑟伊版, 1981年）。

对孟戴斯活动的权威性叙述。

弗朗兹 - 奥利维耶·吉斯贝尔：《雅克·希拉克》（Franz - Olivier GIESBERT, *Jacques Chirac*, 巴黎·瑟伊版, 1987年）。

这算是很久以来, 最好的希拉克的传记, 对研究 1968 年很有用。穆里斯·沙弗兰的《希拉克》（Maurice Szafran, *Chirac*, 巴黎·格拉塞版, 1986年）和蒂埃里·德雅尔丹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叫希拉克》（Thierry Desjardins, *Un inconnu nommé Chirac*, 巴黎·塔布尔 - 龙德版, 1973年）都不及这本书完整。

弗朗兹 - 奥利维耶·吉斯贝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许代表历史的趋势》（Franz - Olivier GIESBERT, *François Mitterand, ou la Tentation de l'histoire*, 巴黎·瑟伊版, 1977年）。

提供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对事件反应的详情。

卡特琳·奈：《黑与红》（Catherine NAY, *Le Noir et Le Rouge*, 巴黎·格拉塞版, 1984年）。

比弗朗兹 - 奥利维耶·吉斯贝尔对五月更怀敌意。

埃里克·鲁塞尔：《蓬皮杜》（Eric ROUSSEL, *Pompidou*, 巴黎·拉泰版, 1984年）。

关于总理在 1968 年 5 月的完整传记。

解释类

有必要扫描一些解释五月的原文, 载《权威》杂志第 39 期, 1986 年出

版。

埃特加·莫兰、克洛德·勒福尔、让-马克·库德雷(科尔内留斯·卡斯特洛亚迪的化名):《缺口》(Edgat MORIN, Claude LEFORT, Jean - Marc COUDRAY (即 Cornélius CASTROIADIS) *La Brèche*, 巴黎·法亚尔版, 1968年)。

由三个批评左派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收集的创作文章,主要来自社会党和曾有野蛮行为的群众。第一次缜密地深刻地出色地分析运动,即使他们的假设没有马上得到完全的证明。

阿兰·图雷纳:《空想共产主义》(Alain TOURAINE, *Le communisme utopique*, 巴黎·瑟伊版, 1968年, 1972年再版)。

是一个同情运动的教授所著,第一批对五月进行深入细致的社会学分析的作品之一。许多评注有力而中肯,是解释的典范。

雷蒙·阿龙:《无双的革命》(Raymond ARON,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与阿兰·杜阿梅尔的谈话, 巴黎·法亚尔版, 1968年)。

可以说是对五月运动的广阔的集体进程所进行的没有带观点的批评性分析,很接近自由哲学分析法,但还是可以归并为托克维尔派的关于西欧社会民主化的危机进程观。

雷吉斯·德布雷,《官方谨慎协助的十周年纪念》(Régis DEBRAY, *Modeste Contribution aux cérémonies officielles du dixième anniversaire*, 巴黎·马斯佩罗版, 1978年)。

一个游弋于马克思主义和密特朗派之间的作家,10年后对运动的尖酸刻薄的分析,他从不相信革命是可能的,也不相信革命在法国是符合愿望的,并认为正在革新中的资本主义在五月里是在采取最后手段。

埃特加·莫兰、马雷克·阿尔泰:《五月》(Edgar MORIN et Marec HALTER, *Mai*, 巴黎·奥斯瓦尔德版, 1978年)。

两位尖锐的观察者和知识分子在五月后发表在《世界报》上的解释性文章的结集。

马克斯·加洛：《活力》（Max GALLO, *Le Pouvoir à vif* 巴黎·拉丰版，1977年）。

未来的法比尤斯政府的发言人，同情运动的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解释和叙述。

马克思·加洛：《左派主张·改良主义·革命》（Max GALLO, *Gauchisme, Réformisme, Révolution*, 巴黎·拉丰版，1968年）。

趁热发表的政论文，主要分析五月的意识形态内容。

吕克·费里、阿兰·雷诺：《1968年的思想》（Luc FERRY et Alain RENAUT, *La Pensée 1968*, 巴黎·加利马尔版，1985年）。

激烈地批评“1968年的思想家”（或假设的）富科·阿尔蒂塞，德里达等，否认他们的独创性和所谓的贡献，因为他们出自对多元民主的否认，对种种“死人”的方式表态，并使反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名。这种思想的尝试在五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80年代又赋予客观实在性。他们的思想确实存在争议。

吕克·费里、阿兰·雷诺：《1968—1986，个人主义的道路》（Luc FERRY et Alain RENAUT, *1968—1986, itinéraires de l'individu*, 巴黎·加利马尔版，1987年）。

费里和勒诺继续他们的思考，分析1968年和1986年的两个运动，如同两个相继的“民主个人主义”的示威，根据他们所反映的法国社会史的情况，他们的某些思想走在了前面，并作为政策的基础。

让-克洛德·吉耶博：《孤儿时代》（Jean - Claude GUILLEBAUD, *Les Années orphelines*, 巴黎·瑟伊版，1978年）。

杰出的作品，描写了10年后继承五月希望的破灭。该书还没过时。

让·伊巴拉：《1968年5—6月，阶级对抗的年代》（Jean IBAROLA, *Une période d'affrontement de classe: mai - juin 1968*, 格勒诺布尔·社会科学大

学，1985年)。

对事件的评论接近马克思主义。

贝纳德·布朗：《巴黎的抗议，暴动的分析》(Bernard BROWN, *Protest in Paris, Anatomy of a Revolt*, 马里斯-汤(新泽西)·勒宁将军新闻, 1974年)。

盎克鲁-撒克逊人对五月运动的分析。他们也对这个运动感兴趣。

帕特里克·西尔和莫琳·麦康维尔：《红旗在法国飘扬》(Patrick SEALE et Maureen MCCONVILLE, *Drapeaux rouges sur la France*, 巴黎·法国梅屈尔版, 1968年)。

暴动的原因和蕴涵也使另两位盎克鲁-撒克逊观察家感兴趣。

让-马里·伯努瓦：《马克思已死去》(Jean-Marie BENOIST, *Marx est mort*, 巴黎·加利马尔版, 1970年)。

一个不久将归于自由党人阵线的评论作者，对运动性质的批评分析。

勒内·卢罗：《制度的分析》(René LOURAN, *L'Analyse institutionnelle*, 巴黎·米纽伊特版, 1974年)。

·研究五月的社会学家之一，一个批评学派的创始人，对运动的思想分析很有灵感。

让·蒂博多、菲利浦·索莱尔：《法国1968年五月》(Jean THIBAudeau et philipp SOLLER, *Mai 1968 en France*, 巴黎·瑟伊版, 1970年)。

巴黎的两个先驱作家对事件原因的解釋。

穆里斯-克拉韦尔：《为解放而战斗的自由射手》(Maurice CIAVEL, *Combats de franc-tireur pour une libération*, 巴黎·让-雅克·波韦尔版, 1968年)。

由一个激愤的哲学家汇编的对五月看法的文章，包括二战时的抵抗运动战士、基督徒、自由派、革命者和戴高乐派以及后来绰号为“新哲学家”

派的文章。

让-穆兰俱乐部：《五月革命干什么？》（Club Jean - Moulin *Que f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Mai?* 巴黎·瑟伊版，1968年）。

一个很有影响的反左倾的改良主义的高级公务员团体的理性建议。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法兰西的觉醒》（Jean - Jacques SERVAN - SCHREIBER, *Le Réveil de la France*, 巴黎·德诺埃尔版，1968年）。

《快讯》的主编，《改革者》的未来主编对趋势分析。

让·费尔尼奥：《一场死气沉沉的革命》（Jean FERNIOT, *Mort d'une révolution*, 巴黎·德诺埃尔版，1968年）。

一个有才能的《法兰西晚报》和《快讯》的记者对危机的记述和分析。

弗朗索瓦·米维耶勒-阿尔基耶：《幻想者们》（François FONTVIEILLE - ALQUIER, *Les illusionnaires*, 巴黎·罗贝尔·拉丰版，1968年）。

对事件的另一种现实性分析。

热拉尔·门德尔：《反对父辈的暴动》（Gérard MENDEL, *La Révolte contre le père*, 巴黎·帕约版，1968年），以及《一代人的危机》（*La Crise de générations*, 巴黎·帕约版，1969年）。

对五月革命的精神进行分析。

吉尔·马蒂内：《权力的占领》（Gilles MARTINET, *La Conquête des pouvoirs*, 巴黎·瑟伊版，1968年）。

统一社会党的理论家，《新左派》的评论员，《观察家新闻》的记者，未来的驻罗马大使对社会斗争政治形势的分析。

安德烈·菲力普：《1968年五月和民主信仰》（André PHILIP, *Mai 1968 et la Foi démocratique*, 巴黎·奥比耶-蒙泰涅版，1968年）。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一个社会党知识分子、改革者和民主主义者的看法。该作者的另一本书《1968年五月》（巴黎·德克莱·德布鲁韦版，1969年）是反映了天主教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五月的政治性和预见性见解。

米歇尔·德塞尔托：《词语展览》（Michel de CERTEAU, *La prise de parole*, 巴黎·德克莱·德布鲁韦版，1968年）。

对1968年词语作用的细致分析。

战士分析类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左倾，共产主义衰弱病的良药》（Daniel COHN - BENDIT, *Le Gauchisme,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 巴黎·瑟伊版，1968年）。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和他的朋友们随后献给运动的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的论文。

索邦 - 樊尚 - 农泰尔行动委员会集体著：《五月以后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的计划》（Comité d'action Sorbonne - Vincennes - Nanterre, *Après Mai 1968, Les plans de la bourgeoisie et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9年）。

关于五月运动未来的很富有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

达尼埃尔·邦萨伊、亨利·韦贝尔和阿尔·克里文：《1968年五月，一场全面的演习》（Daniel BENSÂÏD, Heri WEBER et Alain KRIVINE, *Mai 1968, une répétition générale*,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8年）。

后来的“共产主义联盟”，托洛斯基主义的“弗兰克派”分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头头们对运动的分析。他们认为1968年5月是未来工人革命的一场演习。

第四国际：《1968年5月，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Mai 1968, première phase de l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française, 1968年)。

国际托洛斯基派（弗兰克派倾向）的理论著作。

塞尔日·朱利，阿兰·热斯马尔和埃利纳·莫拉纳：《走向内战》（Serge JULY, Alain GEISMAR et Erylne MORANE, *Vers la guerre civile*, 巴黎·原初出版社，1969年）。

运动的三个角色，主张在社会斗争中以激进化的暴力推动事件，他们后来就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创始人，于1973年自行解散。

安德烈·格卢克斯曼：《革命的策略》（André GLUCKSMANN, *La Stratégie de la révolution*, 巴黎·布尔古瓦版，1968年）。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革命学生对学生和工人运动危机蕴涵的分析。文笔呆板。

雅克·儒尔盖：《革命的春天》（Jacques JURQUET, *Le Printemps révolutionnaire*, 巴黎·吉勒科尔版，1968年）。

法国马列共产党领袖，正统的亲华派，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竞争者的分析。文笔非常呆板。

中学行动委员会：《中学生信守诺言》（CAL, *Les Lycéens gardent la parole*, 巴黎·瑟伊版，1968年）。

与中学生行动委员会战士们的座谈。

雷蒙·马塞兰：《公共秩序和革命团体》（Raymond MARCELLIN, *L'Ordre public et Groupes révolutionnaires*, 巴黎·普隆版，1969年）。

他认为是一些颠覆性的小团体的阴谋引起了1968年5月运动，对极左团体倾向于镇压的态度，由于他在风暴中知道如何证明自己的坚定性，随后又从容不迫地处理事件，所以在1968年6月仍然被内政部任命为很少出面的领土规划整治部的部长。

《革命团体的目标和方式》 (*Objectifs et méthodes des groupes révolutionnaires*, 巴黎·内政部版, 1968年)。

让-保尔·萨特:《共产党人害怕革命》(Jean-Paul SARTRE, *Les communistes ont peur de la révolution*, 巴黎·J·迪迪埃版, 1968年)。

斯皮热尔对萨特的采访, 萨特长时间地批评法国共产党。

克洛德·普雷沃:《学生和左倾主张》(Claude PRÉVOST, *Les Étudiants et Gauchisme*, 巴黎·社会出版社, 1968年)。

法共正统成员对极左组织的正统批判。

雅克·杜克洛:《昨天和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何使左派下对抗的赌注》(Jacques DUCLOS, *Anarchistes d'hier et d'aujourd'hui, Comment le gauchisme fait le jeu de la réaction*, 巴黎·社会出版社, 1968年)。

与法国斯大林主义爷爷普雷沃一样训练有素。

瓦尔德克·罗歇:《1968年5—6月的教训》(Waldeck ROCHET, *Les Enseignements de mai-juin*, 巴黎·社会出版社, 1968年)。

以法共总书记的名义所阐明的党的路线。

洛朗·萨利尼:《无产者的五月》(Laurent SALINI, *Le Mai des prolétaires*, 巴黎·社会出版社, 1968年)。

《人道报》的一个记者对罢工的看法。

多米尼克·韦内:《社会渣滓》(Dominique VENNÉ, *La Chienlit*, 巴黎出版公司, 1969年), 《争议指南》(*Guide de la Contestation*, 巴黎·拉丰版, 1969年)。

一个右翼作者的两本论战作品, 对研究运动很有用。

穆里斯·巴代什和弗朗索瓦·迪普拉:《革命的闹剧》(Maurice

BARDÉCHE et François DUPRAT, *La Comédie de la révolution*, 巴黎·保卫西欧版, 1968年6月), 同一主题, 同二作者代序: 《革命形势下的五月的日子》(*Les Journées de mai, les dessous d'une révolution*, 巴黎·新拉丁版, 1968年)。

由两个有名的极右派策划的论题, 一位是众所周知的二战时期的法奸罗贝尔·布拉西拉什的朋友, 另一位后来成了不久前死于一次永远弄不清的谋杀中的让-马里·勒庞的民族阵线的理论家。

幽默类

居伊·奥康让: 《从毛主义向旋转式转变的公开信》(Guy HOC-QUENGHEM, *Lettre ouverte à ceux qui sont passés du col mao au Rotary*,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版, 1968年)。

一位68岁的老头儿指控另一位68岁的老头儿叛卖革命的抨击文章(但诉讼代理人对他们的革命理想的准确性表达得不太清楚)。从中可以看出五月的革命友爱在20年里有点模糊不清了。

让·沃林斯基: 《我不想傻死》(Jean WOLINSKI, *Je ne veux pas mourir idiot*, 巴黎·德诺埃尔版, 1968年)。

由一个大有前途的作家搜集的表达完美的图片集: 《五月的精灵》。

让-路易·屈尔蒂斯: 《中国使我不安》(Jean-Louis CURTIS, *La Chine m'inquiète*, 巴黎·格拉塞版, 1972年)。

对1968年以后的学生运动抱敌视态度的轻巧作品。

雅克·佩雷: 《不安的索邦》(Jacques PERRET, *Inquiète Sorbonne*, 巴黎·阿歌特版, 1969年)。

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

罗贝尔·梅尔: 《玻璃窗的后面》(Robert MERLE, *Derrière la vitre*, 巴黎·加利马尔版, 1970年)。

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

皮埃尔·德布瓦代弗尔：《给左派人士的公开信》（Pierre de BOISDEFRE, *Lettre ouverte aux hommes de gauche*,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版, 1969年）。

·一个保守派作家抨击五月的作品。

雅克·洛朗：《给学生的公开信》（Jacques LAURENT, *Lettre ouverte aux étudiants*,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版, 1969年）。

塞西尔·圣洛朗与1968年5月。一个多才的作家和有无政府倾向的左派与学生的座谈。

弗雷德里克·邦和米歇尔-安托万·比尔尼耶：《假若五月赢了》（Frédéric BON et Michel - Antoine BURNIER, *Si Mai avait gagné*, 巴黎·让-雅克·波韦尔版, 1968年）。

由事件的两个参与者假想的供消遣的东西, 成为一种专门的体裁。前者曾在1987年失踪, 现成为一个受重视的社会学家, 后者参加了《流行》杂志的领导班子。

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将军在索邦》（Alfred FABRE - LUCE, *Le Général en Sorbonne*, 巴黎·塔布尔·龙德版, 1968年）。

一个评论家和反戴高乐派的右派自由射手的论战性评论。

阿兰·格里奥特雷：《内战还是改革?》（Alain GRIOTTERAY, *Des Barricades ou des Réformes?* 巴黎·法亚尔版, 1968年）。

一个有力的中间派的看法和分析。

分领域研究类

文学

帕特里克·孔布：《文学与五月运动》（Patrick COMBES, *La littérature et le Mouvement de Mai*, 巴黎·塞热版, 1984年）。

通过作家的视角研究五月。

经济和社会

阿兰·德拉勒和吉尔·拉加什：《1968年的法国》（Alain DELALE et Gilles RAGACHE, *La France de 1968*, 巴黎·瑟伊版, 1978年）。

详细记录1968年法国经济和社会数据。人们可以从中看出法国不再像以前那样。

青年

卡梅尔·卡韦勒里和克洛德·塔皮亚：《1968年以后的法国青年和社会团体》（Carmel CAMILLERI et Claude TAPIA, *Jeunesse française et Groupes sociaux après 1968*, 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版, 1974年）。

关于70年代青年社会测定的社会学研究。

让·茹瑟兰：《青年暴动》（Jean JOUSSELIN, *Les Révoltes des jeunes*, 巴黎·工人出版社, 1968年）。

关于1968年青年一代的研究。

学生运动

尼科尔·德莫普-阿布德：《外籍大学区的开放》（Nicole de MAUPEOU - ABBOUD, *Ouverture du ghetto étudiant*, 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安特罗波版, 1974年）。

60年代初到70年代的学生运动的概括和描述。

让-路易·布罗：《前进，同志，把旧世界抛在你的后面》（Jean - Louis

BROU, Cours, Camarades, le vieux monde est derrière toi,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版, 1968年)。

关于学生运动的缺乏思考的一个方面的研究。

阿兰·蒙沙布隆: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史》(Alain MONCHABLON, *Histoire de l'UNEE*, 巴黎·PUF版, 1983年)。

关于学生运动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工人运动

皮埃尔·杜布瓦和雷诺·迪隆: 《请愿罢工还是政治罢工?》(Pierre DOUBOIS et Renaul DULONG, *Grèves revendicatives ou Grèves politiques?* 巴黎·安特罗波版, 1971年)。

关于工人罢工进程的社会学研究。

穆里斯·布吕泽克、菲力普·博沙尔: 《工联主义经得起考验》(Maurice BRUZECK et Philippe BAUCHARD, *Le Syndicalisme à l'épreuve*, 巴黎·拉丰版, 1968年)。

工会领袖采访系列。

雅克·弗雷蒙捷: 《工人堡垒 - 雷诺》(Jacques FRÉMONTIER, *La Forteresse ouvrier, Renault*, 巴黎·法亚尔版, 1971年)。

关于雷诺工人生活的详细调查。

国家信息中心企业生产率处: 《从 100 个企业看 1968 年 5 - 6 月事件》(Centre national d'information pour la productivité des entreprise, les *Événements de mai - juin 1968 vus à travers 100 entreprises*, 巴黎·国家信息中心企业生产率处, 1968年)。

为实现更恰当老板企业的另一种研究。

五月在外省

杨呢克·甘：《南特公社》（Yannick GUIN, *La Commune de Nantes*,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9年）。

1968年五月在南特地区（大罢工从这里开始）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特征，尤其让无政府工联主义戴上了假面具。

乔治·沙法尔：《五月风暴》（Georges CHAFFARD, *Les Orages de mai* 巴黎·卡尔曼-莱维版，1968年）。

对卢瓦-谢尔省，特别是对旺多姆事件的详细的引人入胜的研究。

观念演变

埃皮斯泰蒙：《震撼法国的思想观念》（ÉPISTÉMON, *L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la France*, 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1968年5月以前的带准备性质的思潮研究。

西尔万·泽热尔：《五月的观念》（Sylvain ZEGEL, *Les Idées de mai*, 巴黎·加利马尔版，1968年）。

内容同上。

法国广播电视的罢工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解放法国广播电视公司》（Claude FRÉDÉRIC, *Libérer l'ORTF*, 巴黎·瑟伊版，1968年）。

关于电视台罢工的资料。

照片资料

——热尔贝·卡恩：《巴黎烧起来了》（Gilbert KAHN, *Paris a brûlé*, 巴黎·世界出版社, 1968年）。

——菲利普·拉布罗：《五月的街垒》（Philippe LABRO, *Les Barricades de Mai*, 巴黎·索拉尔版, 1968年）。

——《法兰西晚报》的照片：《五月的日子》（*Les photographes de France - soir, Les Journées de Mai*, 巴黎·《历史知识专号》, 阿歇特版, 1968年）。

——爱德华·德热, 菲利普·约翰逊和克洛德·莫利泰尔尼：《1968年5—6月》（Edouard DEJAY, Philippe JOHNSON et Claude MOLITERNI, *Mai - juin 1968*, 巴黎·SERG版, 1968年）。

影片资料

关于1968年5月已拍摄了好几部纪录片, 特列举如下:

——居迪·拉瓦兹的《1968年5月》（*Mai 1968*, de Gudie Lawaetz）。

——克里斯·马克的《天气是红色的》（*Le Fond d'air est rouge*, de Chris Marker）。

——安德烈·弗罗萨尔的《五月事件》（*Histoire de Mai*, de André Frossard）。

——罗曼·古皮尔的《他30岁死去》（*Mourir à trente ans*, de Romain Goupil）。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我们有多么热爱它——革命》（*Nous l'avons tant aimé, La révolution*, de Daniel Cohn - Bendit）。

大事年月表

1966 年

- 1 月 10 日：法国总工会与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达成协议。
- 3 月：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分裂出来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创立。
- 5 月：境遇主义者控制斯特拉斯堡学生总联合会办公室。
- 7 月 2 - 17 日：三大陆会议在哈瓦拉召开。
- 秋：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分裂出来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成立。
- 10 月 15 日：左派运动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

1967 年

- 3 月：罗迪亚瑟塔罢工。
- 3 月 12 日：西欧左派组织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
- 3 月 18 日：贝尔利耶地区罢工。
- 4 月：学生住宿区骚动。
- 秋：中学行动委员会成立。
- 9 月：工人和农民队伍在南特汇合。
- 11 月 9 日：苏夫洛大街学生集会。
- 11 月 11 - 13 日：冈区学生举行讨论会。

- 11月17-27日：农泰尔文学院罢课。
12月：南特工人学生联合示威，大学生住宿区发生事件。
12月12-13日：巴黎工人为维护社会保险条例进行罢工。

1968年(5月前)

- 1月：冈区 SAVIEM 公司举行罢工。
1月8日：米索夫-科恩-本迪事件。
1月26日：农泰尔殴斗事件。
2月17-18日：国际左派在柏林示威。
2月19-21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支持越南人民日。
3月：亚眠大学讨论会。
3月15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常驻会员行动日。
3月17日：中学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亚眠大学讨论会。
3月17日-20日：用塑料炸药象征性爆炸在巴黎的美国企业。
3月21日：全国“越南委员会”战士抨击在巴黎的美国特使。
3月22日：农泰尔文学院学生占领“行政楼”。“3月22日运动”成立。
3月28日：农泰尔文学院暂时停课到4月1日。
3月29日：农泰尔文学院静坐示威。
4月12日：巴黎举行反对西德右派组织施普林格示威。
4月22日：全国“越南委员会”遭“西方”组织洗劫。
4月25日：法共代表朱坎在农泰尔文学院被左派学生撵出会场。
4月29日：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捣毁极右组织“西方”在巴黎主办的支持南越政府军的展览。

1968年5月

1日（星期三）

法国总工会、法共和统一社会党在巴士底共和国广场举行示威游行。

2日（星期四）

7时45分：巴黎大学文学院学生会局部骚乱。

乔治·蓬皮杜赴伊朗访问。

农泰尔：8名农泰尔文学院学生被校理事会起诉；事件发生；不定期停课。

3日（星期五）

巴黎大学：上午和下午在天井院集会，被警察驱散；到拉丁区示威；暂时停课。学生参谋部组成。

4日（星期六）

审判5月3日示威被捕者。大学行动党号召6日（星期一）下午示威。

5日（星期日）

5月3日示威被捕者被判处监禁。

6日（星期一）

农泰尔文学院被控学生到纪律委员会庭前，其中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

示威；第一次出现街垒。

骚乱扩展到外省大学。

7日（星期二）

学生领袖提出与政府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释放被监禁的学生；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撤走拉丁区的警察力量。

从当费尔-罗施罗到星星广场游行示威。

8日（星期三）

开始与学生领袖秘密谈判。

阿兰·佩雷菲特在国民议会上讲话；教育界人士奔走谈判。
至傍晚，从巴黎酒市场到爱德蒙－罗斯唐广场的游行示威无事故发生。解散示威队伍的命令被大部分示威学生错误地接受。晚上，阿兰·热斯马尔重返“3月22日运动”最激进的立场。

阿兰·佩雷菲特发出复课通知。

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们要求戴高乐将军采取平息态度。

法国西部请愿日。

9日（星期四）

下午，罗什校长宣布撤消暂时停课的通知。

巴黎大学广场集会：雅克·索瓦热奥宣布巴黎大学将被学生占领到警察撤走为止。路易·阿拉贡事件。

阿兰·佩雷菲特回应学生领袖，巴黎大学将关闭到恢复平静为止。罗什校长宣布不定期延长纪律委员会对违纪学生的合议，并宣布星期五复课。

10日（星期五）

禁止电视台播放示威活动场景。

14时30分：大中学生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集会；占领拉丁区。21时30分：街垒战。22时：通过罗什校长，政府与学生谈判。凌晨2时：警察攻击街垒。5时30分：骚乱结束。

11日（星期六）

工会组织决定团结起来于13日（星期一）举行全国罢工，并在当费尔共和国广场举行示威。

总统府里谈话频频。戴高乐将军接受阿兰·佩雷菲特的妥协计划。大学生和教师开始组成委员会并在学院里集会。

19时15分：乔治·蓬皮杜从阿富汗返回。21时：蓬皮杜赴爱丽舍宫。22时30分：蓬皮杜发展简短讲话，接受学生的谈判先决条件。

12日（星期日）

释放被捕学生。

13日（星期一）

上诉法院暂时取消5月5日的判决。

24小时全面罢工。

下午，两万工会会员示威，从车站到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学生继续示威，直到尚德玛斯广场，外省示威。

巴黎大学被学生占领。

14日（星期二）

戴高乐赴罗马尼亚访问。并留话将在24日对全国人讲话。

议会辩论。乔治·蓬皮杜讲话。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和共产党组织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

南特飞机制造厂自发罢工。

农泰尔文学院集会宣布“自由和自治”。

阿兰·佩雷菲特批准斯特拉斯堡大学进行自治试验。

克里斯蒂昂·富歇接见前来表示不满的警察工会。

一些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被占领。

15日（星期三）

克莱翁的雷诺汽车制造厂自发罢工。

奥戴翁剧院被学生占领。

16日（星期四）

弗兰的雷诺汽车制造厂自发罢工。

取消在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前的一次示威。

乔治·蓬皮杜发表无线广播讲话。

17日（星期五）

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制造厂罢工。法国总工会在该厂的分会掌握着罢工领导权。

密特朗——瓦尔德克·罗歇会谈。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工会联合会决定罢工。

晚上，学生队伍从拉丁区出发赴布洛涅 - 比扬古工人区。

18 日（星期六）

戴高乐将军从罗马尼亚返回。

罢工者人数在 300 万至 600 万之间。

19 日（星期日）

爱丽舍宫最高级会议。戴高乐总统下达清理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场的命令。随后又放弃这一命令。

20 日（星期一）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些中学被中学行动委员会占领。

21 日（星期二）

国民议会展开对政府不信任案的辩论。

周末以来，罢工迅猛发展。

对科恩 - 本迪发出驱逐令。

医师、建筑师、文学界同业工会办公室被各自的左派工会会员占领。

22 日（星期三）

议会否决对政府的不信任案。

投票通过对判刑学生的赦免令。

保卫共和国全国委员会成立。

晚上和深夜学生示威，抗议剥夺科恩 - 本迪在法国的居留权。

23 日（星期四）

部长会议认可公民投票计划。

学生在晚上示威游行，直至深夜。

150 个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聚会。

24 日（星期五）

17 时 30 分：学生到车站示威，再次导致深夜巷战，直到第二天凌晨 6 时。

20 时：戴高乐将军电视讲话。

在里昂，一警察分局局长死于示威大潮中。

25 日（星期六）

关于事件的谈判在格勒内尔街开始。

伞兵部队聚集弗勒斯基地。

戴高乐确认他的公民投票计划受阻。

26 日（星期日）

戴高乐接见穆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考虑他接替总理的职位。

谈判进入国有化企业领域。

27 日（星期一）

7 时 15 分：格勒内尔议定书达成。

8 时 30 分：布洛涅 - 比扬古的雷诺工厂工人拒绝格勒内尔议定书。

下午：部长会议批准公民投票计划。

17 时 30 分：经政府批准的示威以在沙莱蒂体育场集会的形式举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参加了大会，但拒绝讲话。

18 时：弗朗索瓦·密特朗与瓦尔德克·罗歇会谈。

28 日（星期二）

11 时：弗朗索瓦·密特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在政权空虚的情况下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同时宣布在“临时政府管理时期”的形式下，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可以领导政府。

16 时：瓦尔德克·罗歇声明，建议成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但反对一切新的“幸运者”。

17 时 45 分：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法国共产党会谈。

21 时：乔治·蓬皮杜赴爱丽舍宫。

29 日（星期三）

9 时 30 分：10 时的部长会议延期。

10 时：戴高乐将军召见布瓦西厄将军。

11 时 15 分：戴高乐将军出发前往伊西——莱穆利诺，然后乘直升飞机前往。

下午初时：戴高乐将军去巴登——巴登。

总理确认戴高乐失踪。

14 时 30 分：马蒂尼翁总理府商量对策。

15 时至 20 分：法国总工会示威，从巴士底至圣拉扎尔车站。

16 时：蓬皮杜获航空警戒局报告，戴高乐将军去了巴登。

下午：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和独立共和党宣布在 5 月 30 日举行示威；公布戴高乐将军的去向。

16 时 30 分：欧仁·德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支持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18 时 30 分：戴高乐返回科隆贝，并与蓬皮杜通话。

21 时 30 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发表声明。

30 日（星期四）

11 时：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发表声明。

12 时 25 分：戴高乐返回爱丽舍宫。

15 时，部长会议。

16 时 30 分：戴高乐将军发表无线广播讲话。

17 时 30 分：雅克·沙邦—戴尔马向议员们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18 时至 21 时：香榭丽舍大道示威，支持戴高乐将军。

31 日（星期五）

政府改组。

工会谈判更加积极地进行。

外省举行支持戴高乐将军的示威。

巴黎汽油供应恢复正常。

1968 年 6 月

- 1 日（星期六）：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蒙帕尔拉斯示威，高呼：“投票，叛卖。”
- 3 日（星期一）：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技术设备被部队控制。
- 4 日（星期二）：戴高乐派青年示威，从夏约宫到蒙帕尔拉斯。
- 7 日（星期五）：戴高乐将军接受米歇尔·德鲁瓦的电视采访。
- 10 日（星期一）：在索肖的示威中死亡一人。诺亚德·德·吉尔·托坦死于弗兰。
- 11 日（星期二）：吉尔·托坦死后的示威；第三次深夜巷战。
- 12 日（星期三）：取缔左派组织。禁止在选举期间示威。
- 14 日（星期五）：占领者从奥戴翁剧院撤离。
- 15 日（星期六）：特赦萨朗将军及其他 10 名颠覆罪被控者。
- 16 日（星期日）：占领者撤离巴黎大学。
- 17 日（星期一）：雷诺工厂复工。其他地方逐渐全面复工。
- 23 日（星期日）：第一轮立法议会选举。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在选中有所进展，左派衰退。
- 30 日（星期日）：第二轮立法议会选举。

略 语 表

AFP	Agence France - Presse 法国新闻社（法新社）
CAL	Comités d'action Lycéens 中学行动委员会（穆里斯·奈曼和米歇尔·雷卡纳蒂领导时 尤其活跃）
CDR	Comité de défense de la République 保卫共和国委员会
CFTC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étiens 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前译：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
CFDT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欧仁·德尚领导。前译：法国劳工民主 联合会）
CGC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cadres 干部总联合会（前译：企业行政及技术人员总工会）
CGT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法国总工会（乔治·塞吉和亨利·克拉苏茨基领导）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R	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 共和国国民议会
CLER	Comité de liaison des étudiants révolutionnaires 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朗贝尔分子组成的托派学生组织， 1968年4月改为革命学生联合会）

CNI	Centre national des indépendants 独立人士全国中心
CNPF	Conseil national du patronat français 法国雇主全国委员会
CRS	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 共和国保安队（隶属内政部的流动治安组织）
CVB	Comité viêt - nam de base 基层越南委员会
CVN	Comité Viêt - nam national 全国越南委员会
DST	Direction de la surveillance du territoire （法国）本土警戒局
EDF	Electricité de France 法兰西电力公司
ENA	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国立行政学院（又译：国家行政管理学校）
ENS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ESU	Étudiants socialistes unifiés 统一社会党学生
FEN	Fédération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最大的教育联合会，其中包括倾向于社会党和倾向共产党的两大工会组织）
FER	Fédération des étudiants révolutionnaires 革命学生联合会（参见 CLER）
FGDS	Fédération de la gauche démocrate et socialiste 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主要是激进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弗朗索瓦·密特朗）
FGEL	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étudiants en lettre

- 全国学生文学联合会
- FLN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民族解放阵线
- FNEF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
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右倾学生会）
- FNSE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d'exploitants agricoles
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
- FO Force ouvrière
工人力量总工会（安德烈·贝热龙领导）
- HLM 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
低租金居房
- IFOP Institut Français d'Opinion Publique
法国舆论调查所
- JCR Jeuness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西欧托派倾向的学生组织，所谓“第四国际”以克里文·邦萨伊·韦贝尔为首）。
- MAU Mouvement d'action universitaire
大学行动党（以布里塞·拉隆德和让-马赛尔·布格罗为首）
- MNEF Mutuelle nationale étudiante Française
法国大学生互助会
- OAS Organisation armée secrète
秘密军组织
- OCI Organisation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
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
- ORTF Office de radio et télévision française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
- OTAN Organisation du traité de l'Atlantique nord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PCF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法国共产党
- PCMLF Parti Communiste marxiste - léniniste de France
法国马列共产党（雅克·儒尔盖的正统亲华小党派）

PCUS	Parti Communiste d'Union Soviétique 苏联共产党
PDM	Progrès et démocratie moderne 现代民主进步党（雅克·杜阿梅尔领导的活跃的在野中间派组织）
PME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 中小型企业
PS	Parti socialiste 社会党（又称新社会党）
PSV	Parti socialiste unifié 统一社会党（由米歇尔·罗卡尔领导）
PTT	Poste, Télégraphe, Téléphone 邮电局
RATP	Régie autonome des transports parisiens 巴黎运输公司
RI	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 独立共和党（即共和党的前身）
SDS (UDSA)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Union des étudiants socialistes allemands) 德国社会党学生联盟
SFIO	Section française d'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
SGEN	Syndicat général d'Education nationale 全国教育总工会（亲法国民民主工人工会的教育工会）
SMIG	Salaire minimum interprofessionnel garanti （法国）各业最低保证工资（将代替 SMIC - 各业最低增长工资）
SNECMA	Société nationale d'études et de construction de moteurs d'aviation 国营飞机动力机研究制造公司
SNES	Syndicat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全国中等教育工会（隶属法共）
SNE - Sup	Syndicat national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阿兰·热斯马尔）
SNCF	Société nationale de chemins de fer français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 SNI 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
全国小学教师工会（倾向社会党）
- SNJ Syndicat national des journalistes
全国记者工会
- UDR Union pour la défense de la République
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五月后替代第五共和国联盟。戴高乐派党）
- UD - V^e 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V^e République
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
- UEC 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
共产主义学生联盟
- UJcmI Union de jeunesse communiste marxistes - léninistes
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外号“青年列宁联盟”¹ UJ，亲华的阿尔蒂塞分子组织，由罗贝尔·林哈特领导）
- UNEF 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雅克·索瓦垫奥。自1968年4月未设主席）
- UNR

译名对照表

A

Achères	阿什雷
Adrien Dansette	阿德里安·当塞特
Aïme Albeher	埃梅·阿尔贝埃
Ain - Khanoun	艾固 - 哈农
Aisine	埃纳 (省)
Alain Ayache	阿兰·阿亚什
Alain Davaquet	阿兰·达瓦凯
Alain Delon	阿兰·德隆
Alain Duhamel	阿兰·杜阿梅尔
Alain Gesmar	阿兰·热斯马尔
Alain Krivine	阿兰·克里文
Alain Madelin	阿兰·马德兰
Alain Pelle	阿兰·佩莱
Alain Peyrefitte	阿兰·佩雷菲特
Alain Robert	阿兰·罗贝尔
Alain Shnapp	阿兰·施纳
Alain Touraine	阿兰·图雷纳
Albin Chalandon	阿尔班·夏朗东
Alexandre Hérbert	亚历山大·埃贝尔
Alexis	亚历克西
Alfred Fabre - Luce	阿尔弗雷德·法布尔 - 吕斯
Alfred Kastler	阿尔弗雷德·卡斯特勒
Alfred Sauvy	阿尔弗雷德·萨维
Algérie	阿尔及利亚
Alsace	阿尔萨斯 (大区)
Amiens	亚眠
André Barjonet	安德烈·巴尔若内

André Bergeron	安德烈·贝热龙
André Bettencourt	安德烈·贝当古
André Friedrich	安德烈·弗里德里克
André Gorz	安德烈·戈尔兹
André Jeanson	安德烈·让松
André Malraux	安德烈·马尔罗
Angela Davis	安杰娜·戴维丝
Anières	阿尼埃尔
Anne Wiazemsky	安娜·维娅藏斯基
Antoine Griset	安托万·格里塞
Antoine Sauguinetti	安托万·桑吉内蒂
Anvers	安德卫普
Ardenne	阿登
Auber	奥贝尔
Auguste - Comte	奥古斯特 - 孔特
Austerlitz	奥斯特里茨

B

Babcock	巴布科克
Backmann	巴克曼
Badan	巴丹
Baden	巴登
Baddy Holly	巴迪·霍利
Balladur	巴拉迪尔
Ballanger	巴朗热
Barbet	巴贝尔
Bardèche	巴代什
Bastille	巴士底
Baudrillard	博德里亚
Beache	比奇
Beatles	比思莱
Beatlemania	比思莱玛尼娅
Beauce	博斯

Beaufrère	博弗雷尔
Beauvais	博韦
Beauvallet	博瓦莱
Beauvau	博沃
Benoît Frachon	贝努瓦·弗拉尚
Bercot	贝尔科
Berkeley	贝克莱
Berliet	贝尔利耶
Bernard Koucher	贝尔纳·库什
Bernard Prévost	贝尔纳·普雷沃
Bernard Shaw	贝尔纳·肖
Bernard Tricot	贝尔纳·特里科
Bertelot	贝尔特洛
Béthune	贝蒂纳
Bertolino	贝尔托诺
Bertrand Girod de l'Ain	贝特朗·吉罗·德拉安
Bertrand Lemonnier	贝特朗·勒莫尼埃
Bild	比尔德
Billancourt	比扬古
Bill Halay	比利·阿莱
Billères	比耶尔
Billotte	比约特
Blois	布卢瓦
Bob Dylan	鲍勃·迪伦
Bonaparte	博纳帕特(波拿巴)
Borker	博尔凯
Boris Vian	鲍里斯·维安
Bouguenais	布格奈
Boul - Mich	皮尔 - 米什
Boulogne	布洛涅
Bourbon	波旁
Brandebourg	布兰德堡
Brile Lalonde	布里斯·拉隆德

Briey	布里埃
Brive	布里夫
Brongniart	布龙里亚
Bruxelle	布鲁塞尔
Butte - Chaumont	比特 - 肖蒙

C

Canne	戛纳
Carcassonne	卡尔卡松
Carmagnole	卡马尼奥尔
Carnaby Street	卡尔纳比·斯特雷特
Carpentras	卡尔庞特拉
Carrefour	卡勒富尔
Catherine Clessis	卡特琳·克莱西
Catherine Deneuve	卡特琳·德纳夫
Censier	桑西耶
Chaillet	夏约
Chalin	夏兰
Champagne	香槟 (地区)
Champ de Mars	尚德玛斯
Champs - Élysées	香榭丽舍
Charles de Gaulle	夏尔·戴高乐
Charles Pasqua	夏尔·帕斯卡
Charléty	沙莱蒂
Charonne	夏龙
Château Chinon	沙托·希农
Châtelet	沙特莱
Chaumeil	舒梅尔
Che Guevara	谢·格瓦拉
Chisserey	希塞雷
Christian Bourgois	克里斯蒂昂·布尔儒瓦
Christian Brunet	克里斯蒂昂·布律内
Christian Charrière	克里斯蒂昂·夏里埃

Christian Foucher	克里斯蒂昂·富歇
Christopher Lasch	克里斯托夫·拉施
Chuck Berry	查克·贝里
Citroën	雪铁龙
Claude Bernard	克洛德·贝尔纳
Claude Estier	克洛德·埃斯捷
Claude François	克洛德·弗朗索瓦
Claude Frèche	克洛德·弗雷什
Cléon	克莱翁
Clichy	克利希
Clovis	克洛维斯
Colbert	科尔贝尔
Colombey	科隆贝
Concorde	协和(广场)
Cornilius Castoriadis	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
Corrèze	科雷兹
Craiova	克拉约瓦
Creusot	克莱索
Cujas	居亚
Cyrus Vance	赛勒斯·万斯

D

Danais	达内
Daniel Bensaïd	达尼埃尔·邦萨伊
Daniel Cohn - Bendit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
Daniel Lindenberg	达尼埃尔·林登贝格
Dannaud	达诺
Dany	达尼
d'Artagnan	达特里昂
David Rousset	大卫·鲁塞
Daubard	多巴尔
Daumesnil	多梅尼
Dechartre	德沙尔特

De Dietrich	德迪耶特里克
Delpy	德尔皮
Denfert - Rochereau	当费尔 - 罗施罗
Denis Kessler	德里·凯斯莱尔
Descarts	笛卡尔
De Soubise	德苏比斯
Detraz	德特拉
Dick Rivers	迪克·里弗斯
Diderot	狄特罗
Dijon	迪戎
Disraeli	迪斯累里
Donnedieu de Vabres	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
Donovan	多诺万
Dumas	迪马
Dumurrier	迪米尼耶
Dupin	迪潘
Duprat	迪普拉
Durry	迪里
Duteuil Castro	迪特伊·卡斯特洛

E

Eddy	埃迪
Edgar Faure	埃德加·富尔
Edgar Mouin	埃德加·莫兰
Edgar Pisani	埃德加·皮萨尼
Edmond Maire	埃德蒙·梅尔
Edmond - Rostand	埃德蒙·罗斯唐
Edouard Balladur	埃德华·巴拉迪尔
Elbe	厄尔巴(岛)
Elvis Presley	埃尔维丝·普雷莉
Élysée	爱丽舍(宫)
Ernest Mandel	欧内斯特·曼德尔
Évian	埃维昂

Eugène Descamps

欧仁·德尚

F

Faubourg - Saint - Honoré	福布尔 - 圣奥诺雷
Ferry	费里
Feuillantines	弗扬蒂纳
Fidèl Castro	菲德尔·卡斯特洛
Filles - du - Calvaire	菲耶 - 迪卡尔韦尔
Flins	弗兰
Floch	弗洛克
Folies - Bergères	福利 - 贝尔热
Fontaine	方丹
Forbach	福巴克
Forges	福尔日
Fougères	富惹尔
Franck Tènot	弗朗克·泰诺
Francis Kahn	弗朗西斯·卡恩
Francis Raison	弗朗西斯·赛松
François de Panafieu	弗朗索瓦·德帕纳菲厄
Françoise Flohic	弗朗索瓦兹·弗洛伊克
François Goguel	弗朗索瓦·戈盖尔
Françoise Hardy	弗朗索瓦兹·阿迪
François Mauriac	弗朗索瓦·莫尼亚克
François Missoffe	弗朗索瓦·米索夫
François Mitterrand	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Périer	弗朗索瓦·佩里埃
François Sarda	弗朗索瓦·萨尔达
Franz - Olivier·Giesbert	弗朗兹 - 奥利维耶·吉斯贝尔
Frédéric Bon	弗雷德里克·邦
Frédo Krumnov	弗雷多·克鲁梅诺夫
Fresnes	弗雷纳
Friedrich	弗里德里克

Frileuse

弗里勒斯

G

Gabriel Cohn - Bendit

卡布里尔·科恩 - 本迪

Galleries Lafayette

加莱里耶·拉法耶特

Gallet

加莱 (省)

Gallifet

加利费

Garrefour

卡勒富尔

Gaston Defferre

加斯通·德费尔

Gaston Monnerville

加斯通·莫内维尔

Gavroche

加夫罗什

Gay - Lussac

盖 - 吕萨克

Gene Vincent

吉恩·文森特

Gentilly

让蒂利

Georges Chaffard

乔治·沙法尔

Georges Dayan

乔治·达扬

Georges Gorse

乔治·戈尔斯

Georges Kiejman

乔治·基耶日曼

Georges Lapassade

乔治·拉帕萨德

Georges Marchais

乔治·马歇

Georges Pompidou

乔治·蓬皮杜

Georges Séguy

乔治·塞吉

Gérard Yvon

热拉尔·伊冯

Giacomoni

贾科莫尼

Giap

武元甲

Gilles Lipovetsky

吉尔·利波韦茨基

Gobelins

戈布兰

Goetz von Berlichingen

格茨·冯贝利欣根

Goff

戈夫

Goliath

戈里亚特

Gonin

戈南

Graal

格拉尔

Gramsci

格拉姆齐

Grappin	格拉潘
Grenelle	格勒内尔
Grenoble	格勒诺布尔
Griset	格里泽
Guichard	吉夏尔
Grichot	吉绍
Guy Béart	居伊·贝亚尔
Guy Debord	居伊·德博尔
Guy Hermier	居伊·埃尔米耶
Guy Hocquengherm	居伊·奥康让
Guy Mollet	居伊·摩勒
Guy Sabatier	居伊·萨巴蒂埃

H

Hachette	阿谢特
Hauts - de - Seine	上塞纳省
Havane	哈瓦拉
Helder Camara	埃尔特·卡马拉
Henri Blanchet	亨利·布朗歇
Henri Dacier	亨利·达西埃
Henri Krasucki	亨利·克拉苏茨基
Henri Lefebvre	亨利·勒菲弗
Henri Rey	亨利·雷伊
Henri Vacquin	亨利·瓦克坎
Henri Weber	亨利·韦贝尔
Hernu	埃尔尼
Hervé Hamon	埃尔韦·阿蒙
Hispano - Suiza	伊斯帕诺·叙扎
Hô Chi Minh	胡志明
Hublot	于布洛
Hussein	侯赛因

I

Issy - les - Moulineaux	伊西 - 莱穆利诺
-------------------------	-----------

J

Jacob	雅各布
Jacques Baumel	雅克·博梅尔
Jacques Baynac	雅克·贝纳克
Jacques Chabon - Delmas	雅克·沙邦 - 戴尔马
Jacques Dacqmine	雅克·达克米纳
Jacques Duhamel	雅克·杜阿梅尔
Jacques Dutronc	雅克·迪特龙
Jacques Fauvet	雅克·福韦
Jacques Foccart	雅克·福卡尔
Jacques Isovni	雅克·伊索尔尼
Jacques Jurquet	雅克·儒尔盖
Jacques Laurent	雅克·洛朗
Jacques Massu	雅克·马絮
Jacques Monod	雅克·莫诺
Jacques Narbonne	雅克·纳博纳
Jacques Sauvageot	雅克·索瓦热奥
Jacques Soustelle	雅克·苏斯戴尔
Jacques Vendroux	雅克·旺德鲁
James Dean	占姆士·迪安
Jaeger	耶格
Jean Beaufrère	让·博弗雷尔
Jean Bertolino	让·贝尔托诺
Jean Charbonnel	让·沙博内尔
Jean - Christophe Averty	让 - 克里斯托夫·阿韦蒂
Jean - Claude Guillebaud	让 - 克洛德·吉耶博
Jean - Claude Périer	让 - 克洛德·佩里埃
Jean Daniel	让·达尼埃尔
Jean Delannoy	让·德拉努瓦
Jean Ferniot	让·费尔尼奥
Jean Fourastié	让·富拉蒂耶
Jean Lacouture	让·拉库蒂尔

Jean Lecanuet	让·勒卡尼埃
Jean - Louis Barrault	让 - 路易·巴罗尔
Jean - Louis Moynet	让 - 路易·穆瓦诺
Jean - Louis Péninou	让 - 路易·佩尼努
Jean - Luc Godard	让 - 吕克·戈达尔
Jean - Luc Pouthier	让 - 吕克·普捷
Jean - Marc Coudray	让 - 马克·库德雷
Jean - Marc Salmon	让 - 马克·萨尔蒙
Jean - Marcel Bougeau	让 - 马赛尔·布格罗
Jean - Mareel Jeanneney	让 - 马赛尔·让纳内
Jean Nohain	让·诺安
Jean Paolini	让·保利尼
Jean - Paul Dollé	让 - 保尔·多莱
Jean - Paul Sartre	让 - 保尔·萨特
Jean - Pierre Dannaud	让 - 皮埃尔·达诺
Jean - Pierre Durant	让 - 皮埃尔·迪朗
Jean - Pierre Duteuil	让 - 皮埃尔·迪特伊
Jean - Pierre Farkas	让 - 皮埃尔·法尔卡斯
Jean - Pirre Hutin	让 - 皮埃尔·于坦
Jean - Roymond Tournoux	让 - 雷蒙·图尔努
Jean Schalit	让·沙利
Jefferson Airplane	杰斐逊·艾尔普兰
Joan Baez	让娜·贝兹
John Kennedy	约翰·肯尼迪
John Winston Lennon	约翰·温斯顿·伦农
Johnny Holliday	约翰·哈里迪
José Bidegain	约瑟·比德甘
Joseph Bachmann	约瑟夫·巴克曼
Julien Besançon	朱利安·贝藏松

K

Kaiser	凯撒
Karl Korsch	卡尔·科尔施

Karl Liberknechet	卡尔·李卡克内西
Karl Marx	卡尔·马克思
Katas Axelos	卡斯塔·阿克塞洛
Kellermann	克勒曼
Khrouchtchev	赫鲁晓夫
Killian Fritsch	基安·弗里奇
Kleber	克莱贝尔
Kochevoi	科切沃伊
Kossuth	科苏特
Kravtchenko	克拉夫琴科
Kunduz	昆都士
Kurfürstendomm	居尔菲斯唐达姆

L

Lagaillarde	拉加亚尔德
Lalonde	拉隆德
Lamartine	拉马丁
Lampéduisien	兰佩迪西安
Langevin - Wallon	郎之万—瓦隆
Langlois	朗格卢瓦
Lauga	洛加
Laugier	洛吉耶
Laurent Schwartz	罗朗·施瓦茨
Leclerc	勒克莱克
Le dantec	勒·当泰克
Lefebvre	勒菲福
Lenin	列宁
Léon Blum	莱昂·勃鲁姆
Lhomond	洛蒙
Lille	利勒
Limoux	利穆
Lockheed	洛克厄
Loir - Atlantique	大西洋岸卢瓦尔省

Loir - et - Cher	卢瓦 - 谢尔省
Lorraine	洛林
Loubard	卢巴尔
Louis Althusser	路易·阿尔蒂塞
Louis Aragon	路易·阿拉贡
Louis de Broglie	路易·德布罗耶
Louis de Vilmorin	路易·德维尔莫兰
Louis Joxe	路易·若克斯
Louis Wallon	路易·瓦隆
Lucien Rionx	吕西安·里乌
Lukacs	卢卡奇
Lycurgue	莱克格
Lyndon B·Johnson	林登·B·约翰逊
Lyon	里昂

M

Macuse	马居斯
Madeleine Renaud	马德来娜·勒诺
Maine - et - Loire	曼恩 - 卢瓦尔省
Maison - Laffitte	迈松 - 拉菲特
Marangé	马朗热
Marceau Pivert	马尔索·皮韦尔
Marcel Baleste	马赛尔·巴莱斯特
Marcel Dassault	马赛尔·达索
Marcellin	马赛兰
Marc Heurgon	马克·厄尔贡
Marc Kravetz	马克·克拉韦茨
Marc Paillet	马克·帕耶
Marianne	玛丽安娜
Marie - France Garand	玛丽 - 弗朗斯·加罗
Marie - Madeleine Diensch	玛丽 - 马德莱娜·迪内施
Marigny	马里尼
Mario Livi	马利诺·利维

Marlon Brando	马龙·白兰度
Martin du Gard	马丁·迪加尔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
Maspero	马斯佩罗
Massa	马萨
Matignon	马蒂尼翁
Maubert	莫贝尔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Maurice Grimaut	穆里斯·格里莫
Maurice Labi	穆里斯·拉比
Maurice Najaman	穆里斯·奈曼
Maurice Papon	穆里斯·帕蓬
Maurice Scnuman	穆里斯·舒曼
Maurice Szafran	穆里斯·沙弗兰
Maurice Thorez	穆里斯·多列士
Mautauban	莫托邦
Ma Van Lau	马文楼
Metternich	梅特涅
Metz	梅斯
Meulan	默朗
Mgr Marty	姆格尔·马蒂
Michel - Antoine Burnier	米歇尔 - 安托万·比尔尼耶
Michel Bassi	米歇尔·巴西
Michel Boscher	米歇尔·博舍尔
Michel Bruguières	米歇尔·布吕吉埃
Michel Caldaguès	米歇尔·卡尔达盖斯
Michel Debré	米歇尔·德勃雷
Michel Droit	米歇尔·德鲁瓦
Michel Honorin	米歇尔·奥诺兰
Michel Jobert	米歇尔·若贝尔
Michel perraud	米歇尔·佩罗德
Michel Paniatowski	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
Michel Récanati	米歇尔·雷卡纳蒂

Michel Rocard	米歇尔·罗卡尔
Mick Jagger	米克·贾格尔
Molotov	莫洛托夫
Moncada	蒙卡达
Monod	莫洛
Monsieur - le - Prince	王子先生 (街)
Montboudif	蒙布迪夫
Monthléry	蒙莱里
Montholon	蒙托隆
Montparnasse	蒙帕尔拉斯
Murat	谬拉

N

Nancy	南锡
Nerval	内瓦尔
Nicolas Boulte	尼古拉·布尔特
Nicolas Ceaucescu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Nicale de Hauteclouque	尼科尔·德奥特克洛克
Nicale de Moupéou - Abboud	尼科尔·德莫普 - 阿布德
Nicale le Gnenec	尼科尔·勒盖内克
Nièvre	涅夫勒省
Nizan	尼赞
Noyade de Gilles Toutin	诺亚德·德·吉尔·托坦

O

Odéon	奥戴翁
Olivier Guichard	奥利维埃·吉夏尔
Olivier Stirn	奥利维埃·斯蒂恩
Orléans	奥尔良
Ornano	奥尔纳诺
Otis Redding	奥蒂斯·雷丁

P

Pageaud	帕若
Paniline	波利娜
Pança	潘萨
Panthèon	邦戴翁
Pantin	庞丹
Papillon	帕皮永
Pas - de - Clais	加莱海峡省
Paul Cormier	保尔·科尔米耶
Paul Fontanille	保尔·丰塔尼耶
Paul Huvelin	保尔·于弗兰
Paul - Marie de la Gorce	保尔 - 玛丽·德娜戈尔丝
Paul Mc Cartney	保尔·麦卡特尼
Paul Painlévé	保尔·潘勒韦
Paul Ricoeur	保尔·里克尔
Paul Taylor	保尔·泰罗
Paul Virilio	保尔·维里利奥
Patrick Rotman	保尔·罗特曼
Patrick Wajzman	保尔·魏斯曼
Pellet	佩莱
Pelletier	佩尔蒂埃
Pereire	佩雷尔
Petain	贝当
Pétiet	珀蒂耶
Petit - Clamart	珀蒂 - 克拉马
Philippe Alexandre	菲力普·亚历山大
Philippe de Gaulle	菲力普·戴高乐
Philippe Mathèrion	菲力普·马特里荣
Philippe Norman	菲力普·诺曼
Philippe Robrieux	菲力普·罗布里厄
Pierre Abelin	皮埃尔·阿贝兰
Pierre Beylot	皮埃尔·贝洛

Pierre Billotte	皮埃尔·比约特
Pierre Charpy	皮埃尔·沙尔皮
Pierre Cot	皮埃尔·戈特
Pierre Duvochel	皮埃尔·迪沃舍尔
Pierre Franc	皮埃尔·弗朗克
Pierre Goldman	皮埃尔·戈尔德曼
Pierre Guillaume	皮埃尔·纪尧姆
Pierre Juillet	皮埃尔·朱耶
Pierre Juquin	皮埃尔·朱坎
Pierre Krieg	皮埃尔·克里格
Pierre Lambert	皮埃尔·朗贝尔
Pierre Laurent	皮埃尔·洛朗
Pierre Lefran	皮埃尔·勒弗朗
Pierre Messmer	皮埃尔·梅斯梅尔
Pierre Mendès - France	皮埃尔·孟戴斯 - 弗朗斯
Pierre Overney	皮埃尔·奥弗尔内
Pierre Rouanet	皮埃尔·鲁阿内
Pierre Somveille	皮埃尔·松维尔
Pierre Vianson - Ponté	皮埃尔·维昂松 - 蓬特
Pierre Vidal - Naquet	皮埃尔·维塔尔 - 纳凯
Pink Floyd	平克·弗洛伊德
Plaza Athénée	普拉扎·阿泰纳
Pleven	普利文
Port - Royal	皇家港
Praque	布拉格
Pygmalion	皮格马利翁

Q

Quichotte	(唐) 吉诃德
Quai d'Orsay	凯道赛

R

Raaul Salan	拉乌尔·萨朗
-------------	--------

Rambouillet	朗布伊埃
Raspail	拉斯帕伊
Raymond Aron	雷蒙·阿龙
Raymond Barillon	雷蒙·巴里永
Raymond Heim	雷蒙·埃姆
Raymond Marcellin	雷蒙·马赛兰
Raymond Mondon	雷蒙·蒙东
Raymond Rouleau	雷蒙·鲁洛
Raymond Tournoux	雷蒙·图尔农
Raoul Tubiana	拉乌尔·蒂比亚纳
Ray Coleman	雷·科尔曼
Recife	累西腓
Régie	雷吉
Régine	雷吉纳
Régis Debrag	雷吉斯·德布雷
Reiser	雷塞
Renault - Cléon	雷诺 - 克莱翁
Renaut	勒诺
Réné Backmann	勒内·巴克曼
Réné Billères	勒内·比耶尔
Réné Capitant	勒内·加比唐
Réné Lacroix	勒内·拉克鲁瓦
Réné Rèmond	勒内·雷蒙
Réné Youinou	勒内·尤伊努
Rennes	雷内
Rhodiaceta	罗迪亚瑟塔
Rhône - Poulenc	罗纳 - 普朗克
Richard Anthony	里夏尔·安东尼
Rivoli	里沃利
Robert Buron	罗贝尔·比隆
Robert Faurisson	罗贝尔·弗里松
Robert Kennedy	罗贝尔·肯尼迪
Robert Linhart	罗贝尔·林哈特

Robert Poujade	罗贝尔·布热德
Roche	罗什
Rock Stars	罗克·斯塔尔
Roger - Collard	罗歇 - 科拉尔
Roger Frey	罗歇·弗雷
Roger Garaudy	罗歇·加罗迪
Roger Holeindre	罗歇·奥兰德
Roge Souchal	罗歇·苏沙尔
Roland Boscary - Monsservin	罗兰·博斯卡里 - 蒙塞万
Roland Castro	罗兰·卡斯特洛
Roland Dumas	罗兰·迪马
Roland Ieroy	罗兰·勒鲁瓦
Roland Nungesser	罗兰·农热塞
Rolling Stones	罗林·斯通斯
Rol Tanguy	罗尔·唐居伊
Romain Goupil	罗曼·古皮
Roméo	罗密欧
Romorantin	罗莫斯坦
Ronsard	龙萨尔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
Rothschild	罗德希尔德
Rottes	罗泰
Rouen	鲁昂
Rueff - Pinay	吕夫 - 比内

S

Saint - Denys	圣德尼
Saint - Dizier	圣迪济耶
Saint - Germain - des - près	圣热尔曼 - 德普雷
Saint - Jacques	圣雅克
Saint - Lazare	圣拉扎尔
Saint - Ouen	圣旺
Salle Pleyel	萨莱·普莱耶尔

Sargent Shriver	萨金特·施赖弗
Satory	萨托里
Savien	萨维扬
Scribe	斯克里布
Serger Bosc	塞尔日·博斯克
Serger Gainsbourg	塞尔日·盖恩斯布
Serger July	塞尔日·朱利
Severine le Crix de la Salle	塞弗丽娜·勒格利·德莱萨莱
Sidgnick	西奇威克
Simone Nora	西蒙拉·诺拉
Simone Valère	西蒙拉·瓦莱尔
Solfèrino	索尔费里诺
Soufflot	苏夫洛
Soumise	苏米兹
Souvarine	苏瓦林
Springer	施普林格
Staline	斯大林
Stéphane Berg	斯特凡纳·贝格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Suzanne Massu	苏珊·马絮

T

Téléran	德黑兰
Theule	特勒
Thimoty White	蒂莫蒂·维特
Thierry Desjardins	蒂埃里·德雅尔丹
Thouin	图安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
Toulon	土伦
Tours	图尔
Trocadéro	特罗卡代罗
Trudaine	特律代纳
Truffaut	特吕福

Tuileries 杜伊勒利
Turgot 蒂尔戈

U

Ulme 于尔姆
Unelec 于纳勒克

V

Val - de - Grace 瓦尔 - 德格拉斯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Vauban 沃邦
Vaugirard 沃拉尔
Vendôme 旺多姆
Vesoul 维祖尔
Victor 维克多

W

Waldeck Rochet 瓦尔德克·罗歇
Warner Books 沃纳·布克斯
Wolinski 沃林斯基

X

Xavier de la Chevalerie 格拉维埃·德拉舍瓦莱里
Xavier Langlade 格拉维埃·朗格拉德

Y

Yannick Guin 杨尼克·甘
Yves Chotard 伊夫·肖塔尔
Yves Guéna 伊夫·盖纳
Yves Kervendaël 伊夫·凯旺达埃尔
Yves Lancien 伊夫·朗西安

Yves Lichtenberger	伊夫·利什唐贝尔热
Yves Mourousi	伊夫·穆鲁西
Yves Rocton	伊夫·罗克通
Yvonne de Gaulle	伊冯娜·戴高乐

Z

Zamanski	扎曼斯基
----------	------

法国瑟伊出版社给本书译者《68年5月风暴史》一书中文简体本版权授权书



Editions du Seuil

2^e rue Jacob
75261 Paris cedex 06
Tél. 01 40 46 50 50

M. WAN Jia Xing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Section d'Histoire Politique
432100 Xiaogan du Hubei
CHINE PAR AVION

Cher Monsieur,

Je vous remercie pour votre lettre du 12 mai et votre intérêt pour l'ouvrage de Laurent JOFFRIN intitulé Mai 68. Histoire des événements Je vous confirme volontiers que les droits chinois (caractères simplifiés pour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ont actuellement disponibles.

Nous serons heureux de pouvoir associer nos efforts aux vôtres pour qu'une telle édition soit entreprise, et nous vous donnons notre accord pour que vous fassiez librement quelques démarches en ce sens auprès des éditeurs qui vous semblent susceptibles d'être intéressés. Nous vous recommandons toutefois de ne présenter, dans un premier temps, qu'un résumé du livre et un échantillon de votre traduction.

Dès que votre projet retiendra l'attention d'un éditeur de votre connaissance, il vous faudra nous le signaler (de même qu'à Monsieur Darrobers) et l'orienter vers nous. Nous devons en effet échanger notre contrat usuel avec cet éditeur, et soumettre du dossier de demande de subvention auprès de notr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ans l'attente de vos prochaines nouvelles, je vous prie de croire, cher Monsieur, en l'assurance de mes sentiments les meilleurs.

Roselyne Bailly
Droits Etrangers